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左舜生自選集

左舜生著

近作·雜文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左舜生選集  
近作集



→

民國三十一年攝於重慶  
時年五十歲



←

民國三十六年任農林部部長  
時攝時年五十五歲



民國四十五年攝於香港  
時年六十四歲



民國四十三年春攝於台北  
時年六十二歲



左舜生選集  
雜文集

# 目錄

大陸「民主」與「反民主」的大決鬥	一
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	一三
記留台北三週的觀感	三一
略記旅美四個月的一些實感	五三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一二三
旅臺一月記	一三五
日本在美化中	一七三

## 大陸「民主」與「反民主」的大決鬥

中共蟠踞大陸十六年，鬧了十六年，最近更鬧得烏煙瘴氣。胡鬧是一切共產黨的本質，中共不能例外，理所當然。可是他們這次的鬧，牽涉的人數之多，地域之廣，內容之複雜，却與已往任何一次不同。我們要了解他們這能鬧的嚴重性，必先了解中共當前內外的情勢，始能分析這次動亂的起因，並推測其可次的結果。

先就他們外在的情況說：

一、中共原靠蘇聯起家，毛澤東尤其強調過「一面倒」。即在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以後，

大陸「民主」與「反民主」的大決鬥

蘇聯也確曾繼續援助過中共一個很長的時期；初期中共政權之所以能漸趨穩定，居然還能高談建設，不能說與蘇援沒有關係。自然蘇方的這種援助不是沒有條件的，他們那種居高臨下的氣餒，也不無給予中共自尊心以一種刺激；不過就大體說，究竟也還沒有到絕對不能忍受的程度。即以今天的情況來看，美國對中共所以不敢採取斷然的高壓，他們所顧慮的，也還是在蘇聯而不在中共本身。單從這一點來講，說中共至今依然受着蘇聯的掩護，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赫魯曉夫比較毛澤東有常識，感覺也相當銳敏，他曾攜同若干專家，親自訪過美國，他了解美國的實力決不是一場謾罵，或幾句空空洞洞的口號，幾篇又長又臭的文章，所能對付得了；他似乎也懂得美國今天所謂資本主義，與一百年前馬克斯（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所認識的，並不一樣；他充分了解東歐共產國家的脆弱，決不能作為他們有力的幫手，而只是他們一個沉重不堪負荷的包袱；他理會到上次大戰後西德與日本復興的突飛猛晉，足以使蘇聯有遭受東西夾擊的可能；他也懂得亞洲的共產黨（包括中共與印尼），人數雖然可觀，實力則不堪一擊。基於上述種種的事實，他乃充分認識所謂世界革命，去事實還非常遙遠，在今天就要憑着空想，幻想去盲目推進，結果一定要碰得頭破血流，粉身碎骨！赫魯曉夫把這種情形，看得明明白白，瞭如指掌，他絕對不肯把蘇聯兩億人民作為孤注一擲；他



不願眼看列寧五十年的艱難創業毀於一旦；尤其不願看見他們辛苦造成的建設基礎在美日、英德夾擊之下，化爲灰塵；而使資本主義在蘇聯這塊土地上公然復活。因此，他才毅然決然把他們的對外政策和緩下來，只希望能實現和平共存這個原則。例如三年前的古巴事件，一時美蘇間的空氣，確已充滿火藥氣味，頭一天蘇聯的代表左林，還在聯合國會場掉弄他的唇槍舌劍，大放厥辭，把美國代表史蒂文生的面孔，逼得紅一陣，白一陣，幾乎不得下台（其時我正在會場旁聽），可是當天的晚上，他們却已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斷然對美讓步。這是理智，不是衝動，也就正是他對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活用。

現在赫魯曉夫雖已退出他的崗位，但由他所代表的這一外交政策，仍由他的繼承者廣續執行，而且執行得非常有效；執行這一政策的範圍，也越推越廣。例如，現在蘇聯的當局，表示歡迎與日本合作，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假如日本的政治家也具有同樣氣魄，慨然接受這一邀請，由雙方簽訂五個五年到十年的計劃，使這一蘊藏豐富的廣大地區由荒涼變成沃壤，由貧瘠變成繁榮，使得這條貫通歐亞的大鐵道，減輕它的軍事價值，而加強它的經濟價值，這真是一個偉大的世界政策；不僅日蘇本身的相互威脅可根本解除，即對於人類和平共存的理想，也是最有效的一着。自然，茲事體大，真要把這一企圖見諸實行，日蘇兩方，一定各

有其先決條件，必須經過周詳的商討。合作原則首先通過，進而擬定具體計劃，也還要經過專家們精密審慎的調查與勘測。科技人員日方可以供給大部分，蘇方也可供給小部分。投資事項假如能得美國贊助，通過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運用三五十億美元，完成收益較快的第一期計劃，當不甚難。勞働力則暫時只能求之日蘇兩方，將來則北韓及我東北的耐寒人民，也未嘗不可發動。日首相佐藤有於本年繼推名外相訪蘇的傳說，果能實現，則對此一計劃，可能有所推動。假定日方所提的先決條件，包括千島領土的歸還，漁約束縛的解放，則蘇聯不僅應該欣然同意，甚至就將庫頁島南部一併歸還日本也應在所不惜。今天的日本，爲美蘇雙方所爭取，美國把日本拉得越緊，蘇聯對日本將放得越寬，日本所以取得這一左顧右盼，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這是中共一面反對「美帝」，一面又反對「赫修」的當然結果。中共又不僅反美反蘇，他們也早已反日，反英，反印，反泰，反越南，在不久的將來，他們還要反印尼，反大馬，反阿聯。他們這種的對外姿態，我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過獨木橋的外交政策」(「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這是咱們湖南人最歡喜掛在嘴上的流行話，老毛也會在他的大作裏面引用過)。現在大陸一小撮自封爲無產階級的代理人高唱擁護「毛澤東思想」，我積四十年對老毛的觀察，深知毛澤東不可能有思想。他腦子裏除掉

中國幾部舊小說，幾首油腔滑調的舊詩詞，對現代一切思想學術，從未有過任何接觸；連馬克斯列寧，也僅僅得諸耳食；即他自己，也只說過「槍桿子出政權」，却從來沒有說過「槍桿子出思想」。現在的捧毛專家，一定要把這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的金牌子鎖在他的頸子上，這等於變無爲有，變毒草爲香花，變嫖母無鹽爲西施王嬙，變牛鬼蛇神爲祥麟威鳳。即老毛自己對鏡子照照，豈不也要啞然失笑！

二、越戰打到那一天爲止，目前尚不可知，但戰事一天不停，中共對北越與越共總要支援下去。儘管美國內部不免因越戰引起相當波動，但美國政府態度迄未改變，而且增兵不已戰意甚濃，中共既不敢公然出面，但站在背後苦撐，却也大費氣力，而又無可申訴。美國雖聲言不與中共作戰，中共却不能不防，於是，構築防空設備，訓練民兵，剷掘四通八達的地下地道，準備在地下作戰，使得無限的人力、物質、金錢，一切擲諸虛化，因而生產無法增加，人民生活到底無法改善，而且一天天陷於無法生存。再加上印尼的事變，也是由中共導演的。他們在事前對印尼共黨估價過高，多方打氣，其有金錢上的資助，武器的供給（甚至連郵票也替他們改印了），自更不待說。可是印尼共黨雖號稱三百萬，但畢竟還是一個沒有成熟的果子，中共迫不及待，一定要把印共推上台去，造成東南亞一個新局面，藉以挽回越

戰的頹勢，且打擊大馬，逼走英美，而由中共取得東南亞的領導地位。不幸事與願違，不僅印尼共黨被軍方掃蕩無餘，中共在印尼一切公開與秘密的活動機構，也清除殆盡，與中共有關的華僑隨同破產，且被驅逐；中共外交人員挨打，也仍被驅逐；遭受侮辱到了這一步，可是中共的「銀樣蠟槍頭」原形畢現，除空言抗議以外，乃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中共外交已陷於如上述的這種絕境，但毛澤東依然抱定他的拳匪思想不肯改變；他們依然要高呼世界革命，依然要反美反蘇，依然要向蘇聯問鼎之輕重，爭取共產世界的領導權！其結果，世界反共的箭頭本來全集於蘇聯的，今乃轉而全集於中共。中國一般的老百姓，可欺騙的限度很高，他們自然對這方面不會說什麼，但大陸開明分子以及中共內部若干比較有頭腦的高級幹部，深知道前路漫漫，苦悶到忍無可忍，乃非站起來說話不可。因此，我覺得大陸反毛的形勢，實以中共對外失敗為主因，其他尚在其次，不過參加反毛的人，依然要就內部的情況找題目就是了。

其次再就他們內部的情況說：

三、現在中共內部的情况，可以說是一場糊塗，過去他們對於自己的醜態，多少還要遮遮掩掩，這次他們總算把所有的遮羞布全部揭開，赤條條讓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目前解釋大陸這次動亂現象的，包括中共自身以及海外反共的人們，大率不外三派：

第一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他們說：無產階級用來作為革命武器的，就是所謂「毛澤東思想」。據我看，這一派決不能說明目前大陸動亂的真象。其原因之一，便是今天在大陸大做文章來提倡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這羣傢伙，他們自身就不是無產階級，而只是冒充無產階級，混進無產階級裏面來剝削無產階級的老手。他們的第一目的在吃飯，在吃好飯；第二目的在保住一把椅子，還想爬上一把更高的椅子；第三個目的在保險，他們最怕被人指為革命對象，因此才趕忙寫出這些文章以求免死。老實說，今天真正無產階級的人們，百分之九十九，並不會寫文章，尤其不會寫這種又長又臭的文章，因為凡能寫這類長文的傢伙，全部都是由小資產階級裏面滾出來的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見解不夠知識有限，除毛澤東的書不讀，他們如何能解釋這次動亂的原因，或進一步推測其結果？

所謂「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根本就不能成立，毛澤東只有：感想、空想、幻想、胡思亂想，絕對無所謂思想。假定毛澤東果有一套自成體系的思想的話，那就應該「真金不怕火」，為什麼不許別人批判呢？今天大陸反毛的開明分子，他們只反對毛澤東的行爲，並沒有涉及所謂「毛澤東思想」。老實說，在這羣開明分子的眼中，「毛澤東思想」還沒有取得

被反對的資格，更如何把它作為武器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呢？

第二派，「中共上層分子權位爭奪說」。他們的理由是說毛澤東快要死了，中共領袖這一席，劉少奇想幹，周恩來想幹，林彪也想幹，……於是他們下面的嘍囉們便各為其主的鬧了起來，希望他們的主子得勢，他們可以雞犬登仙。這種情形不能說完全沒有，但不能說這就是亂子起來的主要原因。因為毛澤東死在眼前，乃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毛死以後，只要這個邪惡的政權不立即瓦解，他這個位子總得有人繼承。無論繼承他的人姓劉、姓周、或姓林，……甚至他們幾個人力求妥協，而產生所謂集體領導，一如他們的先進蘇聯一樣，這次的亂子並不會因此平息，而且還要繼續擴大。

據我所知，這次發難的開明分子，他們自有立場，各有其較高修養；過去對黨，各有勞績，在黨內地位也不算低；真正甘心樂意願為某一上層分子作走狗的，即有也不太多。這都可以說明所謂上層分子的權位爭奪，與這次亂子之所以起來，並無不可分的關係。

第三派，「槍桿子抬頭說」。這一說，確有事實可指，最顯著的，便是他們的「解放軍報」，已經變成了槍桿子對政治發號施令的廣播台；而且他們也會坦白的說：「大家要好好聽黨中央、毛主席的話，同時還要聽軍委、林彪同志的話」。照過去中共的習慣，他們的軍

人是不敢對政治隨便發言的，即資望在林彪之上的朱德、劉伯承之類也從來安分不敢亂說。這次這位「林彪同志」居然一躍而與他們的「毛主席」比肩，這不是槍桿子抬頭是什麼呢？可是，話仍得說回頭，這次是亂子已經起來，而且已經嚴重無法收拾，然後才不得已把槍桿子搬了出來，並不是槍桿子已經抬頭才發生這次的亂子。我們細細檢查這次開明分子所發表的文獻，他們所反對的只是毛澤東和黨的所行所爲，他們並沒有對槍桿子有什麼過不去。毛澤東說過，「槍桿子出政權」，他們這個邪惡政權，本來就是由槍桿子造成的，現在他們的政權已經發生根本動搖，已經不是毛澤東這個人可能安定得了，不得已才把槍桿子抬出。這說明毛澤東的威望已經掃地，據他們揣測，可能使這班開明分子稍稍懼怕的，也便祇有這幾根槍桿子。可是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推測大陸這次的亂子一定還要擴大，也一定還要嚴重，毛澤東死了固然要亂，毛澤東不死也依然要亂；因爲今天這個邪惡政權，毛澤東這個人，除槍桿子以外，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給它們以支持了，「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權既非靠軍人支持不可，今後想更以黨，以政制軍還有什麼可能呢？

中共的軍人巨頭以數十計，正規軍號稱三百萬，民軍又好幾百萬，你以爲像林彪這樣一個帶病延年中無所有的小人物，真正可以統率得了嗎？袁世凱死了，袁所哺育成長的北洋軍

閱，還在中國鬧了十幾年；毛澤東一死，他所哺育成長的這一大堆所謂「人民軍隊」，你們還怕這一羣紅色軍閥不會你爭我奪分別據爲自己的私產嗎？誰有多少槍桿子，便誰也會建立一個多大的小政權，到那時候，今天中共這個邪惡的統一政權，便告壽終正寢。到那時候，國際的白色和赤色帝國主義，各就歷史因緣與地理方便，分別對這般紅色軍閥，加以消滅與收買；到那時候，便不是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的問題，而是十個或二十個中國的問題（但不害怕，這個時代不會太久）。

然則，上面三派都不能說明這次大陸動亂的起因，也很難得出一比較可靠的推測，你的看法又怎樣呢？我鄭重回答：大陸這次的大搏鬥，依然祇是一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我們不必扯上什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也不必扯上什麼工、農、兵、羣衆。中共政權在大陸出現還祇有十六年，中國民主思想的培育與發展，却已經有了七十年以上的歷史。在這七十多年的期間，經過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嚴復、蔡元培、宋教仁、蔡鍔、胡適、陳獨秀，……諸人的倡導鼓吹，繼以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撲滅袁世凱帝制，張勳復辟，加上全國知識分子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還加上全國人民，在蔣先生的領導之下，以十年之力撲滅國內軍閥，更以八年抗戰，撲滅日本軍閥等等的事實表現，民主思想已經深



入人心，民主要求已成舉國一致。中共邪惡政權一切反乎民主，當然成爲革命的對象，過去梁漱溟、張東蓀、馬寅初、周炳琳、章乃器的義不屈服；章伯鈞、羅隆基「章羅同盟」；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以及這次大陸開明分子的投袂奮起；無非都是「民主」對「反民主」的生死決鬥，也就是七十多年的民主運動所開出的花，所結出的果！

我們今後惟有高舉民主的大旗，向共匪開火，千萬不可三心二意，照毛澤東那樣去胡思亂想。必須了解無論怎樣千迴百折，中國終於要出現貨真價實的民主，然後才有一個和平統一，分治合作的現代國家出現，這是我們不可動搖的一個信念。

（原載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微信新聞報）



## 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

——張聞天、田漢、李達及其他

大陸對多數開明分子的高壓仍在繼續擴大中，我想起一個早被清算的張聞天，兩位正在被清算的田漢和李達，都和我有過一段關係，把我知道他們的若干事實，在這裏談一談，也許對注意大陸問題的朋友們有些用處。

張聞天，江蘇南匯人，民國八年開始和他交往的時候，他和沈澤民（沈雁冰的弟弟）正

在南京河海工程學校讀書。「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民國七年，我在第二年便已加入，其時我在同學黃仲蘇的南京家裏爲他的幾個妹妹和兩個小姪女補習國文。張沈兩位知道我是「少中」的會友，也許還在「少年中國」月刊和上海「時事新報」見過我的文字，因而未經任何人介紹，便一同來看我。我和他們經過幾度見面和談話，覺得他們研究的雖是河海工程，但中英文都不錯，對文學的興趣很高，對他們的印象確實不壞，因和仲蘇商量把他們介紹加入了「少中」學會。

其時，我的年齡已二十五六，張、沈還不到二十。其時「少中」有三個姓沈的會員：沈怡、沈昌、沈澤民，加上張聞天和劉仁靜，都算是我們最年青的會友。

民國九年春天，我加入了上海中華書局編譯所任新書部主任，不久張、沈在南京畢業，我便把聞天介紹進中華書局，和我同事。民九以後的幾年間，在我這一部有四個同事，後來都變了共產黨員：一、聞天，二、田漢，三、李達，四、何叔衡。關於田、李的故事，下面再談，現在先談聞天。

聞天在河校畢業後，便結了婚，而且生了一個孩子，他的太太和小孩，住在上海對面南匯的家裏。聞天進中華以後，便一直和我在哈同路民厚北里同住一房，我不會見過他回家一

次。有一天，他的太太抱着小孩子來找他，聞天立刻逼着她回去，她的眼淚一大顆一大顆落在懷裏孩子的頭上，但聞天無動於中，這可看出「五四」以後的青年，對自己婚姻不滿的態度。

當聞天和我同住的時候，他急於要找到一個新的對象，對吳淞中國公學一位四川姓文的女生，和當時一位美名噪於一時的毛小姐，他都下過不少的工夫，可是兩者皆無成就。

聞天對讀書是用功的，其時H.G. Wells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新出版，聞天便買來擺在我們臥室的書桌上，從第一頁到末了一頁，以兩星期的工餘時間，通讀了一遍。這也是「五四」以後，一部分青年急於追求新知的共有態度。

聞天和我同事的時間不太長，大致兩年左右。後來我知道他去過一次美國，但他是那一年加入共產黨的，我不知道。民國九、十年之間，我和惲代英、鄧中夏（原名康，和惲同爲「少中」會友）常在一塊，不會見過聞天參加。我和陳獨秀也有過一時期的往來，而且在他編的「嚮導」和代英編的「中國青年」上寫過稿子，也不會見聞天在這兩種刊物上有文字發表。

聞天在中華書局出版過一本中篇小說（書名已忘），我看過原稿，內容寫一個青年和他

的父親發生激烈衝突，文字非常尖銳，這可看出他當時思想的一斑。後來（時間在民國二十年以前）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曾以訓令方式，通知上海各書店，一次禁止了兩百種以上的新書，單我在中華經手出版的，也在二十種左右。聞天這本小說，和田漢的一本「咖啡店之一夜」的戲曲集，都在禁止之列。

民國十四年，我加入了青年黨；十五、六年，我又離開書局到法國去跑了一趟；從此以後，我和聞天的關係，便有一段長時間脫了節。後來我知道他到蘇聯讀了幾年書，俄國話說得很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過翻譯，後來他和陳紹禹、秦邦憲等都變成了有名的國際派，在黨內所擔任的職務，也逐漸的重要起來。

民國三十四年，我和褚輔成、黃炎培、冷通、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同訪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舉行了三次會談，聞天便是他們的八代表之一。其時我已五十二，聞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却和我們在上海時一樣，他和我確也談得很親熱（這是我們「少中」同人的一種風氣，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的私人情感，總是超越黨派或政治意見之上的）。毛澤東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當然知道我和聞天的關係。這次他所以把聞天排在八代表之內，大概多多少少是爲了敷衍我的。會談結束，我向毛提出，說我個人要和

聞天談談，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於是，我和任弼時一陣去會張，任係毛的親信，我和聞天談話，他便坐在旁邊，因此我們便只能敘舊，不便談政治，這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所謂國際派，是何等的猜忌。其時聞天住的地方，非常簡陋，桌上除幾本外文書和一部電話以外，別無他物（與周恩來的住所迥然不同），同時，我也不會看見他的太太，大概一直到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光桿，我聯想到他所追求過的那位文姓女學生，和那位毛小姐，也許是因為他的眼光提得太高，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對象吧，但這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囉！

當毛澤東還在向蘇聯「一面倒」的時代，他儘管對國際派如張、陳、秦諸人非常猜忌，但表面還得敷衍，因此聞天（洛甫）會歷任要職，做過駐蘇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一直到中共和蘇共大決裂以後，才把他凍結起來。他現在也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精神上也許很不舒服，但他與這次的大風潮，似乎沒有直接關係。

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都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其時中共有一個代表團留在重慶，周恩來任團長，指揮一切。葉劍英則為軍事代表。陳紹禹愛出風頭，對政治和社會都認識不夠，但領袖慾極強，辯才無礙，每遇着他在參政會發言，能說會道的主席汪精衛，也

只能皺皺眉頭了事。有一天，張君勳和我與蘇聯駐重慶大使鮑格莫諾夫見面，陳爲我們當翻譯，俄國話熟極而流利，我和君勳都承認他是中共一個可造的人才。可是毛澤東始終對他放不下心，可能周恩來對他也不滿意，大致他留在參政會只有兩年，便調回了延安，據說他回延安後，一直病了好幾年，說不定已被毛軟禁。我們到延安後，想揭破這一祕密，也要求和他談談，毛不好拒絕，經過兩天，我們便見着他了。其時是陽曆七月三、四號，中午延安天氣很熱，但他仍穿着棉衣褲曬太陽。據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打過一千多針，看樣子確實有病。他住的地方比閩天的更不如，並且電話也沒有，會客的地方，除幾把椅子以外，別無他物，他的太太帶着一個小孩，面黃肌瘦，可看出他們的營養不良。現在他已經是六十九歲了，是否尙在人間，誰也不知道。他是安徽六安人。

秦邦憲情形稍好一點，仍可往來延安與重慶，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延安主編「解放日報」，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張，我們這幾天在延安活動，都成了這張報紙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對他說：「您回延安後，身體胖多了。」他說：「我在這裏，只是飽食終日。」這句話充分表示他無所事事。後來他和王若飛，都是在抗戰結束時回延安，因飛機失事死了的。他是江蘇無錫人。我與李幼椿和他第一次見面在上海滄洲飯店，其時是抗戰前，



廬山談話剛剛結束以後，這一晚也有周恩來在座，我們的談話內容，是關於如何求得抗戰勝利的一點。

田漢，字壽昌，長沙人。我和他在徐特立（懋恂）創辦的長沙縣立師範同學。其時是民國元年，他十六歲，我十九歲。他大致在長沙師範讀了四年才去日本，我只讀半年便跑了。我和他朋友關係的建立，不在同學而在長沙定王台省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規模不算大，但內容相當充實，藏舊書近十萬冊，善本書頗多（開辦初期，湖南著名經師皮錫瑞鹿門任過館長），清末民初出版的新書也有好幾千冊。因地點僻處東城，看報的每天有二三十人，但看書的只有四五個，遇着風風雨雨的時候，尤其是寒暑假，三間閱覽室，便幾乎被我和壽昌兩人專用。閱覽室的三面，裝着大的玻璃窗，窗外有十幾棵芭蕉，風搖葉動，夾着打在上面的雨聲，更令人神往。其時壽昌看的書已經以文學為主我還在亂看亂翻的時代。我偶然在「長沙日報」發表演文，壽昌便在第三版發表他的改良湘戲，記得他寫過一齣「新三娘教子」，以黃花崗某烈士的家庭為題材，給我的印象頗深，這是壽昌寫劇本的開始，也是我們以文字相見的開始。「長沙日報」的總編輯傅熊湘，字君劍，一字鈍根，是「南社」有名的社員之一，光緒三十二至三十四年，他在上海主編「競業旬報」，胡適之便為這本雜誌寫過稿子不

少。他能儘量把我和壽昌的稿子在報上發表，確也給了我們一種鼓勵。

我們在圖書館，有幾次看見徐特立的爸爸，六十左右，常常拿一本木版大字的陶詩，坐在閱覽室外的階簷邊上高聲朗誦，有一首我便聽也聽熟了；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植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將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有人說，此老有神經病，我看不盡然，假如，這便算是神經病，那末徐特立終日忙忙碌碌，東奔西走，向人說話，慷慨激昂，見人發起什麼事，便想進而包攬，便算是神經病之尤了。平心而論，徐特立這個人，確不失為熱心分子，毛病出在學養不優，宗旨無定，當清末請開國會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他便砍下兩個指頭，寫了「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字血書，交給當時湖南的請願代表羅傑。等到勤工儉學有人大力鼓吹，他的年齡已經四十二，便拋棄一切到法國開始學法文，還要一面做工，一面研究他所愛好的數學。回國以後，他看見共產黨已經鬧得蓬蓬勃勃，他又變了共產黨。民國三十四年我到了延安，他的高齡六十有九，我問他近來幹什麼？他說：他想把許多部門的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等等，編成一種綜合性的教科書。延安另有人告我，說他近來還要跳到延安河裏去洗澡。今年他已九十，據大陸報

紙記載，他依然見獵心喜，還要和莊則棟比賽幾盤乒乓哩！羅傑因爲他的斷指血書所感動，曾送過他一首七律，有兩句警句：

「指痕送別壯南八，才氣逼人求李雙。」

我承認他「才氣」確實是有一點，但微嫌太亂，外省人不大知道他，他在湖南，却是一部分青年的偶像，近年湖南的亂人出得最多，受他的影響不小，我們要懂得毛澤東，懂得田漢，便多少有了解徐特立這個人的必要。

壽昌離開了長沙師範，便到日本讀書，後來進了東京高師，在名義上儘管是繼續研究教育，但仍以搞文學爲主。他曾告我，他每次出去，總要在神田區一帶買一兩本書，遇着有好戲或好電影要看而沒有錢，便又搬幾本書去當了買票（在日本，好書是可以當錢的）。他去日本三四年，回了湖南一次，便把他的表妹，即他的未婚妻易漱瑜帶了出來，再去日本。其時已民國八年，我在南京教書，已加入「少年中國會」，他路過南京，和漱瑜一陣來看我，事前並未通知，使我喜出望外，於是我把南京的「少中」友人，以南京高師和金陵大學的學生居多，和他見了面，我還帶着他和金大的教務長劉伯明（經庶）作過一次長談，凡伯明提到的書，壽昌大抵看過，談得甚爲融洽，事後，劉伯明還常常對我恭維壽昌不置。壽昌之加

入「少中」，就在這一時期。民國九年，主持「少中」會務的王光祈去了德國，我進了上海中華書局，「少中」的會刊「少年中國」，便由我負責編輯，壽昌寫過不少的稿子，他的話劇處女作「環珮璘與薔薇」這個劇本，便在這個月刊上發表。這個時候的「少中」月刊，內容還很幼稚，但銷路不壞，平常每期銷六七千冊，出過兩期婦女問題專號，都超過一萬，黃仲蘇的妹妹後來成了武漢大學理學院長查謙的太太黃孟姒，和後來成了李達太太的王會悟，朱謙之的太太楊浚累，都在這兩期上有稿子。

壽昌有個舅舅名易象（字梅丞，一號梅園），學問不壞，曾做過湖南留日學生監督，壽昌能到日本讀書，還得了一份官費，大概得着他舅舅即他的岳父的助力不少。但後來易象捲入了湖南地方政治漩渦，在長沙爲他的政敵所殺，當軍隊包圍他的住所，拉他下樓槍斃的時候，他知道不免，還從容寫了一首絕命詩：

「天外飛來事可驚，丹心一點付浮沈，愛鄉愛國都成夢，留得來生一恨吟。」

這件事大致發生在民國十年左右，這對壽昌、漱瑜的精神上是一絕大的打擊。壽昌的母親，我在上海常見面，也是一位明白多禮的老太太，壽昌之敏而好學，大致和他的母系血統是有關的。

壽昌在東京高師畢業後全家遷往上海，我請他加入中華書局（其時張聞天已離開了）。在中華做事有一好處，即書局對我們的工作，絕對不加干涉，我們名雖編輯，大部分時間，都在利用編輯所的圖書館讀我們自己要讀的書，民國十一、二年之交，他們的圖書館，已有藏書三十萬冊，民國二十年我離開以後，已陸續加到五十萬冊。其時，我已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中國與列強的關係史，壽昌則加緊創作劇本，並從事翻譯。他的戲曲集如「咖啡店之一夜」，翻譯的莎翁劇如「哈孟雷特」、「羅蜜歐與朱麗葉」，王爾德的劇本「莎樂美」，「日本戲曲集」等等，都在這個時候出版，書局並沒有把這些工作算在編譯所的時間以內，還是另給稿費或抽版稅的，這比較今天香港的出版家，似乎賢明得多。日本的作家如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之類到了上海，因壽昌的關係我也和他們見過面；中國方面從事文藝的人，凡與壽昌有往還的，我大抵也有過接觸；我對當時的所謂新文學能感興趣，並且知道這件事的重要，為中華書局出過許多文學部門的書，壽昌對我可說是最有影響的一個。

壽昌在中華工作，大致有三年左右，離開以後，他的文學運動，尤其是戲劇運動，便大大的展開：一面從事寫作，一面也從事實驗。壽昌與青年黨無關係，但他出過一種「南國特刊」，却附在青年黨的機關報「醒獅」出版。民國十六年，他創辦了一個「南國社」，設有

一個實驗劇場，可容納觀眾三百人左右，隨時有他自己寫的劇本上演，歐陽予倩寫的「翠屏山」，由予倩飾潘金蓮，周信芳飾武松，也在他這個劇場演過。到「南國社」不僅有好戲可看，而且有香檳、威士忌可喝（壽昌從那裏找來的錢，我却不明白，也不願明白）。結果是賓至如歸，我自然也是座上客之一，因而我認識搞文學的朋友也越來越多，「創造社」的郁達夫和他的太太王映霞，我便是第一次在「南國社」見着的。當時的王映霞是那樣美，我真為他們暗暗祝福。壽昌又不只在他的實驗劇場演戲，有時還帶着大隊人馬到南京、杭州等處上演，氣象真是活潑極了。後來唐槐秋（此君係青年黨）父女組織了一個「旅行劇團」，到處演戲，便是直接受着壽昌的影響。

壽昌對男女生活是相當浪漫的，自從民國十二年秋天易漱瑜死了以後，他續娶的一位名黃大琳，同時還有一位林蘇菲，也和他「濃得化不開」，後來這位林小姐到南洋教書去了，所有寄給壽昌的信件或食品，還是由我轉交，「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像這類的事，我總是樂於幫忙的。現在他的太太名叫安娥，我却不認識。

據說壽昌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三）加入共產黨的，從此他和夏衍（沈端光）、陽翰笙便成了左翼話劇界和影劇界的領導人物。壽昌在抗戰前後寫過不少劇本，抗戰中，他更到

長沙、桂林、昆明等處作過演劇活動。他這個時候，名義上是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下面負責文藝宣傳工作，但他自從「創造社」以來，便一直看郭沫若不起，因而他很少跟郭在一塊做事。當壽昌在中華書局的時候，郭還在日本讀書，曾寫過不少白話詩在「時事新報」的學燈發表，有一首可憐巴巴的表示要自殺（爲什麼我不清楚），頗能引起若干人的同情。後來郭又和「少中」會員宗白華（時任學燈編輯）有關於哥德的討論，壽昌也參加了，於是他們三人把有關這一方面的文字輯成一小冊，名爲「三葉集」，在亞東圖書公司出版。可是等到白華、壽昌把他介紹進「少年中國學會」的時候，郭在四川的中學同學會琦、魏嗣鑾、李劫人等（均少中會員）却堅決反對，說他在中學時便品行不端，因而他卒未成爲「少中」會員。後來郭這一特殊的不良行爲，更大有發展，現在在台灣的張夢九，和抗戰時參加汪偽組織的傅式悅，都最清楚。壽昌之所以看郭不起，這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大家只知道郭叫「斯太林爺爺」、「親愛的鋼」、「永恆的太陽」……實際他的卑鄙何止如此，這次大陸大舉清算知識分子，郭首先自打耳光，以求保持這碗共產飯，在一個知道他歷史的人，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共黨蟠踞大陸以後，他們居然能用壽昌、歐陽予倩、洪深、丁燮林、夏衍、茅盾、周信

芳等領導戲劇和其他文藝工作，我總覺得用當其才，以爲共黨在這方面，或能有所發展，沒想到壽昌卒以「謝瑤環」一劇翻船；吳晗本來是搞歷史的，這次也以「海瑞罷官」的劇本奉入，真是不幸得很。以壽昌的性格來說，富有正義感而又讀書甚多，骨頭相當硬，不肯輕於妥協，尤其不拍馬屁，要和郭沫若輩爭一日之長，當然是不可能的。假定，他這次還能不氣死，不餓死，我希望他能關起門來，寫一本回憶錄，把他五十年來從事戲劇活動的艱苦經過記錄下來留贈後人，使繼起作這一活動的人有所憑藉，我想這是很有益的。

李達，湖南零陵人，現年七十五。他本來是在日本學工業的，捲入了「五四」以後的思潮，也頗留意社會科學。我原來不認識他，他回國以前忽然寄給我一部由他譯出日本人著的「社會問題總覽」，請我代他向中華接洽。我覺得他的譯稿寫得乾淨，文字清通，便接受下來，因而和他通過幾次信，出版後居然銷了好幾版。他畢業回到上海，一時找不到工作，我便把他拉入中華幫忙。他沈默寡言，看樣子很老實，做事也相當負責。但說他可以做一個大學校長，則太嫌不夠。他在中華，大致只有一年多光景。其時上海有一大羣女子，都在東跑西跑的找對象，有一名王會悟者，貌僅中人，稍解文字，略有常識，和我也有過短時期的往還。據我所知，她本來已有一個假定的目標，可惜只限於「落花有意」。會悟有一姪女，貌



美且較年青，不久便與沈定一的兒子訂了婚，結了婚，於是他這位姑姑的求偶之心更切。剛好李達到了上海，也正有找人的需要，與會悟見過幾面，後來他們又住在一所屋子裏面，再經過老李一度的懇求，於是會悟不得已而思其次，他們乃自然結合。我知道了，當然向他們恭喜恭喜。

李達離開中華以後，我們的關係便已中斷，他是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的，我全不知道。一直到中共佔據了大陸，老李居然做了湖南大學校長，我才再看見他的名字。這次他在武漢大學任內被清算免職，在我看一點也不稀奇，因為像李達這樣的共產黨人我看得太多，他們之輕於加入共黨，也正和他們輕於與一個女人結合，沒有多大的區別：和女人結合是一杯水主義，和共產黨結合是一碗飯主義。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只有愚蠢，却不浪漫，像老李這樣的人，既已上了共產黨的船，又不肯做奴才到底，以一個大學校長，在毛澤東看來還算得什麼東西，豈不是自討苦吃？

我在這裏，要附帶敬告一切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們：對毛澤東個人的估價不宜過高。例如有一位朋友說：「在中國歷代打天下的人物中而工於詩者，魏武帝之外，毛澤東應該是第一人。」那然則做過皇帝的人如劉邦、劉徹、楊廣、李隆基、李璟、李煜、趙佶等等，他

們都會寫出比毛澤東好上一百倍的詩或詞，您打算把他們排在第幾呢？外國人要翻譯老毛的詩不奇怪，因為他們根本不懂中國文學，中國人似乎不好這樣說。

（原載民國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徵信新聞報）

## 記留台北三週的觀感

我十年不到台灣，今年八月二十一到九月十日，乃得有三個星期留在台北。這好比失落番邦的遊子，經過這樣一個長的時間，始得重返故國。「故國舊都，望之暢然」，一切新知舊雨，家人親戚，給我以熱情的招待，過高的期望，我內心的愉快與感激，乃非尋常言語所能表達。「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今後除掉運用我有盡之年，充實自己，以求於縮短光復大陸時間，仍有萬一之補，也別無其他可以答謝大家這次對我個人的一番盛意。

「比較」是觀察一切事象或討論一切事理有效方法之一。我正因為十年不到台灣，以今

天的台灣景象與十年前我所見到的作一比較，再與十七年前我初到台灣所見的作一比較，我內心乃得着莫大的鼓舞，精神上也得着無上的安慰。

按照原定計劃，我本來想除台北以外，得一遊台中、台南，並飛花蓮一看橫貫公路的，後來因為在台北參觀訪問的日程排得太緊，被親友約去吃飯的時間又佔得太多，而我還要留下十天一去東京，乃不得已把原來的打算一切變更，留待明年再說。現在我僅僅把三個星期在台北的聞見，舉例說明幾項如下：

### 一、故宮博物院

第一，八月二十四日，我首先去看了「故宮博物院」。這是一個花了六千萬元（中華民國自任三千萬，美援三千萬）創建的機構，內藏自商周以來以迄今日的國寶不計其數。凡銅器、玉器、瓷器、雕刻、漆器、文具、琺瑯、法書、繪畫、織繡、圖像、圖書、文獻等等，無不保藏得完完整整，分室陳列。據院長蔣復璁先生告我：所陳列的文物，每三個月全部更換一次，假定一個人長期住在台北，每更換一次便去瀏覽一回，雖歷十年也無法全部看完；一九二六年及二七年，我曾於一年的時間內劃出一部分，隨時去參觀巴黎的魯佛爾博物院；

三年前我留在美國，在紐約、華盛頓、舊金山，也曾看過美國若干各種性質的博物院；論到規模的宏大，收藏的豐富，誠然足以代表人類若干方面的文明，可是，我們的這個故宮博物院有一點是和他們截然不同的，即我們所藏的古今文物，僅以本國人所手創的爲限而未及其他，凡世界學人以及一切觀光遊覽人士，要就東西文化從現存的實物作一清晰的比較研究，並探討亞洲若干國家的文化淵源，以求得東洋史的一個基本概念，都非有相當的長時間，到我們這個博物院來，作一番觀摩的工作不可！正當我參觀的這一天，一進大門，便看見一大羣（大致有四十位左右）美國和其他國家男男女女的觀光者從裏面走出；另有三位日本的歷史學者，正在就該院所藏的滿文老檔向蔣院長有所請益。我還知道有少數世界學人，曾在該院附近租定住所，逐日在該院作過長期的工作，他們有人會把我們這所博物院譽爲世界最重要的四大博物院之一。據蔣院長告我：現在每天到院參觀的中外士女以千計，如在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放假的節日，則到院買入門券的要擺長龍，人數以萬計。台北的氣候變化頗大，因雨水多，相當潮濕，因之調節室內空氣必須有良好的設備。各陳列室的光線，本來充足，但爲參觀者能看得格外仔細仍須輔以電燈，每一陳列文物的玻璃櫥內，更非裝置電燈不可，尤其在天陰的時候，還要使電力特別加強。如上舉調節氣溫，及應付火警、盜警及其他

意外的設備等等，一切都是電動的機械，因之消耗的電力特別大，且須晝夜不停。因此，該院乃有自己的發電房，不受公衆電廠停電的影響。至於全院的清潔工作，警衛工作，每一陳列室的防護工作，比之世界任何一處博物院的同類事項，都做得毫無遜色。又該院所陳列的各類文物，既規定每三個月必須更換一次，因而檢出與收入的工作也異常繁重；而且一不小心，便容易使文物蒙受毀損，以致無法補充與修繕，因之執行這類工作的人員，必須經過良好訓練，積有長期經驗，始能勝任愉快。凡此種種，都可使我們想像該院所用人員之多，每月支出經常費的龐大，蔣院長爲我詳細說明這類的情形歷一小時，最後，我對他說了幾句笑話：「您所做的這一偉大工作，站在我們保護中國文化的立場來說，您是『功首』；站在共產黨要澈底毀滅中國文化的立場來說，您是『罪魁』！集功首罪魁於一人，中國歷史上像您這樣身分的人物，確實是少有的。」他聽我這樣一說乃報我以苦笑，然後我向他匆匆告別。是日同往參觀者爲立委劉子鵬與國大代表趙純孝。

二十五日，我還看過一所與故宮博物院頗相類似的歷史博物館，雖規模不及前者之大，所藏文物不及前者之多（共兩萬七千餘件），但也有一部分東西爲前者所無，而爲後者所特有者。我僅匆匆瀏覽一過，內容不詳，不願多說。但有一事頗引起我的注意：即張默君在去

世以前，曾將她私人所藏的玉器，全數捐入該館，現在陳列於該館者爲數頗多。像這類化私爲公的精神，在外國固舉不勝舉，即在中國也不少這類先例（如梁任公的全部藏書，即捐入松坡圖書館），確實值得大家效法。

## 二、台灣大學

第二，我願一談九月一日所參觀的國立台灣大學。台大已爲今日亞洲的著名學府之一。就學生人數論，在三十四年接收時，僅有學生五八五人，自本學年度開始，即將超過一萬（五十三年度爲九千六百七十一人，內包括外國籍學生兩百人）。校址之宏大，各項建築物之日新月異，逐年增加（單就學生宿舍論，已能容納全體男女生半數五千人以上），實爲過去大陸任何大學所不及。目前有文學、理學、法學、醫學、工學、農學六院。共分五十八個系科（醫學院稱科不稱系），二十八個研究所（文四、理七、法三、醫六、工三、農五），此外各院附設機構，及與其他大學或機關所合辦的研究中心，爲數尙多。該校圖書館所藏中外文圖書雖尙不足一百萬冊（去年統計爲七八二、六五三冊），此外還有中外文定期刊物四十餘萬冊。該校自接收至今，已經過五任校長（外加沈剛伯三個月的短期代理），而以傅校長

斯年爲最有名，且曾有種種規劃；以現任錢校長思亮任事最久（自四十年三月至今已歷十五年以上），成績也最爲昭著。四十三年，我即曾在該校作過一度參觀，其時學生還不足五千人，科系不及今天的多，一切建築與設備的規模，也遠不及今天的宏大與豐富。這次，經錢校長領導我就全校各方面看了一個大概，而以化學系的新設備，及「農業陳列館」看得比較詳細。抗戰勝利以後，我因爲曾參與過二十個月的農林行政，會隨時向農林部各專家不斷請教，而對農、林、漁、牧，以及農業推廣、農業經濟各方面積有若干常識。這次在陳列館參觀，經該校農學院農業推廣學系副教授蔣亨達先生，就各項圖表、模型，爲我逐一講解，我對台灣近年農業的突飛猛進，乃知道絕非偶然，而我們歷年派往非洲、中亞、南美等國，幫助他們發展農業的工作人員，莫不成績良好載譽而歸，也絕非倖致。當三十九年我初到台灣的時候，和一部分從事農業研究的朋友們談起，大家都以台灣的糧食增產，恐怕終於無法與人口增加相適應；每年食米的產量，也恐怕無法超過兩百萬公噸；可是人定畢竟勝天，十幾年來因電力、水利、化肥、農具、病蟲害藥、防風設備水土保持等等，莫不有長足的進展，尤其土改成功，使得農民歡欣鼓舞，生活全面改善，無論精神物質，都得到完全的解放而白慶爲有土之民，其社會地位已完全改變，得由他們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他們的收益與他



自己對工作的努力，乃得到正比例的進展，與已往受制於地主者迥然不同，這更是近年台灣農業全面進步的一個主要關鍵。在台灣，大家還只感到經過這樣一番努力，人口雖已增加到一千二百萬，食米產量却已超過二百三十萬公噸，不僅足以自給，而且有一部分可以出口，以為這只是一種奇蹟！實際講來，今天的人類連月球也可能上去，人類的壽命也大有延長到一百歲以上的希望，都只是科學研究的結果，而決無所謂奇蹟可言。上面我還只講到台灣近年主要食糧的增產，實際則台灣農村的主要副產物如：甘蔗（民國五十四至五十五年期，白糖生產超過一百萬公噸）、鳳梨（十一萬六千公噸）、香蕉（約四十五萬公噸）、蘆筍、洋菇（三萬九千公噸）、橘柑、香瓜，……乃至各種家禽、家畜、水產（單祇本年一月至八月已得二十七萬二千公噸，較上年同期增加一萬九千公噸）等等，也莫不欣欣向榮，而林產依然保持了特殊紀錄。這些不僅豐富了台灣當地人民的生活，有許多東西經過加工以後，且為出口的大宗，國庫的外匯賴以充實。這次我在台灣只上了兩個人的墳，其一為陳辭修先生的，其一為胡適之先生的，都使我非常感動，在辭修先生的墳前，據管理墳地的某君告我：現在每逢朔望或其他節日，在墳前燒香的農民，往往以百計，他們知道土改的完成，水利的建設，以辭修先生倡導、規劃、督促最力，他們實身受其賜，而他們對這位「陳伯伯」的崇

敬，也完全出於一種衷心的自然流露。這在一方面固然可看出中國人民的純厚，另一方面更可使得後之來者，充分認識一個人只要能以實心實力為國家為人民服務，即在死後，老百姓也決不會忘記他們的勞績。適之先生生前，固然是名滿天下，可是毀之者也大有其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他們簡直把「胡適思想」看成洪水猛獸，誣毀攻擊，無所不用其極；大陸過去幾年，曾把這類清算胡適的文字集成專書，多至五六厚冊，可是今天怎樣呢？最近大陸的知識分子，普遍反毛，幾無例外，但他們那一個不直接間接受了胡適之所倡導民主自由的影響呢？所謂「毛澤東思想」，只能騙騙中學還不會畢業的小孩，「胡適思想」雖經過摧殘，詆毀，歪曲而終於發酵，這不足以使大家認識從一種思想所發出雷霆萬鈞的力量嗎？

上面這段話，是我因參觀台大的「農業陳列館」連類而及。再進一步說：我更深切感到最近十幾年來，能把一種學術研究的結果表現於具體事業的，殆莫如今天台灣的農業。我更確信這一事實，必能加強大家對科學研究的信心，而且也必能推廣到一切新事業的各方面，而造成一種學術與事業打成一片的新風氣。

### 三、輔導委員會與榮民總醫院

第三，我要談一談「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這是一個龐大無比的機構，從四十三年十一月成立至今，已有了十二年的歷史。其目的在使得歷年的退除役官兵得到適當的安置，並有參加生產建設的機會；能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其最高理想，則在使得他們壯有所業，病有所醫，老有所終，學有所用，幼有所育（指他們的子女），我得到該會趙主任聚鈺的安排，原定於九月六日七日兩天，分別參觀他們一部分業務機構：第一天參觀近在台北市的「榮民總醫院」，第二天從台北乘中華班機飛花蓮，參觀「大理石工廠」；在乘汽車到天祥，看橫貫公路的一段，及一兩處農場。不幸在六號晚上，忽然有了颱風，雨也下得不小，台北所有飛機，都已飛往台南避風，七號早晨能否飛回台北，無把握，不得已只好將第二天的日程取消。可是「大理石工廠」雖不會參觀，仍承他們送了我們每人一套文房用具，外加烟灰盤一個，均為榮民所手製；堅實美觀，工作精細不苟，石質溫潤，與雲南大理石不啻上下，色深灰，花紋細緻，異常古雅。這種石材的產量如何，我沒有問，但現在已應用於雕刻美術品，鑲裝桌面椅面，室內衛生設備的浴缸與牆壁，若干高級旅館，且有用以鋪地面者，可見產量決不會少。台北的「中華民國工業品陳列館」，以及香港的「港台貿易有限公司」的陳列所（地點在九龍彌敦道加連威老道口東英大廈二樓），除各種新

出的精美工業品以外，並有此類大理石的用品展出，大有可觀。

九月六日，在參觀「榮民總醫院」前，先在「輔導委員會」聽了他們四十分鐘的簡報，就他們散佈在臺灣全省各方面的業務，參照圖表，逐一加以說明，這算是我這次到台灣後所上最有益的一課。報告畢，乃分乘汽車兩輛，由趙主任領導，逕赴總醫院。這次同我一陣去的，除前述劉子鵬、趙純孝以外，還有王師曾、蔣偉之、沈雲龍、周寶三各位，他們有的以前來過，也有不會來過的。首先，又由院方就該院各部門作了一個大體的說明，然後由趙主任及該院副院長（院長因事公出）帶我們開始參觀。三年前，我因為胃出血的舊病復發，曾在波士頓、舊金山兩個著名醫院先後住過三星期，這次又在台大附屬醫院探過我姪兒幹忱的病（他不幸已於九月二十二日在該院去世）；留香港十幾年，又兩度住過九龍的法國醫院；對現代醫院的設備，已略有經驗。我覺得美國醫院的內容，自然非常良好，對病人的診治看護，更殷勤、鄭重、周到，可是說到規模之大，比較我們這間榮民總院，仍有不及（固然這間醫院的成立與發展，仍是得着美國大力援助的）。

如果要就全院作一普遍的視察，至少非四五小時莫辦，但因為限於時間，我們僅用兩小時，擇要匆匆的看了幾處。

該院現有病床八百張，應診的並不以榮民爲限，凡參加「公保」的公教人員、軍眷，及一般普通人民均可到院就診。榮民與參加「公保」者不收費，對普通人民收費也不高。榮民不僅不收費，且每天供給飯食及小食五頓，每月並發給零用六十元。

有一間大廳，有病床四十張，由一位高級看護立在一塊大玻璃板後面，可以照料全廳，見有某一病人臨時需要醫生或看護的時候，只須將電鈴一按，醫生及看護即可隨時到達某號病床，爲病人照料一切。大致留在這間大廳的榮民，並無重病，或重病的時期已過，似乎只是療養性質，當我們走入廳內的時候，他們在床上或起立輕輕鼓掌，面容表現非常愉快。其時他們正進午餐，有菜，有湯，有麵食，有小碟子，因病況不同，食品內容也不完全一樣，清潔營養的條件是足夠的。大家不要誤會：以爲一間廳房有病床四十張，其擁擠情形也許與輪船統艙無異，實際這間廳其大無比，兩床之間的距離，有的不下於一丈，只看見各病床疏疏落落，分佈全室；而且室內空氣流通，光線充足，還有氣溫調節，可以說是舒適之至。

凡病人每天必須出浴，必須換衣，病人換下的衣服，都經過高熱度的蒸燙、消毒，像這樣的洗濯室也是機械化的。因此，我們走進任何一間大小病房，不僅聞不到普通病人可能有的氣味，乃至其他醫院可能有的各種藥味也聞不着，能保持這樣高度的清潔，真是太不容易

了。

在總院的大樓東邊，建有一所龐大的「柯柏醫學學術研究館」，建築宏偉，佔地兩萬六千多平方公尺，經費的半數係由美國柯柏夫人(Mrs. Kohlborg)捐贈，半數由政府補助。正式開幕於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到現在還不足三年。另有一座「病理館」，也佔地一萬二千餘平方公尺，與上舉的柯柏館連貫一氣，是專供病理研究之用的。

「柯柏館」內設有「心臟血管研究室」、「肺功能研究室」、「血液疾病研究室」、「腦電波檢驗研究室」、「內分泌疾病研究室」、「過敏性疾病研究室」等等，每室均有專家領導，從事研究。當我們走進「心臟血管研究室」參觀的時候，看見一隻狗正仰着平綁在案上，四脚撐開，頭與全身成一直線，狗是活生生的，可是經研究者將電扭一按，狗戰慄慘叫了約一兩秒鐘，即心臟全停死去；再將電扭一按，狗又悠悠地活了轉來。像這樣相當殘酷的研究過程，其勢無法拿人類作實驗，因而「柯柏館」另有一個動物室，養有若干專供各種實驗用的動物，為數頗多。

我們還看過專醫癌症的病室，見一患病者正仰臥着受鈾六十的治療，看樣子是非常痛苦的。這種病現在還沒有絕對有效的診治方法，發覺後立即治療，可延長若干年的壽命，但餘

毒一經蔓延仍非死不可。最近我的胞姪幹忱和友人徐亮之，便都是由這種病犧牲的。中醫說他們有藥可醫，我看這不過是一種無稽之談。中山先生學過六年半的西醫且有臨床經驗，當他患肝癌到了臨危的時候，他到底不願服陸仲安的中藥，這說明他雖臨死也不願棄其所學的精神。成舍我的夫人、李幼樞的大姐，因患乳癌，因爲一開始即動用大手術，乃卒得延長其壽命。丁文淵也是學西醫的，他患了險惡的腸癌，乃不惜把大腸割去一段將大便改道總算延長了生命六年以上。我在波斯頓麻省總醫院與一位腹部患癌的老者同房住了兩星期，據說他的病原已宣告不治，後經一位廣東的王就安醫生爲他開刀（王醫生是該院的第一把刀），將腹部的肉割去一塊，將病者自己腿部的肉另割一塊補上，乃卒告康復而先我出院。但我私下問過這位王醫生，他說這位老者儘管暫時好了，仍只能延長壽命一年，從上舉這些例子，可看去癌症的患者，只有從早找高明的西醫治療之一法，而且非自身以最大的毅力一聽醫生診治不可。

附屬於柯柏館的還有一間具有規模的圖書室，所藏的書籍和報刊頗多，固然以便於研究醫學的爲主，但也並不以與醫學有關者爲限。我們在參觀時，便看見若干下班休息的看護，她們手裏捧着閱讀的，乃有當前銷行最廣的文學書籍與雜誌。就我連日參觀所及，各機構在

職人員，大抵富有研究興趣，而以在榮民醫院內所見的最爲顯著。

又「輔導委員會」正在籌建一所規模宏大的醫科大學，與榮民醫院及柯柏館打成一片，其地址即在醫院鄰近，刻已具體化，大約一兩年內即可完全實現，行見台灣醫學人才輩出，這是一千二百萬人民的福音。參觀既畢，又由趙主任招待我們同去參觀各位，在院長住宅內吃了一頓精潔豐富的西餐，然後告辭。

上面僅就榮民總院略記大概，其實散在全省的榮民分院仍爲數不少，而且規模與設備都相當宏大，完全。如竹東、永康、楠梓、龍泉、嘉義、埔里、鳳林、員山、玉里、蘇澳道十個分院，據兩年前統計，已有病床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張，醫師與看護均有高度水準，藥物也非常充足，我們便不難想像所造福於台灣人民者是何等的普遍。

#### 四、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第四，九月二日，我們還參觀了「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這是一個調查各種涉及法律案件的機構。從前中國最高的司法機構不稱法部而稱刑部，自中央以迄地方，不問任何一個審判機關，對於一切有犯罪嫌疑人取得口供，大抵少不了刑訊，在嚴刑逼供之下，何求不得？



人民死於冤獄者，真不知多多少少。每當中國歷史上遇着一個獄滅刑輕的時代，便譽爲「太平盛世」，然而這種「盛世」不多，因而中國老百姓的生命與自由乃全無保障。

這次我們參觀「調查局」，以及該局一所藏有中共自變亂來以迄今日各種資料的機構。他們都分別在事前作了簡明報告，然後才由沈局長之岳陪同參觀，時間整整花了一個上午。偵察各種案件的科學設備，分爲若干小組，每組各有專室，均有高級技術人員管理。像這類科學機械以及化驗設備的用法，是我以前所不會見過的；即隨同我去參觀的幾位朋友，也多不會見過。例如：經過他們破獲的一個製造偽幣的組織，一架印刷偽幣的機器（有照片），每天可印出偽台幣八百萬張，而且所印出的，即在一個能鑑定紙幣的內行，也無從分辨。可是經過機械射出的某種光一照，則真偽顯然。又，一家出賣珠寶鑽石的商店，往往把真的假的混在一塊，你要去買，便可能選擇了假的而放棄了真的，因爲假的比真的更好看，更有光彩，而價較廉。這裏有一間小小的暗室，你將真假兩種珠寶在室內用某種光線加以檢驗，則真假原形畢現。又銀行收進經過改變數字的支票，也是常有的事。好比原開出的支票僅爲叁萬元，偽造者用某種藥品將「叁」字洗去，改爲「捌」字或「拾」字，而開支票的人原在該銀行存款甚多，而簽字或印鑑又確係真的，銀行職員稍一粗心，即被取款者將此鉅款收去，

於是引起糾紛，乃至涉訟。這裏有機械可使「叁」字重現，而改過的「捌」字或「拾」字乃痕跡宛然，無從狡辯。還有一種照相機，能在幾百公尺以外通過各種障礙物攝取活動照片。好比三五個綁票匪，在一間密室內預謀綁架某人，或已取得贖款正在分贓，自以爲人不知，鬼不覺，沒有料到偵察者已將他們的行動，一一攝入鏡頭，一經被捕，便將這類活動影片映出，讓犯人們自己去，他們惟有啼笑皆非，俯首認罪。

凡這類的設備，爲數甚多，在我們參觀時，會選擇幾種試驗給我們看。例如：當我們正在一間室內，和沈局長及解釋上舉攝影技術的某君談話之際，而我們這一談話情況，便已在一種特製的機械上映出，而且正在繼續活動，實際這是遠在室外幾百公尺外的樹林後面攝得的，真使人有科學萬能之惑。

調查局收藏有關共產黨的資料機構，另在一處，由本局前往須坐二十分鐘左右的汽車。沿途公路頗整齊，路旁有樹木不少，給我的印象已經不壞。一經進入這個資料處以後，看見建築良好，各處都保持了高度的清潔，我便知道這一機構裏面「有人」。

這裏所藏資料的件數以萬計，他們爲使參觀者容易得到一個頭緒，乃就這許多的資料中理出約兩千件，按照中共蔓延的時期，以次排列，從他們的創黨開始，以迄今天的紅衛兵，

可說是洋洋大觀，面面顧到，使我們對共黨這四十多年以來的造亂經過，能得到一個輪廓。這裏有「紅旗」自第一期一直到今天的全份（這是中共自己也不完備的）；有江西蘇區時代共黨的各種佈告原件；有共黨對內的各種單張印刷品或小冊子；有他們首腦人物的著作或演說辭；有他們歷次開會的紀錄；還有形形色色的宣傳品。隨時期的先後，他們的印刷品自油印、石印、鉛印，以及頗為美觀的書冊，無不應有盡有。但我在這裏很少看見照片、地圖。我不知道他們對這許多不容易搜集的資料，會否大下工夫整理，就時代（例如江西時代，延安時代等等）、事件（如人民公社，彭黃去職事件等等）、人物（高層如毛周，次要如劉少奇、林彪，再次如陳伯達、陶鑄、康生，以及過去人物如朱德、董必武等等）、行政（包括經、外、財、建等等）、軍事、黨務……這若干方面，各以類從，編出各種目錄與索引以供研究者檢查否？我知道國民黨中央黨部及軍方，也有此類收藏共黨資料的機構，能不能合併起來，集中人才經費，使這一工作做得更為有效呢？這是在參觀時的一種臨時感想，或許他們早已做了，或做得更超過我的理想也不一定。

美國人抱有一種成見：以為台灣是一處堅決反共的地方，他們對於從台灣發出有關共黨的消息，或對共黨某一行動的研究或批評，總以為不免流於主觀，不足取信。這次我在台北

看見幾位從事大陸研究的專家，聽過他們報告關於共黨最近動亂的情況，我覺得他們根據可靠的資料，其觀察與論斷，確實非常客觀，比較美國人的研究，更能深入。本年的九月十一日到二十二日，我留在東京十一天，見着日本的朋友不少，他們無不密切注意目前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樂於聽取我的談話。他們去過大陸的集團或個人，除少數原有成見對共黨自來就同情以外，其他抱着一種研究心情前往的人士，其觀察論斷的可靠性乃比較的高。他們的大報如朝日、每日、時事、產經等等，在北平、上海等處，大抵都有特派的記者，自這次毛澤東發瘋，紅衛兵出現以後，他們幾乎每天都有長電拍回，所報告的事實非常詳盡。聽說在日本，這類研究中國大陸的機構也為數頗多，我想，除掉他們必須與大陸做生意的這一態度不容易改變以外，說日本人可以全面與中共妥協，甚至崇拜老毛而甘心情願跟着他走，我看是決不會的。這是我因為紀錄上述參觀台灣研究中共的資料及聽取他們專家的報告以後，附帶把美日兩方對此一大動亂的態度，以及我對他們研究的估價，也附帶記錄於此。

我們在參觀了上述這一機構以後仍回調查局，由沈局長招待我們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這次就我參觀所及，私心會把輔導委員會的趙主任聚鈺、調查局的沈局長之岳，譽為台灣新與事業中少壯代表的雙璧。因為，不僅他們自己異常努力，即與他們共事那一大羣高、中、

下各級幹部，也莫不表現蓬蓬勃勃的氣象，使他們經辦的事業顯出前途無量。

## 五、其他種種

上面僅就我參觀後留有較深印象的幾個方面，作了一番簡單的敘述，下面我還要就我所了解和看見的許多事實，稍稍加以補述。

一、上面我所提到人民生活的改進，並不以農民爲限，實際都市居民的生活也到了相當的高水準，而且有少數人已經近於豪華，而是我們目前的處境所不相宜的了。

二、軍、公、教人員，自然大部分還相當清苦，但他們每年所拿的薪水不是十二個月，而是十七個月；有的還有日用品配給，且由公家供給房屋、交通工具，同時，還有醫藥保險等等。假定一個五口到八口的家庭，兩個人有職業，或僅一人有職業而有兼職，便滿可過得去。我參觀了二十個左右的這類家庭，少說一點，他們十家總有七家已經是近於現代化，電話、冰箱、電視等等不要說，有的還在他們的客廳或書房鋪上一張厚厚的地毯哩！這豈是我們海外大多數流亡人士所能企及！

三、台北的中西餐館、影戲院、夜總會，以及其他飲食娛樂的場所，幾乎處處人滿，我

所謂近於豪華，當然這些也包括在內，這都證明人民生活優裕的一斑。

四、台北報紙，每家銷到十萬、十五萬、二十萬者，已不止一兩家，其他銷五六萬份的日報晚報，更指不勝屈。而且他們內部的設備，以及編排方式，內勤外勤的人選，也無不逐漸改進，他們的企圖，好像是以趕上國際的優良標準爲目的。大家不要忘記：過去在大陸全國性的報紙，能銷上二十萬份的，已如鳳毛麟角，今天擁有四百萬居民的港澳，頂多只有一家晚報，可能已有二十萬，其餘能銷上五六萬份的，便要把正確的數字，登在第一版，作爲爭取廣告的招徠。台灣全省不過一千二百萬人，台北市及市外附近地區，合計也許不超過兩百萬，而報紙能有此銷路，廣告收入更有可觀，這都是可作爲教育普及以及工商業日趨繁榮的鐵證。

五、近年台灣的文藝空氣，也一天天濃厚起來，有地位的作家，老一輩和年輕一輩的，其人數之多，遠非香港所及（尤其女作家特別多）。他們或她們的一本小說出版，在很短的時間，動輒可銷幾萬本，印行十版，乃至香港且有人專以盜印台灣的文藝書籍發財，或冒他們作家的姓名及出版書店的名義以求魚目混珠，這豈是從前所曾有過的現象？又台北一部新出的影片，同時在三五家戲院上演，時間持續到三五個星期的毫不稀奇，最近一部由小說「

幾度夕陽紅」改編的影片，便繼續映出到一百五十天以上！而且他們的導演、演員，乃至攝影的、化裝的、配音的、代唱的，……無不人才輩出，音樂也有了了不起的進步。照這一趨勢，再繼續發展三五年，豈只日本片子、香港片子要直接受到他們的威脅，即美國片子也無可倖免。至於大陸最近所出專以傳播所謂「毛澤東思想」，乃至以人海見長而毫無內容和情節的宣傳片子，其必然要被他們所壓倒，自更屬毫無疑義。

六、除報紙和雜誌的種類繁多，銷行的數字也相當可觀以外，近年，在台灣所印行的書籍，包括重印的舊書和初出版的新書，其數字似乎也是空前的。儘管所重印的舊書，究竟何者應該提前印出，何者或不妨稍稍壓後，還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問題，但最近一兩年所印許多大部頭舊籍，售價高至數百元或數千元甚至超過一萬的也大抵能不脛而走。這在一方面可說明一部分個人的研究者，已有餘力可以買書；另一方面也可說明一般普通圖書館與附屬大學的圖書館，都在力求充實；兩者都不失為一種良好的現象（自然我知道由外國圖書館購去的也頗多）。最近三十年，我個人對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曾稍稍加以留意，關於這方面應該比較參看的若干資料，在從前不容易搜集的，近年在台灣已陸續印出不少，這更是我個人感到非常欣慰的。

上面僅就台北一市舉例記錄若干事實，實際即在台北市及其附近，我已經參觀過的，如大規模的石門水庫及發電廠，張其陶先生主持的文化學院，中華民國工業品陳列館等等，我都沒有提及，而應看未看的方面，也還多到不可勝數，此外，台中、台南、台東各處，我這次因為時間關係都來不及一看，聽說進步的方面以及有益人民的新建設，也很多很多，但因為我不會去過，都只好暫時保留，等待有機會看了再說。

我離開台灣回到香港，一瞬又已兩月，在這兩個月內，來找過我的朋友很多，他們問起我此行的觀感如何，我會就我所看過，所知道，對他們說了不少。但有人向我質問：您所說的，只限於好的一面，我們聽說也有許多不好的方面，難道都不是事實嗎？我回答：您們所要說的不一定不是事實，但傳說與事實之間，容有若干距離，或不如所傳之甚，這是一層；過去為人民所責難的若干事實，近年略有改善的也不少，不過做得不痛快，不澈底，缺少除惡務盡的精神，久而久之，又不免鬆懈下來，這是第二層；近年台灣一部分的言論（包括短篇文字與專著），可能有若干也說得過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賣弄聰明，使人不快），不免與政府及社會若干人士以難堪的刺激，但我們必須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對政府及佔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責難，或對一般現狀表示不滿，往往不免過分，這在一個專制或民主國家



都是司空見慣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認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濟必要的朋友們，更不可運用刀筆的方式，非把少數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須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論自由或禁止某一類書籍發行，並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清末對維新革命兩派的言論或專書，何嘗不嚴厲禁止，可是梁啟超的「清議報」、「新民叢報」之類乃銷行最廣，翻印的且無法統計。革命派的「民報」，固不用說，而鼓吹革命的小冊子，更是滿天飛，中山先生在美國翻印「革命軍」之類，動以萬計；克強先生更親自把這類的革命書報秘密運到武漢，在新軍中散發，滿清其奈之何？眼前的例子：如大陸出版的「海瑞罷官」、「謝瑤環」、「燕山夜話」等等，內容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本來我們可能一輩子不看，可是一經中共高壓，嚴加禁止，我們乃看得津津有味，翻印的人更大賺其錢！蘇聯在革命初期，本來有許多帝俄時代出版的文學書也是不許出賣的，但後來他們覺悟了，仍舊准許發行。難道這些事實，還不够我們參考嗎？總而言之，「弭謗莫如自修」，「事實勝於雄辯」，一個聰明的政府，只要能積極有為，所做的事，大多數人民都能滿意，一切內容並不怎樣良好的言論或書籍，管它幹嗎？我會仔細的考慮過：「逐步走上民主的軌道」，依然是反攻復國前夕一個必須採取的步驟，尤其以放寬言論自由的尺度為然。我覺得：關於這一方面，政府與社會有為人士的「容忍」精神，還

有提高的必要，這是第三層。

以上幾點，或類似這類的事情，都是今天的政府所應特別留意的。

（原載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中央日報）

## 略記旅美四個月的一些實感

### 一、引端

一九六二年的秋天，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會到美國作了一次較長時間的旅行。

是年九月十五日離開香港，一直延到次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夜半的十二點以後，才匆匆由東京飛回。其時正值舊曆的除夕，我的飛機一經到達港九的天空，便看到燈火萬家；等到接近地面，更聽到爆竹之聲，不絕於耳。

究竟是大家在準備過年，機場檢查證件和行李的人員，都異常寬大，連我的兩口箱子也不會叫我打開（實際我在檀香山和東京却也不會打開過）。大致不到十分鐘，我便很輕鬆的走出了機場的大門。其時站在機場出口接我的親友們仍有四五十位，而且我知道內中有兩位近來的健康情況不甚良好，這真是我衷心所感激的。

我離開香港的時間共為四個月零十天；在美國境內停留四個月，這是我原定的計劃。可是另一計劃打算在歸途對日本作兩個星期的訪問，卻沒有完全實現；僅僅在東京一間舒適而清靜的旅館好好睡了三晚，以恢復我旅途的疲勞。自一九五六年我第三次訪問過日本以後，我對這一個隨時都想多了解一點的國家又已闊別了六年；這次因為健康的關係，只能悄悄而來，又悄悄而去，連若干我所渴盼一談的中日友人，多數都來不及通知；六年來日本若干的變動，我也無暇細問；這確使我感到非常的惆悵。

我是第一次到美國。我平日對於美國的了解，大抵都是耳食、皮毛、零零星星、不成片段；甚至連美國立國精神所寄托的一部美國歷史我也知道有限；中美兩國間開始建立關係以迄今日，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年，在這一悠長歲月中，發生於中美兩國間的若干事實，在我的腦海中也只有一个粗枝大葉的輪廓，從來沒有作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可是在過去的若干年，

我依然追隨時賢之後，高談中美問題，對美國作過若干無謂的歌頌，若干不中肯的非難，甚至還對美國存了若干絕對無可能的期待，現在偶一回想，真使我汗顏無地！

自從中美有了交往以來，中國的學士文人，到過美國或留學過美國的，真也不在少數；尤其是今天，包括在學的青年（去年六月底的統計，在美國各級學校留學的為七千三百十八人，現在或已超過八千人），已學成在美國各方面服務的少壯分子，加上中國外交界在美國及其他國際機構做事的若干人士，更加上數字相當可觀的許多寓公、高等難民，以及從事商業、宗教、及其他文化事業的人士等等，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現在散居在美國各地的，何止一萬五千人至兩萬人以上！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大抵學有專長，外國語言文字也過得去，更優秀一點的還可以用中英文文字從事著作；可是一看中國的出版界（包括台灣、大陸、香港、南洋等處），想要找幾部留美諸君的大作，足以說明美國各方情況，可增加國人對美的了解者，則仍等於鳳毛麟角。

六十年前（一九〇三，即光緒二十九年），梁任公曾在美國有過十個月的勾留（其時任公三十一歲），寫了一部十幾萬字的「新大陸遊記」，涉及美國的範圍頗廣，尤詳於當時留美僑胞的情況，觀察銳敏，文字條暢，其有裨於國人對美的認識者，確實很大。

幾年前，程天放先生寫了一部三十萬字的「美國論」，胡適之先生從頭讀了兩遍，他恭維這本書「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學人寫的介紹美國，說明美國，了解美國的一部最好的書。」他並且說：程先生「在這本書裏用的歷史敘述方法」，「是一本很好的美國史教本，比一些形式的歷史教科書更可讀。」這次我剛一到達紐約，便在百老匯路一間旅館的十層樓上，以兩晚的時間，把程先生這本書從頭細讀了一遍，我覺得胡先生恭維程先生的話絕非過譽。尤其我把梁任公六十年前在他所寫遊記上所列舉的若干統計數字，與程先生所舉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的數字逐一比較，我覺得美國人在這六十年間的突飛猛進，確實令人可驚。

中國在最近這六十年的演變，我是知道一個大概的，持以與別人的進步一比，中國所以鬧成如目前這一如此這般的現狀，我乃深深的知道，絕非偶然。日本人在戰後，懂得他們的鍊鋼設備，比之美國落後了十年，因此，他們汲汲與美國交涉，澈底換了一套新的，這對日本近年的復興工作，確實起了一方面的決定作用；可是毛老大，却在中國大陸來過一次神話式的「土法鍊鋼」！連赫魯曉夫到美國作過一番視察以後，他也承認美國是一個不容易戰勝的國家，而毛老大却要硬派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甚至他在與赫魯曉夫鬥嘴的時候，還要強調：「即令這隻紙老虎裝了核子的牙也不足怕！」他不懂得美國的實況是冷戰則弱，熱戰

則強；在他們領導別人的時候，確有不少的毛病，等到他們自己起來硬幹的時候，却有一種舉世無與倫比的龐大實力。這不是我故意爲美國張目，有在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中他們所表現的事實可證。單就這一點而論，我覺得不把大陸上這一羣「土包子」趕快收拾，他們可能更要把中國陷於萬劫不復啊！

當我到達美國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候，香港一位曾在美國住過二十年的小姐便寫信問我：「您對美國感想怎樣？」當時我却是難於置答；我僅僅籠統的說：「假定中國的學生要專攻理、工、農、醫、經濟、銀行、商業管理，……這類的科目，不妨到美國來；假定要研究哲學、文學、美術、音樂……，一類的東西，最好還是到那個文化老家的歐洲去。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留學生都集中到美國，至少並不怎樣理想。」現在想來，便連這類的話，我也不敢十分肯定。

回到香港以後，仍有不少的朋友，向我提出許多有關美國現狀的問題。我因爲病後精神不繼，說得過於簡略，無已，我只好以筆談代口述，隨便寫出一些留美四個月的實感；我知道我了解美國的基本條件太嫌不够，一定要說上許多主觀、武斷的外行話，這便只好請求原諒了。

## 二、加州初旅

由香港乘汎美公司（P.A.A.）的飛機赴舊金山，中途須停東京、檀香山兩站。東京停一小時，檀香山一小時半。在東京機場休息室和老友崔萬秋談了四十分鐘，於深夜一時再飛檀島。次日午後兩點後到達檀香山，即算到了美國境內，旅客例須於此報關，並檢查行李（經過這次檢查，入美國本土後，即通行無阻了），我因為有駐檀胡總領事及王領事在場照料，一切免除。在休息室和胡王兩位談了一點鐘，把本年五月大陸難民湧進香港的經過，向他們說了一個大概。四點續飛，十點左右即到達三藩市，時間多了一天，仍為九月十五。到機場接我的有總領事翟因壽先生、亞協袁倫仁先生、吳坤淦教授、世界日報的呂超然先生、曹桂芬先生、郭長城先生等十餘人，除吳博士係我在中央政治大學教書時的老同學外，其餘均屬初見，甚可感也。

我因為連續坐了二十幾小時的飛機，頗感疲乏，原想到預定的旅館休息，但吳先生勸我放棄旅館，到他家去住；並且說：陶鵬飛先生家中，尚有多人，可以一見，並可一看舊金山夜色；因分乘兩車，開赴陶家。車行自由大道（Freed Way），來去的車輛分別行駛，可以



開足六十買，路上僅見車輛，不見行人，道路砥平，燈光耀眼，見有幾處疏疏落落的住宅，却不見警察一人，舊金山給我的第一印象，真所謂「泱泱大國」。

在陶家見着陶君夫婦（陶夫人係張漢卿的女兒，神情頗酷似漢卿的少年時代）、藍妮母女、W. W. 吳的夫人，此外也還有其他的客人，小坐二十分鐘，略進茶點，即坐吳先生夫婦的車子同到他們的家裏，來去車行約兩時以上，到吳家已在一點以後了。浴後酣睡五小時，兩天來的疲勞，乃全告恢復。

我這一次的加州初旅，整整延續了一週（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所會到的舊雨新知甚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實確實不少；以之與後來在美東的聞見一加比較，我總覺得美西更有朝氣，生活也更為合理；甚至以三藩市的唐人街與紐約的一比，也覺得美西的要整潔得多，而內容更為充實。

這次在舊金山所見到老一輩的朋友，有張君勳、顧孟餘、董世進、蔡增基、吳尚鷹、呂超然……各位，他們的態度有的是溫溫爾雅，有的是慷慨激昂，但他們一種關心祖國，維護民主和反對共產的心情，卻毫無二致。

君勳先生於上半年赴德講學回到金山以後，偶因不慎跌了一交，背部輕傷，我兩次和他

見面，都在聖瑪利醫院。他已高齡七十五六，依然健談，精神旺盛，除讀書研究以外，他似乎不感到其他的事更爲可樂；談到近年留美學生成績的優異，他更是眉飛色舞，高興非常。後來我在波士頓入醫院的前夕（十一月一日），深夜不能成寐，起來靠在余傳弢客廳的沙發上休息，看見壁上有君勳四年前爲傳弢寫的一幅單條文曰：「於是背玄壩而延望，指蔥山而燭跡，川陸綿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周！」（按原文見「大唐西域記」張說寫的一篇序）他殆以玄奘自期，亦以此期待於今日的留美青年朋友。

顧孟餘和董時進兩位先生都住在三藩市對面的 Berkeley，到他們那裏要經過一道長八英里以上繞行的港灣大橋（Bay Bridge），我生平所見的大橋，以此爲第一。二十日政校同學王天循先生陪我去參觀加州大學，我們乃首先去看顧先生，和他談了一點鐘以上，他對國際的一般情況仍異常關心，手邊的西文書報不少；近年參加美國方面一種研究工作，每天總得去一去。顧先生的年齡七十四五，比較七八年前在香港見面時雖稍見清癯，但精神仍然很好。可是他已謝絕一切普通酬應，王先生約他同到加大午餐，他也婉辭謝了。

王先生是加大畢業的老學生，對加大各部門的情況都非常熟悉，由他領導我參觀，雖只花了半天的工夫，看見的東西可真不算少。據他說：加大共有八個單位，學生近十萬人，研

究原子能的一個機構設在山上，參加研究的就有一千多人。全校究竟有多少中國學生，王先生不能確指，但就我所看見的，已知道人數不少。該校經費充足，設備無不新之又新；教授們的待遇也特別優厚。據說歷屆得諾貝爾獎金的學者，也以該校為最多，其為美國西部各大學的一重鎮，自屬毫無疑義。

參觀加大以後，到王先生家小坐飲茶，其夫人福建人，菲律賓華僑，除英語外，並能操西班牙語，國語亦能說能聽，原在加大研究英文學，以初生小孩須照料，暫輟學一年。王先生研究中國思想史，有英文著作，正繼續寫作中，兼營商業，甚得法，其住宅頗講究，一切新式設備。

離王家後，便和王先生一陣去看董時進先生。董王兩位本來是四川同鄉，但却不大熟。當董先生開始和我長談的時候，王先生乃抽空回家休息，並約好再來同進晚餐。董先生為留美人士中熱心國事的一人，我們隨時都有機會讀到他說明中國情況的講稿。他儘管是一位農學專家，但他的興趣相當廣泛。他有一本敘述中共初期在大陸各種措施的大著，頗博得美國出版界的好評；近年他更有文藝作品出版。這一天至少和他談了三四小時，一直到晚餐桌上還沒有停止，他對台灣有很高的期待。他的夫人姓朱，是熊秉三先生的朱夫人的內姪女，她

算是朱經農的同輩。她比之董先生似乎更是多才多藝：目前留在美國的太太們，能畫幾筆中國畫的頗多，但董夫人却能畫富有東方情調的洋畫，最近才開過一次個展，被美國人買去不少。在他們的壁上，還掛了好幾幅她的近作，一幅好像是寫三峽的給我留下的印象頗深。她又能自出心裁製作一種盆景，即擺在日本人所製的盆景中，也一定可推為上品。晚餐桌上擺出好幾樣菜，四川湖南的口味兼而有之，當然也都是董夫人親自操作。我打趣董先生說：「在我還沒有欣賞您的文藝創作以前，您的作品是否能超出您夫人的繪畫與盆景之上，我暫時還只能採取保留態度！」

晚餐後又小坐一會，已將近十點，仍由王先生開車，送我回到R. K. Woo的家裏，我感到這一天的生活內容，確實相當豐富。

老友曾慕韓（琦）先生，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在華盛頓大學醫院去世的，即卜葬於華盛頓的近郊，隔現在已是十三個年頭了。他有一個惟一的兒子名憲斌（元配宋夫人所出），是和慕韓一陣去美國的。十幾年來，我只知道憲斌在美國讀書教書，成績很不錯，可是從來沒有和他通過信；他究竟住在美國什麼地方，我也全不清楚。我這次去美的願望之一，便是能去慕韓的墓地憑弔一番，同時也有機會和憲斌見面。

真沒有想到，我剛一到達舊金山，便已接着憲斌的電話，第二天，他便到吳先生家來看我。原來他就在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外文系教書，早已結婚，太太名 Gloria，出生於南美墨西哥附近的一個小國；已經有了兩個男孩，大的名 David C. Tseng，六歲；小的名 Steven P. Tseng，四歲；憲斌的聲音笑貌，與慕韓的少年時代幾乎完全一樣，但他能自己開車，能操流利的英語，年齡剛過四十，身體非常結實，勁氣內斂，而且和一位外國的小姐結了婚，這些却與慕韓迥然不同。

過兩天，憲斌開車來接我到他家去吃飯。他的太太美而且健，正在廚房忙着燒中國菜，臨時學會了叫伯伯；兩個孩子的體貌和膚色，完全是中國的，活潑跳動不停，但不能說國語。我們的車子是午後五點左右開到憲斌家的，他的同事許先生已早到。我們在草地上拍過幾張照片以後，我和許先生及憲斌便開始一段長時間的談話。許先生名芥昱，籍四川華陽，畢業於西南聯大的外文系，Stanford 大學博士，也到過歐洲，太太是比利時烈城人，中文名字叫賀碧姜，法文名字為 Jeanne M. Ihsu，可惜這一天沒有到，我不曾見着。

舊金山州立大學的外文系，共有九種外國語文，除歐洲幾種重要的語文以外，亞洲的則有中國、日本和印度，也有日本人和印度人執教，而許先生便是這一系的主任，他的年齡似

乎和憲斌的差不多。我們的談話是從飯前談到飯後，因為時間延得稍長，許先生請曾太太代他的太太告假，兩位太太乃在電話上大笑不止，我想這大概是爲我們這三個呆子而發吧！曾太太弄的中國菜，大盤小盤擺出七八樣，我恭維她的宮保雞丁確有川味，她便立即把她的烹任教科書翻給我看，說她完全是照着書上所寫的做的。後來我在紐約書店看見這類的書有好幾種，大致很銷得。美國人有很好的東西不會吃；那樣肥嫩的菠菜，只會把它煮成羹湯，四季荳黃芽白也只會用白水煮熟了事，實在太可惜了；假如他們肯虛心學習，我想我們對他們必有很大的貢獻。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憲斌只坐在一傍靜聽，很少發言，正像他的爸爸從前和我們一陣開會的樣子；許先生提的問題却很重要，他尤其關心大陸現狀，和去年五月以來大陸難民逃出後的生活情況，並且還要我把我所知道關於周恩來的種種，一一告訴他；他更運筆如飛，把要點一一記下，一會兒便寫了好幾張紙，字既娟秀，文又簡潔，真美材也。談得快到十點，仍由憲斌開車送我回吳家，我在車上問憲斌：「你覺得我們今天的談話怎樣？」憲斌很幽默的回答：「正如我爸爸平日最喜歡說的一句話，『過癮』！」

我留在舊金山的這七天，像這樣長時間的談話雖只三兩次，但令我高興的事却很多，現

在我再舉兩件在下面：一次，在因.因.因家裏吃飯，來客在十人以上，有一對剛近中年的夫婦，主人向我介紹：「這位是陳先生，工程師；這位是陳太太。」我覺得這位太太雍容大雅美秀而文，一望而知為中國的大家閨秀，絕無普通留學生的洋派，操國語略帶江蘇口音，我初以為只是一位家庭中的標準主婦而已。飯後客人走了，主人再向我詳細說明，說這位陳太太是一位了不起的病理學專家，娘家姓胡，籍江蘇無錫，在加州某醫院服務，在她領導下的美國醫生有二三十位，她已寫過上千份的脈案，妥慎周到，從來不曾犯過一次錯誤，這輩醫生莫不奉之如神明，仰之如觀音菩薩，她的年薪已在四萬五千美金以上，她先生的收入還遠遠落在她的後面哩！

另一友人告我：他有一位好友吳君，係加州大學的機械工程博士，任某飛機工廠的副總工程師。同廠總工程師，美國人，也是加大博士，和吳君先後同學，彼此相處得很好，但這位總工程師平日因公私各方面的種種活動，對工程上的新問題，乃無暇繼續探求。我們這位副總工程師，與之相反，仍孜孜不已的作多方面的研究。於是工程上一有新困難發生，凡總工程師不能解決者，一找這位副總工程師，便無不遊刃有餘得到圓滿的解決。於是全廠各級的技术人員，莫不對吳君表示最高的敬意，而吳君在工程界的名譽也就一天天為遠近所知。

不久以前，另一飛機工廠出了一個總工程師的缺，該廠與吳君接洽，希望他能屈就，待遇比現職要高得多，吳君沒有肯定的答復，乃謀之於我的這位友人。吳君的意思，覺得現任的職務，已經不壞，與全廠同仁也相處得非常融洽，如驟然捨去，在人情上頗感不安，很願意聽取我這位友人的意見。我這位朋友告他：「假定您沒有合同的拘束，而現任的廠方又沒有一定堅留您的意思，您能變更一個較高的職務，也未嘗於您的事業前途無益。」於是吳君乃將這一切情況婉辭告訴了他這位現在共事的總工程師，表示願將現在的職務辭去。總工程師聽罷躊躇了好一會，乃決然毅然對吳君說：「道格特吳，應辭職的不是您而是我，目前本廠可以無我，但不能沒有您，我向廠方去辭，即請您接替我這個職務！」廠方為這位總工程師的精神所感動，乃將他調了另一個職務，即以吳君升任總工程師，年薪立即增加一萬以上。

我聽完這個故事，感慨萬端！這兩位工程師，一個不忍為金錢捨去他的舊有職務；一個知道自己研究不如人，甘心情願讓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 三、從三藩市到紐約

我到美國後一個主要的宗旨，便是多看多聽。因此，我留在舊金山一個星期，總覺得很



忙。

除上述以外，我還參觀了世界日報（民憲黨機關報，已有七十年以上的歷史，總編輯曹桂芳）、少年中國晨報（國民黨機關報，已有五十年以上的歷史，董事長兼經理鄒瑤甫）、金山時報（無黨派，但反共，對國民黨友善，總編輯林蔭浦）；訪問了好幾處僑胞的團體；吳坤淦兄陪我看不少應該看看的地方；尤其使我高興的，還看見了老友譚伯揚兄和他的女兒和女婿；伯揚的身體比在香港時好多了，他的女兒和女婿能使得他身心愉快，這是很可告慰於伯揚在台灣和香港一切友人的。

我對舊金山的僑胞們能為他們自己的事業努力，衷心傾佩；他們對我的殷勤招待，尤其衷心感謝。

我在香港原已買好了由舊金山赴紐約的火車票，但老友周謙冲兄等不贊成，他們的理由是芝加哥要換車，對我很麻煩；不一定能準時到，對他們接客的也不方便。為接受他們這一手好意，只好託亞協袁先生同我一陣去交涉，改坐A.A.公司的飛機。好在由舊金山到紐約，機票與車票都是美金一百四十元，並無出入。

九月二十二日午前九時由三藩市起飛，原定午後五點可到，但早到了二十分鐘。在機場

接我的有余傅弼（余景陶兄的大世兄，在聯合國服務）、游總領事、政校毛樹清同學、謙冲夫婦和他們的兩位少爺（都在哥大讀書）、辜太太鈕先箴女士和她的兩位小姐（都在醫院服務），多年不見，歡談甚快。

由機場坐巴士到周謙冲兄的家裏，約須三十分鐘，傅弼和鈕女士及其兩位小姐，是回我們一陣去的，周太太的晚餐早已預備好，鈕女士母女因另有約會早走，傅弼則和我們一塊吃飯，我把國內現狀給他們談了個痛快，也從他們聽到許多美國方面的消息，然後洗了一個熱水澡，好好的睡了三個鐘頭。

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整天休息，午餐後小睡一會，即在周宅的周圍散步。由周家到市中心，要坐巴士，再坐地下火車，約須一點半鐘以上，即坐私家車，也至少非一點鐘以上不可，交通不能說方便。但郊外空氣新鮮畢竟舒服，附近有小學、中學，也有醫院。謙冲的房子是分期付款買來的，每月付一百四五十元，還要十幾年才能付完，但究竟比租房子上算。位置在兩條街的直角上，房子周圍的草地甚寬，有十幾棵果樹；但因兩面臨街，冬天要負責掃門前和左邊的雪，否則行人在您的房子附近跌倒，房主人是要吃官司的。中國有一句老話「各人打掃門前雪」，這在美國算是一種不成文的法律。晚上，馮今白、袁道豐兩君來談。

今白是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顧問，代表民社黨，職務和謙冲一樣，對國際表示各黨各派的一致，這在今天似乎也還是必要的。道豐是一九二六年和我同船到法國的，年齡比我小得多，從法國的中學住起，巴黎大學畢業，通英法及西班牙文語，蘇聯也去過，會歷任巴黎和古巴總領事，對古巴有充分認識，現在在紐約一所大學的圖書館服務，很用功，十多年不見，也居然是五十以上的人了。今白能清談，很合我的胃口；道豐了解國際，我也有需要；因此大家談得很愉快。

九月二十四日午前，同謙冲往參觀聯合國，規模宏偉，設備豪華，正在開大會，坐旁聽席四十分鐘，戴上收聽機，試聽各種語言的翻譯，中國語的翻譯異常惡劣，斷斷續續，幾乎聽不出講些什麼。繼又在各部分兜了一個圈子，頗感疲倦，即在聯合國附近一中國餐館吃點心，十個蒸餃，十件鍋貼，一壺茶，共美金四元六七角，另加小賬五角，如以港幣折算，則為三十元，在香港決不超過三四元，真貴得豈有此理。以我後來四個月的體驗，大致美國食品的材料並不太貴（尤其以農產品為然），實在人工與房租，雇用一侍應生，每月須二三百元，一中國高級廚師，月須五六百元，而且要供給他們來回的旅費，同時營業稅更是一大負擔，以此種種相加，不能不高出香港若干倍，或亦無怪其然。但我這次所經驗的係一特殊例

外，普通在唐人街吃飯一次，也不過高於香港三四倍或二三倍而已。在美國除用自助餐或坐在櫃檯邊喝一杯冷飲以外，普通上館子，坐的士，理髮，擦皮鞋，……無不要小賬者，且必須多於正價十分之一，他們才叫一聲謝謝。這也是初到美國所不可不知道的一種常識。

第一次去過聯合國以後，後來我又到過兩次，當十月二十五日古巴問題鬧得十分緊張的時候，我還在安理會聽過美蘇兩方的一場辯論。美代表斯蒂文生雖然不客氣，但態度還相當雍容，蘇代表左林，簡直就是一種流氓兼惡霸的姿態，以「海盜」斥美國，總在十次以上；他即用美國報紙上的言論，反駁斯蒂文生；除沒有脫下皮鞋在桌上亂敲以外，真已極飛揚跋扈的能事。可是最後雙方的結論都相當軟弱，而以調解此事的責任屬望於聯合國的祕書長。我們預測美方搜查蘇聯的船隻決不會認真，蘇聯也決不會硬挺，儘管問題不能徹底解決，但戰是決不會打的了。果然第二天蘇方大讓步的消息即已公佈，於是滿天的風雲，乃一時歸於寧靜。當這個問題鬧得十分緊張的時候，旅館爲我收拾房間的老太婆，天天向我訴苦，說她的兒子就要去打仗，簡直聲淚俱下。我安慰她：「您們的總統很聰明，很勇敢，他懂得以堅決的態度應付蘇聯，仗是打不起來的。」等到和平果然實現，她乃擁抱着我，表示她喜出望外。美國一般人民怕打仗，確給了我一深刻的印象。

我自來對聯合國這樣一種機構是頗懷疑的。我總覺得：每年集合這許多人在一塊來吵一陣決不會產生如何積極的作用。但經過實地看了一番以後，態度乃有些改變：以當前的國際形勢來說，吵是免不了的，但與其讓兩造或少數國家分別的勾心鬥角，却不如明白朗爽把各國的立場公諸大眾，使強者略有顧忌，弱者也有所發洩，究竟可使空氣趨於和緩，此其一。近年新興的國家甚多，有以幾百萬或幾十萬人而成立一個國家的，假如沒有這樣一種機構，他們在國際的地位便很難確定，現在他們是以國際一員的身份出現於這一世界政治舞台使別人不敢輕侮，有時還不能不拉他們做一個朋友，這在無形中確給了他們一種保障，此其二。世界各地的情況，確實相當複雜，即在一個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有時也不容易完全明白；藉着大家相聚一堂的機會，可以親切的作意見的交換，各方面實況的說明，世界真正的和平，必以做到互相了解為第一步，聯合國不失為促成這種相互了解的一有力工具，此其三。以此種種，今後我也許要變成一個聯合國的支持者了。

我到美國一個主要的目的地便是紐約。

我自己從來沒有考慮過什麼時候到美國去作一次旅行；反之，再漫遊一次歐洲，或到日本去住上半年到一年，却是我近年的一種願望。這次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學院（East Asian

Institute)給我一次去美國的機會乃完全出我的意料之外。不過他們所以有這樣一種安排，却也不是沒有經過考慮的：先是，大前年的冬天，東亞學院派了一位在該院從事研究工作的夏小姐（她是故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夏粹芳先生的孫小姐）到香港來，就居留港九的幾位老先生，分別作一長時間的訪問。夏小姐是研究歷史的，在美國經過長期的訓練，不僅英文寫得好，對工作也非常認真。她這種訪問的目的，在請被訪問者把他們生平所經歷的重要事項，逐一加以說明，用錄音機錄下，由她加以整理，用英文寫成一本一本的詳細報告，向該院提出，作為他們研究近代或現代中國的一種參考。香港方面，我是他們選擇作為被訪問者的一個，其餘的幾位為：王正廷、顧少川、張發奎。夏小姐和我談話，每星期一次，每次兩小時或三小時，時間經過一年零兩個月。談話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例如清末民初，我在長沙受過十年以上中小學教育，我便把當時長沙教育界的情況，對她詳細說明。毛澤東生與我同年，受教育與我同地，甚至一部分教過我的先生，同時也就是毛的先生；我既不能超出這一環境的影響，毛自然也無法超出，我相信這一類的談話，對於他們了解毛澤東的少年時代多少是有一點用處的（在哈佛就有以「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作為專題研究的）。又如「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其時我正在上海的中華書局有過十年的服務（民國九年至十九年），對這一

運動，尤其是新文學運動，所及於當時出版界的影響，我當然有一種親切之感，把這件事的過程和她談一談，使他們知道「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中國學術界的情況大有不同，這對於他們對現代中國的了解，可能也多少有些益處……。

大致就因為我對這一工作與他們有過這樣一番合作，他們乃約我到美國去看一看，使我對美國也有增加一點了解的機會，同時對他們這一機構還可繼續保持接觸，便是他們主要的用意。報紙上傳說他們約我到美國去「講學」云云，這都是揣測之辭，不僅我無學可講，他們也壓根兒沒有要我講什麼學。不過話雖如此，他們還是在東亞學院這一機構裏面，指定了一間房間，讓我每天去坐一坐，可以有機會認識許多朋友，可以自由借閱書籍，可以知道他們研究的是一些什麼問題，還可以大致知道他們對中國問題的了解，現已達到了何等階段，這已經使我得益不少。至於，這一學院的領導者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久在哥大教書，現已退休，而仍與東亞學院保持密切關係的何淬濂（廉）教授；以及仍在該院繼續研究，並從事寫作的唐德剛博士各位，他們對我親切的幫助和指導，當然更是我所心感不忘的。

就因為東亞學院這一件事，我先後有近三個月的時間，不會離開紐約。我住的旅館就在

百老匯路哥大的附近，每天到學校去所花的時間不多，因此還大有餘裕可以找朋友們談天，隨時應他們的邀約，到唐人街或其他的地方去吃飯，參觀各類的博物館、美術館（包括古典的和現代的）、紐約市立圖書館和各種展覽會（包括一次中國書畫展覽和一次中國古陶器展覽），我也聽過音樂，聽過歌劇，看過電影，看過芭蕾舞、大腿舞，還看過中國復興劇團王復蓉演出的「貂蟬」哩。從美國各州初到紐約的美國人，或到美國旅行的外國人，往往要登一登紐約有名的摩天大樓，或坐在遊船上花兩三小時去繞紐約一週，我便連這類的優事也會幹過，但我覺得反不如逛逛大規模的百貨商店，大規模的食品市場或股票交易所，還能幫助我們想像美國各階層的生活。此外，紐約的自然史博物館，大有可觀，我也去過兩次。

紐約陳列古典派繪畫和雕刻的博物館，我不敢恭維；反之，兩處陳列新派繪畫和雕刻的美術館，我覺得大有前途，每處都去過兩次，甚至我對齊白石的繪畫和篆刻能作進一步的欣賞，也得着他們這類新東西的啓示不少。我記得：一九二六年的冬天，我在巴黎參觀一現代畫展，因色調太強，幾乎刺激我喘不過氣；其所欲表現的一種意境究竟是什麼，我也有些莫名其妙；於是我趕快跑到對面一處展出古典畫的畫廊，才把我的頭腦清醒過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六，我也有兩三次參觀過日本這類現代畫的仿作，依然不感興趣。一直到美國再看到



這類的東西，才知道這一派的畫家，仍在繼續苦幹，已能表達他們內心的靈感，然後我的成見才糾正過來。

美國大大小小的圖書館真是非常普遍，中國人在各地圖書館服務的也很多。據說美國各大學圖書館藏書在三百萬冊以上的，共有十五處，紐約市立圖書館有藏書六百餘萬冊，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有千餘萬冊（包括還不會裝好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快要擁有四百萬人口的港九，似乎也太落伍了。在美國圖書館裏看書是不許抽烟的，但哥大歷史系的圖書館却是一個例外，我第一次去的時候，看見兩間大閱覽室裏面，看書的人不會少於一百五十位，而抽烟的乃在一百人以上，何以有這一特殊情形是我所不了解的。

一位私人所藏商周以迄唐代的古陶器在哥大展出，我也看了兩次。他們對這類東西是非常珍惜而保護得很好的。

紐約不是一個清潔的都會，比之於三藩市、波斯頓、華盛頓差得很遠，即唐人街也不如三藩市的清潔整齊，大概人多人雜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過所謂人多，也只是就紐約與美國其他的地方比較而說，就我所知道，真正人多的地方要推東京、大阪、港九，還數不到紐約。紐約對黑人的歧視，表面上不大看得出來，但實際依然不免。我也曾故意就黑人店員的

手上買過東西，他們對於取貨、點貨、包貨、算賬都比之於美國白人、中國人、日本人要遲鈍一些，這真是一件無可如何的事。美國的黑人，佔他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據說生殖力也很強，如果處處都演成像美國南部若干地區一樣，這也還可能構成他們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哩！

看朋友，看到許多若干年沒有機會見面的老朋友，也看到不少平日想見面而很難有機會見到的新朋友，這也是我到美國後一件最感愉快的事。

中國人以住在紐約的爲最多，當然我所見到的朋友也以紐約爲最多。

我的朋友以年齡來分別，大致可分爲三類：六十以上到八十，算是老一輩的；四十以上六十以下，還只好算是少壯；至於正在大學讀書或剛剛才離開學校而就業的，老實不客氣，便只好算是我們的第二代了。

以我大致的估計，這次我在美國所見過的舊雨與新知，包括上面所舉的三類，不會少於一百五十位到兩百位，而十分之七以上，都是在紐約碰頭的。

何淬廉、李潤章（書華）、繆芸台、王文伯四位先生，本來有一個按月一次的聚餐會，我到了，他們便也邀我加入。聚餐的地點，在百老匯路一家名叫新亞的中國菜館，我由旅館

去到那裏只有二三十步。我們五個人中以淬廉先生的年齡為最輕，但也有了六十八（按現在已過七十），僅僅小我一歲。稍長一點的是潤章先生，七十三（現在應該是七十五六了）；繆王兩位則都是剛到七十。他們的身體很健康，興致也很好，而且繆、王、何三位都有喝幾杯的雅興。有兩次聚餐後，我們便一陣步行到淬廉家裏去談天，從國內動向談到美國現狀，真是無所不談。平日不是聚餐的日子，我們也有在何家吃飯談天的機會，僅客人有些變動，例如何先生的親戚張純民先生，何先生的兩位高足，吳敬敷先生和范士奎先生，我都有過和他們長談的榮幸。張先生在聯合國中國代表團服務，是目前在美國方面英文寫得多而且好的一位，給我的印象很深。有一次，張先生提到他有放棄現有職務到香港教書的意思，我不敢怎樣表示，因為我知道香港教育界的門戶很緊，他們不能接受比他們更為優秀的人才，假如沒有歷史關係，又非發起某一學校的元老，頗不容易找到和他學力相稱的崗位。

淬廉先生有一個融融洩洩的家庭，老夫妻的情好之篤，令人艷羨；兩位世兄早已大學畢業，而仍在繼續深造；一位小姐（寶琳，二十一二），年少貌美，聰明活潑，在哥大的文學部研究中國文學，偶然聽到我們幾位老先生高談闊論，她似乎興趣甚濃。有一天，她拿着我的舊著「萬竹樓隨筆」，問我某幾句的解釋，我問她何以有這本書？她說：他們學校的中文

系，即用此爲選讀的課本之一。我頗爲驚詫。這可看出美國大學教授中文，要找到一部適當的書作爲教本是很不容易的。泮廉兄伉儷，已經有了一位美而賢淑的美國媳婦，我默祝着他們更能得着一位合乎他們理想的中國愛婿。

藉此機會我要插入一點說明：這一次我在舊金山、紐約、紐澤西、普林斯頓、波士頓、華盛頓六處，一共訪問過三十個以上中國朋友的家庭，他們的太太們幾乎無一不非常能幹；不僅把一個家庭弄得纖塵不染，井井有條，而且大抵都能弄出幾樣很够標準的中國菜。這大致是環境使然；在美國雇用一個女工，每月非三百美金莫辦，而且每星期只工作五天，星期六和星期日她們都要回家休息。因此，除吳坤淦先生家裏因三個孩子都太小，而他們夫婦又都忙於自己的業務，無法不用一個工人幫忙以外，其餘各家都是太太們自己動手。甚至連黃膺白夫人在她妹妹女兒家裏作客（在舊金山），也還要幫同照料照料哩。我覺得美國這種風氣，即大多數人非工作不可，而且沒有人認勞動爲可恥，反而以坐食爲可恥，乃資本主義自然演變的結果，根本用不着中共那種不合理的「勞動改造」。

此外，鄭天錫先生我是初見，他算是中國外交界的老輩，現年八十以上，但身體甚好，健談，興致之佳，酒量之大，我所見幾位七十左右的朋友，都未必趕得上。他的外交工作

儘管已經中止，但聽說他每年也還要到倫敦去住一個時候。

梁和鈞先生（敬鐸），即近年常在香港「天文台」三日刊發表重要論文的「萍客」，年齡也在七十左右，研究中國現代史甚有心得，我們從他的近著「開羅會議與中國」一書（按梁先生前年更有「九一八事變史述」出版），可以看出他的用力之勤。就我所知，大致梁先生和李潤章（書華）先生，算是今天在留美老一輩的人物中做研究工作極有規律的兩位，我在這裏遙祝他們的健康，並殷切的期待還有和他們見面長談的機會。

謝扶雅先生是香港的朋友們最熟悉的，他的工作據點在紐澤西，但常到紐約來。他的年齡已到了七十，身體不算太好，可是他的精神却能戰勝一切。他對國事既異常關心，尤其樂意與青年們接近，最近他還領導出了一種「自由中華」月刊。但因出國太久，對近年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多少都有些隔膜。

潘公展先生是我在民國十三四年就很熟的一位老朋友，其時他在上海教書，又和陳布雷先生一陣辦「商報」，我則在中華書局任編輯工作。近年他在紐約以全力辦「華美日報」，使得紐約也有一份代表國民黨的報紙；其奮鬥的精神是很可佩的。他私人約我到唐人街吃過飯，我也出席過他們一羣朋友的「四四」聚餐會，而且在這個場合還聽過外交部楊西崑司長

（按現在楊已任外次）一篇關於非洲概況的報告，很不錯。他可能是未來外交界一位最有希望的人物。

陳立夫先生也住在紐澤西，曾約我和周謙沖夫婦到他們家裏見面。立夫也已過了六十，但不顯得老，態度很雍容，因雞場失火，雞是不養了，聽說他的太太還在做化學皮蛋出賣。陳太太和公展太太都能畫，這次陳太太還給我們弄了一頓很不錯的西餐；我上面說留在美國的太太們都能幹，真是沒有例外。在南京的時代，果夫立夫兄弟比鄰而居，我常有見着他們的機會，他們的生活自來很樸素，過去如此，現在更是如此，中共居然也把他們昆仲列入寮門，這是中共造謠之一證。

我在舊金山和紐約的中文報上，常有機會讀到許多朋友的舊詩。其實，作舊詩風氣的復活，不僅在美國如此，在台灣，在大陸，在香港亦復如此。

用白話寫新詩，是胡適四十年前在美國留學界開始提倡的，當時曾引起過不少的爭論；到了「五四」前後，因為白話文的通行，一時新詩人乃多於過江之鯽，甚至印行的新詩集子也有過好幾十本。會幾何時，風氣好像又在變了。

在適之去世以前，我曾在報上看見，他約集台灣若干現在仍在寫新詩的青年人談過一次

話，表示他自從提倡白話詩以後，從來不會「變」過「節」，而目寫過新詩現在又掉轉頭來寫舊詩的人爲「反動」。這是遺之平日說話照例要把語氣加重以聲聽聞的一種常態，當然不足據爲典要。

平心而論，文學藝術的天地甚寬，自由更是文藝所托命；不問新的也罷，舊的也罷，只要是好的，總可以博得欣賞者的共鳴；反之舊的舊得不成話，新的新得不成東西，便要自然的歸於淘汰。我聽過彈得好的琵琶，也聽過拉得好的胡琴，但我決不會聽到彈得好的鋼琴，或拉得好的小提琴而放棄我的喜悅。

例如我過去對新派的繪畫和雕刻，都很難理解，但這次在紐約看到兩處新派的油畫和雕刻，却使得我非常舒服，看了一次，還從容的再去看了一次，而斷言必有其前途；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什麼「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說什麼「後來居上」，乃是說一件新的藝術品，只要它已經到了一定的藝術水準，它便可在舊的當中開拓一個地位；不過只是積累而決非所謂代謝就是了。

我對中國文學的前途，或者說舊詩新詩的前途，也作如是觀；只要中國人對外來文學有了更深的造詣，或者換上另一套眼光去讀中國舊日的作品，則中國的文學必起變化而自然會

有新的東西產生，乃是我所深信不疑的。本來，我對這類的問題原不敢開口，不過因為看見毛澤東偶然寫了幾首舊詩詞，大陸上乃有不少卑劣的文人把他捧上了天；甚至董必武、朱德也做舊詩，還有人恭而敬之把它影印在一本書的前面，實在有些難過；同時又看見若干敝帚自珍的先生們，還要剝奪許多青年研究科學的寶貴光陰，去仿製許多廢鼎，也覺得是當前教育界一種不應有的病態；乃引出我上面的一派狂論。

顧一樵（毓琇）先生，我還是一九五三年在台北見過的，近年他在費爾德拉費一所大學教書。去年他遊過歐洲，不久又依然回了美國。他因事來紐約，到我住的旅館和我作過一度長談，他對當前的國際乃另有一套看法。過去，我曾看過顧先生寫的幾個劇本，這次談過以後，他又寄給我他的一本「海外集」，我才知道他對中國的詩詞着實下過很大的工夫也勤於寫作。一個人在自己的專門研究與工作之餘，而有餘力從事文藝，確實是一件可欣羨的事。我原有計劃一遊這個與美國獨立史有密切關係的費城，同時也想和一樵先生再談一度，但因爲在波士頓害過一場大病之後，再回紐約便把這一計劃取消，甚至何淬濂先生原約定我去參觀他的母校耶魯大學的，也不果實現，這真是我留在紐約最感到歉然的兩件事。

王人麟先生是我在抗戰後才認識的，以前我確實不知道他愛好文學，而且把生活安排得



細緻而有條理。這次我在準備回來的前幾天，他一再約我到他家裏晚餐，並約了梁和鈞和潘公展兩位在一塊敘一敘，經過一度的快談，並讀了他一冊詩稿，尤其是一首關於陳香梅（陳納德的夫人）的「干春曲」，同時坐在他那一間布置楚楚的客廳，見了他那位溫文爾雅的夫人，還吃了經她手製在紐約不容易吃到的幾樣家常菜，才知道王先生是過着一種不折不扣的詩人生活，而引起我對他提出抗議：怪他不早約我到他家裏去坐坐。最近承他把我在一「華美日報」發表的兩首小詞剪下寄來，並關心我病後的情況真是很可感的。按這兩首「踏莎行」是我近年學寫詞的處女作，興趣是由涂公遂、易君左、鄭水心三位引起的。第二首是和他們的原韻，很不自然，現在，我把頭一首錄在這裏吧：

遠水溫山，舟楓白露，漁舟點點神州路。誰言遊子竟忘歸？歸帆總被秋風誤。濁酒休停，閒愁休訴，歡娛共把頽齡駐。從頭收拾好家居，思量未必他人錯。（與筆會同人遊青山遙望大陸）

伍藻池先生在紐約唐人街開了一間「友方書店」，出售的新舊書籍不少，而且還有若干木刻的舊書，看樣子生意是頗不壞的。有時我一個人在旅館悶得發慌，便跑去找他聊天。到他那裏買書談天的人各方面都有，因此我也聽到不少聞所未聞的消息。有一次我們從午後三

四點談到天快要黑，他拉我一陣去上館子，他那位八十高齡的老父和他的夫人小姐也一陣參加，使我感到一種客中的溫暖，同時也使我覺得集他得着他這位見解甚高的夫人助力不少。大致就因為這一次我們談得非常痛快，藻池還寫了一首七律送我。我現在把它錄入我這篇隨筆：

「閉門久與世相違，能得相逢喜可知。

風貌未隨千劫變，襟懷還似十年時。

不因酒薄情難盡，却恐愁多語易癡。

忍說天涯離亂意，燈前霜鬢已成絲。」

以前我只知道藻池的英文寫得好，外國書讀得很精，但我不知道他會寫詩，更不知道他能寫這種平淡而情感自然流露的詩，這真是我這次意外的收穫。

我留在紐約的時間，原想避免任何公開的講演，但結果仍被中央政校同學會和「海外論壇社」的朋友們拉我去講了一次。講題為「對國民黨及青民兩黨失敗的總檢討」，是他們所擬定的。我最初以為來聽的只是若干較年輕的羽友，沒有想到六七十的老先生還是來得很多，實際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許比我更為清楚，於是我只好變更我的腹稿，率性痛快

的講了兩點鐘，這要算是我到美國後一次最吃力的講話了。

集合上百的人，由某一個人站着，作出一種冗長的講演，其人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話要說，在這一場合之下，也不能不裝模作樣，擺出一個「儼然有介事」的姿態，這是我最怕的；我不僅不願作爲這一站着講話的人，同時我也不願作爲一個坐下來聽人講話的人。

反之，三五人，最多十個八個人，大家確有若干意見願意交換；而彼此所注意的方面或者說平日彼此所下過的工夫，又確有多少接近之點，在平日苦於沒有碰頭的機會，一旦見着了，於是在一塊兒坐下來，抽煙、喝茶，願提問題的提問題，願對某一問題加以解答的便加以解答；甚至對某人提出問題的方式，也可加以補充或修正，一切無拘無束，大家可以自由發言。像這一類的小型座談會，我覺得最有意思，往往能談出一些道理，而能使得大家各有所得。

像這一種的談話機會，我這次留在美國的期間，也曾有過三五次。記得有一次的週末，在紐約一位朋友的家裏，我們有七八個人談了一個整整的下午，還須勞這位主人的太太爲我們添過無數次的茶，吃過她所準備好的大盤小盤的點心，我們所談到的方面，確也是相當廣泛。我在下面所記錄的，只是當時所談過的一部分，而且是我所認爲值得大家共同注意的部

分；同時，也是我自己多少表示了意見的部分，其餘的便只好從略了。

一位最關心反攻大陸的朋友首先發言，他的問題是這樣提的：「聽說台灣近年會積極作反攻的準備，而且據負責方面屢次表示準備已到達成熟的階段，只要適當的時機一經到來，隨時都可動手，究竟這種準備的內容如何？在政府負責者的心目中，所謂『適當的時機』，究竟所指的是什麼？」這位朋友把問題提出後，便望着我，當然他是我新近從香港到美國，對這一情況的了解，可能比他們清楚，所以希望我說話。我說：「對這兩個問題實際就是一個問題，我很抱歉，不能作出何種具體的答覆。因為我有六年多不會到過台灣，對台灣近年的種種措施，我不清楚，但他們近年確實在準備，我並不懷疑。不過關於直接與反攻有關的事項保密的程度相當高，不僅我們住在香港的人無從知道，就是從台灣到香港的朋友，我也向他們問過，他們也一樣不能給我以圓滿答覆。所以，對問題的這一面我只好交白卷。至於什麼是『適當的時機』一層，這只是普通答覆問題的人一種辭令，可以解釋為『遠在天邊』，也可以解釋為『近在眼前』，當然更無關宏旨了。」

我的話說完，這位提問題的朋友，依然逼進一步的問我：「您所謂不清楚的大致是指『軍事反攻』的一面，但除『軍事反攻』以外，還有所謂『政治反攻』，您又覺得怎樣呢？」

我說：「這一問題正是海外與台灣若干不同看法的癥結所在。海外的觀點，是從過去三十餘年失敗的歷史，國際一般的空氣，以及中共在大陸這十幾年來徹底高壓而終於無法穩定他們的局勢出發；政府的觀點，則從着重現實，尤其着重穩定台灣內部，並爭取國際優良條件出發。看政府當前一般的成績，如內部秩序良好，人民的物質生活遠比大陸舒適，因而軍事、經濟、文教各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步。我知道大家對台灣目前的政治情況仍有若干的不滿，但只要大家能共同努力，並實地去加以詳細研究，然後運用切實可行的方法予以推進，我相信當局也不是抱有如何牢不可破的成見，而以安於現狀為滿足。」

「不過於此有一點應請大家特別加以注意：即假定毛澤東一旦死了，代毛而起者，又為中共一個或幾個比較穩健的人物，他們覺悟到『形勢比人強』；確實感到所謂『東風壓倒西風』，只是一種有趣的童話；或他們也感到人民的消極抵抗，足以制他們發展經濟的死命，而繼續高壓也無所施；甚至他們還覺悟到以現在的方式與民主國家去鬥爭終於無效，而必須幡然改圖；……居然來一次對內對外的大妥協，即令就是暫時的，或者是『退一步進兩步』的，我相信對若干民主國家的誘惑力依然很大。只要看甘迺迪一經看見蘇聯對古巴問題小作讓步即喜形於色；有一等民主國家表面上着重貿易，偽裝民間行動，而發出經濟與政治分別

處理的反常議論；乃至美方大使級的與中共代表談了多年而毫無進展，也依然不肯斷然放棄；何一不是處心積慮在誘致中共的妥協？如果中共全無妥協的需要，自然還要僵持，如一旦中共覺悟非作出暫時的妥協不可，而美方又不惜付出相當代價以購取一時的和平，還不是一拍即合？果不幸而真有這樣一天，則中華民國的前途，乃真是十分的可慮了。

「以我所了解，『軍事反攻』與『政治反攻』，需要同樣的勇氣；有時『政治反攻』所要的勇氣，可能比『軍事反攻』所要的更大。大家似乎只承認過去的失敗全在軍事，而於政治並無多大關係，這也只是一種心習使然，並不足怪。以我所分析，『政治反攻』雖似迂緩而勝算較多；『軍事反攻』而無『政治反攻』配合，即令能擊敗中共於一時，也未必能予中共政權以根本摧毀。再就大陸的現狀來說，毛澤東所以陷於今天的苦境，大部分也還是他的政治失敗使然，而不是他的軍事有了如何了不起的破綻。捨政治而單單強調軍事，這等於攻中共之堅而不攻中共之瑕，我是期期以為不可的。」

在美國的留學生，大體上自然是研究學問的興趣甚濃，可是也有少數已經學有專長，年齡在三十四十之間，甚至在美國的社會服務已經有了一段經驗，他們眼見國內不能有一個安定的局面出現，使得他們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好暫時寄人籬下的住下去，但究竟心有不甘，

不免感觸甚深，在無意中乃自然流露出一種激昂慷慨的論調。例如在我們這次談話中，便有一位有這樣的問題提出，他說：「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人數以兩個時期為最多，其一在清末的日本，其一則在今天的美國。當日的日本留學生，在一個時候可以說是中國革新運動的主力；一派掀起了清末的立憲運動，一派則參加了推倒滿清的革命運動，儘管他們的宗旨不一樣，但他們的工作都做得有聲有色，不僅遭遇困難無所恐懼，甚至有不少的人就拿自己的生命犧牲也心安理得；何以今天留美學生除掉人自為戰努力一種學問的研究以外，對國事似乎是漠不關心，乃至有一部分人已在美國安居樂業，他們覺得國事就繼續的再糟下去，也好像與他們不甚相干呢？」

我聽完這一問題，確實沉默了好一會，但仍覺得非常慎重的回答不可。我說：「我對這個問題可以試答，不過妥當不妥當，仍請各位研究。」

「第一、現在各位在美國留學，與當日許多人到日本留學，其情況截然不同：中國與日本僅一水之隔，當時出境入境並不須辦理任何手續，來去非常自由，在日本的學費與生活費也比較便宜。因為路近而用費較廉的這種原因，所以當日的留日學生，仍可與國內保持密切聯繫，也容易明白國內一切的動向，他們對國事比較的關心，這是很自然的。」

「第二、當日到日本去留學的，有長期計劃的不多，除掉極少數的例外，他們所選習的大率是速成法政、速成師範，比較嚴格一點的，便是士官或其他一類的軍事學校。他們應付學校功課比較的輕鬆，因而還大有餘裕可以過問國事。今天在美國的各位，大抵非夜以繼日從事研讀不可，到了放假的時候，多數還要覓得臨時的工作去解決下一期的學校用費，平日漁看報的時間都不多，那裏還有時間過問國事呢？過問國事必須有長時間研究；又必須各方奔走，與多數人交換意見；而且必須有組織；凡此均非今天在美國留學或就業的各位所容易辦得到。

「第三、據我所知，當日留日的學生，在國內受過高等正規新教育的人還不多，可是他們對中國的舊學問或多或少具有根底的却不少，因而他們歡喜發表意見，歡喜辦刊物，能長篇大套的寫文章。在戊戌以後（即光緒二十四年以後），同盟會成立以前（即光緒三十一年以前），由留日學生在國外發行的刊物以及小冊子乃多到數十種，等到同盟會成立以後，「民報」隨則出版，其時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原已風行一時，於是革命立憲兩派在言論上的鬥爭乃更趨尖銳，因而把政治的空氣造得非常濃厚，這在今天留美的各位都不容易辦到。今天大家所需要的精神食糧，其種類與內容，都已提高，各位不辦像當日留日學生那樣的刊



物，在我想來，這毋寧說是一種好現象。

「第四、當日留日學生所從事的政治活動，其目標非常單純，僅僅是如何去對付一個腐敗的滿清政府。一派主張維持它而加以改造，是爲君憲派；一派主張根本推翻它，而重新建立，是爲革命派。這兩派人當日的想法：前者以爲只要有了一部白紙黑字的憲法，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即不難現代化；後者以爲只要把滿清推倒了，一個中華民國的黃金時代便立即可以到來；故能一鼓作氣的分途並進，在很短的時期，便能創造出一個新的局面。可是經過了這五十多年的教訓，乃深深知道要改造一個像中國這樣人口最多，而各地文化程度經濟情況又相差甚遠的國度，其艱難困苦，實遠遠超出當日一般志士仁人的想像之外，使得人民所身受的痛苦，乃較清末有過之而無不及！再加上，這半個世紀以來，整個世界也起了空前的變化，使得一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乃錯綜複雜到異乎尋常，換言之，即任何一個國家想要遺世獨立，來自我創造一套改造國家的方法而付諸實行，幾乎已成了一種不可能的事。基於此一情況，大家對政治運動乃不敢輕言，這不獨留美各位的心情如此，即住在任何一地的人，其心情亦復如此。以我所了解，決不是當日的留日學生，便對國家十分熱心，而今天的留美學生，便把國家置之度外，實在是因爲時代的不同，大家運用頭腦的方法，也就完全

兩樣了。

「第五、以當日留日學生與今天的留美學生比較，還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點：即當日在留日學生中，很自然的產生了兩大領袖。領導革命派的是孫中山，領導君憲派的是梁啟超。當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中山在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後，即亡命日本，其時他的年齡剛剛三十。再經過二十二年倫敦被難一幕，他的革命領袖地位乃完全確定。當梁啟超在戊戌維新（一八九八）失敗以後，也亡命日本，其時他的年齡才二十有六。他還憑藉戊戌一幕所博得國內國外的同情，再加上他自己已在言論上的不斷努力，他的君憲派領袖地位的確定，也不容否認。以孫、梁兩先生當日的年富力強，而又熱情洋溢，其時，留日近萬的青年，凡關心國事者，乃不知不覺的，集中在他們的兩大旗幟之下，因此乃能在十幾年之間，便能造出一幕政治運動的高潮，因而有中華民國的出現，由今天想來，這是很自然的。目前近萬的留美學生，乃是人自爲戰，羣龍無首（即有此類自告奮勇的人，其資望與能力也太不够），只能在學術上求貢獻，不能在政治運動上顯身手，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而且也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我勸各位不必苦悶，更不必灰心，各位要知道過去留美學生對新文化運動，新教育運

動，新工商業運動，乃至對科學水準的提高各方面，已經有了偉大的貢獻，今後只順着這一趨勢去努力就行。以我觀察，中國不出三五年，便非有一次大的變化不可，等到這種變化一來，即有無窮的事業需要各位去做，各位只須充分準備，充分表現你們的實力便好了。」

#### 四、參觀普林斯頓和哈佛兩大學

住在紐約的旅館太久，我確實感到有些苦悶，到了十一月中旬，我隨時去一去哥大的這一義務已經解除，於是乃有了一去普林斯頓和哈佛兩大學參觀的機會。

我參觀普大在十一月十四日的午前，是何淬濂先生陪我一陣去的。普林斯頓（Princeton）屬紐約的鄰州紐澤西，稍偏紐約的西南，乘巴士來去，甚為方便。到達普校以後，首先即去訪問該校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童世剛先生。童先生係淬濂的老友，承他領導我們看了中文部分的書庫，藏書之富，善本之多，較哥校似稍過之。中文部共有女職員四人，我們都見過，其一即童先生的太太。楊振寧、李政道兩位，原來都在普大繼續研究，刻李已赴哥大教書，打電話問楊，適因事他去，須兩天後始能回來，因此我們未得一晤。

普大僅有學生四千人左右，但在學術界的地位甚高。威爾遜任總統以前，曾做過普大的

校長；我們的胡適之先生曾在此校園書館有過短時期的任職；世界有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會在這裏領導過研究工作好多年。

這一天，我們在莫復禮 (Frederick More) 教授家中午餐。莫先生和他的夫人陳效蘭女士，我曾在香港一美國友人家中見過多次，也談得很多，當時他們在客中，我僅僅知道莫太太曾在金陵女大讀過書，對中國文學有修養，這次到他們家裏去拜訪，才知道她是一位標準的主婦。她做了不少的中國菜請我們，最後還有蒸餃和鍋貼。同坐的除何淬濂先生和我以外，還有一位陳先生，一位高先生，都在這裏教書，高即當年在參政會的老同事高惜冰先生之子也。莫先生對中國的文字與學問有甚深的修養，中國話更說得流暢而自然，聽說他準備翻譯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不知能否成爲事實（我實際不贊成他譯這本書）。

從莫先生家裏出來，我們去看了陳韞銳先生，陳先生早年在上海當律師，頗有名氣，後來我和他在參政會同事，現在，也垂垂老了。老友黃仲蘇是陳先生的妹婿，因此我們談到仲蘇。他問我近年是否聽到仲蘇的消息，我告他一度聽說仲蘇到了廣州，好像是準備出來，但仍被中共截回，最近七八年便全沒有他的消息，究竟他是否尚在人間，大概也在不可知之數了。（按仲蘇還健在，一年前我還看見他們夫婦的照片，但已憔悴得非復當年的樣子，五五

年十月補記。)在去陳先生家的途中看見一所小教堂，據說是威爾遜常去做禮拜的；又看見一所兩層的樓房，便是愛因斯坦的故居；他們乃同一時代的名流、學者，死後也同歸寂寞。

時間到了午後的五點，但我們仍去拜會了陳觀勝教授。陳先生專攻佛學與佛教史，係湯用彤先生高足，英法文外，兼通梵文，年約五十，活力甚強，曾為各校所爭聘，但卒為普大所挽留，現任正教授。在陳先生處吃了一些茶點，乃與泮濂先生同就歸途，我回到紐約的旅館，已經是夜間九點左右了。

十五日午前，應費正清(J. King Fairbank)教授之約，前往波士頓哈佛大學參觀，適韋慕庭教授亦被約到哈大作一次講演，乃得同行。波士頓在紐約北面，飛行一小時即到。因事前已與余傳張姪約定來接，故一切均甚方便。

到達哈大後，即與費先生見面，並由他指定謝文孫君陪我到哈大各部門參觀。謝君來自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讀書甚多，常識豐富，看樣子還不到三十。他現正參加費先生所主持的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繼續從事研究。

在哈大圖書館無意中見着洪煊蓮光生。洪年七十，在美有研究杜甫的專著(英文本)，現已退休，但仍與哈大保持相當關係，可隨時到圖書館看書。同時，我也見着來自新亞書院

的孫國棟君及新近到哈大的新亞研究所的會省同學，甚感愉快。

午後五點，在費先生家裏參加茶會，到了二十餘人，大致均與費先生所主持的機構有關係者。茶會中我們隨便暢談，我頗感到他們研究中國情況的空氣，甚為濃厚，態度也甚為積極。七點，晚餐開始，在座者除我與韋慕庭先生及主人費正清教授外，有研究「中國共產主義及毛澤東之興起」的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他並有研究嚴復的專著）先生，有研究郭沫若的芮效衛（David Roy，生長中國，刻在哈大教中文）先生，還有專攻「中俄關係史」的Mark Maucaull先生。中國人方面，則到有周策縱先生（他著有英文本「五四運動史」）、張佛泉先生以及陪我參觀的謝文孫先生。因為美國的各位都能說中國話，我們從七點到十點，乃作了三小時快談。關於中共的前途，我說明毛下台後代毛而起者可能性最大的仍為周恩來，決非劉少奇，到時候，中共對美國的關係可能有所改變。關於日本前途的推測，我仍本於一九五三年以來一貫的看法，說明日本為一可愛而又可怕的民族，必須中美合作，使日本的民主力量加強，日本人民的生活繁榮而安定，對他們的移民予以方便，對他們貿易的進展及工業原料的取得不加以過分的限制，……則日本或可與吾人和平相處，否則日本極右與極左的兩種勢力均可能滋長。而且日本人不容易忘記仇恨，但容易忘記別人對他

們的好處，這一點也值得留意。同時，我又說明日本依然是亞洲一個最不容易赤化的國家，其理由：一、日本究竟已施行了八十年以上的憲政，人民有高度的自由；二、日本多數人民的生活確已逐年改善，土地問題也解決得相當徹底；三、多數農民仍對皇室有相當信仰，皇室仍不失為日本的安定力量之一；四、日本工商界的領袖，人才甚多，他們所實行的已不是舊式的資本主義，而頗能顧到工人的福利，其失業的人數自來不多，有時且感到人手不夠；五、蘇俄已推行共產四十年以上，中國大陸已推行十三年以上，成績均不見佳，中共更徹底失敗，不能予日本左傾勢力以鼓勵；六、儘管日本目前缺少偉大的思想領導者，但多數有地位的人士，其言論與態度却相當謹慎；……凡此種種，均為日本不易赤化的基本原因。目前日本的左傾思想雖然具有相當力量，但共黨人數却已逐年減少，乃係顯明的事實。這一番話，在座者多與我有同感。

### 五、在波士頓醫院十六天

我們這一晚的談話，所涉及的範圍確實相當廣泛，不以上面所記述的為限。我知道，美國方面在過去中了共黨宣傳的毒，或誤於共黨同路人一種虛偽的報導，確曾有人作過若干離

奇怪誕的主張；但自去年（一九六三）五月發生大陸人民向海外大舉逃亡的一幕，所有共黨道十幾年來一切糟糕的事實，即已暴露無遺；即美方若干人士的幻想，也已經被這類事實大部粉碎。這一晚提問題的是同座各位，答問題的是我，他們聽了我的解答，最多也只有對某一問題作進一步的發問，但絕對沒有人發表他們自己在何具體的主張，並絕對沒有人提到「兩個中國」。主客之間根本無所謂爭執，也根本沒有發生爭執的機會。但後來不幸有一位莫名其妙名其妙的記者，居然無中生有，憑空編造一段謠言，說我與費正清之間，因為「兩個中國」的問題會有過一番熱烈的爭辯，甚至說我在波城臥病兩週，即因此而起；而台灣和香港的若干報紙，不明真象，又把這一謠言，展轉登出，以致弄得費本人深感不安，這確實是我此行中一段最無聊的插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中國近年有若干故事，都是這類庸人無端製造出來的，以致引起國內國外許多無謂的猜疑與誤會，而造謠的人乃完全不明白他們所應負的責任，反而以他們能報導内幕消息，或製造問題而沾沾自喜，這種無知與無賴的行為，真是我所不了解的。

至於我這次在波士頓胃潰瘍之所以復發，實早已植根於紐約兩個月不太正常的生活；加上我不願放棄平日每晚必看書兩三小時的習慣，以致睡眠不足；而十一月十四、十五日這兩



天，在普大與哈大又完全未得休息，談話較平時爲多；都不失爲誘發的主因。十五日夜深回到傳發家中，即整夜不能入睡，一直坐到天亮，乃嘔吐不止，胃部出血甚多，延至十六日午後，乃由傳發送我到麻省總醫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診斷。初以爲三五天即可無事，即住在頭等病房，每天的醫藥及房費，約須四十美金至五十美金（記得十年前在港以同一病況住法國醫院頭等病房兩週，所費不足港幣五百元），這次總算是我生平住醫院花錢最多的一次了。

以我這次及後來在舊金山再住醫院八天的經驗，加上兩度在舊金山到聖瑪利醫院去看君勳先生，我確實知道美國的醫藥設備非常良好，醫院規模宏大，他們的醫生、看護，以及其他一切在院服務的人員，其對待病人的態度，都異常親切。爲我看病的是該院任專醫胃病的 Foster 醫生，年約四十餘，沉着而又仔細。當我初入院的頭幾天，情況相當險惡，他不愧不忙；當我病況已見好轉，他更格外慎重。我一共照 X 光四次，第一次照肺部，無病；二次照胃，不完全清楚；三次仍照胃，乃發現胃上有一小小疤痕，舊創新發；第四次照全身，費時最久，證明各部分良好。由指頭抽血化驗，歷時約一週，幾乎是每天一次，稍後仍隔一兩天再抽一次；驗血壓則每天一兩次不等。以血液中水份不够，乃將一手掌的背面刺破，綁好，

平放不動，由高懸之水瓶中每次輸水兩瓶，每次約需三小時左右，頗感痛苦。又以一細軟之橡皮管，長約兩英尺許，由鼻孔透入，到達胃部，吸取胃液若干化驗，雖爲時不長，但經過三五次，則幾痛苦到不能忍受。一切驗畢始正式服藥，每日三五次，深夜仍服一次。最初幾天，完全飲冷牛乳，日夜不斷；大致在五天以後，始每頓給半生熟雞蛋一枚，繼加薄脆的餅干兩片。十天後始能起床到房外散步，飲食亦逐漸正常，然量仍極少，渴則仍以牛奶代茶。問醫生何時可以出院，答須待驗大便完全無血，始能確定。最後決定出院，實十二月一日午後也。

我在此次入院的第二天，費正清先生及其他兩位教授即來看我，並囑傳弢轉告要我安心養病，不必以醫藥費爲念，哈大與哥大可共同負責，其意可感。謙沖兄第三天自紐約飛來，告我紐約方面的友人，均對我異常關心，淬濂兄更謂醫藥費決有辦法，並勸我作一次徹底治療，如須割去胃一部分，亦不必怕。但醫生自始至終，却未談及須動手術。在院共十六天，傳弢每天必來看我兩次，午間十二時左右一次，午後五六時一次，從未脫班。其夫人陳幸女士，以有孕嘔吐，須靜臥，但也到醫院看我。十天後，傳弢並介紹其他友人到院作短時間談話，使我雖在病中，生活也不過分單調。我在病榻自思：深覺我平日之愛朋友，乃遠不如朋

友之愛我，實且感且慚之至。

我同房住的一老人，年約六十左右，患癌病，開過兩次刀：一刀在腿部，一刀在腹部，係從腿上割肉一片，補在腹上，經過良好，已能下床走路，但腹部仍隨時作痛。動此項手術者，係一中國王姓醫生，名就安，廣東人，曾在香港服務，現為本院一開刀名手。我問他此老人病況如何，他答暫無問題，但最多僅能延長壽命一年，以癌症還沒有根治的方法也。在這十幾天中，我和這位老人以及他的老妻愛女，都混得很熟，醫誠老人絕對不能抽烟，其妻也監視甚嚴，但他的愛女，則每天必以烟一兩包暗暗送他，也偶以兩包送我，我眼見他的家人對他那樣親切，又聽到王醫生告我以實況，乃不勝黯然。

我在出院的一天，醫院賬仍未算清楚，由傳發簽字暫欠，傳發夫婦約我在一中國飯館晚餐，並在他們家裏靜靜睡了一夜，次日一早，即飛回紐約。上一天，在同一機場起飛，而且是同一公司，曾有一飛機失事，死二十五人，如我早一天出院，或亦有搭上此飛機的可能，我的生命豈不可以痛快的提早結束？

## 六、「丈夫亦愛少子」

我之匆匆飛返紐約，一方面固然是得到醫生的許可，實際也還是由於我自己一再向醫生催促。我之所以必須提早出院，其原因甚多：一、醫藥費儘管由哥哈兩方允為擔負，但要別人作此額外的支出，內心實過分不安。二、多住醫院一天，即須支出等於港幣三百元之數，我生平不會過過這種奢侈生活，總覺得以提早結束為是。三、我在紐約所住的旅館（College Residence Hotel, 601 West, 110th St.），依然保留未退，初以為留波士頓三五天便可回去，房內一切書籍、衣物、信件均未收檢，自己的東西遺失還不要緊，萬一從哥大圖書館借出幾部不容易買得的書不見了，便太對不起人。四、我的兒子宗權在Lodge的Forest City 1 讀 Waldorf College 讀物理和數學（他已經在香港的崇基讀過一年），連讀三學期都得着榮譽學生的獎狀，我想鼓勵他一下，答應他耶誕放假到紐約來看我的時候，請他吃兩頓較好的中國飯，在紐約玩幾天再帶他到華盛頓旅行一次，藉此瞻仰瞻仰華盛頓、傑佛生、林肯諸人的紀念堂，使他知道一個國家的建立，必須有若干政治人物為他們的理想去奮鬥，決不是單靠發展科學和物質建設，便會有如今天這樣一個美國產生的。五、我在紐約的確也還有許多事必須結束，尤其買了若干書籍和十幾種地圖必須親自打包付郵，如果連這類的瑣事也要靠朋友幫助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同時，還有好幾位朋友約着繼續再談也非踐約不可。

預計我留在美東的時間，最多已不能超過一月，而有如此等等的待辦，這也確實是我急於要離開波士頓的主要原因。

本來，亞協是爲我辦得有醫藥保險的手續的。根據該會在香港方面給我的信件，原已提到這一層，可是不會說明由美國某一家保險公司承辦，以致無從接洽。我知道紐約方面的朋友也會爲我打聽過，可是依然不得要領。假定我留在麻省醫院的時候早知道確實保了險，則我可能勉強多留在波城十天或一週，聽醫生給我從容診治，或許後來在舊金山胃病再發的一幕，也就可以免除了。

回到紐約以後，謙沖夫婦原擬把我留在他們家裏多住幾天，暫不通知其他的朋友，好讓我靜靜地休養的。可是事實上不可能：凡我所要結束的事，要再看的朋友，還有幾本借得不會看完的書，都只有回到旅館去應付較爲方便。同時，我還感到他們兩位也實在太忙：先生既要辦公，太太還非要每星期出去工作五天不可，假定一個新病初愈的朋友再留在他們家裏作客，以周太太的性格，事事對人體貼入微，她一定每天還要特別做兩樣菜給我吃，便真要把她忙壞了！於是我大下決心，雖經他們再三堅留，我還是在第二天的晚間，搭着他們一位客人的便車，一直回到了旅館。留在旅館的東西，連一張紙也不會遺失，而且由一位收拾房

間的老太婆替我整理得井井有條，這真是使我最覺高興的事。

到旅館三四天後，多數在紐約的朋友都跑來看我，但他們知道我還不能多講話，大抵稍坐即去。周太太還是做了許多菜送到旅館，而傅弼老姪、袁道豐兄也都送來許多他們認為我可以吃的東西。尤其想得週到的是老友李叔明先生親自提來一大瓶炒好的米給我煮稀飯，還由他的太太做了幾樣鹹菜，這真是太可感了。頭一星期我還是遵守醫生開的菜單以牛奶爲主食，朋友們送的東西大部存入冰箱，一直等到我的孩子宗權來了，才幫我吃去不少。

宗權通知我二十一號午後四五點即可到達，其時大雪紛飛，由他的好朋友，謙冲兄的二少爺，到汽車站去接他，我也留在旅館等候。可是等到夜裏九點、十點、十一點，……還沒有消息，我在十層樓的窗口望了又望，凡見着兩個青年並肩在雪中走着的我都特別注意，但總總不是，我真有點着慌，擔心他路上出了什麼問題，「丈夫亦愛少子」，這一篇童年時代讀過的「戰國策」，乃在我腦子裏出現，而感到意味深長。一直到十二點半，才由周太太轉來他的電話，居然到了！我乃跑到樓下會客室去等候，又經過了一點多鐘，才看見他手提一只衣箱，肩上背着一個手提包，漫步走進了旅館的大門！原來他的車子在離紐約五六百里的雪地拋錨，且須修理，耽擱了四五小時，以致鬧出這一次誤點的岔子。

他出國的時候十七歲半，去年十九，更長高了，身體很結實，衣上留下不少的雪花，兩隻眼睛炯炯有神，但頭髮梳得一絲不亂，他算是我的孩子們中最漂亮的一個。這一晚父子同榻，大話家常，也說了他在學校的許多得意之作，這是我生病以來一次最大的愉快！（按宗權今年二十三，已於本年八月二十七日與劉雅愚結婚，係我老友劉雅聲兄的長女，美而多能，是我的第二個漂亮媳婦；刻他們夫婦同住 Montana 州，宗權即在該州立大學研究院讀碩士。五五年十月補記。）

他留在紐約的這幾天，我們看了許多不會到過的地方，唐人街也去過好幾次，替他添了一件比較厚的外套，又同他下鄉去看了他的周伯伯和周媽媽。耶誕這一天，何淬濂兄約我們到他家裏去吃飯，有不少的客，他和幾個女孩子很談得來，一會兒，他便和她們坐下來打牌，一會他們又一陣出去到赫貞河邊踏雪，青年人，青年人，未來的世界是他們的啊！一直延到二十七，我才和謙沖兄帶着他去華盛頓作了三天的快遊。

### 七、留在華盛頓的三天

我們是塔十二月二十七日最早一班從紐約開行的火車去華盛頓的。我到美國以來，坐火

車還是第一次。普通客車來回票美金二十一元，座位略同於過去滬寧路的頭等，但清潔遠不如日本，沿途上來的客人，多找不到坐位，只好站着，尤其從華盛頓回紐約這一天站着的人更多。美國人對交通管理確無特別可稱道之處。聽說他們的鐵道是要賠本的，有兩家大的鐵道公司已合併成了一家。紐約和華盛頓兩處的車站都不見佳，只給我以黯淡和陳舊的印象。我因為動身太早，在旅館不會吃早餐，紐約車站的餐室，更是亂糟糟，以我生平到過的火車站，如上海、杭州、南京、浦口、天津、北京、馬關、大阪、京都、東京、馬賽、巴黎，乃至廣州、香港等等，我覺得沒有比紐約車站的餐室更壞的了。美國了不起的地方自然很多，但一定要說美國的月亮都比別處的亮，我看不見得，日本一位與鐵道有關的老先生告訴我：美國不久以前，曾有一位管理交通事業的大員，到日參觀了日本這條新近修成從大阪到東京的特快鐵道，表示非常滿意，認為可作美國整理鐵道的借鏡；並且還說，他們很想從波士頓通過紐約到華盛頓也修這樣的一條。能虛心承認別人的長處，而想加以摹倣，這却不失為美國人可佩服的地方。

火車走了四點鐘以上，不到十二點便已到達華盛頓。在車站接我們的有老友童季齡兄、慕韓的姪子曾君培光、大使館的朱君耀祖（中央政校的同學，他曾到紐約和我見過），曾朱



兩位都有車子，甚爲方便，但找一家預定的旅館，却費了相當的時間。

我和宗權住了一間雙人房，每天十一元，謙冲兄住了一間單人的，六元，一切都清潔整齊，很不錯，餐廳也十分安靜而招待頗週到。這是在紐約所不容易有的。

四點多鐘的火車，感到相當的疲倦，吃了一些東西，睡了一會，商量了第二天的遊程，並託朱君約好明天午前到中華民國大使館去看蔣廷黻大使。這一晚洗澡後睡得很安適。

三十年前的「一二八」淞滬之役，我和王造時代表上海各公團到北平勸吳佩孚張學良響應抗日，便在清華大學和蔣廷黻先生見過一次，後來在重慶也見過，這回在華盛頓使館算是第三次了；自然彼此都老了，但他還是那樣健談。他表示了對國際現狀的許多看法，尤其對中共和印度邊境的衝突談得很多，不過，我們都不會談到台灣。在同一天的晚上，他約我到他的官邸橡樹園晚餐，又談得不少。有些話是白天已經談過的，又重述一遍，可看出他的老境。（按蔣大使已於去年去世）

儘管我們遊覽的日程僅有二十八、二十九兩天，但因爲朱會兩位分別擔任爲我們各開車一天，所以我們到過的地方還是不少。

美國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有藏書千萬部以上，而不會裝訂的刊物還

未計算在內。老友袁同禮兄在該館的中文部服務多年，而曾培光兄也是館員之一，我們去參觀的時候，更見着其他的中國職員好幾位，並承他們送了我「中國善本書目錄」兩厚冊（王重民輯錄、袁同禮重校），內容計分經、史、子、集及補遺五部分，大率以明刻本爲最多，並附有著者索引及書名索引，甚可寶貴。（按袁同禮兄其時精神已不佳，現已去世。五五年十月補記）

美國的總統府，即所謂白宮（White House）是也，爲一規模不大的兩層建築物。從它的正門遙望，便可看見方尖高聳的華盛頓紀念碑；更遠一點，也可看見白石圓頂的傑佛生紀念堂（Jefferson Memorial）。白宮外表儘管沒有什麼，但內容却相當富麗；保存歷代總統用過的若干傢具，而壁間所懸名畫尤多，如華盛頓及林肯畫像，均出自名家手筆。他們印行有導遊的冊子一本，裏面對白宮的各部分均有說明，據說係甘迺迪總統夫人所編輯，每冊一元，每天既有川流不息的人前往參觀，大概每年可銷去若干萬冊也。

環白宮週圍均政府機關，如國會、高等法院、財政部、農部等等，規模無不比白宮大若干倍，儘管他們保留此一歷史遺物的白宮不願改建，但將來終必有改弦更張之一日也。

我們也參觀了他們的造幣廠，實際即一印行美鈔的所在。聽說每天印出各種票面數額不

同鈔票三千餘萬，大抵以新代舊，雖事實上不能不增加發行，但通貨膨脹的數字並不太大。我所最同情的，便是那些爲鈔票點數的黑人，這大致也是世間最單調的工作之一種。

我所最受感動的即參觀林肯的博物館，其地即由當日（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四日）林肯被刺的戲院改建，陳列了林肯的若干遺物，他在被刺前四天的一張照片，及兇手和兇器（一支約三四寸長的手槍）的照片與實物，也都一一存在，而讀之使我低徊流連的，却還是他那篇「民有，民治，民享」的簡短演說。博物院對面，即林肯死去的一所民房，現仍保持原狀，我們去看了，林肯和傑佛生的紀念堂我們也去瞻仰了，林肯的坐像，傑佛生的立像，都能表現他們各爲一代偉人的神態。

聽說會慕韓的兒子憲斌，也因參加一種討論中國語文教授的會議，此時正在華盛頓，但以事前無聯絡未能見面，因此我們到慕韓墓地去的時候，無法約他同行。墓地即在華盛頓近郊的天主教墳地，汽車十幾分鐘可到，他的墓門，站在路邊即可望見，其時雪深一尺以上，彌望白漫漫一片，可象徵慕韓的一生，我們獻上了一個花圈，默念了一分鐘，並祝他長眠此自由之土。

凡上面所舉我們在華盛頓所參觀過的若干地方，自然都能引起我若干的感想，但我覺得

足以代表美國立國精神究竟還是美國的國會，美國國會的建築，宏大而又堅實，正和其他公共建築物相類似，我們去的時候，正有無數的青年男女也在這裏參觀。在入門不遠有一座大廳，陳列着許多立着或坐着的塑像，似乎都是各州在議會史上的有名議員，甚至南北戰爭期間兩方對立的代表者，也各有塑像在內，能使全國各地前往參觀者自然發生團結之感。我們在會內各處瀏覽一過，無論開會的地方或各黨議員分別集議或辦事的所在，正如我在一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六年兩度參觀日本國會所得的印象一樣。日本人摩仿外國，處處維妙維肖，中國人學外國，至少也已在半世紀以上，但事事都是四不像。（本年八月至九月，在台北留了三星期，參觀了許多新建設，乃大有進步，為過去大陸所無。五五年十月補記）我回想在南京第一次開國民大會那座新建的會所，乃完全是一所戲院，既可演劇，也可作為其他團體開會之用。我從來不會聽說美國或日本的國會議場可作為演戲或其他團體開會之用，而中國乃獨不然。在中國的設計者以為十分巧妙，殊不知這樣一來，這個全國最高會議的場所，乃在它的尊嚴上受了莫大的損害。但日本的國會也有一點與美國的不同：在日本的國會一進大門便只看見四座銅像的位子，而已經建立了的銅像只有板垣退助、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三座，其一則聽其空着，好像很不整齊，我在一九五三年曾問過那位領導我們參觀的日本人：「據

您推測，這個空下的位子將來會屬於那一位呢？」他答：「很難說，也許尾崎行雄有這種可能吧。」一九五六年我再度去參觀，正值他們在開會，我們只在會場的旁聽席上坐了一會，即行退出，不會繼續留意這件事，究竟那個空的位子是否已將尾崎補上，我至今毫無所知。尾崎誠然為日本的議會政治也有過五十年的奮鬥史，且曾歷任東京市長、文部大臣、司法大臣諸顯職，但在日本近代史上的地位，究竟還不能和板垣、伊藤、大隈相提并論。也許日本人抱着寧缺無濫的觀念，對他依然是吝而不予吧？假定果然如此，却正可證明日本人把國家的名器看得十分重要，也仍不失為立國精神的一種。中國人當袁世凱活着的時候，總要把這位「袁根」（這是章太炎在家書中，罵袁所用的名辭）說成神武英明，讓他做總統不夠，還要請他做皇帝；這十幾年以來，毛澤東殺人如麻，無惡不作，一般捧毛的黨棍，一定還要說「毛主席」對人民有「說不盡的恩情」，把他許多荒謬的言論奉為經典哩！單單憑這一點奴性，中國人真會鬧到亡國滅種也說不定啊！

話說遠了依然言歸正傳吧！

我在紐約便會聽說，華盛頓是黑人的天堂。在這裏不僅沒有種族的歧視，而且黑人在政府機關中地位頗高的也不太少。我到華盛頓一看，覺得這一說明雖有幾分近於事實，但究竟

也還是聯邦政府要維持這一不歧視黑人的原則，在事實上不能不表示這樣一種姿態。至於一般白人多願與黑人隔離，也還是與各地一樣。例如在華盛頓的某一條街上，只要有一家黑人遷入，其周圍若干的白人家庭，便往往逐漸搬走，於是黑人利用這一機會，也就大批湧入，以填補這一空缺，因此，整個的一條街乃變成了黑人街。假定只是一個單純的種族問題，解決還不十分困難，如果再加上教育文化問題、生活方式問題、清潔衛生問題、貧富懸隔問題等等，衝突乃可隨時發生，而解決也就非常棘手。我去年初到美國的時候，小石城的事件剛過去不久；而密失失必州某大學不許黑人入學的問題，乃鬧得相當的緊張；等到第二個問題暫時歸於寧靜，而今天Alabama州Birmingham的黑人暴動事件又引起了軒然大波！站在聯邦政府的立場，操切固然不可，坐視也勢所不能；不歧視黑人的原則不能不顧，而各州不同的立法，又不能度外置之；就今天美國內內外外的情況來說，真也可說得是多事之秋了。因此，我也聯想到我們自身的問題；美國過去不是沒有過排華的歷史，而近年中共不斷的反美行動與言論，事實上也不能不予美國人以多少刺激。好在我們留在美國的僑胞究竟不過二十多萬，而純粹的勞工尤其是絕無僅有，再加上近年上萬的留美學生都能力爭上游，老一輩的也多受人尊敬；另一方面，美國人近年對中國的文化也正在努力求了解，其所得也遠非六

七十年前可比，所以我們能與美國人和平相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基本態度上，還是我們的孔老夫子說得最好：「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今後我們所應致力的，只是如何把足以引人重視的事實逐漸加多，而把被人輕視的事實力求減少，便思過半矣。

就我個人來說，原想在華盛頓多盤桓幾天的，可是一月一號宗權便要從紐約趕回 Iowa 去參加學期考試；我自己也要在六號飛往加州，同時還想在紐約和幾位朋友，再有一兩度的聚會。因此，只好乘二十九日晚間八點十五分的火車返回紐約。在此次的華盛頓之行，有一件事覺得可惜的，便是我早與竇宗一先生約好，原說到華盛頓一定去看他的，同時，我還知道，他近年參考了中外多種資料寫成了一部幾十萬字的「李鴻章傳記」，也很想向他領教，但因爲在兩天中，東跑西跑，簡直不能抽出時間，以致失去了這一機會，我只好在這裏附筆道歉了。

## 八、離開紐約的前夕

從華盛頓再回紐約，我留在美國東部的時間，便只剩下整整一個星期。在這幾天的短促

時間，我一切不能不作重上歸途的打算。我生平最怕處理瑣務，再加上病後的身體，還不一樣結實，稍一動作，便感到疲勞，可是依然不能不掙扎着把一切一切料理得相當清楚。

兒子宗權，決定一月一號返回 Iowa，在他留在紐約的最後兩天，我和他在謙冲兄家裏過年，會見的朋友不少。亡友郭肇璜先生的大少爺郭錫管，他早年便已在日本的帝大畢業，專攻化學部門的釀造。當抗日勝利後我在農林部的時候，乃請他在上海主持一所農林部附設的釀造廠。我會嘗試過他所手造的醬油，真是鮮潔無比。正待擴張，不幸大陸已告變色，農林部也宣告結束。他後來經過若干時期的轉徙，乃得到美國繼續深造，得有博士學位，近年在芝加哥一間工廠服務，極受歡迎。他的年齡已在四十以上，但不幸還是一位「王老五」，中國留美的女生既是求過於供，而他又無與外國女性結婚的雅意，頗感到相當的尷尬。肇璜兄當年任漢口總商會的主任秘書，實際便是該會的坐辦，其時青年黨在華中的發展，即以肇璜兄為樞紐，而一切道出漢口的青年黨員，也以肇璜兄為最重要的東道主人。這次錫管從芝加哥到紐約來看我，在新年前後暢談了好幾次，使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對他惟一的贈言，便是希望他隨時與國內外的朋友保持聯繫。

李幼樁兄伉儷的二少爺蔭長和二小姐蔭棠都在美國讀書。二小姐已與斯聰君結婚，他們



的家隔我所住的旅館相當遠，曾由斯聰開車接我到他們家裏去吃過飯。斯聰專攻的是工程，已早在美國服務，但對國內的情況非常留意，聰明與沈着，可謂兼而有之，與蔭棠真是理想的一對，已經有了一個兩歲的孩子。我很想和斯聰再作一段長談，但我一個人無法再跑到他們的家裏去，他也每天忙於工作，僅僅與他們在謙冲兄家裏有過第二次的見面。

老友周昌雲兄，是留學德國的土壤博士，曾在農林部我的任內，做過二十個月的常務次長，真是一位實幹的朋友。台灣的土壤，近年已經過全部調查，聽說也以他的力量最多，我不知道他的小姐也在美國讀書，這次在蔭棠的家裏無意中見之，而且長得那樣的美秀，真使我喜出望外。據另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和斯聰的弟弟已經有了很好的友誼，不久便可訂婚，蔭棠和她大可由朋友而變成妯娌，也真是一件好事。

陳啓天兄的兩個兒子，克彥克周，克彥已在美國得了博士，這次帶着他的太太從他服務的地點畢茨堡到紐約來過年，我也和他們伉儷見過好幾次。克彥笑着對我說：「左老伯，我的身體長得這樣矮小，不少的朋友很耽心我不容易找到對手，但現在如何呢？」他太太的家庭，居留紐約多年，她也出生於紐約，至今還不能操國語，但禮貌和態度乃完全是一位中國閩秀，而且見着長輩又那樣彬彬有禮，真難怪他說得這樣高興。克周讀書的地方，隔紐約較

遠，而且也正在預備博士論文，這次可惜不會見着。

此外，如龔從民兄的少爺，乃是我所見着的留學生中頭腦最清楚的一位，這次我前後住在紐約三個月，凡所有帶我坐地下鐵道的朋友，大抵都不免偶有錯誤，惟獨從民的這位少爺乃有切實把握。他在哥大讀書，本屆暑假便可畢業了。

老友夏濤聲兄的少爺夏沛然，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國近代史，我到紐約不久，他便從台北來參加了韋慕庭教授所領導的哥大東亞研究院，專攻國際問題。從外表看，我覺得他的身體不算太強，而又是那樣的刻苦用功，我會勸他身體第一，做工夫儘管從容一點。

總而言之，凡我在美國所見着我們的第二代，幾乎無一不比我們這第一代強，而且確有少數必有大成的希望，我覺得我有向國內朋友報告的必要，因此，我把他們的動向逐一的加以敘述如上。

還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歉然的：便是黃日光和陳慶雲兩兄，以及他們的兩位夫人，我却只和他們見過一次，並承他們邀我和謙冲兄在一處聚餐，後來因為彼此都很忙，便不會有再見的機會。但他們的身體和生活情況都很好。

另有一件事更令我非常高興的，便是我留在紐約的最後幾天，乃居然見着了老友崔萬秋

的夫人張君惠。當我去年九月路過東京的時候，萬秋在機場原已告訴我他的太太也正在美國旅行，但他說得不很詳細。我到紐約以後，才知道她正在O.E.和他們的大少爺住在一塊，原來她到美國一個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去看她的兒子，並且要把他帶回東京去作短時期的休息。她和萬秋結婚是我所見着的，這二十多年以來，以我所見着朋友們的太太，每見一次必有一次的大進步，真沒有更出崔太太之右者。原來她最歡喜的是音樂，且是女高音的名手，後來更在日本的國立音專畢了業，這十幾年來留在日本，凡日本女子所能的如茶道、花道，以及日本和中國的料理點心等等，她幾乎無一不能，而且最難得是把他們的家庭處理得那樣井井有條，把他們的子女教育得那樣好。一九五三及五六我在東京見着她，還只知道她的日本話說得和日本女子一樣。這次她在Ohio不僅為當地一所學校舉行過大規模的音樂會，還有過好幾次用英語公開演說，當地報紙更是連篇累牘的登載，一直到她離開Ohio的時候，當地美國的太太小姐們，以及她臨時教過的若干學生，都望着她淚眼婆娑的惜別，問她何日再來哩！（按君惠夫人現在與萬秋住在台北，她更從黃君璧先生學畫，已兩年，好學不倦。我最近在她家的牆上看見一幅畫，遠望去與她老師所畫的幾乎可以亂真，更使我大吃一驚。五五年十月補記）

在宗權返回Iowa以前，我還帶着他看了一次紐約城的博物院（Museum of the New York）。這一博物院所陳列的種種，乃係按照年代，將三百年以來紐約的人生生活各方面的情况，一一製成模型，以供一般市民或遊客的欣賞。在那裏，我們可以看見一六五九年紐約的街道是什麼樣子；一八一二年那種巡邏隊員所着是怎樣一種服裝，用的是何種武器；一八七〇年紐約人的家庭如何歡度他們的耶誕，一八八〇年紐約上層社會婦女所穿的是如何式樣的衣服；乃至他們的住宅如何佈置，廚房是何等景象，無不一一用實物表現，而人物的形態更栩栩如生。像這一類的搜集、複製、展出，不僅歐美人懂得很重要，近代的日本似乎也在極力摹仿，因此，他們在舞台或影片上的演出，文學家、畫家、雕刻家筆底刀下的描寫或表現，大抵都能給予我們一個較清晰的時代觀念，同時也就很自然的給予我們一種親切之感。中國舞台上所演出春秋、戰國、漢、唐、宋各時代的戲劇，好像所着的服裝，所用的器具，總是千篇一律；中國畫家所畫的古代美人，如西施、王嬙、綠珠、紅拂等，她們的化裝術，好像都是由一位老師所傳授，可是事實上當真如此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今天對於所謂古裝戲，或所謂古裝的人物畫，希望有如何的改進，似乎已經很不容易；可是要把近代的故事如太平天國、楊乃武與小白菜、慈禧太后與珍妃之類的人物搬上舞台，我想

加以相當研究，不弄得太離譜，總還來得及吧。現代的中國人，最不歡喜別人談到抽鴉片、裹小脚，以爲這是太醜的事，不值一談，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的醜事太多了，外國歷史家決不諱言，中國古代的歷史家也往往有詳細的記載。在外國，則不僅不諱言而已，甚至，他們連那種與「醜事」有關的實物也要保存下來。我從前在法國一處博物院，便看見法國古代某種男子出遠門，要把自己太太身上的某一部分，用一種金屬帶形的器具加以封鎖，而啓封的鑰匙，便由這位出遠門的丈夫帶走。像這類器具，他們是公然陳列在博物院裏的玻璃櫥內，但這與現代的法國人有什麼損害呢？小脚與鴉片，既是中國歷史上一種事實，而且時間相當長，地域非常廣，直接影響到中國人的身體與生活非常大，國家民族受到的損害真是無法形容，假定照中國一部分衛道先生們的想法，當然像抽鴉片的烟燈烟槍以及那種不足三寸的綉花弓鞋之類，最好是銷毀得一乾二淨，更如何談得上公開展覽呢？果然如此，恐怕一兩百年以後的人，對這類的事，便會在疑信參半之間！這是我參觀了紐約博物院後所引起的一些實感。（按不久以前，有人攻擊胡適之，說他不該在外國一篇演說辭中提到鴉片與小脚，以爲這是丟中國人的醜，不愛國。這一想法真是太落伍了。五五年十月，補記）

### 九、最後在舊金山的一幕

今年一月一號把宗權送走以後，我還在紐約停留了五天，仍然忙着看朋友，或被他們約出去吃飯。正在這一時期，老友鄭振文兄，忽由馬來亞經香港飛到紐約醫病。他的病況，據說香港方面的醫生，認為相當嚴重，幸診治得早，尚無大礙。他的年齡雖已屆六十，但精神還好。我對美國的醫院與醫生，已有相當信心，確信他的病在短期內一定可好。可惜我已訂好六號飛三藩市的機票，決定要走，一切照料振文兄的責任，便只好偏勞謙冲與傅弼老姪，內心不勝抱歉之至。（按振文兄全愈返回馬來西亞不久，即已去世。五五年十月，補記）

由紐約到三藩市，仍坐A·A·A（American Airlines）公司的巨形噴射機，異常平穩，午前十點三十分起飛（紐約鐘點），午後兩點三十分（三藩市鐘點）到達。紐約氣候正值嚴冬，但三藩市則和暖如春，冬外套已非脫去不可。到機場接我的有譚伯揚兄及其小姐與愛堉、翟因壽總領事、吳坤淦博士，真是太煩勞了他們。坐翟先生的車子到他的公館小坐，並見着他的夫人和小孩，再回到吳公館休息，仍住在上次在他家住的那間房間。坤淦兄伉儷對我病後的身體非常關心，吳太太更是本着她的醫生經驗，給我種種指導；他們的三位小寶

寶，更對我那樣親切，真使我感到「如歸」之樂。初到的兩天，仍不免有若干應酬，坤淦兄並爲我請過一次客，因得與世界日報的管曹兩先生、君勳先生、黃膺白夫人各位，在吳公館再度晤談，後又在君勳先生的家裏與君勳及董時進兄作過三四小時的談話，由君勳自己蒸包子、沖茶，不勝溫暖親切之至。不幸到九號的午後，我的胃病乃又復發，且出血甚多，情況相當惡劣。因接受他們的勸告，到Children's Hospital診治，該院即吳太太服務的地方。我最初對這一醫院的名稱頗覺奇怪，後經吳太太解釋，才知道該院最初本爲兒童而設，經過百年間的逐漸擴充演變，乃成爲如目前一最完備的醫院，其規模與設備以及第一流的醫生之多，確與我在波士頓住的麻省總院不相上下。初進去的時候，仍上下出血不止，雖經制止，但體力一時不易恢復，且發生小便不通現象，經他們三位專門醫生（一胃科、一外科、一泌尿科）先後會診，認爲有輸血的必要。經過輸血手續，又打了幾針，情況乃大見好轉，且得安眠。後又經亞協袁倫仁先生查明，該會確已爲我保有醫藥險，經袁先生向保險公司交涉，醫藥費用的大部可由該公司擔任，連同在波士頓醫院的用費，也由他們補償，我在精神上的負擔乃大感輕快。同時，翟總領事又自動去電台灣報告我的病況，並由他先墊出一千元，以防萬一，真可感之至。經過八天，醫生認爲可以出院，當即仍回吳公館休息。總而言之，這

次確經過坤淦兄伉儷及翟、袁兩先生大力照拂，至今令我心感不忘。出院後又休息了幾天，乃於二十一日由三藩市直飛東京，經過八小時的飛行，實在疲勞不堪，在東京旅館靜臥了三晚，並與崔萬秋謝澄平諸老友及由他們介紹的十來位朋友見面，也見着彭昭賢先生，並由日本國鐵總裁十河老先生，堅約去接過他一頓午餐（他在一度路過香港時，原與我有約），作了兩小時左右的長談。乃於二十四日夜間飛港，其情況如我在本文開始時所述。

（原載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



##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 一

從去年八月到現在，時間已經過了半年，無論在台北、在東京、在港九，我隨時都和許多朋友在一塊，共同檢討中國大陸這次的動亂，我們有許多點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

一、這次的亂子，醞釀的時期很長，牽涉的範圍很廣，一經發動，絕不是短時間所能結束得了，甚至陷於無從結束也不一定。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二、中共已經有了四十年的歷史，在他們未取得政權以前和這十八年已取得政權以後，他們中間已經有過許多意見上的參差，更有過許多人事上的恩怨；即以毛、周、劉三巨頭而論，他們本來都是「半瓶醋」的文人，儘管他們強調組織，號稱鐵的紀律，但他們彼此間「相輕」的惡習，絕不是這種所謂組織和紀律所能減輕得了。

三、單以毛而論，他並不缺少若干方面的「小聰明」；運用這種「小聰明」的方式作政治鬥爭，有時也發生奇效；但以「小聰明」應付大問題，或提出什麼大主張，當然要毛病百出。過去有不少的中國人和外國人，號稱對中共有相當認識的，往往對毛的估價，都看得太高，只有極少數清楚毛根柢的人，才能少犯這種錯誤。

四、自從有「紅衛兵」出現，我們都知道亂子一定要擴大；在罷免彭德懷以後，毛知道軍隊已經不大能效忠於他，這是他的機警；但他不知道把林彪的地位過分提高，足以招致軍隊的分化，却是他的糊塗。就中共說，林彪也自有他的勞績；在一部分中下級軍人中，他也積有若干的威望；如果老毛對這塊料能謹慎使用，叫他所擔任的工作不出軍事範圍，他總也還可撐持幾時。忽然要把劉少奇這把交椅奪來給他，還加上一個異樣的頭銜，叫作「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這寧不令比林老一輩的人寒心，新興的少壯一輩絕望？林本人也未會不知

道他負不起這個責任，可是他的野心一經被毛挑起却又得意忘形，於是只好澈底排除異己，加速提高自己的親信，甚至連彭德懷也要加倍處罰，捉拿解京；朱德、賀龍也要追加清算；此所謂去年殺韓信，今年醢彭越，要隳布不起來造反，豈非怪事？三十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他們用朱德的名義請客，被約陪客的全係他們的高級軍人，我這一桌，我坐客位，彭德懷坐主位，當時我和彭的問答，請參閱左舜生選集回憶錄內所記，回到重慶以後，有人問起中共的人才，我說：「軍人優於文人」，軍人我又推彭第一。這次風潮的掀起，始於彭首先反毛免職。因而有「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以「三家村」等等的說法出現，可證明我的觀察十分正確。至於朱德，我們去延安的六個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鈞和我，和中共的代表們，舉行了三次談話，朱每次都在場。我眼中的朱德，只是一個平凡的軍人，假定他有角，也早已被老毛磨平了。中共佔據大陸這十幾年，朱始終只負一空空洞洞的名義，毫無實權，但他究竟是紅軍的創建者，很長時期都是「朱毛」並稱，他年齡已過八十，也以此自娛有一個元帥的頭銜，和毛等同上天安門看看熱鬧，已經心滿意足，此外別無其他野心。毛自然多少懂得他的「無用之用」，所以過去不敢輕於動他（實際也無此必要）。林彪這個小老粗，當然不懂，依然要揪出他來鬥一鬥，這是林自己開自己的玩笑，

也十足證明林其笨如牛，賀龍也是彭德懷那天陪我吃飯在坐的一個，終席未發一言，但我對他那副綠林豪傑的面孔，却頗感興趣。同席的蕭勁光、蕭克拿賀開玩笑，曾對我說：「我們的賀同志這幾年進步最快，他已經能寫白話信了！」在稠人廣眾中，當着老賀的面，對一位生客說這種話，多少有點令人難堪，但老賀未以為侮，只抿嘴一笑，這可說明老賀確有一種江湖朋友的胸襟，相當可愛。據我所聞，賀龍、蕭克算是聯襟，當他們度着打家劫舍生涯的時候，曾在他們的本鄉桑梓霸佔了人家兩姐妹，賀龍較長，得了姐姐；蕭年青，分了妹妹。這個故事，頗類似孫策周瑜之於二喬，不過我們湖南一個偏僻縣分的鄉下姑娘，恐怕遠不如長江下游的姑娘來得漂亮就是了（孫策周瑜攻皖得喬公二女，策納大喬，瑜納小喬，二喬可能就是安徽人）。因為賀有這樣一種性格，多少還有人味與其他裝模作樣的共產黨人不同，因而許多軍人很歡喜他，他在軍隊裏面的潛力似乎還在朱德之上，現在林彪壓迫到朱、賀，不僅中共的軍心從此瓦解，多數反毛林的軍隊，可能對林有極嚴重的條件提出，非打擊林到永遠不能翻身不止，到那時候毛也惟有犧牲林以自救，可是毛這一着有不有效，仍很難說，因為毛這次實在鬧得太不成話，他的「厚黑」，他的刻薄，他的無知，……經此一度，已經暴露無遺，甚至連目前當過「紅衛兵」的這一羣小孩子他也欺騙不了。

## 二

上面這一段話，大半根據事實，一部份是經過大家的檢討暫時得出的假定。

除此以外，有一點是我在半年以來隨時強調請求大家特別加以注意的，即周恩來在這次亂子起來以後所變的戲法，和他所抱的一種希望。在香港，我們每月至少有一次人數較多的討論（十人以上），其他二三人或三五人交換意見的機會，則次數無限制。每次遇到這種有多數人討論的場合，我一定本着我個人所見，提出以供大家參考，但我並不十分肯定我所見的一定可靠，而且我也相當謹慎，不願使我的判斷過分流於主觀。至於任何一位朋友，能就中共的某一方面，某一個人，或某人與某人間某種關係能作出深入研究，我總衷心欽佩，不惜盡量接受，以加強或修正我自己的判斷。去年八九月在台北，在東京我的態度如此；三年前在紐約，在波士頓也是如此；尤其最近幾個月在港九，我更會就我的看法，作過多方面的說明。換言之，我在每次談話，一定要提到周恩來，以中共的上層分子來說，我不認毛劉是中心人物，周才是中共內部左右全局的一個腳色，中共這個政權勉強支持了一十八年，也以周的關係最爲重要。

我第一次見周，在民國二十六年「廬山談話」結束以後，在上海滄州飯店的一個晚上。我對他的第一印象，覺得他的基本知識儘管不夠，但常識却比毛多，而且也還能細心聽取別人的意見。他有五十年的統戰經驗（不是從黃埔當教官算起，而是從留法勤工儉學算起），在共黨中接觸黨外人士最多的，他是第一個，這也就是十八年以來他變成一個「不倒翁」的最大本錢。

毛之爲人，知識有限，主觀太強，讀書太少却又太雜；有人說他曾熟讀「資治通鑑」，我不相信；從「水滸傳」、「三國演義」學得許多鬼主意，倒是真的。假定他真正好好讀過「資治通鑑」，遇着一個大問題，便不會錯得太離譜（「資治通鑑」本來就是一部皇帝或政治領袖人物的教科書）。有人說毛能看英文文件和報紙，這也是騙人的；截至現在爲止，毛對外國文字，只認得西瓜大的一籊筐，因此毛最缺乏國際常識，也完全不懂什麼馬列（但他有本店自造的馬列，也有陳伯達捉刀的馬列）。反之，他却胡謔出許多不成話說的舊詩詞，經無恥文人柳亞子、郭沫若等給他一捧，他也就飄飄然以詩人自命。毛在過去和最近作出無數害死人不償命的浪漫主張，就是從中國舊文人的惡習出發；毛平日抽烟、喝酒、玩女人，養着各省的名廚，爲他做菜，再加上起居無節，俾晝作夜，也都是從舊文人的惡習自然產生

的。這次亂子擴大以後，他便連江青也放了出來，讓她對王光美發洩一股怨氣，假定說江青也能指揮什麼「文化革命」，則「文化」兩字在毛的心目中究竟是什麼意義？於是只好把「文化革命」這面旗子棄而不用，就直截了當赤裸裸地把他們這次的內鬪正名曰「奪權」，平日毛口中所標榜的「教條」、「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爲人民服務」等等，乃完全成了騙人的鬼話。

周恩來在這些方面，似乎比毛小心得多；他從來沒有寫過一本什麼書或一篇講稿強迫人去背誦或學習，也很少聽見他把馬恩列斯之類掛在嘴上，檢查他五十年的統戰工作，儘管在他偶不謹慎的時候，也要露出虛偽的馬脚，但他在周旋進退之間，却也表現相當的素養。他原籍紹興，生長淮安，讀書於天津南開中學；離開南開以後，在日本住過一年左右，然後才去搞勤工儉學。他的法文不會學好，但英語還可對付，能慢吞吞地和英美人打交道，也能看看淺近的書報。周的老婆鄧穎超，和我們在「國民參政會」共過一時期的事，她也是一個愛說話的人，除掉口齒清楚以外，內容自然也沒有什麼，但我在延安，曾去參觀過她的家庭，她却能把他們一個窩洞裏的家，佈置得并非有條，窗明几淨，一塵不染；若干的書籍，也擺得整齊齊齊，在最近這十八年以來，她也從未出面干擾過政治，這些地方，都可使我們把毛

與江青和周、鄧作一比較。

儘管周的基本知識談不上，但他却喜歡聽取別人的意見，抗戰中，他在武漢和重慶一直充當中共代表團團長，與各方面經常保持接觸。楊杰（耿光）這個人本來是魏延趙括之流，一味驕妄，官癮甚大。他曾繼蔣百里（方震）的「國防論」之後，寫過一本「新國防論」，其內容不過是一本日本軍事學校的講義，毫無特色，比之百里的書，不可相提並論。周恩來不明白日本的軍閥情況，常到重慶鄉下找楊，請他說明日本進攻中國的軍事動向，經常和周一陣去楊那裏的，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因為所謂各黨各派，只中共有一部汽車），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聽過三幾次之後毫無所得乃不復再去，但周仍照常周旋。最近的十幾年，中共的政治、外交都掌握在周的手裏，他又隨時出外走動，見聞因而較廣，經驗也較前有加，實際對他也頗注意；在中共的黨中央，他雖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見，也不會被忽視。說到「當權派」，他才真正是當權的，而且自來看毛不起（在重慶，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談到毛，總叫「毛主席」或「我們的毛主席」，只有周叫「老毛」），為什麼這次亂子起來以後，他都站在毛林的一面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知周之為人：他是一個最能看風使舵的，首先要把自己站穩，絕對避免「吃眼前虧」。當大亂初起，他看見毛在黨內還保持一部份殘餘威



望，而又把林彪拿穩，可以支配部份的武力，其決心要與劉少奇等，作一場殊死決鬥，顯然可知。周本來是澈頭澈尾反毛的，幾乎這十幾年來毛的許多荒謬主張，他都不以為然，但沒有使得政權根本顛覆，他總是多方隱忍。周本人最基本的理想是要由他來掌握實際的政權，在他上面，不妨擁戴一個虛名的傀儡，可是毛把劉提高到作為他的繼承者，周却絕對不能容許。其理由：一、劉比周年青七歲，身體似乎也還沒有大毛病，這一點周比不過他；二、劉在黨方軍方，都有相當的潛力，周最多也只能與他勢均力敵；三、劉也可能取得若干國際的支援；四、劉具有若干湖南人的硬性，決不甘心做別人的傀儡，而要自作主張；五、以這次表現的事實為證，劉顯然已取得若干文化人對他的支持；……因此種種，假定劉果真代毛而起，這對周實在是一莫大威脅，他絕對不能袖手傍觀。毛林結合，以鬥垮劉為第一目標，他姑且站在擁毛的一面，先把劉鬥倒，乃對他有利；他也知道劉的實力不弱，不見得一鬥即倒，他把毛、劉「兩利而俱存之」，則對他的好處更大。周這一策略，求之中國的古書，乃是卡莊子坐觀虎鬥的辦法，也就是蒯通說韓信的那種陰謀。周對這類書本子上的知識，原不一定弄得清楚，但他積有多年鬥爭的經驗，乃居然與別人暗合，這也可說是周的聰明處。

又當大亂初起，周內心本來有一套主張，即不要把亂子擴大到不可收拾：一、他認定他

所主管的行政系統，不容擾亂；二、生產機構不容破壞；三、軍隊最好不許介入。過去他們有所謂只許「文鬥」不許「武鬥」的說法；有所謂「十六點」的規定；更有所謂「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這些大體上都是周下的工夫。可是自從毛利用「紅衛兵」在各處大鬧後，生產固然大部停頓；軍隊也顯然分了擁毛反毛兩派，還有心存割據的紅色軍閥；就在周所主管的偽國務院，也被「造反派」公然侵入，有若干的偽副總理及其他次要人員，已被鬥垮、鬥臭、鬥死。尤其劉少奇、羅瑞卿、彭真、陸定一等等，頭頂紙帽，身上掛着牌子遊街，更把中共的臉丟盡；周十幾年來對國際所造的西洋鏡，經此一幕，也全部拆穿；周眼見毛的威信已全部喪失，林彪更完全經不起考驗，卽毛林本人也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周乃認定他乘時崛起的機會已經成熟，假如他仍不接受毛林的懇求，出來作最後掙扎，則中共這一偽政權便必然全面崩潰，整個大陸也必然四分五裂，這便是周最近毅然起來說話的原因（名義上還是代表毛林），實際也就是他早經考慮，準備起來坐收漁人之利的預定計劃。不過時間經過得太久，亂子鬧得太大、太複雜，人民對黨的信仰，已摧毀無餘，周是否真有能力收拾這個爛攤子，却值得我們全面反共的人，密切加以注意。

今後周的行動是否能發生較有效的結果，將決於下列各點：

一、「武鬥」全面停止，「文鬥」也必須結束，學生上課，工人復工，農村照常工作，對內對外的貿易，加速恢復正常，這些是否大體都能辦到？

二、公社一類的組織，必須斷然廢止，是否不大困難？

三、制止獨裁，略採集體領導的姿態，劉少奇僅能保留他生命的安全，不許再起；毛今後不許亂動，不許亂說，僅保留一個虛位；毛劉這兩派，是否都能俯首接受這一約束，不另作復辟的企圖？

四、強迫人民閱讀「毛選」，背誦「毛語錄」，這是中國民族一件最丟臉的事，是否能在最短期內，把這一可恥的現象根本肅清？

五、如何恢復知識份子的尊嚴，使他們發揮力量不再遭受老毛和孩子們的壓迫或侮辱？

六、解除國際孤立的痛苦，準備如何着手，一反過去所為以取信於人？

七、中共擁有核子武器，美國所受的刺激還小，蘇聯所受的刺激更大，如何自動安排，減輕美蘇的猜忌，避免他們採取實際行動？

八、軍隊仍須有最高統一指揮之人，林彪已成過去，能否找出一個為各方所接受之人。

或仍以朱德（朱今年已八十有一）掛一虛名，爲他覓一有力的副手，如彭德懷沒有死，是否可能在被考慮之列？

周今年也已經是七十的老人，我曾看過所謂「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的這部紀錄影片，看出周以二重人格敷衍毛林大變把戲，不惜混在「紅衛兵」一塊唱歌、跳舞，爲毛在羣衆中開道，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實已身心俱瘁，毛病百出，馬脚畢露，中共到今天也僅僅剩下他這一張王牌，對上面的八大課題，周如不能作出適當的解答，則大陸各地人民除羣起自救以外，也別無他法了。本來，毛在未完全喪失理知的時候也會說過：「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老毛十八年以來，你屠殺人民、侮辱人民、欺騙人民，人民今天已到總清算你的時候了，你明天就死了，這種清算也還是不能避免的！

（原載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徵信新聞報）

## 旅台一月記

### 一、引端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東坡

遊覽好比讀書一樣，我們偶然讀到一部好書，匆匆翻閱一過是不夠的，必須一讀再讀，然後才能多了解其中所包含的義蘊。故都北平，在大陸未淪陷以前，我何止遊過十次，可是近讀「明報」月刊第二卷第九期所特輯郁達夫、沈從文等關於北平的文字九篇，總題目「北

平的回顧」，我才知道我對北平並不會看得怎樣仔細，更不會體味得深切。

台灣，在大陸初告陷落的時候，我會在那裏住過整整四個月，可是我當時的足跡不出基隆——台北——台中之間，不僅台東我不會去過，連鐵道可直達的南部高雄一帶，我也不會涉足，這可說明我對這一寶島的認識是何等的淺薄。

去年，八月二十一到九月十日，我會在台北住了三個星期。因為在此以前，我對台灣有了十年的久別，乃被一羣親友把我留在台北一地，未得越雷池一步，同時，吃飯、開會、座談，確也弄到我應接不暇。依照我當時的計劃，本想一看東西橫貫公路的，可是臨行為颱風所阻，也未能實現。於是把行程改變，去日本作了十天的漫遊，然後匆匆回港。

去年我留台的時間雖短，但我依然參觀了許多我想看一看的機構，會見了不少我願意會見的人物。如故宮博物院，台灣大學，尤其是該校的農業陳列館，輔導委員會與榮民總醫院，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等等，其規模與實況，都是以往大陸所無，令我感到非常滿意。在去年的十一月中旬，我會寫過一篇「記留台北三週的觀感」，比較說得詳細，已在本報的副刊發表，此處不必再說。我今年的遊台，本來是對去年的一個補充，我現在寫的這一篇，把它看成是緊接去年的一個續篇也未嘗不可。

到今年的十月，我便是一個十足七十四歲的老人，經過這次暢遊台灣南部和橫貫公路的考驗，雖已感到相當疲乏，但要繼續三五年這類的緊張活動，也許還有可能。因此，我打算在這三五年中，抽出一部分時間，在國內外各處隨時走動走動，並就見聞所及，提出若干的簡報，一以補充自己的常識，一以提高一部分人的警覺。我深信：不出今後的十年，整個世界必將經過一時期比現在還要紛亂的大紛亂，始能漸漸返於寧靜。在這一六紛亂中，對中華民國為禍為福，目前尚難斷言，但無論如何，從多方面了解實際情況，作為應付未來這一大難題的準備，總是我們應做的一部分工作。像我，這樣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子，既然只能把一切應付未來的責任付託給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那我對現狀多求得一點了解，而且儘可能的記錄下來，以供他們參考，豈不也是應盡的一份義務！

以上是我寫在本文前的一段閒話。

## 二、我往中部南部參觀的前十天

今年我去台灣，較去年稍早，去年留台在七八月之交，今年却在八九月之際。

我去台灣，過去只有坐民航和國泰兩種飛機的經驗，這次我却坐了中華航空公司的一部

新秋。七月二十三日午後八點零五分從九龍啓德機場起飛，在台灣鐘點的八點十分，便已到達台北市的松山機場，剛好一點鐘，台港兩地的交通，可算方便之至。機內設備良好，空氣調節得不冷不熱，小食更清潔可口，三五位空姐，着各色軟緞的短裝，衣褲均緣以兩寸許的花邊，一律綉花平底鞋，在機上往來照料，如穿花蝴蝶，確給予旅客們一清新印象。駕駛員係我空軍退役的軍官，起飛降落，均異常穩練，更使人有安全的快感。這次我攜着一個十三歲的外孫女兒張逸白同行，她生長在香港，坐飛機還是第一次，我相信這次的經驗，於她有益。

我在赴南部參觀高雄工業區以前，先在台北有十天的盤桓。在這十天中，我與各方面的朋友接觸不少，他們以我來自香港，多以港九近四個月以來的動亂為問，兼及對大陸前途的一般推測，我對他們所談的內容，相當廣泛，但萬語千言，要不出下面的兩段：

一、我確信港亂已接近尾聲，港共被迫放棄了羣衆示威，改採零星的恐怖手段，已顯示他們再衰三竭的徵候。他們在這次發難以前，在估計上犯了三大錯誤：第一，他們錯認港九為澳門；第二，他們沒有料到港九四百萬居民，居然能與政府密切配合，對他們加以堅強而韌性的反擊；第三，他們更沒有料到倫敦能給予港九一貫的有力支持。本來，港九原是一個



富有活力的消費與轉口市場，最近幾年，中共經濟力量的入侵香港確也在突飛猛晉，假定再延續三五年，使他們的經濟力量更普及於港九各方，與港九部分商人構成更多的經濟聯繫，調整充實他們的若干銀行，加意培植擴大他們的羣衆力量，……使得他們從港粵的貿易、僑匯，以及由廣州所收到國外的直接定單，從以前每年所吸收六七億美元的外匯，直線上升突破十億美元的大關，則中共在港九的經濟基礎，將根深蒂固，牢不可拔。到那時候，他們憑藉這一可以左右港九的絕對經濟優勢，以穩健態度，不斷向港政府提出各色各樣的要求，今天三項，明天五項，不達目的不止，則不僅港政府將窮於應付，即目前在港九與中共作爲經濟競賽的有力對手，如日本，如西德，也將歸於劣敗而莫可如何！中共本來有這樣一種可供發揮的潛力，不懂得如何運用，乃由一小撮不受約束、一味只想投機取巧的躁進分子，以急色兒的醜態演出最近這樣一幕無法下台的活劇，港九居民固然受害不淺，中共自身的損失又豈三五年能重復舊觀？我們只能把這一幕看成是近兩年中一切自掘墳墓行爲的一個傍枝，一個插曲，現在已不值得如何重視了。

二、他們問到大陸情況，並問我對中共未來的一種看法，我總覺得我去年在台北和幾位比較對中共確有研究的朋友所共同得出的幾點結論，大體是不錯的：

①老毛這次提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或赤裸裸說是「奪權」，其來源甚遠，範圍甚大，所牽涉到個人和派系的關係非常複雜，一經發動，決不是短時期所能收束。

②老毛仍確信「鎗桿子出政權」，要穩定他這一政權，也非靠鎗桿子不可，但他自己對軍隊的控制已失了信心，乃非仰仗林彪不可。可是論年齡、論資望、論過去的勞績，在中共高級將領中，高出林或與林地醜德齊的人為數不少；過去毛去掉一個有見地、有主張、敢於對毛發出逆耳諍言的彭德懷，已使軍人大為不平，實即造成這次大亂的基本原因之一，但這次却把林的地位特別抬高，不僅要林掌握全部的軍權，而且連劉少奇的位子，也非交給林不可，於是軍心全部瓦解，軍隊全面分裂，因而中共這一政權乃發生了根本動搖。

③毛已感到軍隊絕不可靠，於是援用他自來利用青年、犧牲青年的老方法，而有所謂「紅衛兵」的發動，以形成所謂「革命造反派」。但軍隊可分，「紅衛兵」一樣可分，毛派「紅衛兵」可向劉派「紅衛兵」造反，劉派「紅衛兵」也一樣可以向毛派造反；軍隊有武器，「紅衛兵」沒有武器，「紅衛兵」亂了，以軍隊鎮壓，「紅衛兵」其勢要向軍隊奪取武器，以求自衛，於是不同派的軍隊，各自站在屬於自己一派的「紅衛兵」後面以資掩護，因而形成軍隊對軍隊，「紅衛兵」對「紅衛兵」的一場混戰！這都是勢所必至而不難加以預測的。

中國近代史上一切大亂動初起，往往發生於廣東、四川、武漢這些地帶，亂象一經構成，即將無法收拾，目前大陸的態勢便正是這個樣子，您們以為老毛還可收束得了嗎？

④當大亂初起，我還假定十八年的不倒翁周恩來，或可收拾這一支離破碎的殘局，就周個人說，他也原積有政治、外交、建設的若干經驗，其態度相當從容，決非純憑衝動的老毛可比；可是周之反劉是真的，擁毛却是假的，他是一個比較講實際的人，他覺得毛的毛病，不過歡喜胡鬧，劉的可怕，則在城府甚深；毛在必要時還可勉用周；劉如果完全站穩，則非去他不可。因此，挑動毛劉互鬥，確也於他的地位有利。可是到了今天毛勢已成強弩之末，而劉勢仍可死灰復燃，於是周要弄假成真的護毛勢有不能：要加強倒劉也只能適可而止，由周挖空心智以想出若干的和緩辦法，又往往有效有不效，擁毛者認周反劉不够澈底；擁劉者又認周別具野心；於是周也陷於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看來周也只能與毛劉同歸於盡，再也演不出更精采的一幕了；這並不說明周恩來全無能力，實在因為一年以來，毛已將黨、政、軍搗毀無餘，文化教育摧殘殆盡，乃至使得農、工生產以及交通與對外的貿易也全面癱瘓，乃至連周若干年來所苦心締造的國際關係，也被連根斬斷，而類似「紅衛兵」的行爲，且蔓延及於倫敦、莫斯科、印尼、緬甸、港九各地，而使得中共派出國外的人員，到處挨打、被

逐，甚至由周所構成幾個點綴民主的所謂民主黨派也絕對不許存在。像這樣一種全盤紛亂，周恩來仍想以過去敷衍的態度出之，使其返於寧靜，如何可能？

⑤然則大陸的歸趨，究竟會演變到何等景象呢？據我看，目前的反毛空氣已普遍及於整個大陸，在所有的文武反毛分子中，必有新人物乘時崛起；照我們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大凡一個政權亂到無可收拾的階段，一個羣雄割據的局面必將代之而起。我們不要以為所謂新人物，目前尚無主名可指，要知道亂象已成，一個毫無憑藉的戍卒，一個屠狗挽車的白徒，一個斷髮修行的小和尚，一個挖煤燒炭的村夫，都可冒出成爲一時代的英雄人物，何況今天散在大陸各地的反毛軍人，大抵手握重兵，又習於共產黨的一種狡獪，只要他們能一反毛澤東之所爲，給予人民一個再度獲得安居樂業的希望，還怕他們不跟着走嗎？現在香港造亂的一羣左仔，他們還希望大陸會調動一支解放軍，開到中英邊境，擺出一個以武力奪取香港的姿態爲他們助威，但他們不知道大陸已無兵可用，假定林彪調動三五萬人開到深圳以北，這支軍隊立即可以得到香港人民大宗金錢物質的供給，使他們掉轉鎗頭反毛，而且佔據整個的廣東宣告獨立，即令就是林彪的親信都要如此做，更不要說本來就是反毛的部隊了；因此，我斷定他們決不敢存以武力收復香港的非非之想。再說四川，這本來就是一個最富有割據經驗

的省份，有兩句老話：「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目前的四川，已和清末辛亥革命前夕搞「保路同志會」，情況差不多；共軍入川，四川人被殺得最慘，袍哥大爺們，更被他們殺了十之七八，四川人對中共，早已恨入骨髓，現在他們再解放的機會已完全成熟，他們還有不投袂奮起之理？綜合目前的大勢來看，邊遠省份獨立，毛共將鞭長莫及而無可如何；西北、東北和東南沿海的省份獨立，他們立即可以得到國際和中華民國的支援，其力量將雄厚無比；中原或長江中部各省獨立，最多也只能引起一時的混戰，假定還有效忠毛林的部隊，也將不堪一擊而歸於失敗。這個時候，如果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賀龍、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之類尚在人間，而且還能自由行動，他們或可分別潛往獨立省份，暫且偷生，但完全失了重要性，再想當權已決無可能。如此，不僅若干年來毛澤東的一套從此根絕，乃至共產黨這一名稱，也將無人敢用；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和江青，不攜手同上煤山，便只好雙雙服毒，一同走入自己所建好的墳墓，靜待鞭屍，能這樣做，總也算完成了他千古風流人物的大願，而中國人民也就可以重見天日了。

⑥ 果然大陸的亂子演變到了這一階段，代表中華民國的台灣，究應採取何種步驟呢？我覺得，台灣近年引滿不發，靜待國際的有利條件；同時埋頭建設使台灣能日進於安定繁榮，

接近一千四百萬的人民，能享受大陸不能夢想的家給人足的生活；而且，天天在整軍經武，以作爲不得已必要施用一部分武力的準備；這一方針，完全是對的。近年海外有一種輿論，頗責備政府放棄了無數反攻良機，不勝惋惜、憤慨，完全是由於對台灣情況缺乏認識；對國際的微妙關係缺乏理解；同時，他們也不懂得像台灣近年來這種加速的建設，正是最有效果的一種作戰！我們應該了解：近十年間，日本加速完成他們的復興工作；中華民國以輝煌的建設博得舉世的同情；蘇俄對史達林以來的政策毅然加以修正，實爲構成今天大陸普遍反毛的一大衝擊力量，也就是我們對共黨作戰第一回合的重大勝利！目前台灣側重反毛，叫出「反毛聯軍」的響亮口號，最足以警醒大陸軍民力圖自救，趕快與毛澤東脫離關係，在策略上也完全正確。我在這類談話的煞尾，有幾點類似的結論，正式奉告了台灣的朋友們，我覺得：我們站國民的立場，只宜以羣策羣力造成可戰之勢，厚植能戰之力，至於選擇作戰之時，則應授權統帥部作出最後的決定，不應由我們不負直接責任不明實際情況的人加以干擾。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在這裏特別一提的，便是我在台北眼見一部分人不明白台灣近年的加速建設，只是爲了準備反攻的一個大目標，決不是爲少數人造成發財機會，更不是爲他們提供一種最高的享受，可是這一部份人除掉對於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特別考究以外，他們還要

出入於燈紅酒綠之場，日與酒女歌姬爲伍，這確與戰時氣氛太不相容，直接影響下一代的青年，可能造出若干的太保太妹，同時使得若干的工作人員心旌搖搖，促成他們許多的非法行爲；如果說今天的台灣應有受指摘的一方面，這一部分人確是應受指摘的對象。

上面這兩段話，都是我從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三日十天中和朋友們談話的內容。口說比較上面所記的有詳有略，但我沒有說過與我自己的觀點相反的話。

台北酷熱，簡直不是我在香港所能想像。最初幾天我確實感到相當疲勞，二十九日和三十，我到桃園我兒子宗惠（四五）的家裏整整休息了兩天，實際我還是想看看台北以外一般人民的生活。由台北到桃園縣治，小汽車須時三十分至三十五分鐘，我的孫女大磊由桃園到台北二女中上課，如坐巴士，包括等車停車的時間，却非五十分鐘以上不可，每天來回兩次是頗費事的（桃園當地自然也有中小學，但水準不及台北公私立學校高）。三十這一天是星期，宗惠不要辦公（因爲他是軍人，平日也有星期日輪值的時候）；大磊（十七）和孫女大晶（十四）都放了學（雖在暑假，但平日都要到學校正式補習），我的媳婦童明霞（卅八）也不要到經濟部上班；宗惠明霞的母親，磊磊晶晶的祖母（七一），此時也留在家裏；於是我們祖孫父子六人，從早晨七點到十點，便一直留在宗惠這間窗明几淨、不大不小的客廳裏

談往事，話家常，問問磊磊、晶晶學校課業的進度，趙純孝兄送給我們的兩盒點心，還有台灣名產的小西瓜，和義大利種的葡萄，都作了我們一頓豐富的早餐。

磊磊嫻靜少言，自然婉變，問她什麼，她總有簡明正確的回答，無一字半句含糊。她去年一年，和我通了四十封左右的信，最初我還偶然替她改正幾個字還給她，近來却已無懈可擊了。看樣子，她的國文程度，明年暑假後考進台大應該沒有問題；可是台灣每年中學畢業的學生多，有名大學的學位少，因此她現在已經十分緊張，每晚非工作到十二點鐘左右不敢睡覺，近年台灣流行的所謂惡性補習，也與這一升學問題有關，這確實是當前台灣教育界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晶晶也不愛講話，不問他便可一言不發。等到聽談話、吃東西有些倦，他便拿着他的獵鎗，在後苑一棵大樹的前後左右巡視一週，看看有沒有什麼小鳥兒可以讓他一顯身手。去年他誤會我特別歡喜姊姊，多少有些醋意，不大和我接近，今年已渙然冰釋，知道他這個公公對他是頗不錯的。

十點鐘一到，我便拉着宗惠和兩個孫子去看桃園的菜市，吉甫車五分鐘便到了，隨後還看了桃園縣治附近的第二個，還有一個更大的我不會看。就以這一次看的菜市來說已比香港中環的中央市場大了一倍，九龍城的一個更不用說。這裏的蔬菜之多，真是堆積如山，雞鴨



魚肉，海鮮野味，凡從前我在上海可以買得着的，這裏無不應有盡有，而價值的便宜更出我想像之外，這一天，我們只花了台幣四五十元（約合港幣六元左右），便買了滿滿的一籃，可供四五人兩天之用，裏面還包括在九龍價值六元一斤的田雞哩！

這是我的習慣；過去我在國內或國外旅行，每到一個新的環境，我總想了解當地人民是怎樣生活的，是否還過得舒適。我所用的方法，便是首先去看看他們的日用品市場；或百貨公司之類；他們每天每家必到的如菜市之類的地方，我也非去逛逛去問問不可；同時，我還要注意一般人為公衆服務的態度，以測驗他們所受教育的程度。抗戰中，我在四川整整住了七年，凡重慶、成都、敘府、五通橋、灌縣這些地方如上舉的日用品市場和菜市之類，我都去看過，乃至隔重慶四十里的鄉下冷水場，我也住過一個時期，我看出雖在戰時，當地人民的生活，還是過得那樣豐裕而不迫促，我才懂得「天府之國」四個字的真實意義；我也才了解像日本那羣躁妄而蠻幹的軍閥，到底無法把中國這個民族澈底擊潰的所以然。尤其，我看見成都的太太們，每天提着籃子上牛市口去採購他們一天的食品那一股子神氣，覺得非常可喜。此外在大陸北方我到過的地方，如北平、太原、濟南、鄭州，中部如武漢、九江、南昌等處，以及京滬滬寧沿線的若干城市；南方如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以及我生長的長沙，

這些地區，我都曾用同樣的方法攆到許多地點去注意。但凡某一地方，只要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不虞缺乏，社會的秩序必定良好，人民總也生氣勃勃，一經失調，或遭遇饑饉（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亂子便立刻要起來，記得民國十九年，正當張季直先生逝世後的四年左右，我曾遊過一次南通，坐輪船從天生港登岸，坐車走了一大段路才到達縣城，沿途所看見的農田非常整齊；農家大率住的瓦屋，少數草蓋的，房頂的茅草也是新的，全不凌亂；田傍的水溝，一律清澈見底，流走不息；市鎮上的肉店，當天的豬肉，掛得很多；路上挑擔或田中工作的婦女，臉上發紅，所着的衣服，能辨出顏色；我才領會「張四先生」對他所領導的南通自治，確曾下過不少工夫。以中國之大，允宜把多數人才分配散居全國各地，讓他們自治其省，自治其縣，自治其鄉，千萬不可高調中央集權（或如中共所說的民主集權），使全國高興從事政治工作的人，非集中到中樞即不能找到他們適當的位置，這確是民國以來的一切動亂的基本原因之一，尤其這十八年以來的中共政權，馴致釀成今天的奪權大亂，給我們的刺激更深。平心而論，像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這樣一塊料，讓他們回到湖南、浙江這類地方去充當一名市長、縣長、或鄉長，他們豈不也能勝任愉快各有表現其優良成績的可能？但事實却叫毛澤東這樣一個鄉下看牛娃子，去治理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國，而且他自己

還深信由他確實掌握大權，他即能想出一套最巧最妙的方法，把整個國家治理得蒸蒸日上，豈不是荒天下之大唐？

國外所見，我在紐約住了不到三個月，便感到單調、厭倦，可是一出紐約二三十里的近郊，立即覺得頭腦清楚；即在波斯頓、麻省、加州這些地方，我也覺得比紐約適於居住。四十年前，我留在巴黎的頭幾個月，我有了嚴重的鄉愁，有時鬧得整夜不能入睡，我的房主人看見我床邊有安眠藥水瓶子，爲之大吃一驚。好友王光祈先生從佛郎克佛寫信給我，教我放下一切工作，到巴黎以外去輕鬆十天半月。我到離巴黎約四十五分鐘火車的夏特勒旅行了一次。所住的旅館，正去一座中古時代的教堂不遠；午夜夢回，除令人神往的鐘聲以外，幾乎聽不到甚麼噪音，使您仍可再睡一會。清早起來，到街上去散步，看見的教士，似乎真有一點修養；站在公共洗衣的池邊，見着不少的婦女在那裏談笑風生地從事工作；東坡兩句詠嘆杭州的句子：「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便忽然在的腦子裏出現。

經過這一短期的休息，不只我的精神恢復了好多，連胃口也開了。在日本，我一向歡喜京都遠在東京之上。一次，我住在京都一家舒適的旅館，仍照我早起的習慣，大致在七點左右，便跑到街上走動走動。其時比較大一點的商店還不會開門，就是吃一份簡單的早點，也

總要到八點以後，行行重行行，閒盪又閒盪，看見幾乎在每一條街上，都有女子在那裏從事清潔工作，她們做得很認真，很賣力，任何一小撮果皮渣滓，或一小塊破紙廢料，她們總要掃攬來，一一送到垃圾車上去，我看得非常高興。日本這個國家，所以經得起失敗，敗了又能很快的就復興，我們不能把這個功勞歸到一部份浮在表面的人物，它有幾千萬吃苦耐勞認真做事的人民，這才是他們立國的真正本錢。

即以此這次住在桃園而論，我兒子的家，就在一條貫通台灣南北的柏油公路上（龜山鄉龜山街），每到天亮的時候，我便聽到街上有許多貨運的卡車，在川流不息的走動，軋軋有聲。我不要睡，打開大門，站在街邊上看，看見農民菜農把一車一車的蔬菜以及雞鴨魚肉之類都載得滿滿地，送往台北的市場，供台北居民一天的消費，同時他們也可以得到較高的價錢以支持他們較好的生活。有不少台北遊手好閒的太太們、小姐們、大爺們和不良少年們，他們昨晚逛夜總會、打麻將睡得太晚，這個時候，還在睡裏夢裏，會不會有人想到他們的舒服生活，乃是靠着無數的勞苦大眾在支撐着呢？

說到這裏，又使我想到大陸人民的慘狀：毛澤東倡導的「人民公社」，已把中國人良好的家庭生活（過去那種一家數十口的大家庭不能存在，也不應存在，自屬事實）澈底破壞，

他們總以為人民的力量可以無限度的使用，要把幾億人民的生產、分配，乃至衣、食、住、行，一切由他們控制，而由人民身上壓榨出來的膏血，又用之如泥沙，除供他們少數人揮霍以外，大部分更用於製造武器，並從事渺茫而毫無希望的所謂世界革命，使得全國人民憔悴呻吟，流離顛沛，宛轉就死，冤憤填胸，以致釀成今天的大亂！我們今天的大事，自以團結全國軍民，以加速摧毀這個萬惡政權為第一要義，可是進行這件事的過程，要把全國人民從死亡的邊緣救起，一切返於常態，使他們稍得喘息，已經要大費一番工夫，而且必須假以時日；同時，我們還要開始考慮：今後中國的政治，我們到底準備怎麼辦？中國的道家說：「治大國若烹小鮮」，這本來只是中國兩三千年以來一種「不擾民」的消極辦法，假如我們只希望出現一個端拱無為的政府，決不能應付當前的世變。關於國內施政，則今天世界的開明國家，在原則上大抵不甚相遠；即全國性的大政，大率由中央政府處理，僅屬一地方的政治，則一切歸之地方，尤其着重輔導人民，使他們自發、自動、自治，使得多數的聰明才智之士，能在地方上各得展其所長，而不必一一集中於中央來鉤心鬥角。這是當前世界政治的一個總傾向，甚至連蘇聯，也把史達林以來那種束縛馳驟的辦法，繼續加以修正放寬，使之較合於人性；僅僅只有一個萬惡的中共政權，依然自外生成，依然死硬僵化他們那一套絕無

希望的老方法，以加速他們的崩潰！茲事體大，這是關係將來中華民國一個基本的政治制度問題，暫時只好擱下不談，讓我依然回到本題，記錄我最近所看見台灣近年一部分的建設成績。今天不只僑居海外的人民對台灣的事實知道太少，就是住在台灣的人也知道得不多，甚至連我這次同遊的幾位，他們以前也多未留意，至少不如這次看見許多事實以後，印象來得格外深刻。因此，我把這次的所見所聞，詳細紀錄下來，首先在台灣發表，也還是有相當的用處。

### 三、記台中之行及省政一般

參觀台灣省政，國民黨中央黨部事前代我們有所安排；但我們留在台中的時間不多，參觀的對象僅以省議會及省政府為限。台灣全省的文教實況，我本來也急於想知道，但因時間關係，只好留待明年的冬天再來了。

這次同我一陣赴台中的，計有王師曾、沈雲龍、蔣偉之、周寶三、趙純孝五位，我們原已購好八月三日（星期四）午後的觀光車票，但因蔣總統在這一天的午後五點，約了幾位新從香港來的朋友一陣喝茶，我是被邀者之一，只好把鐘點變動一下，改坐晚上八點半的柴油

快車（與觀光車不同的是沒有冷氣設備，跑得特別快，由台北到台南可節省約一小時，車行多少有一點顛簸）。這一天，是台灣赫赫有名的明星唐寶雲和一位美國留學生威維義君舉行婚禮的日子。我本來和她很熟，去年參觀中央製片廠，龔弘總經理（他是我在中央政校任教時的一位好學生）已介紹我和她見過面，我是帶着磊磊和張玉賢同去的，還同她們在一塊拍過好幾張照片。今年，她主演的「婉君表妹」在香港上演，她來了，我第一天便帶着外孫女兒張逸白去看，又和她談了一會，也拍了照。她的婚禮，我抽不出時間去參加，頗覺歉然。今天台北各日報和晚報都把他們的結婚消息報導得很詳，可是他們究竟準備在那裏度他們的花燭之夜，却保密得半點不通風，各報只推測他們會到某處某處度蜜月，但大抵並不正確。真是「無巧不成書」，當我們六人拿着車票正走向月台時，看見隔我們七八人的前面，一位學生服的俊秀青年，攜着一個着淡黃衫子的少女，已經走近剪票者的門邊，這不是寶雲是誰呢？可是我們坐的是二號的車房，他們却坐了四號。車行後約十分鐘，我請趙純孝兄拿着一張名片，到四號向他們表示道賀，並祝他們新婚幸福。過了一會，這對新人，在車子搖搖擺擺中，相互扶着，走到了二號，來對我表示謝意。她知道我是龔弘的老師，她又是龔弘夫婦的義女，低聲叫了我一聲「左公公」，態度雍容，面上微顯紅暈，一如她在影片上的表情

姿態，但今天却可看出她內心充滿喜悅。我把他們向同行諸友介紹以後，才目送他們返回原有的坐位。我默唸着：「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好像我們整個車房都洋溢着一種喜氣！寶雲的娘家在苗栗，他們是在苗栗站下去的。

寶雲以「養鴨人家」一片成名，至今台灣人都叫她「養鴨公主」；她這部片子在港九演出時，更不知博得了港方太太小姐們多少眼淚。自從有她和王莫愁、汪玲、江青幾部片子在港九演過以後（如王莫愁主演的「蚵女」與「啞女情深」，汪玲的「菟絲花」，江青的「幾度夕陽紅」等等），港方的電影觀眾似乎才懂得文藝片子的寶貴，而台灣的影片也從此大受歡迎，我希望台灣的電影界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好好的提高這一難得的紀錄。我也希望寶雲能實踐諾言（結婚後自以在美國小住為佳），仍能不放棄她的電影工作（這是她去年對我說的），她能多去美國幾次，威君也多飛幾次台北，這不是更顯得「濃得化不開去」嗎？

我們的車子到達台中已經是晚間十一點，周天固（省府新聞處處長，政校出身）、鄒公尹（省府專門委員）、丁步唐（教師會館副主任）諸君，正在月台餞候。周君看樣子已五十五出頭，但仍保持着三十年前在南京紅紙廊政校時的活潑姿態，親切周到，頗引起我一種愉快的回憶。大家相互介紹畢，即乘車往教師館下榻。



教師會館係省府的全省教育界設備的福利事業之一，乃一宮殿式的龐大現代建築物，佔地甚廣，水木明瑟，因為屋頂所蓋的係仿北京製的那種琉璃瓦，更顯得金碧輝煌。全館都係三層樓房，因地勢有高低，更表現各部分參差有致，絕不像純西式的那樣呆板，這大概正是中國式建築的優秀處。共有住房上百號，凡各縣市的校長教員，因事到台中接洽，都可在這裏暫住；學生團體來參加球類或演說比賽，也可容納。室內設備完全現代化，有冷氣調節，像我們住的這幾間，大致在香港每間每天須收費港幣三十元至四十元，招待教育界人士，則僅收台幣二十元，換言之，即不及香港普通新式旅館的費用二十分之一。我過去當過四十年窮教員，確不會有過這樣的享受。

次日八月四號（週五），早餐後，即乘車赴霧峯省議會參觀。議長謝東閔先生因公前往台北，這一天領導我們參觀的，係秘書長洪樵榕先生。省議會現在是第三屆，有議員七十四人，過去十餘年，經過「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一段時期，現在的正式省議會，在民國四十八年始告成立。頭兩屆的任期三年，這一屆起，已改為四年。每六個月開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議員係由各縣市直接民選。會議會佔地甚廣，汽車可直達會內各部分，包括議事堂、議員會館、可開各種小組會議的房間、職員的辦公室、議員職員的宿舍、

以及各類康樂設備的場所、圖書館、閱覽室等等。花園內更有小橋流水，花木扶疏，站在議事堂門前一看週圍的環境，真不失爲一民主搖籃，比較當日南京那座純戲院式的國民大會堂理想多了。議事堂不大，但現在僅有七十幾個議席，頗覺寬舒，大致增加到議員一百人，還不必改建。內部布置比較日本的國會，可以說具體而微，凡官長席、旁聽席、新聞記者席、秘書記錄的坐位，……應有盡有；裝置的擴音器、表決器、計票機等等，一律電動！當一案付表決時。只須議員在坐位上將電鈕一按，贊成反對的人數，即由不同顏色的燈泡表示得清清楚楚，同時並有一電動的白紙條，計出正確數字，送交每一議員，絕不會發生任何爭辯，也比以前用過的這類機械，進步多了。這一天議員先生們，正在開小組會議，我們沒有機會看見他們。

午前十時，我們離省議會前往省政府，其所在地名中興新村。車子開進一新村範圍，但見遍地綠草如茵，高高低低的樹木花卉，彌望皆是，路旁且有荷池、芋田、菜園。剛好這一天，省主席黃達鑿先生（杰）也到台北開會去了，招待我們的，乃是省府的秘書長徐先生（璠），主任秘書林先生（化），王先生（履常），省府新聞處周處長（天固）各位。在他們引導我們到各部分參觀以後，又在省府資料館廳聽取了一小時的簡報。這個簡報的圖表，

用幻燈映出並有錄音說明，同時還給了我們每人一份用文字記錄的小冊子，內容計分「本省土地」、「人口與生活」、「教育概況」、「農業生產」、「林相改良」、「遠洋漁業」、「鑛業開發」、「工業開展」、「水利工程」、「鐵路公路運量」、「稅收與稅負」、「衛生設施」、「土地改革成果」、「社會福利」十四個方面。我看了由幻燈映出的許多圖表，聽了錄音說明，再把這本小冊子逐句細細看了兩遍，總算對台灣現狀上了最有用的一課！以後我還要根據這些表現，好好研究每一件事實的內容。省府這次所給我的良好印象，乃使我覺得這只是一個指揮全省政務的機構，而不像大陸時代那種官氣十足的衙門。我們一行在這裏停留了三小時以上，擾了他們一頓午餐，返回教師會館休息一會，才動身向高雄出發。

下面一段，我以最經濟的文字，根據省府資料館送我們這本「台灣省施政概況圖表錄音說明」的小冊子，加上省府各位對我們的口頭答問，和我個人的若干私見，列舉十之一二的數字，以便看我這篇遊記的讀者，也略知台灣現狀的一斑。這本小冊子雖是今年編印的，但裏面的數字還是根據去年的統計，經過今年的九個月，情況又已大不相同，這是首先應加以申明的。

一、台灣是由七十九個大小島嶼構成的，總面積三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平方公里，是中國

最小的一省。南北縱長三百七十七公里，東西最寬處一百四十二公里。多山，中央山脈把本島分爲東西兩部。最高的玉山，海拔三千九百九十七公里。

全台灣分爲十六個縣：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南投、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十四縣在中央山脈以西；宜蘭、花蓮、台東三縣則在山脈以東；惟澎湖一縣在海上。此外在各縣範圍內再劃出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五個市。現在台北市已改由行政院直轄，其他四市則仍屬省府。將來東部開發加強，鐵路公路擴展，花蓮港的吞吐量加大，海上及橫貫公路交通更見頻繁，或可另行劃出一花蓮市。高雄市人口發展到百萬以上也有改直轄市的可能。

據去年統計，全省已被使用的土地，約佔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八，但據我這次視察所及，東部的花蓮、宜蘭固覺地廣人稀；即西部的桃園、台中、高雄，也不見得十分稠密。

蔣夢麟在去世以前，作單從糧食產量的觀點，強調節制生育，實際農工及其他勞動者，生活既日趨富裕，他們將會普遍結婚，而且會無限制的多產，其結果真正樂於節制的，將以知識分子爲限，而知識分子之所以贊成節制，又並不一定着眼於防止人口的過度膨脹，僅僅爲他們自己減少子女的拖累。若干年前，山額夫人來遊中國，曾對節制生育特別提倡，並舉

出了許多節制的具體辦法，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贊成這一建議的不少。但我們的老友潘光旦先生（他是研究優生學的）却大不謂然，他認為這樣一來，可能會發生一種汰優留劣的反淘汰作用，決不是健強辦法。台灣的人口，據去年統計，為一千二百九十九萬二千七百六十三人，密度為每平方公里三百六十一人，誠不能不說是相當的高；但以港九的情況來說，包括香港本島、新界及各離島合計，總共不過三百九十八英方里，可是它現在所容納的人口，已接近四百萬，而新界所能產生的食糧、蔬菜、肉類等等，比之人口所需的消費量，實微不足道，絕大部分要靠從外面輸入，因為它有工業品可以輸出，再加上其他的財源，在平時並不會怎樣恐慌。台灣的土地略等於港九的三十二倍，而人口尚不及港九的三倍半，即令到民國七十年台灣人口到達兩千萬，港九到達五百萬，台灣人口也不過等於港九的四倍，到那時候港九且不見得怎樣恐慌，以台灣近年農工生產增加的迅速，外貿擴展的飛躍（按去年統計，出口結匯為二億八千萬美元，今年據估計，可超過五億美元），房屋建築尚可向多層發展，更有山地、海埔地可盡量開發（按去年統計，台灣全省海埔地面積，共有五萬三千八百七十公頃），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恐慌的理由。（我很擔心我對台港兩方若干數字的比較，不會怎樣精密，假如台灣的地理學者、統計專家，能為我算出若干更精密的數字，我將衷心感謝。）

二、據省府簡報，台灣近二十二年間的教育進步，確令我相當吃驚！以學校數說：光復前只有大專校五所，去年有六十九所；中等學校只有七十五所，去年有五百六十所；國民學校只有一千零九十七所，去年有二千一百四十三所。學生數：民國三十三年，大專學生只有二千一百七十四人，去年已增加到十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增加了五十二倍。中等學校學生，以二十二年前與今天比較，由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一人，增加到了七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七人，適爲過去的十五倍。小學生由八十九萬八千四百二十四人，到了二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人，也增加了兩倍半。

現在台灣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高達百分之九十七點二，再過幾年，台灣文盲可以絕跡絕無問題。現在政府已把六年的國民教育延長爲九年，當然更是一件可注目的事。

附帶的我請大家想一想：過去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台灣的高等教育，何以絕對不能發展？現在大陸的教育情況又是怎樣？

不過，上面所舉有關台灣教育的數字，僅僅是就量的方面說，質的方面究竟怎樣呢？目前我只知道近年台灣的大專畢業學生到海外就業或深造的，一般的情況很不錯，我準備明年冬季繼續遊台，希望能從台灣教育質的方面得到進一步的了解。

三、近年台灣農業的進步，不僅使得全省直線上升的人口食糧充足，且有部份的餘糧可供外銷。在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初告光復時，全省的糙米產量，僅得六十三萬九千公噸，去年已增加到了二百三十八公噸，適為光復當年的三點七倍。其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如水利灌溉的推廣，化肥普遍的使用，優良種子的選擇，病蟲害的掃除……等等，固然非常重要，而農業科技人員的加多，以及土改成功以後，農民得到最高的鼓舞，更為不可忽視的因素。現在我們的農業科技人員，所組成若干團隊，分向非洲及東南亞一帶，協助許多國家的農業發展，不僅博得了國際的稱譽，間接且擊敗了共產國家向多方面的滲透。現在台灣一個領導農業進步的「農復會」，又着眼於蔬菜的增產，也可說最得要領。至於與食糧有關的其他農產品，如大豆、甘薯、落花生、以及小麥、高粱、油菜等等，也正在向多方面發展。尤其淡水魚的培育，遠洋漁業的推進，家禽、牲畜的飼養。品種繁多的菓類種植，都有成績可舉。而蔗農、蕉農，每年更能為國家博得大宗外匯。其他如樟腦、蘆筍、香菰、白木耳等，近年也漸有可觀。

說到台灣的林業，過去我曾有一種誤會，因台灣的森林相當有名，而未經斬伐的自然林更不少，以為台灣的木料一定不可勝用；這次參觀了兩處製木廠，才知道台灣木材的經濟價

值並不太高，例如製造三合板及若干高等家具，原料大抵須從國外輸入。最近台灣省府已注意及此，並且取得了聯合國的援助，正在作有計劃的改良，而林道的開闢，也在逐漸擴展。

四、關於台灣的工礦業、工業部份，我在下面記參觀高雄工業區的一段另詳此處不贅。就礦業說，台灣礦的種類及蘊藏量不算太多，但仍有金、銀、銅、鐵、硫磺、硫化鐵、煤、石油、天然氣、大理石、石灰石、白雲石、滑石、石棉、石膏、寶石等二十餘種。其主要的幾種去年度生產量及總價值如下數：一、煤，五百零一萬公噸；二、黃金，一千三百公斤；三、白銀，二千四百七十七公斤；四、銅，二千三百十九噸；五、硫磺，六千九百七十公噸；六、石油，三萬五千九百零六公秉；七、天然氣，四億三千九百萬立方公尺；八、大理石，一百十二萬公噸；九、石灰石，四百二十三萬公噸；十、白雲石，五萬一千五百公噸。去年的總值共二十四億九千萬元，其中煤炭生產總值佔百分之七十五，據估計，煤的可採量，約有二億八千萬公噸。上舉十種，其開採前途均很有希望。據最近所聞，天然氣將用以鍊鋼，在橫貫公路中，我曾見有一段大理石山地，輔導委員會趙主任告我，在現在的情況下，可供六十年的開採。

五、關於台灣的土地改革，為台灣近年最大改革成功的事業之一。大別之可分為農地土



地改革與都市土地改革兩項。一、農地改革，曾經過兩大步驟：第一步即所謂「三七五」減租，這是民國三十八年開始實施的。在三十七年減租以前，稻作每公頃平均收穫稻穀三千八百九十四公斤，地主與佃農平分各得百分之五十，即各得一千九百四十七公斤。「三七五」減租實行後，三十八年稻作每公頃收穫量達到四千二百四十八公斤，農民所交出者降低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因而他們分得二千七百八十八公斤。

第二步，到了民國四十二年，實施「耕者有其田」，農民承領公家農地，每年應繳地價只合三十七年度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四十二年每公頃收穫量為五千三百八十八公斤，農民除交地價穀外，他們自己所得，乃增加到四千二百二十公斤。農民繳納的地價，已於民國五十一年全部償清，現在耕地已歸農民所有。五十五年（即去年）稻作，每公頃收穫量高達七千六百七十三公斤，也全部歸農民所得。

農民所領的耕地，係政府向地主徵收而來，政府為兼顧地主利益，乃將農林、工礦、紙業、水泥四大公司開放民營，以該四公司股票及實物債券補償地主地價，轉移土地資金發展工業。近年台灣工業既得迅速的發展，地主改營工商業後，所得利益乃更多。當然，農民耕種他們自己的土地，技術有巧拙，勤惰有差別，投下的資金有多少，對土地保持的方法也不

完全相同，因而所得的好處也自然有厚薄；地主改營工商業，也因人而盈虧的差別甚大。不過近年台灣各方面多表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實以土地改革一舉為樞紐，似無可置疑。這次我在留滯期間，偶有人向我談及土地改革後，也產生了若干毛病，告者語焉不詳，我也沒有作深入研究，不敢加以判斷。但我相信一種重大的改革，在改革初期或行之既久，毛病是不能全免的，只在政治的領導者隨時加以注意與補救而已。

二、都市土地改革，原則為平均地權，其意義即在使都市土地所有者，不能因都市繁榮地價高漲，而取得不勞而獲的過分利得。近年因東南亞一帶，尤其今年的港九，隨時表現動盪不安，僑居海外的人民，多謀入合作久居計，或轉移部分的資金，在台經營工商業，這類人入台以後大抵將集中於若干都市，據我推測，台北市在最短期間，人口可能超過兩百萬，高雄市也可超過百萬，住宅、工廠、商場所需要的土地既多，地價飛漲，勢所必至。政府決定，將本省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所得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收入，全面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使地利為社會所共享，這在原則上完全是對的。不過茲事體大，所謂社會福利方面既多，人事與機構非常複雜，實施的先後緩急也大可斟酌，實施以後，實惠及於人民的能否與理想符合，便要看今後的成績如何了。

上面這段簡短的紀載，完全由參觀省政而啓發，我自己增加的新知不少，特代表同行各位對省府諸位先生表示謝意。

#### 四、參觀高雄工業區及高雄港

八月四日午後三點零六分，我們乘觀光號火車赴高雄，六點十分到達。沈雲龍因事返回台北，一同南下的，有王師曾、蔣偉之、趙純孝、周寶三四位。觀光號車行平穩，坐位舒適清潔，車上男女服務生，親切而禮貌，兼有冷氣設備，比較二十年前我常坐的津浦、滬杭、京滬三路，進步多了。

台灣的工廠散佈甚廣，原不以高雄爲限，但高雄近年的發展情況比較突出，再加上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又首先在高雄成立，因而更顯出一種起飛的姿態。我們這次擬參觀的各廠及其他機構，事前均由經濟部代爲安排。我們活動的時間僅有兩天（八月五號、六號），而我們要參觀的對象，却有中國石油公司的煉油廠、南部火力發電廠、台灣鋁業公司的鋁廠、高雄加工出口區、高雄塑膠廠、復興木業公司的製木廠，以及高雄港擴建工程處和高雄港附設的香蕉冷藏倉庫八個單位。雖經各個單位負責的先生們爲我們多方說明，但事實上仍等於

走馬觀花。下面所記的種種，與其說是我們這次所吸收的一些常識，毋寧說是我們所得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反而妥當一點。

我們車抵高雄，市長陳啓川（六九）先生，主任秘書黃麗川先生，石油公司協理兼煉油廠董世芬廠長，李文悌副廠長及楊龍添、翁有成、陳清輝諸君，均到車站接待。分乘兩車，我們同行的五人由董廠長引導到左營煉油廠招待所休息片刻，即赴陳市長在致美齋的晚餐之約。在座除主、客六人以外，還有高雄地方法院院長趙執中先生，首席檢察官李鐘聲先生及上舉黃主任秘書與楊、翁、陳各位。

陳市長年已望七，但他還有九十四歲的老太太在堂，他不只是一位愛國者而且是一位孝子。他曾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專攻經濟，談話非常扼要，一聽便知道他是踏實做事的人。他本來富甲一方，為擁護政府的土改政策，已把他所有的農田土地都響應政府的徵購，散給了農民；現所剩餘者僅市區的小部份，但公家用得着，為供給建築國民住宅或工廠的需要，他仍以廉價讓出。他任市長已將屆兩任，六年期滿，不僅任勞出力，而且是大宗的陪錢，本省人固然對他愛護，外省人也對他欽佩。在他任市長之初，高雄人口只三十萬左右，現已增加到了六十五萬，基於工業的積極發展，今後或不出三數年，即將突破百萬大關（例如新建

立的加工出口區完成，即將增加工人三萬。我看見市政府印行的一本「高雄市第五屆市長實踐競選政見簡報」，具見并非有條，績效顯著。可惜我們這兩天只能看看幾處工廠，不能抽出時間一看他的市政實績，只好留待將來再說了。

餐畢已在十點左右，我們仍回煉油廠招待所，四號、五號、六號三晚，我們一直都住在這裏。環境清幽，室內整潔，幾個服務的女孩子，都有過很好的教養，非常負責。次晨六時起來，散步一回，即與廠內的幾位先生共進早餐，稀飯包子，各色小菜，對我這個容易引發胃病的人，乃非常適合，偉之更讚不絕口。以後一連三個早晨都是如此。

招待所與煉油廠毗連，八點左右即由董廠長陪同分坐兩車，參觀全廠。全廠佔地之廣，為我生平所僅見。經過他們十四年來的努力（即從民國三十八年至今），現已擁有最新穎與最完善的煉製設備。其主要業務為進口原油（來自中東），煉製各項石油成品，並致力於油源探勘，以謀開發地下資源。由本廠所煉製的航空汽油、噴氣機燃油、煤油、柏油，以及潤滑油等，品質均已到達國際標準。全廠每一天各項油的總煉量為四萬七千桶，除充分供應國內市場需用外，尚有三分之一的剩餘可外銷南韓、琉球、泰國、香港、越南、菲律賓、婆羅州、巴基斯坦等地。自本公司成立迄今，每年進口的原油已增加二十倍，因而營業收入及盈

餘也逐年增加。三十九年的盈餘僅有新台幣九十五萬元，五十二年已增加到五億四千二百萬元以上！可是最近的中東動亂，本公司的原油進口，每年即須多支出四千萬元的運費，可這看出國內一種帶有國際性的事業，均與國際的變動息息相關（再舉例言之：巴西的香蕉試銷日本，台灣的香蕉便要感受威脅；糖在國際市場時漲時落，便直接影響台糖；南韓有一大規模的製木廠出現，我們出口的木製成品如三合板之類，便必得提高警覺；都是同一道理）。本公司基礎已十分堅實，此種一時的現象，在根本上自不會有多大的妨礙。

本公司除本廠製煉各項石油以外，另有一台灣油礦探勘處設在苗栗，近年在苗栗附近的錦水、鐵砧山、出磺坑三處陸續發現的天然氣，對台灣的經濟發展亦為一大貢獻，現正大量開發中。天然氣在國防中雖不及石油重要，但其經濟價值，則與原油無甚差別。現政府即利用錦水天然氣與美商合作設廠製造尿素，每年可產尿素十萬公噸，液氮四萬五千公噸，並計劃利用天然氣建立發電廠，或更利用以從事煉鋼。石油公司且奉有政府決策，產製石油化學品所需之中間原料，以協助民間石油化學工業之發展，現已正式進行，且已有若干成就。其前途真未可限量。

再回頭說到煉油廠罷。據董廠長告訴我們：該廠共有員工約三千人，包括員工眷屬則為

八千人。該廠對於員工的福利設施，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面面俱到」！凡住宅（每家由廠方貸款三萬五千元自建，分期償還）、教育（該廠有為員工子女辦的幼稚園、小學、中學，還有為員工辦的補習教育）、醫藥、衛生、合作社、各色各樣的康樂設備（包括球類、游泳池、棋類……等等），乃至公墓，無不應有盡有。換言之，即生、老、病、死，都可在這裏求得一總解決。若干年前，我在浦口參觀過「久大精鹽公司」所設的硫酸銹廠，已開始有這樣類似的設施，當然尚不足與本廠相提並論。我們在廠內沿路參觀了幾家員工住宅，他們生活得很好，在門前有單車、機器腳踏車，室內有各類電器，孩子們似乎很多，都在受教育，房間不大、不多，但室內鋪的是踏踏米，就多生一兩個也決無問題。據同行各位的估計，像這樣一所房子，如果在台北，便非五六萬元不可，可是他們只花了三萬多元。

我一面聽取董廠長的說明，坐在車上便一面在想，一直回到招待所休息也還是在想：像石油公司這樣一種大規模的企業，它的最高價值還不在能賺錢，能為國家爭取外匯（自然，為擴大一企業本身，為國家解決一個更大的問題，賺錢或爭取外匯都是很重要的），更要緊的乃在發揮它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同時利用這一完善的機構為國家培植無數的科技人才。我細看該公司向多方面發展的業務，確能引我一種更大的希望，一種無上的樂觀，就他們的

服務一點來說，現在台灣一切的用油，如我上文所舉的種種，幾乎一律不假外求，都能自給自足這是何等的愉快！我們只要回想抗戰期中在四川，尤其在滇緬公路被英國人封閉以後，汽油的來源將告斷絕，我們會有過如何的恐慌，便能了解今天能做到自給自足，這一貢獻是如何的偉大！可是，儘管已做到自給自足，如果他們服務精神不够澈底，也還是不容易滿足公私的需要。看他們爲供應全省各種石油產品，以及石油溶劑與部份石油化學工業原料，在各重要城市及港口，設有十一所分支機構，十二所油庫。並用海港油輪、油罐火車、油罐汽石及管線，以求把他們的產品迅速且確實的運送給各用戶。在全省各交通重要地點，他們都設有汽油、高級汽油、柴油、煤油、及各種潤滑油的加油站；台灣近年的農村，採用機械的已經不少，各類新式漁船，也有用油的必要，因而他們在許多農村、漁港，更有料油站的設立；再加上高雄、基隆、花蓮三個國際港口，本國及外國船隻，隨時有添加燃油的需要，他們也有設備使他們得到滿足。現在因天然氣仍有大量剩餘，該公司已計劃以苗栗爲中心，敷設大口徑天然氣管線一條，北達基隆，南抵高雄，將天然氣輸送各地供工業及燃料之用。凡此種種，爲表現他們服務的精神，其計劃是何等的週到，其手續又是何等的繁雜啊！

最後，再談到該公司所培植科技人才的貢獻。十幾年以來，因爲該公司的設備不斷的更



新與擴建，關於設計、建造、安裝、試爐多係自行承辦，乃累積了不少工程技術的經驗，因而他們更有對外工程技術服務業務的辦理，過去所承辦的裝建工作，如高雄硫酸銨廠球型液氨槽，高雄市百萬加侖高架水塔，雲林咖啡工廠，清華大學原子爐，慕華公司的尿素廠，以及正在興建中的中海潤滑油廠，乃至國外如泰國、越南、韓國的若干技術服務，均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博得各方的稱道。我深信：對於將來台灣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和他們的關係更為密切，他們必有更多的貢獻可以提出哩！

上面我以石油的煉油廠為中心，作一簡單的敘述，已經佔篇幅不少，對下面我所看過的各廠，便只想簡略的說一說，因為大家都懂得這些廠各有其重要性，而我對他們的希望，也和對石油公司一樣，不願再多耗費看我這篇遊記的閱者的寶貴時間了。

同在這一天的午前，我們到南部火力發電廠和台灣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也分別看了一下。

這個發電廠共有發電機三部，第二第一兩部，先後於四十五、四十六兩年開始供電；第三部因工業發展的需要，於五十二年始告完成。

這三部機組（除發電機外，包括其他的附屬機器，故曰「機組」）的總工程費為美金二千五百九十三萬元，加新台幣四億三千三百零九萬九千元，我在這裏特別舉出這一數字，在

使大家知道一個現代國家要多方面從事建設，其所需要的資金是何等的龐大。

據廠方的負責者告訴我們：像這類的發電機，在外國每年必得小修，每三年更得大修理一次，他們因為對本廠機器特別珍惜，所以大修可延到四年。當我們參觀的時候，一部機器正在拆開大修，雖動員機匠不少，但仍須相當的時間，在修理未完成以前，有若干的工廠和住戶必須部份的輸流停電。但大規模的機構自己裝有發電機的，當然影響不大，例如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他們收藏室的通風設備，以及各陳列室的電燈，用電日夜都不能停，所以他們自己有發電的設備。

在發電機房內參觀一會，頗感到非常炎熱，但工作人員須成日成夜留在機房內，其辛勞可想。我們乘電梯到屋頂風涼了一會，高雄全市在目，廠方負責者為我們指出各重要工廠的方位，並指出他們正在籌建的新廠地點。遙望新舊兩港，形勢天然，但即在新港建成以後，也只有兩萬五千噸左右的船隻可以開入，大型的油船仍不能進口，只能停泊在港外海中，因此為煉油廠輸送原油的大油船（現在的油船在十萬噸或超過十萬噸者，已為數不少），必須在港口深水中建立一條管子，始能將原油輸送到廠。

（原載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十三日至十九日中央日報）

# 日本在美化中

——最近東遊雜記之一

一

本年十月七日到二十二日，我又在日本東京住了半個月，除掉在上次戰前我會約同老友崔萬秋於民國廿五年去過一次日本以外，戰後我已去過五次。有人問我：「您爲什麼常常跑

日本在美化中

一七三

日本？」我回答：「不爲什麼，僅僅只是爲滿足我某一方面的興趣。我平常住在某一地方太久了，感到索然寡味，便要走動走動，以求得一種新的刺激。日本算是一個最能給我新鮮刺激的，所以我隔不到幾時，便要到那裏去小住一段時間。」

此外，我也另有一種感想：我覺得研究中國現代史，必須把世界與我有密切關係的若干國家這一期的歷史同時研究，才能明白一件重要事實的真象，否則，僅僅根據我們一方面的記載，便難免不流於主觀，不僅歷史的真象不明，如果把它寫成一篇敘述文字，也不能生動有力。舉例言之：自從龔德柏先生譯了陸奧宗光一本「蹇蹇錄」（龔譯改書名爲「中日外交秘史」），亡友王光祈先生從德文譯出「三國干涉遼遠秘聞」，我們過去關於中日甲午一戰的紀錄，便須全面重寫，姚錫光著的「東方兵事紀略」，羅惇巖據姚書改寫的「中日兵事本末」，以及王炳耀所編的「甲午中日戰輯」等等，最多只能供我們參考，而不能認爲是一種良好的歷史記載。

又如：林則徐是清代後期的第一個好官，他一生的績業，自以虎門燒鴉片一幕最能表現中國民族爲正義不惜犧牲一切的勇氣。可是自來關於鴉片戰爭的記載，往往把英國和印度方面的事實忽略了；對當時英國人的心理更不能加以分析；因而沒有一篇關於此役的紀錄可以

算得是很圓滿的。本年三月，有林孟工（崇塘）先生一部六十萬字的「林則徐傳」出版，才算把這一缺憾彌補了。沈雲龍兄說：「有了林孟工這部書，過去一切關於鴉片一役的記載，都可不必再看。」我有同感。孟工這部書出版以後，承他先後送過我兩部，一部是平裝的初印本，另一部是附有「林文忠公大事索引」和「勘誤表」的精裝增訂本。本年八月我在台北和孟工見過三次，他很謙虛的一再要我對他這部大著，加以批評。批評我不敢當，而且無此能力；可是有這樣一部好書，而不向一般好學的朋友們推薦，這在我一個好稱對研究中國近代史有興趣的人，實在未能盡責。因此，我要在這裏借機會提一提。我主張：今天在台北召集一般從政人員的訓練班，可以指定這本「林則徐傳」作為他們的必讀書之一；而且，在他們結業的時候，還可以要他們每人根據這部書提出一萬字左右的讀書記，作為他們受訓成績的一部分。我相信，這不僅可以引起他們研究現代中國的興趣，對他們個人做人任事的心身修養也大有幫助。我希望主持訓練班的先生們對我這一提議不會忽視。

日本和我們的關係，既然比較英、法、俄、德、美都更為密切，因此，研究日本歷史，尤其是自孝明、明治以來這一百多年的日本現代史，乃為我們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惜，我過去雖曾兩度學過日文，但一曝十寒，剛剛學得一點點，便又放下。每次我到

日本，總要到東京神田區神保町那條日本書店街徘徊留戀好幾次，看見他們那種浩如煙海的新舊書籍，確有望洋興歎之感。一直到今年，我才請了一位日本太太（中國留德學生何君的夫人，也是我在清華書院的同事），每月教我二十點鐘的日文。她富有教學經驗，而且知道中國人學日文的弱點。據她說：我的進度不算太慢，理解力也頗不弱。我想，假定能有兩學期或兩年的努力，對於閱讀日文的歷史書籍應該沒有問題，但要讀日本文學書則很難說。我今年已進入七十又五，又下決心掉轉頭來當學生；似乎比較我眼中一般懶洋洋的大學生，還肯多賣一點氣力；這也只是要維持我的這種興趣。興趣和我的生命不可分，興趣完了，我便什麼也完了。

歷史與文學的關係密切，文學是歷史開出的花，也以文學美化了歷史。任何國家，演變到了怎樣一個時代，便往往產生怎樣的文學。日本這一百年的文學，包括詩歌、長篇短篇小說、戲劇、散文、文藝批評、乃至童話等，由中國留日學生譯出的何止一千種！我們從這些東西可以看出日本的現代化或歐化，實以他們的文學和多方面的文藝活動表現得最為清楚。日本由一個封建國家進而為世界強國之一，經過一度慘敗，甫及二十年，又能夠昂然的站了起來，其國民的活力，也以文藝的影響為最大。即以我個人而論，三十年來隨時到日本社會

加以體驗，對日本人精神的和物質的各方面，不感到怎樣陌生，也可說是多少受了中國一般介紹日本文學者之賜。

中國人對現代文學的介紹和創作，比較日本落後了四五十年，從「五四」以迄今日，由於文學的解放，能直接欣賞西洋文學的也漸漸多了起來，才算找出了一條正當的途徑；但經過大陸這次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不學而又土氣十足的如毛澤東，也居然高談文學，而盲從者，更奉他的話如經典，這確實是一次空前的打擊，也是中國這個優秀民族一次莫大的羞恥。自由中國針對這一事實而倡導文化復興，從某一觀點看，亦自有其重要性；但我總希望倡導的先生們，應把廣吸世界文化以豐富我們的固有文化作爲一個重點，過分提倡「傳統文化」，便可能發生很大的誤解。「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台灣有一間著名中學的國文教員，出了一個「論道統」的題目，要一班十七八歲的孩子，胡謔一篇國文，我確實感到啼笑皆非！以我所了解，孫中山先生畢生所追求的，只是如何使中國現代化，他之所以成爲十九二十世紀之間一個突出的世界人物，正因爲他從小便隔離中國的傳統文化較遠，一直在國外受着學校教育，而且受過六年半以上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能領導中國革命，造成中國歷史輝煌的一葉。

上面這段話，也可以說明我常常要跑到日本去看看的動機之一。

二

看戲是我歡喜的一種娛樂，過去在長沙，到北平，到成都，我總隨時要看看戲。京戲畢竟以北平演出的爲正宗，上海的海派京戲，我便不高興看，除非有從北平邀來的名角，或雖是經常在上海演戲的角色，而是由北平科班出身的，我才樂於去瞧瞧。因此，我在上海前後三十年，花在戲院的時間不算太多。抗戰中我在四川住了七年，而以留在重慶的時間佔了十之七八，但重慶的川戲我不能欣賞。七年中我去過成都四五次，每次却非看幾次川戲不可。我把成都的川戲看成京派，重慶的川戲則同於海派，所謂海派者，即不守規矩的胡鬧而已。湘戲在中國劇種中的地位不算太高，但給我的印象最深。大致在六七歲的時候，我的母親便已特許我看戲，戲看多了我才愛聽說書，書聽膩了，我才大規模的看中國小說。因爲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才引起我廣泛的涉獵一切翻譯文學的興趣，若干年來，我對各國的戲劇電影也非常愛好，都是由我童年時代起一直養成的。

這一次，我在東京看了三次歌舞伎：一次是在那有悠久歷史的「歌舞伎座」看的，純古



典的；另兩次是在日比谷公園對面的「帝國劇場」和淺草的「國際劇場」看的，便多少有些現代氣氛。日本人對傳統的東西懂得珍惜，對現代的，也勇於接受，這是日本人可愛的一面。日本人把看戲認為很重要，每有好戲開演，總是場場客滿，對號入座的位子不預先定便買不到票子，這種坐位的票價為一千三四百元，即等於美金四元，這一點可看出日本人近年生活豪華的一斑。

其次，我看了他們的「國立西洋美術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前者陳列羅丹雕刻的複製品頗多，西洋名畫則寥寥無幾，都不能引起我如何的注意；這是因為遠在四十年前我已在巴黎看過羅丹的原作不少，而藏有第一流西洋名畫最多的魯佛爾博物院我也去過多次的緣故。但他們這座西洋美術館的建築頗佳，其結構與紐約近年所建的一座多少類似，後經同遊的盧冠羣兄告我，他們的這一建築，正是由一位美國工程師設計的，這就無怪其然了。

我到他們的國立近代美術館去參觀，其目的是要看看「現代義大利美術展」，所陳列的繪畫與雕刻約有一百點左右，都是新近由羅馬運來的。展覽期五十天，從本年九月二日至十月二十二日，我去看的時候已經是最後一週了。門券好像是日幣二百元，雖已接近閉幕，但看的人，仍相當踴躍，研究美術的男女學生更多，他們在每一件優秀作品前面，總停下來

仔細觀摩，可見教育的意義很大。說到參觀這類現代藝術品，我個人曾有一段特殊的經歷：記得早年第一次在巴黎看到這類東西，爲那種不順眼的線條和強烈的色調所刺激，使得我頭腦發昏，幾乎暈倒，趕快跑到對面另一陳列古典油繪的畫廊坐了一會，從容的看了一週，然後才清醒過來。一九五三年，我在日本也參觀過一次現代畫展，除掉若干小形的舞台佈景模型使我感到新鮮以外，其餘兩三百點的畫幅，乃無一能引起我的注意，甚至我覺得它們比法國人的更爲幼稚。五年前，我在紐約看見這類的繪畫雕刻更多，有一處乃搜集了世界各地這類東西的精華同時展出，其中畢加索的作品也不少，然後才把我的觀念改變過來。我曾細細去玩索過好幾次，覺得他們的一筆一刀，無不旁皇審慎，大費經營，非經過長時間磨練其中者，將無從下手。就我近兩年在日本所見，覺得日本人的這類作品也已大有可觀。尤其這次「現代義大利美術展」所給我的啓示，乃使我感到對一件成熟的美術品，固不應以新舊觀念強爲軒輊；更不應迷信天地間的精華，已爲古人發掘殆盡，後人要推陳出新另闢途徑已無可能；科學與美術間的距離似乎可以縮短；現代對於美術的欣賞，將不以少數知識分子爲限，而將成爲大衆的布帛菽粟，不可一天或缺；這可能是今後一個總的趨向。

以我這次在東京接觸所及，對日本的事事物物幾乎無處不感到他們有普遍美化的要求，

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大力向各方面廣泛推進，可以說，他們對美化已快要做到巨細不遺，無孔不入的程度了。舉例言之，他們可以幾億的日元改建一座劇場，不問您走進任何一個高級的戲院、電影院、舞場、音樂廳、咖啡屋，……總使人有一種美的愉快而不流於庸俗。在人多的公共場所，禁煙很嚴格，不僅劇場電影院如此，即大規模的百貨公司也如此。他們對於噪音的取締，似乎也很認真，像東京那樣一個一千萬人口的都會，車輛是那樣擁擠，很少聽到有人亂撒喇叭，也絕沒有人喧嘩吵鬧。「聚蚊可以成雷」，集合千萬人同居一個城市，如果大家不自行檢點，那會鬧成什麼樣子？

近年日本的印刷越來越講究，我知道，台北發行的故宮畫冊，有許多精品是請日本代印的；香港發行的中文「讀者文摘」，「星島晚報」附帶發行的「亞洲週刊」，裏面的彩色廣告和精美畫幅，似乎也多成於日本人之手；至於過去電影的拷貝，我們要拿到日本去洗，自然更不在話下了（聽說邵氏公司已開始有這種新設備）。近年日本的電視已進入彩色階段，但似乎還在嘗試的初期，不怎樣普遍；我在大阪國際機場休息室所見到的，顏色也不怎樣鮮明。

隨着印刷的進步，他們對於一切刊物的編排格式，包括日報、雜誌、旅行案內、風景明

片，乃至商店廣告和包裝紙以及商品的手提袋或紙盒等等，都無不力求美觀。他們那些每天發行幾次，每次勤以百萬計的日報和夕刊，看來總覺得羅羅清疏，不會使人感到雜亂擁擠，即偶爾加上一兩幅漫畫，一段短短的連載小說，也經過精選，不肯馬虎；他們絕不願把一張報紙看成垃圾箱，不問什麼東西都往裏面塞，確實經過嚴格的安排與去取；甚至連對社會具有最大影響的廣告，他們也沒有忘記報人的責任，並不是出了錢就一切可以照登的。日本的報紙，過去的張數本來就不多，銷到兩三百萬份的大報，往往也只出兩大張或一張半，現在雖已擴展到三大張或四大張，但像把電影或舞場的廣告佔去一整版或一版半篇幅的事實是沒有的，除非有新的戲劇或新的電影必須於上演前一星期預定坐位的，偶然可以佔去一版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地位者外，平日您要到一處娛樂場所，便只能在分類廣告裏面去找，地位不過小字三五行而已。

如報紙書籍之類，這還是大家容易察覺的，現在我再舉兩個更小的例子在這裏：

一盒火柴，總算是小而又小的東西了，可是爲日用所必需，日本人對於火柴，乃至一隻火柴匣子，也必定各出慧匠，勾心鬥角，務使用的人感到愉快，每一根火柴都發生可靠的作  
用，決不會有括上兩三根都不能燃，或一括即火星四射連衣服也燒壞的事實。至於火柴匣子

的美觀，我會把各餐館、咖啡屋或其他娛樂場所送給我們的留下三十個左右加以比較，自然上面都有他們的招牌名稱、地點和電話號碼，但以某夜總會一個純金色的，四川飯店一個印有張大千一朵折枝牡丹的最為精美。中國人歡喜講「大事不胡塗」，好像對小事胡塗一點便不要緊，殊不知近年日本出產的手錶和照相機，能使瑞士和西德的出品，在國際市場感到威脅，日本的造船業可躍居世界第一，這與日本人對一盒火柴也不肯馬虎是有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點頗值得我們提倡工業或發展國際貿易的先生們留意。

日本人是世界著名有潔癖的民族之一，由好潔進一步做到愛美，是順理成章的。現在我們走到任何地方一家中國餐館（例如台北的或香港的吧），餐後照例由館方派給顧客一小方毛巾，作為揩嘴與擦手之用，其用意本來很好而且是有必要的。可是每天經多數人用過的東西，用後的消毒工作究竟能做到何種程度，不無使人疑慮。現在日本東京的這件工作，係由一家公司包辦，他們每天把經過電氣蒸燙的消毒毛巾，捲成三四寸的一個小捲，用塑膠袋子嚴密封好，用汽車分送給各餐館，把上一天用過的全部收去繼續工作，收取一定的費用。試想，像東京那樣一個人口最多的大都會，每天在餐館吃飯的，至少以數十萬計，如果這樣一件瑣事，由每家餐館自行處理，要濫費多少人工，多少時間和金錢？現在由一家公司代辦，

何等的輕鬆愉快！顧客們又如何的放心使用，據說這家公司發起的時候規模是很小的，現在因為採用的愈來愈多，已形成一家十幾億大規模的公司了。我知道台灣近年一部分人，本着他們過去在大陸的經驗，集合少數朋友創辦小規模生產事業或手工業的已經不少，不僅成品在當地可以銷行，出口的也有多種，例如我們在香港所吃的罐頭和部分的水果和蔬菜，已有若干便來自台灣，今後只看他們如何擴大經營與推廣了。我舉日本這個消毒毛巾做例子，一面固在說明日本人好潔與愛美情況的一斑，一面也在鼓勵國人多創新事業，一個人成天坐下來不肯努力，不願多用腦筋，只有佔有與享受的要求，而沒有創造的衝動，這決不是合理的現象。

## 三

看一國的文野和貧富，從他們食用品的種類多少注意，便可一目了然。一個有高度文化而又較富裕的國家，他們吃的用的東西，總是非常複雜，反之便非常單調。

這次我留在東京雖只短短的十五天，看過的百貨公司，到過和式、中式、西式的餐館及其他與食用康樂有關的場所可真不少，藉此理解他們的生活、歷史文化，以及人民的品質，

都有多少益處，如果不親自去經歷體會一番，即對他們較高方面如文學藝術之類，也很難得到進一步的了解。

香港的百貨商店，大率規模不大，商品能充實兩層樓面的已經不多，三層四層的，更絕無僅有，而且陳列既不美觀，花色尤其簡單，只要走進去十分二十分鐘，便可一覽無餘。在香港，我最怕陪太太小姐們到這些地方去，斟酌、考慮、選擇太耗費時間僅僅是原因之一，主要的乃是除買東西以外，不能引起我多方面的興趣。

我最歡喜孩子們，走進東京一家百貨公司，不問是吃的、用的、玩的，我總想多少選購一點便於攜帶的記給他們，讓他們高興高興，也藉以維繫他們對我的好感。因為日本這類地方能引起我的興趣，我要買的東西，決不一次買齊，總想藉機會多走幾處，或到過的地方再去一次。

東京具有規模的百貨公司，佔地很大，總是七層八層，而地下的一層還不計算在內，他們每天的營業時間，午前十點開始，大致在營業前一小時，他們的店員已經在忙忙碌碌做整理、陳列，或清潔的工作，對於臨街窗櫺的佈置，他們更特別用心，時間一到，各門大開，在門前久候的顧客們才一湧而進。一進大門，便看見牆上的牌告，記明某一層出售何種的貨

色；多半門首還有一位女職員，坐在一個小枱子後面，備顧客詢問；同時更有一個銀錢兌換處，便於遊客用外幣換取日幣。

普通的商品不談，他們例有一層樓面，多陳列帶有藝術性的出品，如各種精製的漆器、磁器、陶器、餐具、酒具、茶具、小型的金屬用具、塑膠用具，以及純用手工製成各色各樣的小件，大抵都能引人入勝。還有一種真算得藝術品的東西，則大抵陳列在玻璃貨櫃之內，一隻杯子，一把茶壺，一件或一組文房用具，……有的古色古香，有的新穎悅目，上面均有製作者的姓名，每種總只有一件或一套，式樣無一相同，當然更值得欣賞。其代價低者以千元計，較高的以萬元計，這大概非真錢的人不敢問津了。但我在銀座却看見專賣這類東西的商店，可見銷路還是不不少的。

在日本各地出產的「人形」，這裏也種類繁多，作風也有種種差別。這類「人形」的化裝、衣着，頭戴一頂笠子，手握一柄摺扇，手提一盞宮燈，撫弄着一件樂器，一個老頭，肩一支釣竿，背上一個魚籃，或一個武人飛舞着長槍短劍，大抵古典的意味很重，他們所據以表現的根據，或得自民間的傳說、歷史故事，與戲劇小說也有關聯，我們從他們舞台上或日本風的浮世畫裏面，常看見這類的形態。他們有研究這類東西的講習所，必須經過長期訓練



才能做出像樣子的成品，也確有不少是製作得很美的。中國無錫的泥娃娃失之粗劣；北平的「泥人張」及其徒子徒孫的作品，也呆板無生氣；彷彿似之，只能求之唐代的敦煌壁畫或有與日本「人形」相通之處。日本人多用這類東西供客廳的擺設，外國的遊客也樂於購買，一個小型的定價千元內外，還是簡單的粗製品，大型而又很精美的，可高達四五萬元，但這算不算是日本人所特有的一種藝術品呢？我不敢說。

兒童玩具，也大率陳列在同一樓面，按照孩子們的年齡、性別和心理，種類多到不可勝數。那些拿着各色各樣玩具做給參觀的孩子們看的女店員，也大抵經過選擇和訓練，她們能說三五歲孩子們能懂的語言；有使孩子們樂於和她們接近的神態和禮貌；尤其可貴的，她們還有一種毫不厭倦不怕麻煩的耐性；我站在旁邊看了一會，不禁暗暗的爲日本孩子們祝福。我曾在日本各地常看見他們的小學教育，領着一羣一羣的學生，在街頭列隊行走，前面、後面、側面，總有先生們小心的照顧着；這次在上野公園看見不少的幼稚生，由他們的保姆帶着在動物園裏面玩，她們指着一隻梅花鹿或一羣小白兔爲他們低低的講解；看見孩子們在一羣養馴的鴿子後面追趕，她們便以輕微的手式，加以適宜的制止。這一切的一切，乃使我聯想到台北和香港那些填鴨式惡性補習所困擾的中小學生們，乃至連週末和星期日也抽不出時

間去尋找他們所愛好的娛樂，而感到非常難遇。

食品陳列在另一層樓面，雖以點心、糖果、蜜餞、罐頭等為最多，但其他可吃的東西，仍不勝枚舉。我對這些東西吃過的太少，不想多說，但仍有幾種值得在這裏提一提。

①我過去對日本點心的批評，總覺得失之太甜，而且做出的樣式和名目雖有種種不同，但質料的變化似乎太少。這次在東京，我却吃到了很好的「羊羹」，這是由一位中國朋友的日本太太送給我的。因此，我在回港的前一天，買了好幾種帶給台北和香港的孩子們嘗嘗。除帶台北的兩大包於回程飛機在松山機場暫停的時候已交割清楚外，帶香港的却在九龍啓德機場檢查行李的時候失落了，頗覺可惜。我在東京另一家百貨公司的樓下第一層，曾看見他們提出一二十種來自各地的特產「羊羹」，有東京本地的，京都的，福岡的，名古屋的，長崎的……分別陳列出賣，可說明這種東西是日本最流行的點心之一種。

②雞蛋糕和核桃酥，這是中國常見的，但幾十年來我在大陸各地所吃的，都絕少變化。這次在東京我吃到標明「中國風」的桃酥，薄、脆、鬆、香，都比我們自己做的。東京「文明堂」和「風月亭」的蛋糕極有名，比西洋點心中任何一種蛋糕都好吃。若干年來，我因為害過嚴重的胃病，醫生總要我少吃多餐，每到晚上一兩點鐘睡覺以前，常覺饑餓，不稍稍

吃一點東西，便不容易熟睡，蛋糕便成了我常食品之一。這一次在東京半個月，銀座四丁目那家「文明堂」老店，我去過好幾次，還買了兩大盒送給台北的朋友和孩子們，我的孫女磊磊特別來信，誇獎他們的包裝很美，其實不僅包裝好看而已，他們在裏在盒子外面那張花紙的一角，還貼了一塊圓形的小紙，上面記明這盒點心是某月某日售出，這不僅保證了這盒點心的新鮮，如果您把它用作送人的禮物，也能使收受這份禮物的親友，知道您是臨時專誠買來，決不是隨便的敷衍。日本人對商業心理的研究入微，確實是高人一等。

③我愛吃的水果，根本不多，今年在台北吃過很好的葡萄、香蕉，尤其在遊橫貫公路的時候，在「福壽山農場」吃到他們剛從樹上摘下的水蜜桃，真是世間的美味。過去我吃過山東肥城和浙江奉化的桃子自然也很好，可是對我留下的回憶，究不如這次在福壽山所吃的至今猶有餘甘。今年由台北運到香港的大宗橘柑（中號的每個港幣五六角，最大的近一元），能使美國著名的金山橙黯然失色，如果這種水蜜桃有方法可以大量生產，必能在國際市場爭得一席更高的地位。不過應從包裝上特別研究，總要使它能經過三五天不壞，才便於出口。日本水果種類也很多，但我愛吃的只是葡萄和楊梅，可是這兩種的價錢奇貴。此地九龍太子道這兩家高級咖啡店，有飛機運來的日本楊梅出賣，一小碟大致不過三五枚，價格港幣五六

元不等。我在東京銀座「千疋屋」買過一次最好的葡萄，分量不足一磅，包好了向我算帳，乃爲日幣九百元，折合美金約爲兩元六角左右。可是我得着一次新鮮經驗，發見他們在一串葡萄梗子粗的一端，用線網緊着一個一吋見方的綠色塑膠水袋，把梗子浸在水內，其大小僅等於一顆大的葡萄，不細心便不容易看出。有了這樣一種裝備，能使這串葡萄保持三兩天不會腐爛，而且色味和水份也仍然正常。這也可看出日本人在這種小處何等的肯用心思。

東京大大小小的餐館，多到不可勝數，日本料理、中華料理、西洋料理，在這裏各顯神通。這三種吃法，可以說各有所長。近年世界的各大都會，都有不少的中國餐館出現，如果做中國菜的廚子能力求進步，能從色、香、味三方面多在色字上下工夫，我相信愛吃中國菜的人數還可能增加，但說中國菜可以壓倒一切則近於迷信。人生不能離開衣、食、住、行、娛樂與醫藥，從這幾項的每一角度去看，都可代表一國文化的深淺，也關聯着他們歷史的長短和地理的環境。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從「論語」的「鄉黨」一篇，我們知道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便是最講究吃的一位聖人；稍後的孟子，也懂得推敲着魚與熊掌，而且，他還提倡吃狗肉，他不明明說要使「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我們這些七十以上的老頭子才能吃肉嗎？更遠一點，從「禹惡旨酒而疏儀狄」的這一故事來看，我們也知道中國造酒的方法在三

千年前，便已大有可觀。但一般的說，中國菜是藝術的、哲學的，不要拿嚴格的科學加以衡量。朱子解釋「割不正不食」一句說孔子「造次不離於正」，他不知道能把雞、鴨、魚、肉切得端端正正一塊一塊或一片一片的，正是孔老先生要吃雞、鴨、魚、肉的精華，否則「膾不厭細」的一句所謂「膾」，便是要把肉切成一絲一絲，或根本斬碎做肉丸子或揚州獅子頭來吃，又有什麼正不正可說呢？朱子解釋「四書」和「詩經」，總不能超越一個理學者的頭腦，隨時都要往道德不道德的方面拉，其實「飲食男女」只是「人欲」，並不包含什麼「天理」，我生平不大歡喜宋儒，就在這種小處，也必得麻煩他們幾句。

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以米飯為主食的民族，這或許與他們的地理和氣候有關。一般的日本人雖也歡喜吃中華料理，但還是以吃日本餐為主。我每次短期住在日本，對日本式的吃法，也頗能欣賞，除掉分食和定量分配可以免除浪費，我很贊同以外，尤其對他們的食物如「沙希米」（生魚塊）、烤鰻魚（蒲燒）、海苔、「澤菴漬」等等，更有偏好。

「沙希米」照例用三種生魚塊盛在一碗或一碟，紅色的是鮭，最軟、最好吃，也於老年人最宜；一種白色的是鯛，不硬，但比較的耐咀嚼，味亦佳；另一種白色的便是生墨魚，從前我也歡喜，近來已有點咬不動。三種魚都切成寸許見方，一分許厚薄，每種魚照例只有四

五塊，用醬油和蒜泥芥末之類自動調味；白磁碗碟內總擱上三兩塊亮晶晶的冰，面上擱幾片或一種野菜，以顏色配搭來說，不僅好吃，而且好看，但能同時喝三兩杯日本酒，乃更爲相宜。

烤鰻魚有專家，也有專賣「蒲燒」一味的飯店，同內行去可吃到最好吃的，肥大的鰻魚油頗多，和飯一陣吃最妥，佐以一小碗清湯更好，最貴的也不過五六百元日幣一頓。

海苔有兩吋許的小薄片，可以稍漬醬油乾吃，也可放在湯內；大張的則捲飯加雞肉之類烘烤了吃（壽司）。有專門出售海苔的著名商店，也有專賣「壽司」的餐館，兩者均有好壞價錢也不一致。

「澤菴漬」據說是一位留學中國名澤菴的日本和尚介紹回去的，做法很簡單。據我的日本先生告我：選擇品質最好的小蘿蔔洗淨吹乾，裝入一大木桶，桶內滿儲米糠，加鹽加水攪勻，將蘿蔔拌入糠內，桶面加蓋，用大石壓緊，經過一星期即可取食。普通家庭做的色白，餐館用的着了一點顏色，淺黃，香、脆，似較雲南最好的大頭菜更有味，湖南最好的油蘿蔔也遜一籌。日本人用爲佐餐的常食品，我也最歡喜吃。

好，我這篇瑣瑣碎碎的文字拉得太長，專從小處着眼，其重點在說日本人當前生活從各

方面日趨於美化，另有兩篇談到日本較大的方面，有工夫或能陸續寫出發表。

（原載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中央日報）





# 目錄

「中國現代名人軼事」序	一
「萬竹樓隨筆」序	三
記中國歷史上幾個有名的女子	五
「中國近代史四講」序	三五
談風度——紀念黃膺白先生	三九
中國能抄襲蘇聯嗎？	四三

我對於今後教育的一點看法·····	四九
培養政治的新機與活力·····	五三
反攻準備的要點·····	五九
趕快糾正「反共八股」·····	六五
讀蔣總統「三一」文告書後·····	七一
馬倫可夫代得了史太林嗎？·····	七七
從日本政局想到我們的國民大會·····	八一
克拉克之來與亞洲聯軍·····	八五
新日本給我的新印象·····	八九
斥中共入聯合國的傳說·····	一〇七
李承晚總統萬歲！·····	一一一
日本願再使時機坐失嗎？·····	一一五
大家照照一面歷史鏡子·····	一二一
中共攻臺的「空大鼓」·····	一三一

注視中共的「填海工作」	一三七
以行動求團結	一四三
「鬥智」與「鬥力」	一四九
泛論當前大勢	一五五
日本新局勢的展開	一六一



## 「中國現代名人軼事」序

十年來我寫了筆記近兩百條，包括紀人、紀遊、紀事的各方面。凡我平日在報紙雜誌上所發表檢討時局的文字，從來沒有存稿，只有這些筆記，却保存了一部分。

這本小冊子裏所收入紀現代人物的二十幾篇，便是從這些存稿中整理出來的。

關於「五四運動與蔡子民」一文本來是今年爲「自由陣線」週刊寫的一篇紀念「五四」的論文，於筆記體裁頗不合，但大體仍側重在寫蔡先生的生平，所以我也把它收入了。

盛宣懷、梁士詒生時，毀之者多，譽之者少，可是他們究竟還爲國家做了不少的事，比

之後來一班只要錢不做事的官僚似乎要好得多，而且他們的事業就到今天，也還有不少的影響，所以我就事論事，還是爲他們表彰了一番。

張季直先生是我生平最佩服的一人，他和沈壽的一段故事，自然不免爲盛德之累，可是他們自己並不諱言，我們當然更沒有爲他諱的必要了。

最近共產黨在大陸上所屠殺的青年黨人，據我們約略估計，已在兩千人以上，共產黨對青年黨人除屠殺以外，即無其他的辦法，僅此一點，便最足以表現青年黨的精神。曾慕韓以一個毫無憑藉的書生，居然在舉世不爲的時候能創辦這樣一個反共的黨，而且他的精神又能夠經過三十年而始終不懈，這畢竟不能不說是慕韓的偉大處。我自己從來便沒有意思寫什麼書，現在印行這樣一本小冊子，不幸我這位老友便已居然趕上，我便就算把這本小冊子來紀念我這位老友，同時也用以紀念這一羣死難的同志吧。

我這類的筆記，都是平日應報紙雜誌的需要隨手寫下的，並沒有用過多少工夫，錯誤自然不免，假如賜閱者能不吝給我以指正，我當然非常感激。

中華民國四十年七月二十日香港

## 「萬竹樓隨筆」序

十幾年來，我已斷斷續續寫過近三百條的筆記，長者或逾萬言，短的也亦率都已在報紙或雜誌上發表過。我從來不敢說「文章總是自己的好」，但究其心思，完全扔掉仍覺得不無可惜，因此選出一部分，把它再印一次。前年九日「國現代名人軼事」，去年三月印的一本「近三十年見聞雜記」，便都是從這裏的。出版以來，各銷了五千本以上，在今天發行的範圍是這樣狹小，居然還以一閱，這實在是我衷心所感謝的。這一本書所選的三十四篇，十之八九是一

質，給青年朋友們看看，或者多少還有點益處，因此我又大胆的把它印行了。

「萬竹樓」這三個字，是因為我住在重慶鄉下的房子，樓前有幾行修竹，環境頗宜於讀書，當時正是寫這筆記的開始，因此便用了這樣一個名稱，用久了也就懶得去改它，實際沒有多大的意思。有一位四川朋友，抗戰中送過我一首長詩，裏面有這樣四句：

安得千丈桐，佐以萬竹種，此君坐明窗，縱筆寫「噩夢」。這大概是我這個「萬竹樓」惟一的根據了。

這本書排好以後，我正患着頗嚴重的胃出血，在法國醫院睡了兩星期，一直等到出院以後，才由我自己校對了兩次，校對完了，我的病也大體好了，因此我把這本小冊子作為我這次大病的紀念，並藉此機會為一切關心我的朋友們祝福。

舜生、四十二年二月一日、香港。



# 記中國歷史上幾個有名的女子

## 一、西施

「休提起蛾眉聲價，算和親輪到奴家，便長留兩臂宮砂，怕難忘一縷輕紗。  
「承謝你不識面的東君擡舉咱，恰相逢盈盈未嫁。

「現如今故國天涯，杜若溪邊，苧蘿山下，何日重停踏？

「况姑蘇合畔多俊娃，怕老君王看不上貧家裙衩。

記中國歷史上幾個有名的女子

「望吳山那答，別越山道答，殘陽暮鴉，迢迢退路。」

右錄吳瞿安（梅）「擬西施辭越歌」。西施的故事，流傳了兩千多年，在歷史家、小說家、戲曲家、詩人的筆底，也不知加了多少的附會，添了多少的想像，然大致這樣一件事是很尋常，這樣一個人我們也是寧信其有的。

當時越國境內這個苧蘿山，和靠近山邊的東西兩個村子，都在今天浙江的諸暨，像這種地方能產生一個採薪和浣紗的小家碧玉，樣子確實長得不錯，這自然是很可能的；說這東西兩村姓施的很多，而這個女子却住在西村，因而便叫她作西施，也未嘗不合理。凡一個流傳的故事，總隨時都要添枝添葉使它趣味化的，既然西邊村子裏有了一個西施，說東邊村子另有一個東施，又有何不可？不過西施既然是美不可言，東施便非醜到十分不可，可是聽你怎樣醜，眉總也會皺，心總也會捧，於是便又有了所謂「東施效顰」一說。

司馬遷的「越王勾踐世家」，並沒有提到西施這樣一個人，可是當時勾踐曾以美女寶器向吳國去請和，他却說到的。越國既然物色了西施這樣一種美女，既令就被吳國賞收了，然也不一定就能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作用，可是事前必得加以相當的訓練總是一定的。大致當時選擇這類美女和監督這類的訓練工作，范蠡至少是參與的，因此說後來越國把吳國滅了，

范蠡仍然把西施奪回，也就大有可能。

可是這裏又有兩說：一說吳亡以後，范蠡便感到勾踐這個人很靠不住，他毅然辭去了越國，而且變更姓名，載了西子去遊五湖；一說越王把西施帶回越國，越王的夫人怕奪去了他的寵，因而把西子負着石頭，沉到江裏去了，而且附上一個理由，說這是亡國妖物，留之無用。這兩說我覺得前一說比較有趣味，則就范蠡這個人的性格講也是有可能的。總而言之，越國和吳國的興亡，另有其原因，西施這個女子的關係，可以說是微末不足道的。

## 二、虞姬

千夫辟易楚重瞳，仁謹居然百戰中，博得美人心肯死，項王此處是英雄。——吳梅村

司馬遷的「項羽本紀」實在寫得太好，中國人歡喜崇拜失敗的英雄，大概和這類的紀載不無關係。中國人又有兩句常講的話：「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大致也就是受了項羽和虞姬這類故事的暗示。司馬遷在「項羽本紀」和班固在「項羽列傳」上所提到的這位虞美人，文字都不很多，更沒有一個字從正面去描寫這位美人究竟是如何如何的美，不過因為我們讀「史記」「漢書」的人，對項羽已經有了先入為主的同情，以為一個女子能被這樣一位英雄

所鍾愛，乃至到了死生之際還不忍相離，總覺得美不可言就是了。

故事的本身是這樣的：項羽兵敗垓下，被漢軍和諸侯兵重重疊疊的包圍，已完全陷於絕境，而張良又運用一種心理的宣傳，叫人從四面八方都唱着楚歌，項羽覺得大概是楚地已經全失，不然便不會有這樣多的楚人，因此失望到了極點。其時這位虞美人還在項王的身邊，有一匹名叫騶的駿馬，也是他常常騎着的。現在他自己知道已死在眼前，面對着這平日相依爲命的美人、名馬，乃悲歌慷慨的高唱着這樣一首詩：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項羽反覆唱了幾遍，虞也以歌和之，歌曰：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見楚漢春秋）

於是項王哭了，虞也哭了，左右更哭得不能仰視。於是項王上馬，率數百騎突圍，卒烈於烏江之上。虞是自殺還是死於亂軍之中，「史記」並無明文，但這幕大悲劇中的一個美人影子，却永留天壤。

### 三、李夫人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這首歌是李延年在漢武帝面前起舞的時候所唱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更能作一種新聲變曲，聽的人都很感動。當時武帝聽他唱這個歌便慨歎的問：「世上真有這樣的人嗎？」他的姊姊平陽公主回答：「延年有一個妹妹便正是這樣一種人。」於是武帝召見，果然「妙麗善舞」，因此寵幸備至，並且生了一個孩子，是爲昌邑哀王，這便是李夫人最初的歷略。

李夫人年紀很輕便死了；當她已經病得垂危的時候，武帝親自去看她，她便把被扯來蒙頭蓋了，並且說：「我的病已經很重，形貌也全毀了，實在不願再看見皇帝，死後只希望皇帝看顧我的這個孩子，和我的兩個哥哥。」武帝說：「您的病也許難好，您把囑託我的事，當面向我談談，不也好嗎？」夫人回答說：「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我實在不敢以這種樣子和皇帝見面。」武帝說：「只要您和我見一面，我便加賜千金，而且給您兩個哥哥的大官。」夫人說：「把不把大官給我的哥哥們做，這完全是看皇帝的意思，並不在這最後的一見。」武帝依然戀戀，非強迫一見不可，於是夫人乃長歎一聲，翻身向裡面睡下，連話也不說了。武帝不得已，只好悵悵的退出。

武帝走了以後，夫人的姊妹便埋怨她，「您爲什麼這樣恨了皇帝呢？把您哥哥們的事當面拜託他，豈不也很好嗎？」

夫人說：「您們那裏知道啊！我之不和皇帝再見，正是因爲要深深的託他；我本來是很微賤的，他之所以這樣對我好，完全是因爲我的容貌，大凡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我現在病到這一步，顏色已完全不同於往日，假如讓他看見了，他便會害怕而唾棄我，怎樣還會因懷念我而錄用我的兄弟呢？」夫人死後，武帝果然思念不已，把她的形貌圖畫於甘泉宮。當時有方士齊人少翁，說他能够召致李夫人的魂魄，於是於夜間張燈燭，設帷帳，陳列着酒肉，要武帝立在另一帷帳的後邊，武帝便居然看見一個宛如李夫人的好女子，在對面帷帳中出現，一會兒坐坐，一會兒又起來走走，只是不能和她接近。於是把這位皇帝弄得顛顛倒倒，因悲感不能自己，便作了這樣的一首詩：「是那？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後來的唐玄宗，因楊貴妃死了，也會要方士演過這樣類似的一幕，漢武帝的文治武功，遠非唐玄宗所能及，要之同爲千古風流人物也。

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後來做到貳師將軍，封海西侯，李延年也做了協律都尉，比楊國

忠總算好一點。

#### 四、卓文君與紅拂

歷史上的卓文君和一個傳奇式的人物紅拂，總算是中國舊時代兩個突出的女性。卓文君之私奔司馬相如，相如是主動，文君不過是被動；紅拂之私奔李靖，則靖乃為被動，而紅拂反居主動。

卓文君究竟美不美，至少在司馬遷和班固的筆底並無明文，但知言，且能詩，也許都是事實。紅拂是隋煬帝時司空楊素家裡的一個侍妾，據世所傳「虬髯客傳」，則固十八九麗姝也。

因為司馬相如、李靖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卓文君和紅拂的故事乃流傳不衰。故事的内容大致是這樣的：

司馬相如字長卿，四川成都人，他不但歡喜讀書，也學過擊劍；少年時有個小名犬子；後來因為羨慕蘭相如之為人，才改名相如。他在漢景帝的時候便做過武騎常侍，但因為他性近文學，這個官不是他所歡喜的，因此他便到梁孝王那裡去作客。在梁孝王那裡的著名文人

如鄒陽、枚乘、莊忌之流，都成了他的朋友，等梁孝王一死，他這班食客，便只好星散，相如也回到成都，他的家境是清貧的。

其時臨邛這地方有一個著名的閩人，名叫卓王孫，他是以開礦冶鐵起家的，單就他家所蓄的僮奴而論，便多到八百個；至於田池射獵之樂，更是擬於王者。相如和臨邛令王吉是好朋友，因此他對卓家的情形也很清楚，既知道卓王孫是臨邛的首富，而且知道王孫有個愛女名叫文君，才出嫁不久丈夫便死了，寡居在家。他於是與王吉合謀：第一步由王吉把相如接到臨邛，奉爲貴賓；第二步相如也裝做很闊綽的神氣，車騎服飾都很考究；第三步王吉天天去朝見相如，最初他還見見，後來就簡直稱病不見，可是這位縣太爺依然不敢怠慢，就不見也還是天天往朝如故。大家要知道，大凡有錢的人，總是歡喜結交官府的，尤其在一個人地方更是如此。卓王孫聽說縣令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貴客，便和另一位閩人程鄭商量，發起請客，席便設在卓家，相如是主客，縣令被請作陪，其餘地方上稍稍有點地位的也一律請來，一共有百人以上。臨到入座的時候相如忽稱病不到，於是大家慌了，乃由縣太爺親往迎接，好容易才把相如勉強接來，大家看見相如那種雍容閒雅的儀態，乃莫不爲之傾倒。

卓文君懂得鼓琴，是王縣長和相如早知道的，喝過幾杯酒以後，縣太爺便把預先準備好



的一張琴取了出來，對相如說：「聽說長卿好此，請奏以自娛。」相如初尚辭謝，卒爲一鼓再鼓。

實際相如這一天要來鼓琴，空氣早已放出，文君好琴，必來竊聽，也是勢所必然，相如其所以裝模作樣，其目的原在以琴心挑文君也。

司馬相如不只以琴心挑文君，而且還賄賂文君的侍者，表達他的殷勤之意，於是這位風流寡婦禁不起這種誘惑，居然於當天晚上，私自跑到了相如的住所。相如把文君拐到成都，文君才發見相如「家徒四壁」，前日的那套排場，不過是臨時做出的誘騙手段而已。卓王孫聽到這個消息，大怒，他知道不只是誘拐，而且帶得有竹槓性質，因發誓不給一錢，文君和相如在成都窮困不堪，兩口子乃定下一條苦肉計，把馬車賣了，跑到臨邛，開了一爿酒店，「文君當爐，相如身自着犢鼻褲，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一個有了錢的人，究竟要愛一點面子，卓王孫看見女兒快要墮落到當女招待，女婿就簡直去做堂倌，實在太不成話，於是經人勸告，才分了他們一百個僮奴，錢一百萬，於是司馬相如人財兩得，居然有了這點政治資本。後來相如做到中郎將，建節往通西南夷，道出蜀中，卓王孫以及臨邛這班闊人，才又跑到門下來獻牛酒，卓王孫而且後悔他的女兒嫁相如太遲了哪！

紅拂的故事，我覺得是更有趣味的。當時隋煬帝幸江都，楊素以司空在西京任留守，權重望崇，真是不可一世。李靖以布衣往獻奇策，見素長揖不拜，並責素既以收羅豪俊爲心，即不宜踞見賓客，素不得已起立，斂容謝之。當靖對楊素清辯滔滔陳述他意見的時候，素身邊站着一個執紅拂的女妓，既驚訝靖的儀表，又傾聽他的意見，不覺入神，把靖望了又望，及靖告辭退出，這位執拂女郎，又追蹤出來，叫人問明來客的住址，暗暗記下。李靖回到逆旅，睡到五更，忽然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乃是一位紫衣着帽的少年！靖驚問：

「你是誰呀？」

「妾乃楊家之紅拂妓也！」來人這樣回答。靖連忙把客人請了進來，帽子去掉，外衣脫掉，乃是一個十八九的妙齡女郎，素面畫衣，深深而拜，肌膚儀狀，言辭語氣，真天人也。靖又追問：

「你怎麼跑到我這裡來了呢？」女郎回答：

「我侍候楊司空已經好久了，看見天下的人也真不算少，昨天聽了您一席談話，覺得只有您，才真是我的意中人，所以我下了決心，跑來就您！」

靖且喜且懼，對她說：「楊公權重京師，您不怕有人來追問嗎？」女郎說：「楊公屍居

餘氣，怕他幹嗎？」但靖終覺不安，住了幾天，果然也不見有人追索。於是女郎依然服男子服，乘馬，隨李靖奔太原，助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功封衛公。或曰紅拂姓張，行一。

（最近偶檢「西京雜記」有下面這樣一段，果若是，文君固美不可言也。雜記說：「……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遷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卒，以此疾至死。……」）

## 五、班昭與蔡琰

班昭籍扶風，屬今天的陝西；蔡琰籍陳留，屬今天的河南；本來當她們的時代，中國北方的文化要比南方高得多，這兩位才女都出生在中國的黃河以北，這是無怪其然的。

班昭一名班姬，她是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因此，她自身也就成爲了一個文學家兼史學家。蔡琰字文姬，她是東漢末年一位大文學者蔡邕的女兒，蔡邕是因爲接近董卓而爲王允所害了的；而她的一生，更是極人世之慘痛，她的環境如此，所以她成爲了一個純文學者。

班昭的丈夫名曹世叔，所以她又被稱爲曹大家（讀姑）。班固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深

沒有寫完，便已死了，漢和帝乃詔班昭就東觀的藏書閣，替她的哥哥完成這部偉大的著作，而且叫皇后和諸貴人以師禮待她。漢書出版以後，當時的許多人都看不懂，乃至連馬融這樣的大儒，還伏在閣下向她請教。去今一千八百多年以前，中國的女子便已享着這樣最高的榮譽，誰敢說女子的智慧便一定不及男子呢？

等到和帝死了，鄧太后臨朝，班昭更出入宮禁，與聞政治。因為她的奉職之勤，她的兒子曹成，也就封了一個關內侯，官至齊相。

班昭的著作頗多，但在中國流行了一個很長時期而且具有相當權威的，便是有名的「女誡」七章。以今天教育哲學的眼光來看，「女誡」究竟應該給以一個怎樣的估價？這是另一問題；但我覺得她解釋女子的「四行」，就在今天看來，也還是平易近人，她說：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

大凡一個接觸過西洋和日本高尚家庭的人，他一定會發見他們的婦女，對於班昭所說的「四行」，幾乎是無不講究，而且講究得非常澈底；至於那些都會上的名女人，以及電影上大腿女郎之類，道究竟只是一種病態，而決非正常，假定你一定要說像班昭這種思想實在過於落伍，今天中國的女子，一定要向丁玲史良這類的貨去看齊，而且要把一羣一羣的青年女子趕到大街小巷去歪着屁股扭秧歌，然後才叫着「前進」，那末，老子們便斷然「後退」，讓你們在毛澤東的旗幟之下「前進」好了。

以蔡琰的身世和班昭相比，其榮枯真不可以道里計了。「後漢書」爲她寫的一篇略傳，稱她「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的幼童傳上說：

「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

大概文姬青年時的家庭環境，在蔡邕未死以前，原是很好的。她第一嫁，嫁給河東衛仲道，不久她的丈夫死了，沒有生下兒女，不得已回到娘家，其時她的父親雖還存在，可是天下已經大亂。董卓挾獻帝由洛陽西遷長安，不久董卓爲呂布所殺，蔡邕也就爲卓所牽累而遇害。大致由董卓遷都所引起的大紛亂，正是文姬所親歷的，她描寫說：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  
銘有萬計，不得合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當時董卓的兵，內容原是很複雜的，裏面雜得有南匈奴的「胡騎」，自屬意中事。文姬  
爲這種胡騎所擄得，因此沒入南匈奴左賢王。從此她在胡中住了十二年，被強迫與胡人苟合  
而且生下了兩個兒子，這與蘇武娶胡婦生子，恰好是一個對照。

曹操和蔡邕的私交甚深，他看見蔡邕沒有兒子，乃出金璧把文姬從匈奴贖回中國。文姬  
描寫和她兩個兒子分手的情形說：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  
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在另一首中更說：

「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歸，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側，今何更不慈？我  
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文姬回到中國以後，不勝城郭人民之感，因此她說：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

肺，……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勵厲。……」

所謂「託命於新人」，是因爲她回來以後，再嫁給了一位名叫董祀的屯田都尉。後來董祀犯法當死，文姬又跑到曹操那裏去苦苦哀求，曹操也居然把董祀赦了。曹操問起她父親蔡邕的藏書，她說：原有四千餘卷，經過亂離，已完全喪失，現在她所能記誦的，不過四百餘篇。曹操要派人就她抄寫，她說不必，不久她自己便把這四百餘篇逐一繕寫，送給了曹操。我們看曹操之贖歸文姬和保全文物，其偉大處，真不是今天這般強盜所能想像的哩！

## 六、二喬的故事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杜牧

大凡詩人或小說家，每遇到一種涉及女人的題材，總不免造出許多節外生枝的附會，這大致是無分中外古今，事同一律的。

二喬，陳壽三國志喬本作橋，周瑜傳云：

「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

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孫策和周瑜同年，這個時候他們兩個都只二十四歲。史稱：「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袁術也會歎息着說：「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以上見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這可看出孫策是一個如何可愛的青年了。至於周瑜呢？三國志說：「瑜少壯有姿貌」。又說：「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這便更不難想像他是一個風流倜儻的人物了。

當他們兩個分別娶了橋家這兩位小姑娘以後，「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見裴注引江表傳）。也可看出他們兩個對這件事是如何志得意滿。可是不幸得很，孫策二十六歲便死了，周瑜死較策遲十年，也不過三十六，這兩個青年喪偶的姊妹，後來的歸宿如何，則史無明文，我們也惟有付之歎息罷了。

三國演義的作者運用這個題材是頗具匠心的。原來曹操築「銅雀台」新成，會叫他的兒子曹植做過一篇「登台賦」，演義的作者，以爲在赤壁之戰以前，諸葛亮覺得東吳並無抗曹的決心，他因而將曹植這篇賦改動兩句，把原文改爲「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當面唸給周瑜聽。周瑜一聽，果然以爲曹操豈有此理，孫劉合力破曹之局，因以完成。（按演義所引的這篇賦，內容與分量較「曹子建集」及「魏志」曹植本傳注所引者，大有出入，不知何所本。）實際這只是小說家言，不僅是厚誣了孫權、周瑜、魯肅這班人，乃至把諸葛亮也寫成一個過於淺薄的策士了。但就小說論小說，演義的作者因見「三國志」二喬之喬，本作橋，乃把這篇賦上的「二橋」改過來作「二喬」，究不能不認爲是一種小聰明的表現也。

總而言之，孫策和周瑜娶了橋家的姊妹兩個，自來的詩人詞客多少是不勝其妬羨的，我前面所引杜牧的這首絕句，固然說東風如不給予周郎以方便，這姊妹兩個真有被曹家搶去的危險；即蘇東坡那首有名「赤壁懷古」的「念奴嬌」，又何嘗不說：「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而言外若不勝其艷羨之意呢？因此，我想像橋家姊妹當孫策周瑜的生前死後，一定還有不少關於她們的艷事軼聞，可惜史有關文，我們在今天已無從發現出來作爲談話的資料就是了。

## 七、綠珠與石崇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杜牧

金谷粧成愛細腰，避風台上五銖嬌，身輕好向君前死，一樹穠花到地消。

——吳梅

自來詩人詠綠珠墮樓這一故事的，真是多到不可勝數，其原因便是這個故事實是異常淒艷。元明以來，有不有人把綠珠這個題材寫成傳奇或雜劇的？我記不  
不有人把它寫成劇本的？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如果把有關她的這些材料，好好  
以想像，寫成一個話劇或歌舞劇，甚至構成一部影片，一定是很能動人的。

究竟是石崇因綠珠而傳還是綠珠因石崇而傳，這且不去管它；但石崇因為右  
而綠珠以一個感情熱烈的南方女子，能够反抗強暴，而又死在像金谷園那樣的一  
此相得益彰，使得他們兩個都成了歷史上活生生的人物，却是事實。

石崇是渤海南皮人。他的父親石苞，是晉朝的開國功臣之一，石崇是他六個  
的一個，因此他號季倫。石季倫這個名字，在中國的若干文學作品上，要比石崇  
為常見。

史稱石苞「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見晉書石苞傳）石崇的性格，大概和他父親的遺傳是有關係的。

綠珠姓梁，博白人，這個地方本來以產珠著名，因此生的小孩子，女的往往叫珠娘，男的往往叫珠兒，綠珠之名，便是由此而來的。

石崇因為家庭的關係，從二十幾歲起，便開始作官，綠珠便是他做交趾採訪使的時候以珍珠三斛換來的。石崇有一座有名的別墅，在河南的金谷澗，因名金谷園，窮極侈麗，既得綠珠，便把她藏在這個園子裡面。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漢明妃名王嬙字昭君者也，後人憐其遠嫁異族，作此曲以哀之，石崇則把這個曲子叫綠珠歌唱，又自製新歌曰：

「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泣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加我單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賁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且慚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讀此，我們可以想像綠珠入金谷以後的生活一斑，亦可藉此窺見石崇斐然之文采也。

石崇是晉初的豪門之一，爲人「穎悟有才氣，而在俠無行檢。」當他做夔州刺史的時候因劫奪遠使，沉殺客商，以致巨富。「世說新語」和「晉書」本傳，記載他豪華奢侈的事實甚多。拿它與現在有錢人的生活相比較，自然也算不了什麼，可是在當時確也駭人聽聞，現在姑舉幾條在下面，以見其概：

一、王愷是王肅的兒子，晉武帝的舅舅，因爲他要和石崇以豪富相誇衒，武帝便每每幫助王愷。某次，武帝賜愷一株高三尺的珊瑚樹，枝柯扶疏，世罕其比；王愷心想：這一下總可把石崇壓倒了吧？可是送給石崇去看，崇乃以鐵如意一下把它打碎，王愷覺得太可惜，還以爲石崇是嫉妬他，正鬧得聲色俱厲，石崇乃叫左右把他所藏的珊瑚樹搬出六七株，王愷一看，覺得比他的更好，更高，乃感到非常慚愧。

二、又史稱：「愷以枳蠹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

三、樂史「綠珠傳」，說石崇蓄「美艷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同視之，不稍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繫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

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石崇過着這樣一種奢侈糜爛的生活，却也有他的一種人生觀：「晉史」上說他一次和王敦同入太學，看見顏回原憲的象（孔子兩個最窮的學生），他便歎道：「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意思是說，他也儘可趕得他們上）。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蹇牖哉？」他的意思是說，一個人既要享大名，又要生活過得很舒適。以他這種態度，處在那樣的亂世，更遇着趙王倫和孫秀那樣的亂人，其召致殺身之禍，本來大有可能，而穿插上綠珠這樣一個故事，也就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

當孫秀派人到金谷園指索綠珠的時候，石崇堅執不予，來人對他說：「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石崇依然不聽。於是孫秀乃勸趙王倫殺崇，石崇也自知不免，因與歐陽建潘岳密謀，被孫秀知道了，因派人收捕崇與歐潘，皆棄市。當收捕的人到金谷園的時候，石崇正在樓上歡宴，因對綠珠說：「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石崇以爲他的罪狀，至多不過流徙交廣而已，及以車載赴東市，才發覺因爲貪他的家財，乃更非要他的性命不可。

石崇死的時候年五十二，死後清算他的家產，計有水田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其他

珍寶、貨賄、田宅稱是，「謾藏誨盜」，「多藏厚亡」，這大致無間古今，都是這麼一回事啊！

## 八、江采蘋

江采蘋，福建莆田人，論到中國的女性美，本來以福建的平均分數最高，能產生一個像江采蘋這樣的美人，當然是一點也不稀奇的。

在楊玉環未入宮以前，據說唐玄宗所最寵愛的一個妃子，便是江采蘋。采蘋善屬文，以謝女自比，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因為平日最歡喜梅花，玄宗每呼她「梅妃」；在最親密的時候，也偶然叫她「梅精」。

玉環雖生於四川，但實際却是北地胭脂，豐碩修整，擅舞，能歌，而且能自作譜；又長擊磬，為梨園之妓所不及，琵琶更妙絕一時。

玄宗自從有了楊妃，對梅妃的愛，便漸漸為她所奪；玄宗原也沒有要與梅妃完全疏遠的意思，可是禁不起楊妃的媚與妬，不得已才把梅妃遷到上陽東宮去住了。

有一次，玄宗秘密叫小黃門把梅妃召到翠華西閣侍寢，至日出仍未視朝，為楊妃所知，

乃親自跑去，當面和玄宗搶白了一頓。梅妃雖被玄宗抱起藏在夾牆中躲過，可是從此被屏，雖想和玄宗見面也沒有可能了。

梅妃住在上陽東宮，自作「東樓賦」以寫幽怨，警句有云：

「……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舫之仙舟。君情繾綣，深致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以日月而無休。……」

雖然不是怎樣了不起的文字，可是很像女子的吐屬，大致總不是後人所假托的吧。據說楊見了這篇賦，便說她怨望，要求玄宗把她賜死，但玄宗究竟沒有執行。

某次，夷使來貢，玄宗命封珍珠一斛，秘密賜給梅妃，妃不受，作小詩一首，囑使者代呈玄宗，詩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安祿山反，玄宗偕楊妃西幸，以軍士譁變，楊妃死於馬嵬；等到事平東歸，梅妃也早死於亂兵之手，後來於溫泉傍邊的梅樹下，掘得其屍，頸下刀痕宛在，乃改用妃禮把她葬了。

楊妃因為牽涉到一種政治關係，而且她的家庭因她之故，也弄得聲勢煊赫，再加上幾位

姊妹穿插其間，因此無論正史、野史的敘述，或詩人所詠歎，關於楊妃一方面的，乃異常詳盡，而梅妃則很少有人提及。可是我們把「太真外傳」、「長恨歌傳」和「梅妃傳」這類的材料比照一看，便可看出她們兩位才情性格，顯有不同，究竟誰美於誰？大概也是很難判斷的啊！

### 九、才女李清照（1081—1140？）

在宋朝南渡的前後，中國山東的濟南一地，產生了中國文學史上兩個最偉大的詞人，前者爲李易安（清照），後者爲辛幼安（棄疾）（1149—1207）。易安的「漱玉詞」，流傳到現在的，不過五十首左右；幼安的「稼軒詞」在數量上雖十倍於她，可是我們要從藝術的見地去強分軒輊，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事實上也無此必要吧。

易安的父親名格非，「工於詞章，陵轍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見宋史本傳）她的母親是狀元王拱辰的孫女，也能文章。易安有這樣的家世，對她文學造詣上的影響，自然是很大的。



易安二十歲，嫁給太學生趙明誠（字德甫，山東諸城人）。趙明誠雖是宰相趙挺之的兒子，可是他並沒有普通純樸子弟的習氣；自己會做過幾任官，但也仍能保持一個讀書人的本色。他會以所藏三代彝器和漢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著有「金石錄」三十卷。易安在「金石錄」後序裡敘述他們夫婦那種讀書和賞鑑的生活，真是令人艷羨：

「……每獲一書，則共同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子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

又俞正燮在他所寫的「易安居士事輯」裡，敘述易安夫婦間一個有趣的故事說：「（易安）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思勝之，謝客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句，縱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誦再三曰：『有三句乃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正易安作也。」

這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我們看她的自述，和所流傳的這類故事，可想像她的家庭生活是非常良好，而這種環境對她文學修養上之大有幫助，當然是更不待言的。

易安不僅以詞名，而且能詩能文，也能畫（宋濂「學士集」說明人陳查良藏有她的「琵琶行圖」，「太平清話」說莫廷韓買得她的墨竹一幅），不過都為詞名所掩罷了。

易安和趙明誠結婚，在一一〇一，而他們舉家南渡，則在建炎丁未（一一二七）。他們這次到南方來避亂是相當倉卒的，因此所藏的書畫古器，只好大部拋棄在他們的青州故居，可是攜帶到南方來的精華，也還有一十五車，可見依然不少。不幸南來後只有兩年，即建炎己酉的八月（一一二九），她的丈夫便死了，其時她已經四十九歲，度過二十八年的結婚生活，從此便一直寡居，而且並無子女。我們所知道她最後十幾年的生活，是非常淒涼的：她奔走於台州、溫州、越州、杭州一帶，大致在六十以後，便死在金華；所攜帶南來的古物，在流離中也陸續散失；國家受着異族的蹂躪，家室也弄得殘破不完，其給予我們這位詞人的影響，是不難於她的字裡行間看出的。

她為她丈夫寫「金石錄後序」，在紹興壬子（一一三二，即明誠死後的三年）其時她已五十二，其文字已够淒苦；次年癸丑五月，她有「上樞密韓公工部尚書胡公」的兩首詩，在

給胡松年的一首裡說：「趙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時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成雨，子孫南渡今幾年，漂零遂與流人伍！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這便更令人不忍卒讀了。在她的詞裡有一首「武陵春」，一首「御街行」，我們顯然可以看出是她的悼亡之作，這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御街行）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香煙斷玉砧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

小風疏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有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在她五十二歲寫「金石錄後序」的時候，尙自稱「易安室」；五十三歲做詩的時候，尙自稱「趙家」；到她晚年住在金華的時候填詞，還在念念她死去的丈夫不已（上面武陵春一首裏面的雙溪，便在金華）；甚至到她六十一歲的時候，還有人稱她爲「趙令人李」（見俞正燮所說謝伋「四六談塵」的自序）；可是却有人一定要栽誣，說她晚年改嫁了張汝舟！本

來在今天看來，一個女子的丈夫死了，另外改嫁一個人，原算不了什麼，可是在當時却不失爲一種誣蔑他人有力的武器，何況被誣的是一位名士的妻子，一位名門的閨秀，更是一位才氣無雙的才女呢？自己不努力，却偏偏嫉妬別人努力，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劣根性，俞正燮、李慈銘、胡適之幾位，對易安被誣改嫁的這事件，不斷的有所辯正，我覺得這是很應該的。

「南來尚怯吳江冷，北去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在易安的詩裏，有着這樣的句子，可見她對當時南渡的人物，批評是相當嚴格的。本來在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對於女子往往是要想方法設計去加以陷害的，何況易安的態度又是這樣咄咄逼人，其足以召人之忌，更何待說！

談到詞的起源，這也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但說北宋是詞的一個開花結果的時代，大致便不會有什麼異議。可是易安對於北宋若干有名的詞人，却給了不少的指摘：

「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

尊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稼軒詞」幸而晚出，否則恐怕也是逃不了她的批評的。幼安有一首「醜奴兒近」，標題是「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這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千峯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却怪白鷗，着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莫是別有說話？」

「稼軒詞」比之「漱玉詞」儘管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格調，但易安的作品爲幼安所愛讀，且進而摩擬之，不能不說是詞壇的佳話了。

詞之美者，在能寫難寫之景而豁人耳目，能狀難狀之情而沁人心脾；能守繩墨而不覺勉強，能放手鋪敘而又無半點火氣；在一首詞中，把這些條件能一一顧到的，我們終不能不推易安這首「聲聲慢」爲出色當行之作：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在這樣一個短短的篇什中，能連用十八個疊字，說它是千古絕唱，誠然是不錯的；可是假如我們能體會出她當時那一種尋尋覓覓的心情，則能一氣貫注的流走下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 「中國近代史四講」序

這部書是我近九年來在香港兩處大專級學校講中國近代史的一種講義。

普通講中國近代史的，大率從鴉片戰爭講起，迄民國以來為止。我覺得這一段時間雖不算太長，而必須詳細講明的大事太多；學校對這門功課的規定，授課時間共為兩個學期，少者每週兩節，多者三節，每節僅四十五至五十分鐘不等；而香港的學校除例假外，又有公共假期及各種紀念或慶祝的放假，因此，為學生們上課的時間實在不夠。

假定我們把這一百多年間的大事，依先後次序逐一的講下去，這會近於一篇流水賬，看

來應有盡有，實際按之無物，可能引不起聽者的興趣，講者的責任感也未免過於輕鬆。

我會這樣的想過，也會在大陸的復旦大學和中央政校這樣的嘗試過：如果要把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其勢必須對西力東漸的經過也要有所說明。要把太平天國十五年的歷史，講得生動活潑，使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便必須對會、胡、左、李以及洪、楊、石、李這班人的行事說得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其成敗得失之故，也能使聽者心領神會。此外，還要把與太平天國一募有關的捻亂經過附帶的加以敘述。更進一步，自同治初年迄中日甲午戰前約三十年間的「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其弱點正是召致甲申中法、甲午中日兩役失敗的原因，同時也就是後來政治和文教改革運動的前奏，確實非常重要，也使學生們知道一個大概不可。不過要這樣講，單只這一史程的前段，就花上一學年的時間也不見得怎樣充裕，這當然不是現在的大學課程所許可的。

我因為深切感到這種困難，近年在香港乃只講「甲午戰爭」、「戊戌維新」、「庚子拳變」以及「辛亥革命」這四大段。我所持的理由如下：第一、中國真正的政治和文教改革運動，確實是甲午戰後才逐漸起來的。第二、儘管我的講稿主題僅從甲午開始，但要追溯這四件大事的根源，則自江寧條約訂立以來的若干事實，仍不能不有所涉及，這不僅我在口頭上



的講述如此，即在這部講義文字的表現也是如此。第三、現在各大學的必修科，另有中國通史，通史的講法如何我不大清楚，但我相信自五口通商，迄甲午戰敗的經過，也一定會要講到，因此，像我這樣一種的講法，對聽講的人也不見得會有甚麼不能連貫之處。

至於進入中華民國的這半個世紀，當然可以劃入現代史的範圍，應由各大學另開課程講授，不過目前却不容易講得好就是了。最多在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為止，還可理出一個眉目，過此以往，則事實繁複，是非顛倒，恩怨尚存，主觀難免。比較可靠的史料還有待於繼續出現；搜集整理這類史料的機構，還有待於擴大充實；這決不是憑少數私人的力量所能勝任愉快的。一個理想的中華民國國史館，必須超出於一切黨派與政治力量之外，讓一部分的純粹學人專力圖之；研究編寫的機構，也必須集合若干志同道合又確有研究的朋友們來分工合作；否則決不會有一部真正可靠的信史出現，則有也不過一種無聊的宣傳品而已，如何能信今傳後？當前的現象，不僅國家已陷於存亡絕續之交，即國史也有中斷的危險，這確實是有人最感到怵目驚心的一件大事。

我這部簡陋的講義是一面編寫，一面發表，發給學生們作爲他們聽講後整理筆記的參考用的；其目的在使他們知道清代之所亡，與民國之所以興，而禍根所伏，已貽害及於今日。

每月約寫一萬字，前後延續了兩年半的時間，寫完後加以訂正補充，又花去工夫不少，但限於學力，所鑑別的史料不一定正確，錯誤及敘述不妥之處一定很多，我惟有希望對這方面有專精研究的朋友們，不吝給我以嚴格的指正，這確實是我衷心所期待的。

友聯出版社給我印行這部書的機會，我也必須在這裏表示深切的謝意。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時在香港。

## 談風度——紀念黃膺白先生

我認識膺白先生很遲，僅僅是在他去世前兩年的事，并且前後一共只談過四次，所以我不敢說，我對膺白先生之為人，和他對政治上的懷抱，有什麼透關的了解。

可是，我和他第一次在莫千山見面，便有過六小時的談話。在這六小時中，他足足談了四小時，從他留學日本參與革命談起，一直談到塘沽協定為止。他這二十幾年的政治生活，和他處理一切政治問題的手腕或方法，實在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并且，使我對民國以來的這一段歷史，多了一番親切的理解。最後他對我說：「舜生先生，一個人總要能夠獨來獨

往，所謂羣衆，所謂政治團體，都是靠不住的。」這幾句話，更促起我特別的注意。

我平日對於「從事政治」，有一種特別的看法。我總覺得是「小人因緣以爲利，君子不得已而爲之」。這裏的所謂「小人」便是「政客」。所謂「君子」便是「政治家」。政客是吃政治飯的，所以「知進而不知退」，政治家是爲一種意義或主張而幹政治的，所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膺白先生在這二十幾年中實際參加政治的時候較短，退而從事修養與研究的時間反而較多，從這一點上看去，我覺得膺白先生實在是有着一種政治家的風度。

在一個國家，尤其是像今日中國這樣的國家，一方面固然要有人從正面去苦幹，一方面還要有人從側面去冷靜的思考。由這種思考所得的結果，或憑藉其人在社會上的資望，或以某種私人的因緣，往往在無形中能對國家有莫大的貢獻。膺白先生這二十幾年在政治上的成績，一小部份是人所共知的，一大部份是人所不知，或知而不詳的。可是估量其價值，後者却反在前者之上。說到這裏，不禁引起我一種感慨。我覺得在近十年的政局中，有重要的關係與作用，此時不應死，而畢竟死去的，一共有三個人。一位是譚組菴先生，一位是楊暢卿先生，一位便是膺白先生。組菴先生絕頂聰明，而態度沖淡，處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往往能泯除不少無謂的紛爭，使政局趨於穩定。暢卿先生態度積極，其關於政治的規劃，也

許有若干方面失之稍粗，但其敢作敢爲的精神，却能給予我們一種建設國家的興奮。至於臍白先生則對中國政局不但有全盤的了解，并能一一明其關鍵之所在，故對近年若干的事變，或補救於無形，或挽救於垂敗，而對是非毀譽，更不求諒於一時的庸俗。其襟懷，其風度，我尤其覺得是難能可貴。

目前一般淺薄者流，多對時局抱着一種過分樂觀的見解，好像從此可以平安無事。但據我觀察，眼前的風平浪靜，也許正是狂飈巨浪快要襲來的前夕。所不幸的，便是在這樣一個風雨漏舟的情形之下，我們乃驟然失去了像臍白先生這樣一個熟悉航線、明白暗礁的舵手，真是國家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

（原載黃臍白先生故舊感憶錄）



## 中國能抄襲蘇聯嗎？

中共決定「一邊倒」，他們叫得最響的口號是：「向蘇聯看齊」、「向蘇聯學習」，最近因為斯太林的七十生日，更把整個的中國，鬧得烏煙瘴氣。我們在孩子時代，也曾看見過一次滿清慈禧太后的七十「萬壽」，當時一般滿清的王公親貴官僚奴才，其對他們主子的忠誠，實在沒有今天中共對斯太林這樣熱烈。斯太林在蘇聯的地位，本來早已超過了帝王時代的沙皇，但他自己却沒有想到他在中國的地位，更超過了一個統治了中國二百八十年的異族的女主！自孫中山以來，中國革了五六十年的命，到今天只落得這樣一個下場，能不令人浩

中國能抄襲蘇聯嗎？

歎？然而這還是「一邊倒」的開始，將來會演變到怎樣一種程度，更不可知！

好，閑話暫且不提，我們姑且來檢討所謂學習蘇聯，究竟有不有這種可能性？

爲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試就中俄兩國的國情，作一簡單的比較研究：

第一、中俄兩國在革命以前，雖同是一種君主專制，可是中國的專制並沒有帝俄時代的沙皇那樣澈底。當時中國的老百姓所謂士農工商，除掉士的一個階層因爲要做官要應考試不能不與政府發生關係外，其他農工商各階層的人民，除了完糧納稅，可以說政府在原則上是不去擾他們，他們對於政府也是絕不理會的。中國有兩句俗話：「天高皇帝遠」、「一品老百姓」，從這兩句話裏面，我們可以十足看出中國過去政治的一種放任精神。孫中山曾說：「中國人民不是沒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這個話在某一意義上是不爲無見的。中國近代既沒有像沙皇那樣絕對專制的君主，更老早沒有貴族而兼大地主的一個階層，當然更沒有像農奴那樣的一種殘酷制度。這些情形說它不好，便是中國社會散漫無組織的原因，說它好，便是中國人民還能保持一種自動自發的生氣。例如各國的殖民，必先之以武力的開拓，繼之以政府的保護，然後人民才敢於向國外遷居，中國若干萬的華僑，却完全是由於自動。像這樣一種被放任慣了的人民，驟然要來對他們實行一種凡事干涉凡事統制的極權政治，這是不



是會要引起人民一種極端的厭惡而終於碰壁？

第二、帝俄自十八世紀下半期以來，即已世為歐洲強國，只看見她去侵略別人，很少看見別人去侵略她。單就中國這兩百年來在北方被她所掠奪去的土地便不知有若干千萬方里。再加以近百年來中國更歷受列強的侵凌，以致淪於次殖民地的境地，因之中國在國際上許多複雜而微妙的關係，絕不是俄國那樣的單純可比。今天中共還一聲不響的讓蘇聯保有旅大，更引導蘇聯的勢力向東北，向華北無限制的伸張，而口口聲聲却要把英美等國勢力排出於中國以外，甚至就在中國的鄰近地帶也不許他們立足，說這樣決不會引起國際的衝突，甚至爆發戰爭，有什麼人敢提出這種保證？蘇聯建國的初期，也曾遭遇過國際的武力干涉，我們在當時並沒有聽見列寧或斯大林叫出什麼「一邊倒」的口號，卒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外來的干涉一一排而去之，這正是蘇聯值得學習的地方，而中共却偏偏不學，一定要「一邊倒」，所謂「一邊倒」者，即自己毫無自立自衛的信念，一切不能不仰仗他人，即此一點，不已足夠證明中蘇兩國的國情，確有顯著的差別，決不是貿然可以抄襲得來的麼？

第三、歐俄對於現代歐洲的科學文化，畢竟是近水樓台，在彼得大帝的統治期間（1682—1725），即已開始大量的輸入，我們只要看1763年，俄國便有第一所現代的大學出現，

只要看列寧放逐在西伯利亞的時期，居然能輾轉從政府機關借得可靠的統計數字，作為他研究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參考，不巳足夠證明蘇聯所憑藉的現代文化基礎，實遠較中國所有的人為堅實？中國與西洋文化的接觸，雖已有了較長的歷史，可是確實感到科學研究的需要，却還是很近的事，加以自入民國以來，又不斷的為內亂與外患所苦，若干研究科學的機構和設備，更是貧弱得可憐，今日國內對科學真有高深研究的人，固然是鳳毛麟角，至於一般後進的青年，更叫他們到何處去找得學習研究的環境？不錯，蘇聯戰前戰後四個五年計劃，確實造出了許多輝煌的成績，可是他們究竟憑藉了一個較良好的基礎，我們今天則並此基礎而無之，難道叫出許多口號，提出若干計劃，甚至多找幾個顧問，多雇幾個專家，便可把幻想的海市蜃樓，一一變成真實的崇樓峻閣嗎？

第四、一個國家要樹立一種極權政制，必須具有兩個起碼的條件：其一、有一個傑出而有絕對權威的領袖高高在上；其二、有一大羣守法而絕對服從的人民蠢蠢在下；像過去的德日和今天的蘇聯，他們大抵去封建不遠，人民的奴性甚深，所以他們還能樹立這種極權制於一時，可是因時代的推移、環境的變化，遲早終必歸於傾覆。因為這畢竟是人類進化史的回光返照，是一個主流中可能有的逆流，聽憑你如何煊赫一時，終必返於常態。中國人有一種

奇怪的習慣：他們對於一個成功的英雄，往往不樂於崇拜，乃傾其無限的同情於一切失敗的人物。例如漢武帝、魏武帝、唐太宗之流，不問是歷史家文學家，對他們都有不少的微辭，而對項羽、關羽、岳飛，乃至文天祥、史可法之流，却表示非常的敬意，甚至於頂禮膜拜。這種地方都表現一個傑出的領袖人物在中國這個社會不容易站得住，假如你還要變本加厲，憑藉自己的權威來厲行專制，那老百姓便會把你看成惡魔，非千方百計把你打倒不止。這還是就對上層的領導人物而言，至於在一般普通的社會，則凡是愛出風頭歡喜表現的人物，大抵都是人所討厭的；凡是平凡樸素、埋頭苦幹的人物，便是人所稱道的。中國實際的情形如此，你想要拿各色各樣的勳章去鼓勵，拿各色各樣的英雄頭銜去誘導，在中國人視之，總覺得這是非常滑稽，根本不在他們的眼下。至於談到中國人服從守法的精神，那就更難說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弔兒郎當」，不負責任；中國的官吏或公務員，最擅長的本領便是「偷天換日」、「陽奉陰違」；至於平日我們在社會上所常看見，不是某人會佔便宜，就是某人巧於趨避；以迎合潮流為時髦，以看風轉舵為俊傑；一個奉公守法的人，可能被社會看成落伍；一個孤忠耿耿的人，可以被社會看成瘋子。像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種人民來推行極權政治，以為令行禁止，立刻可以變朽腐為神奇，我看不見得吧！

只有沿襲中國政治上放任的精神，把人民誘導入寶愛自由的正常軌道，再加以二十年的民主教育，去加強他們那種自動自發的本能，才庶幾可以使他們懂得守法奉公、效忠羣衆。不從這個基本上着眼，只一味高叫去向別人學習，中國也會學過日本，學過德國，學過英、美，今天又掉轉頭來學蘇聯，學，學，學，學不像又怎樣呢？

（原載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六日自由中國二卷二期）

## 我對於今後教育的一點看法

最近有關於台北的兩項教育新聞：其一、據說有外國人在台北所設的一所學校，開辦已有相當的時間，中國人遣送子弟入該校肄業者亦復不少，但地方教育當局對於該校設立的情況，事前並無所知。其二、最近政府教育當局，已表示可允許基督教中國大學聯合委員會在臺灣設立一個教會大學，但希望完全按照中國教育部所訂關於設立大學的法規辦理。

這兩件事的詳細情形我們不明白，不願說話，我只想對今後辦理教育的方針，表示個人一點意見。

我在原則上不贊成政府對教育多作不必要的干涉；基於宗教的信仰自由，我覺得任何一個教會，應該可以接受該宗教信仰者的要求，自設學校去教育他們子弟；基於講學自由，如果僅僅以學術性質為限，各大學必須保持一種高度的自由空氣，政府不應隨時給予他們一種麻煩；鑑於過去黨化教育的澈底失敗，以及中共在大陸種種的胡鬧，我覺得教育機關總以隔離現實政治愈遠愈好，在大學中，尤其不應有任何黨派性質的組織，正式的黨團更不用說，但這與政治學術及政治問題的研究，自屬判然兩事；更鑑於中國土地的遼闊，民族與宗教的情形相當複雜，過去政府那種一道同風的規定，以及教科書的劃一編訂，實在並不理想，將來也應該重新釐訂。

照中國的歷史看，中國自來是一個自由講學之風最盛的國家，孔子便是一個自由講學的首唱者，以他的成就，豈是今日區區一個大學所能比擬？在孔子以後，無論任何一個時代，也往往有若千的老師宿儒，維持這種自由講學之風於不墜；在當時如果政府對於這種私人講學不加干涉，或不使之牽入實際政治，便往往能使這一時代的學術趨於昌明，否則，即引起若干無謂的紛擾。今天是時移世易，學術內容起了很大的變化，以前那種私人講學的辦法，幾乎已陷於不可能，但我覺得這種精神，依然值得我們重視。

以最近五六十年之新教育而論，我覺得清末那種私人辦學的風氣，實在有助於中國的進步不小，以我個人所知道的來說，當時湖南、江蘇、浙江等省私立學校的發達，實為全國之冠，而且成績大抵優良，辦學者的精神也至足令人感佩，假定當時的政府不予放任，隨時加以不必要的干涉，恐怕一般中國人的教育水準求如今天也不可得。

一想到大陸收回以後的教育問題，尤其使我感到不安，我覺得除掉特別獎勵私人辦學以外，很難使中國教育界的元氣逐漸恢復。

往年的風氣，政府總是偏重集權，好像任何事都要由政府來集中辦理，實際則成績並無可觀，尤其教育更是毛病百出，例如教育經費的短絀，教師待遇的不良，學潮的隨時爆發，所謂「索薪運動」、「反饑餓運動」種種的層見迭出。何嘗不與這一套勉強的辦法有甚麼深的關係？因此，我覺得今後政府教育的態度，對下舉各點應特別加以注意：

一、政府只能做它所能做的，竭力避免它所不能做的，例如教育宗旨的標明，學制的釐訂，辦學成績的考核，對優良學校的獎勵，留學政策的改善等，這可能是政府所能做所應做的，但仍須尊重全國教育家的意見，對全國教育會的決議多予尊重，私心自用，閉門造車，也還是不可以的。

二、發展教育的重點，應該擺在地方，政府最多只能對各地教育經費以及推行教育的進度等方面予以調節，什麼大學都要使它戴上一頂「國立」的帽子，大可不必。即關於中小學師資的培養，政府也祇能提出意見，決不能以一種不合當地情況的辦法，強全國以從同。大抵在提高的一面，政府應負的責任較多；在普及的一面，地方應負的責任較大。

三、在「五四」以後，我和一部分的朋友，曾對教會教育加以嚴厲的批評，由今思之，也覺得有不少的地方過分，平心而論，教會教育對中國是利害參半的，今後仍當聽其存在，不過應使中國的教育者多有參與的機會，而不能聽其過度的自爲風氣就是了。

四、應該獎勵扶助私人興學，獎勵一類好的學校，應該多於取締一類壞的學校，當然也應該取締一部分藉辦學以牟利的行爲。

五、我希望黨化教育這一名詞與事實，今後永遠不復在中國出現，它是中國人精神上製造糾紛的一大根源。今後對於內學中學校長的任用，應以學術資望爲準，決不能以某種黨籍爲限。

六、學校教育外一切學術性的設施，政府應以大力提倡，並促其普遍的實現。對私人組織的學術團體或機構，亦不應加以歧視。



## 培養政治的新機與活力

### 一、一個古老的故事

孔老先生有一位長於文學姓名優的學生，做了魯國一個名叫武城縣的縣長，老先生很歡喜這個學生，他雖是做官去了，老先生依然對他十分的關切，尤其注意他能不能把平日所學的，多少表現到他的行政工作方面去。

有一天，言偃來看老師，問過老師的安好以後，老先生便叫他坐下，問了許多武城地方

的情形，談到最後，老先生問他：

「您到武城已經有不少的時候了，您也發見什麼人才沒有呢？」

言偃回答：「武城這個地方很小，人才不算太多，但有一位姓澹台名滅明，字子羽的，看樣子有些古怪，但其人剛方正直，半點不肯苟且，他雖在我衙門裏辦事，可是除掉因為處理公事不能不找我以外，他從來不到我面前說一句私話！據說他還有一個怪脾氣，走路一定要走大路，叫他少走幾步抄一條捷徑他是不幹的！」

老先生聽了，點點頭，沒有說什麼。

有一天，老先生起得很早，一看天氣晴朗，忽然心血來潮，便對他的學生提議說：

「言偃自從上次來過以後，又有好久不會來了，他在武城這樣忙，究竟在幹些什麼呢？我們今天到那兒去看看好不好？」

學生們聽見老師要放假，大家都高興極了，有幾個平日注意地方政治的，就要求同去，好藉此見習見習。老先生欣然同意，便叫備好兩部車子，帶着六七個學生一直向武城進發。剛到中午，便已到達武城縣境，言縣長得着消息，知道老師帶着幾位同學，前來參觀，連忙整肅衣冠，出城郊迎，在老師車前行了禮，又和同學們打了招呼，便登上老師的車子，陪老

師同坐。老先生一面和這位縣長學生談天，一面觀看路邊的光景；見田野盡闢，溝水甚清，道路兩傍，已居然種了不少的樹木，田下的農夫，正在忙忙碌碌的工作，有不少的婦女和小孩，手裏都挽着一個籃子，像是剛好送飯回來，身上的衣服，倒也相當整潔。老先生看見這種情形，心下着實歡喜。車子走近城邊，人烟已漸見稠密，忽然聽見一派的弦歌之聲；路上行人，看見縣長陪同這一羣貴客下車，便都佇立兩傍，表示一種親切而又自然的禮貌；老先生更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

一進衙門，看見辦事的人員並沒有幾個，可是一切一切都井井有條，老先生剛一坐下，言縣長和同來的幾位同學，便都圍了攏來，老先生滿面笑容，開始說話了：

「偃，您在這樣一個小地方，便當真的在這裏這樣大幹嗎？這豈不等於拿着一把殺牛的刀子在這裏割雞？」

言偃一聽，心下着實胡塗了，便質問老師說：

「老師，您平日不是對我們說，一個幹政治的人，第一便是要使老百姓有工作、有飯吃嗎？等到他們的生活過得去了，便必須加以教育嗎？您不還說過，一個幹政治的人必須受過良好的教育，才會懂得愛護老百姓，老百姓也必須受過教育才會懂得和政府去合作嗎？學生

在這裏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着老師所教的辦理，老師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

老先生一聽，便知道剛才的話說錯了，連忙加以糾正：

「同學們，武城的所見所聞實在使得我高興極了，我因為抑止不了我這種歡喜的心情，所以說了剛才的幾句戲言，實際講來，偃的話才真是對的哩！」

## 二、政治何以缺少活力

我平日注意民國以來的政治，總常常感覺缺少一種新機，也可以說缺少一種活力，演變復演變，才把今天的整個中國大陸，變成了這樣一個魔窟。細細研究起來，自然原因是很多的，但我覺得這幾十年的教育不會辦好，而從政者又大抵不把學問看得很重，實在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本來是清代遺留下來的一個「遺少」，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已經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了。我常常把我在童年時代所受的教育和現在我自己的孩子們所受的去比較，我總覺得他們並不如我那樣有福氣，至少至少，我知道他們的先生們決不如我的先生們那樣認真，也決不如我的先生們那樣有學問。以當時我故鄉長沙的地方官而論，我現在願意舉出他們的名字，有陳寶箴、趙爾巽、黃公度、江標、徐仁鑄、俞明震、吳慶砥，……這般人，

我後來長大了，也還偶然看見他們的名字，知道他們都是一些讀過書的人，至於當時地方有學問的紳士，更不可一二數。入民國以後，情形確實一天天不同，軍閥不必說了，就不是軍閥，也大率是一班與中國文化生不起任何關係的人物。他們從政的門路，既不是由讀書研究學問而來，一旦做了官，當然更不談學問了。

### 三、國民需要好好教育

記得我在六七歲的時候，有一位親戚在湖南做糧道，這位老先生已經是七十左右的人了，他雖然也有著作，但不是以學問著稱的。記得有一次，我偶然到他衙門裏去玩，不知如何跑到這位老先生一間在花園裏邊的書房附近去了，我張眼向他玻璃窗子裏邊一望，看見這位老先生鬚髮如銀，在燈光下正拿着一本洋版書在那裏細看，我連忙走開，看見他房外裝着玻璃的書櫃，總以數十計，裏面的書籍都擺得整整齊齊，何止萬卷，這實在給了我一個至今不能忘記的印象！

民國以來，尤其到了現在，一班讀書人，在從政者的眼中，似乎都變成了臭狗矢，或者是奴才，甚至還要教這班人向他去學習去看齊，他們不僅要作之君，還要作之師，例如今

的毛澤東。從政的人既不要讀書，從了政更不要讀書，他們自己胡鬧，又率全國人而胡鬧，於是乎鬧來鬧去，乃把一個中國鬧成如今天的這種景象！

要培養中國政治的新機與活力，無疑的，還是要好好的教育我們的國民，使中國成爲一個有學之國；要使中國成爲一個有學之國，則一切搞政治的人物，總以「不讀書的好漢」愈少愈好，否則，共產黨便還是要胡鬧下去的，一直把中國鬧完爲止！

## 反攻準備的要點

整個時局只能緩緩的發展，任何方面想快也快不來，因為未來的一次大決鬥，不僅可能有若干的國家又要發生重大的變化，更可能是全體人類的一大浩劫，大家不願掉以輕心，必需澄心靜慮作制勝條件的充分準備，這是勢所必至而理有固然的。

台灣反攻大陸，儘管影響可及於全局，行動總還是局部的行動，但中國的命運將由這一戰來決定，却是了無疑義，因此，我也同樣希望不要掉以輕心，而必須大家澄心靜慮的加以思索。

很顯然，反攻大陸決不只是一個軍事條件，最多軍事不過是主要的條件之一，此外，則有政治的、經濟的、思想文化的、外援的運用與配合、收拾大陸的方針與逐漸實施的先後緩急，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則為人才的儲備與爭取。

最近兩年，美國的文武大員，前往台灣觀光的確實不少，他們對於台灣的軍事與生產事業乃至地方的一般情況，大抵多讚美之辭，即小有批評，也大抵偏於善意而決無惡意，惟有對於政治則保持沈默，這個態度與馬歇爾來中國的時候迥然不同；艾克登台伊始，也曾表示美國對一切盟邦的政制選擇，絕無強其必與美國從同之意；這樣一種姿態，決不是表示美國對一切盟邦的政制即已完全滿意，而只是表示多為盟邦保留自我努力的餘地，而不願越俎代庖，實際美國也無能為力。日本人自命對亞洲情況的瞭解，遠在美國之上，這一點我們也相對的承認。本月六日，合衆社把東京「讀賣新聞」一篇有關台灣政治的社論要旨，以電訊報導於世界各方，其主旨在說明「自由中國的反攻大陸，必須有克服中共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且說：「國民黨過去的失敗，不盡由於軍事，實由其壟斷政策而使中國人民厭戰」。今後真要反攻，「便應準備一足以號召中國人心的政治機構」。這篇文章是在日本的報紙上發表而通過一家美國通訊社以傳播出來的。香港有兩種可以進入台灣的報紙，對這個消息均略而



未登，我想台灣當地報紙當然更不會有機會登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據我看，這個問題始終是當前的基本問題之一，而且是反攻成敗的一個主要關鍵，我們只能勝，不能敗，因此我不能不期待當局，對這個問題有一次明白朗爽她表示，而且，不能徒托空言！

經濟條件的健全，不只在準備期間有此需要，在反攻的過程中乃更有此迫切的需要，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用不着我們多說，但有一點也必須申述的，即外援雖不可少，然不能專靠外援，自身也必得想辦法，以良好的政治條件，贏得海內外人民的一致支持，便也是充實經濟條件的辦法之一。

關於思想文化與人才的儲備與爭取，我知道這是台灣早已着眼的一端，但我們十分模糊看不出已經得着怎樣的要領。今天的西德原有若干的大學，仍在繼續工作，且在加強工作，而在柏林的自由區域，依然把一個規模宏大的大學建立了起來，在萬分艱難的情況之下，德國人自籌了美金百萬，美國也立即助以一百萬，現在美國若干的基金委員會，也準備予以進一步的援助了。台灣僅有的一個大學，在這三年中沒有把學生擴充到一萬人，教授的網羅，似乎也沒有盡到最大的努力，比之西德，這實在是太可惜的。如何教育下一代的青年，這自

然是國家百年的大計，可是在這個急待有大宗人才以資應用的目前，在時間上實在有些來不及，如何把三十到五十的成材，加以調配與運用，這確實是目前的當務之急。以我所知道，流亡海外的兩萬知識分子，其中即大有人在，而且有不少有用的國民黨員，拔十得一，即不難選得兩千人，以應急需，可是這樣一個工作，似乎還沒有看見政府好好的來做一做。老實說，今後誰能統一大陸，安定大陸，只是決於人才爭取的多少，「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這個道理是十分明白淺顯的。

關於收拾大陸的方針以及實施的先後緩急，真所謂茲事體大，我不知道這幾年台灣的準備怎樣？海外一部分的有志者，我知道也在一點一滴的做，但要做得像個樣子，必須有大宗的經費，集中大批的人才，而且需要很長的時間，很顯然靠少數私人是無能為力的，儘管能做一點總也比完全不做得好。可是這件事關係於復國的前途實在太大，因為復國決不只是還原，而是要實行建國，是要把過去四十幾年來一切耗費在消極方面的力量，大部轉移到積極方面來，要對一切同情我們的人們，表現我們真有建設的能力，這真是談何容易！可是不做又成嗎！

說到外援的爭取與配合，我是自來不愁的。只要把我上舉的四點都能盡其在我，一切都

現出最善的努力，外援是自然會來的。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很簡單，就是問我們自己提不提出辦法，而能加以力行？後台叫好毫不相干，自我陶醉更大可不必，一切一切都非經得起別人的考驗不可，都非見諸事實而確有實效不可。

時間到了，不要猶疑，更不要孟浪；要膽大如斗，更要心細如髮！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二月十一日自由人）



## 趕快糾正「反共八股」

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便有人開始反共，有的反了三十年，有的反了二十年；有的人始而不反，繼而還是反；有的人原來就反，但終於又不反或不敢反。自從中共控制了整個中國大陸以後，共產黨在本質上所具有的猙獰面目，便已完全揭開，在最近這四五年以來，他們在大陸上亂打、亂殺、亂抓、亂搶、亂姦淫，凶狠徹底，貪污空前，奉來自北方的胡人如神明，使中壘善良的老百姓不得齒於人類，於是中國人才大澈大悟，知道大家非一致起來打殺這一羣瘋狗不可。現在留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反共的佔百分之九十九，留在大陸以內的，

也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因為環境關係，在大陸以外的人，可以直率的以語言，以文字，以行動把他們反共的情緒坦白的表現出來（也有不能完全表示的，因為他們對大陸的親屬還有顧慮之故），留在大陸以內的，便大抵只能中心藏之，以等待一個時期的到來，也有公然見諸行動的，如各地的遊擊部隊、起義部隊、以及各處農村集合若干人對共幹實施報復之類，反共的方法與方式儘有不同，其為堅決反共，則了無二致。

可是話雖如此，共產黨的倒是倒定了的，但他們的早倒或遲倒，并不會一定因為我們的反共人數加多陣容加強而成正比例的。原因很簡單：他們是一個有組織而相當複雜的集體，與自來中國歷史上的土匪流寇不同；他們有強而多方面的外援，儘管賣國賣得十分澈底，與自來引進外國的那些賣國賊，也仍有差別；他們自然也是「打天下」、「做皇帝」，但他們究竟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論，而天下最足以搖惑人心的一種說法，就在他們能做到一個「似是而非」！因為如此，我們在今天反共，想要運用一種簡單的方法，甚至就從共產黨的本身竊取一些皮毛，以為即以其人之道可以還治其人之身，那是斷然無效的；自然我們也需要外援，但假定我們眼巴巴的只望着外援來想辦法，一切失其自主，而又不肯盡其在我，這也是要不得的；能戰勝思想的只有思想，能打擊一種理論而有效的，也只有一種更好的、更妥當

的、提得出真憑實據的理論。

這是就一般的反共情形來說，在這一篇文字裏，我却只想就反共宣傳的這一點來談談。最近這三四年來，所有一切的反共宣傳刊物，我接觸過的至少不會少於十之六七，老實說：我已經有些厭倦，我非要求有更好的東西出現不可。本來，在過去的三十年，國民黨有國民黨的一套八股，共產黨有共產黨的一套八股，乃至於青年黨也確有青年黨的一套八股，這些黨八股，已經十分的令人不耐，不幸我們的反共到了今天這樣一個重要關頭，我們乃看見這一大套的「反共八股」，又在這裏濫竽充數！如果不澈底加以糾正，這不僅不會有損於共產黨的毫末，甚至於還會要發生極不好的後果。

要怎樣才能加強這個宣傳陣容，確能使共產黨受到無情的打擊呢？大別之可分為消極與積極的兩方面來說：

就消極的方面講：一切淺薄的、雜湊的、道聽塗說人云亦云的東西，應該絕對停止。站不住的理論，空洞迂遠的說法，不可靠的消息，絕對辦不到的辦法或計劃，乃至連文字也不大通順的種種刊物，也以少印爲是。反共問題，既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用力的範圍太狹小，世界常識的介紹不充分，把一個一個的局部問題孤立起來看，而不能指出它的聯帶關

係，也還是要不得。大家的反共目標本來是一致的，但又不肯合作，一定要人自爲政的來搞小組織，宣傳的方針與材料，不能通過一個或三兩個有力的研究機構，而只憑少數人在那裏師心自用，閉門造車，隨時發揮一點零星感想，甚至還自矜以爲獨得之祕，這又何能與有組織的共產黨爲敵？我決不忍說這三四年來的宣傳工作做得絕無成績，但我一定要指出反共運動到了現階段，以往種種的那些做法，實在是太不夠了。

就積極的方面講：

我們必須有一個從事反共宣傳戰的總司令部出現。這個司令部是學術性的、研究性的、搜集性的，可以拿打倒中共作爲一個主要的目標，然而又必須是世界性的，這裏面要包括各色各樣的高級人才；要搜集各色各樣的中外材料；要發行各色各樣高深的、淺近的書籍，小冊子，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要有廣泛而確實可靠的宣傳網；必要時、可能時，應該與宣傳反共的國際方面合作，至少要保持彼此的密切聯繫、調用，包括人才的調用與材料的調用。我的意思決不是要拿這個司令部作爲一個包辦宣傳的統一機構，只是希望名符其實的，使它負起領導的責任，對於一切個人的或小組的反共宣傳，應該予以方便，必要時予以扶持，然而只是朋友性質的，而決不是命令性質的。我的意思更不是要拿這個司令部作爲一個統一



思想的機關，假定今天還有人要作統一思想的噩夢，這種人便不僅不能反共，而且他還會成爲反共宣傳陣線的罪人！因爲我們的敵人之所以罪大惡極，便正是因爲他們要統一思想，如果要以一種統一思想去對付共產黨，最高限度也只能做到旗鼓相當，要打倒共產黨便是不能的。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二月十八日自由人）



## 讀蔣總統「三一」文告書後

最近讀到蔣總統復行視事三週年紀念日的一篇文告，文長八九千字，就台灣三年來的一切措施及其進步概況均有所說明，同時並指出若干尚待努力之點，作為本年度一切施政的準則，內容翔實，是什麼便說什麼，既沒有誇張，也沒有隱諱，使我們這些久離台灣的人，能對台灣三年來的情形，得以大致明瞭，從這一點上看，我想一定能使大家感到相當的滿意。可是港九一部份的輿論，仍有微嫌不足的，這大致是由於對台灣期待過分殷切的一種心理出發，其動機是純粹善意，頗值得重視。我們姑舉「星島日報」三月一日的一篇社論來談談，

同時也想藉此表示個人的一點意見。

「星島日報」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曾有一篇社論，標題爲「反攻大陸應昭示新政綱」，他們並且指出：「經三年之改造，當有新事實、新綱領以見人。爲對國人負責計，爲今後前途計，爲爭取多助計，實應及早有所表白矣！我人且屏息以待之！」及至他們讀過蔣總統這篇文告以後，他們却說：「今日爲蔣總統復行視事三週年紀念日，沿例必有文告昭示國人，故昨日吾人便滿懷熱望，以爲吾人上述之預期，即可實現。及今晨獲觀蔣總統文告之全文，則感覺吾人上述之期待仍然在期待中，想國人內心之焦急，尙未獲解也。」

我分析三月一日他們這篇社論的主旨，仍認爲「國民政府在反攻大陸之前，應完成反攻之政治準備，早日昭示新政綱。」據我看，與該報抱着同樣心情的人，就港九一地而論，確實不在少數，其動機不難了解，其要求也很正當，可是討論却還是值得討論的。

老實說，以今天台灣的當局，如果要集合若干對時局有相當研究的人，就國內國際當前形勢作一番檢討，因而發表一篇堂皇動人的「新政綱」，這實在是輕而易舉的。可是發表一篇政綱是一件事，如何實行却又是一件事。就我所知道，今天反攻大陸究竟應具備何種條件始能實現？攻上大陸以後，如何始能作三五年的持久戰？這從經濟與軍事的觀點上看，已經

大成問題；至於到大陸後的一切政治設施，自然更是千頭萬緒，非針對現實擬具詳細的計劃與施行步驟，實將無從着手。我敢斷言，截至現在為止，台灣對於這樣一種準備，實際所差尚遠，而且不配合國際的行動與支援，簡直可以說無法進行。至於有不少的人隨時都在宣傳一切反攻的準備都已完成，這不過是不懂得艱難的青年人隨便說說而已，在蔣總統的正式文告中，我們雖可看出他確實具有反攻的決心，但他却並沒有說到反攻準備已經完成的話，這一點毋寧說是蔣總統一貫的謹慎態度，他決沒有把目前還做不到的話，提前說出來去勉強安慰一般焦急渴望的老百姓。不到確實有把握的時候，不說確有把握的話，這樣一類態度，是很對的。

不過話得說回頭，就蔣總統這篇文告的內容而論，是不是沒有可以斟酌之處呢？這却是不然的。

第一個印象，我覺得這篇文告說得過於詳細一點，容易使大家忽視它的重點所在。

第二個印象，我覺得有許多話，最好是留給行政院和台灣省當局去說，以總統的身份與職權，確實還有其大者遠者應該注意，而且以蔣總統今天的地位和精力，也似乎不應該把精神過於分散，反而使得對於若干的大問題，沒有餘力去作充分的考慮。

以我個人的淺見，覺得今天的蔣總統，應該抓住幾個特別的要點，至於其他種種，則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縱不管，或少管一點，也沒有多大的妨礙。

我所謂的特別的要點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是今後政治趨向的總方針，我們很懂得，要台灣在今天就實行澈底的民主政治，自然在事實上還有不少的困難，可是趨向總必得是這個趨向。在個別的特殊事項有時不能與民主原則完全相合，這是可以諒解的；在一般的舉措上如果與這個總趨向背道而馳，那却是要不得，這是我們希望蔣總統最要把握的第一點。

第二、抗俄復國這一大業的完成，其關鍵可以說大部分在於國際，今後對於國際情況的充分理解與外交陣容的特別加強，實在是當前的一大要着。以目前的外交陣容而論，除掉外交部的葉部長，出席聯合國的蔣代表，以及一二小國的使領（如駐埃及的大使何鳳山之類）而外，其餘的大多數，實在是不大符合一般人民的期待。老實說，我們今天決不需要若干擺樣子的外交官到外國去撐場面，我們是要求他們有所作為，要他們能提出詳盡透關的觀察與報告，足以供政府的參考。這一點，我也覺得值得蔣總統加以注意的。

第三、對大陸實際情況的認識，這是我們在一切反共行動中所最不宜忽視的。我們不要

過度怕共產黨的宣傳，我們正要從他們那種虛偽的宣傳中去了解他們的實況！老實說，今天的中共，本來只是一個「兒皇帝」，其本身決不足道，而確實需要認真去對付的，乃是他們的主子。中國自來的外患，從東西南三面侵入者，均比較的輕微，最可怕的乃是從中國北方侵入的這種外寇！今天的蘇俄，雖無入主中國之名，確已有入主中國之實，我們只看她在精神上與物質上竭全力予中共以支持，並派分若干萬的人員對中共加以嚴密的監視，我們便知道整個中國大陸，確已非中國人所有。我們的所謂反攻，決不只是從中共手中去爭回我的政權，而是要從俄帝手中去奪回我們的主權與領土；這一大部從中國北方侵入的「胡人」，其強有力算是我們空前的一種敵人，也是我們最後的一種敵人，俄帝不倒，中共是倒不了的！今後我們的宣傳方針與敵情研究應該合而為一，千萬不可專做那些毫無內容、毫無用處的反共八股！

第四、則在培育人才與保全和發揚文化。就目前中國艱難的環境來說人才是不够用的，今天拿出許多人來應用，只是不得已，實際是去理想太遠的！好好的教育我們的青年，這自然是百年大計，但方針尚有待於檢討，時間上也確實有些來不及。我們所期待於蔣總統的，是要從台灣從海外就三十、四十、五十這班中年人中去，虛心體察人才，勉勵他們為國家效

用，「不以一管掩大德」，「毋求備於一人」，我相信總一定還有若干的可用之才是可以發見的。這是我們復國工作的一個基本，假定我們得不着大批的新人才，則我們一切的希望便會落空！說到文化，根本不必在分別什麼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只要是有益和有用，便都是我們所需要的。這要用一種偉大的抱負與宏闊的胸襟來提倡，決不是「狹小漢家制度」兩個眼睛只知道望着鼻子的人所能為役！我們要求台灣大學要改組，教育部要切實整頓，中央研究院要真正是學術機關，不能作政客的尾閥。這些都只是起碼的要求，爲了國家的生存，爲了民族精神的復活，我們實在顧不得情面，不能不說話了。

上舉四點，實際都是一種「卑之毋甚高」的希望，即不能包舉一切，只要能切實的做去也就可以得其概要的。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七日自由人）



## 馬倫可夫代得了史太林嗎？

「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一切獨裁者的目的大抵也在「流芳」，但結果則終於「遺臭」。

史太林在近代的獨裁者中，總算居然是得到「壽終正寢」的一個，但吳却是臭定了。

史太林曾經批評過希特勒，說他不懂得「適可而止」，史太林最大的一個長處，便是在遭遇到真正困難的時候懂得咬緊牙關來忍耐；真正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也居然能以笑臉迎人。他所以能贏得二次大戰的勝利，一直到他死以前第三次大戰還終於沒有正式爆發，其原因

馬倫可夫代得了史太林嗎？

因大致就在於此。

今後的蘇聯只有一天天走向下坡，其理由不難了解：凡獨裁者決不能容許同時有「勝己者」的存在，屠殺異黨的賢者才者不稀奇，即同黨亦非徹底的加以肅清不可。袁世凱畢竟只是一個不成器的小獨裁者，他雖然懂得殺吳祿貞，殺宋教仁，殺黃遠庸，殺趙秉鈞，殺鄭汝成，殺應桂馨，……但他却沒有殺梁啟超，殺蔡鍔，殺陳宦，殺湯薊銘，……所以皇帝到底做不成，而結果還是一氣而死。

我們只要看史太林一生所殺異己者之多，便不難承認他是近代一個集獨裁的大成者，我們就說這個二十八年的史太林政權，一半是建築在一個能殺人的基礎上，總也不會太遠於事實吧！

今後的蘇聯會怎樣呢？馬倫可夫不過是史太林溫室中培養出來的一個人物，「三個臭皮匠」，決不能構成一個諸葛亮，即令貝利亞莫洛托夫可能與馬相忍共事，但要保持史太林這樣一個全盛時代，終於是不可能。我們不要過分相信組織，尤其不要相信騙人的主義，蘇聯在過去的三十四年，人的因素還是居於第一。

根據這幾天國際市場的行情來看，毛澤東的價錢，似乎是高了一些，因為「史爺爺」死

了，沒有親自前往奔喪，因而引起若干神經過敏者的揣測：或者說毛實在是被韓戰拖苦了，大有藉此脫身之意；或者說馬倫可夫資望不夠，毛根本看他不起；或者說因史太林之死，中共內部的民族派將要抬頭；再加上蘇聯也確實有點心虛，把「偉大的中國人民」，喊得一片價響，大有非把他切實抓緊不可之意；於是乎烘雲托月，居然把毛澤東烘托成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本來，今天的國際情況，原也沒有什麼信義可言，蘇聯更不是一個配談信義的國度。假定毛澤東真有一點本領的話，就拆一次「大濫污」，也未嘗沒有可能，可是毛澤東究竟非其人也，而實際的情況也在所不許。毛澤東眼看見大陸上大多數人民對蘇聯充分不滿，民族精神確實在那裏暗長潛滋，當然也不能不暗暗着急；以他自己而論，原也帶有幾分英雄思想，並不一定甘居人下，一位爸爸剛剛死了，即刻又要他去拜它第二位爸爸，確實也令他難堪；可是您叫他有什麼辦法呢？中共內部既有一個徹底的國際派，隨時可以取他而代之；蘇聯所派到中國的特務，更是到處密佈，使得他一動也不敢動；蘇聯駐北平的大使，本來潘友新已經比羅申強，現在更換了一位庫滋涅索夫，當然比潘友新更強；像這樣重重的束縛，居然還有人希望毛澤東能够自求解放，這豈不等於癡人說夢？

馬倫可夫代得了史太林嗎？

原來毛澤東所走的，老早就是一條死路；進一步倒向蘇聯，民主國家便只有把他作爲對手，遲早必得向他頭上開刀；他要背棄蘇聯，馬倫可夫確有可能在幾小時之內，把他置之死地；不論他向那一面搖擺，總得要死，他選擇於這兩種死法之間，究竟靠緊蘇聯還是可以稍緩須臾，所以說到歸根結蒂，他總得還是承認這一位繼父老子了事。可是話得說回頭，如果在蘇聯的了解之下，他也並不是不可能作出種種姿態拿一部分的民主國家來開心的，尼赫魯們總還得以小心爲是。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十四日自由人）

## 從日本政局想到我們的國民大會

日本議會對吉田內閣通過了不信任案，吉田不承認他自己有錯，毅然把議會解散，訴諸全國民意，再來一次選舉；假如選舉的結果，吉田的自由黨依然在衆院獲得多數，他當然可以照常組閣，否則便只好讓給別人。議會有權不信任政府，政府也有權解散議會，這在日本六十幾年的憲政史上，只是一種家常便飯的行爲，換言之亦即一種憲政軌道上的普通行爲，絲毫值不得驚異。

可是，話雖如此，日本其所以得着這一點民主基礎——即人民有不信任政府之權，也還

從日本政局想到我們的國民大會

是經過長期的奮鬥，同時因為過去的憲法上，依於歷史的演進，使他們的軍閥有一種特權，以致使得一個絕對合乎民意的政府，到底無法成立，即成立亦無法久存，而釀成一種軍閥獨霸的局面。這便是七年前日本遭受一次慘敗的基本原因。這些事實，到現在為止，還是很新鮮的留存在我們的記憶。

日本在美國的管制之下，經過了六年，可以說他們已在進一步的學習民主，自從實行這部新憲法以後，總算是兢兢業業，不敢稍有踰越，甚至要正式的重建武裝，重光葵等也主張非修改憲法不可。本來，日本的新憲，確實是不許再有武裝的，既要重建，當然非將憲法修改不可，就憲談憲，毋寧說重光等這種態度是很對的。

就另一方面看，吉田這一次的挫敗，從某一意義上說，實在是出於他之昧於國內國際大勢所使然。上次選舉的結果，自由黨在衆院並不是絕對的多數，而黨內且有問題，同時日本急待處理的大事，例如修改憲法，重建軍備，以及形成一舉國一致的外交政策等等，以日本現有政黨分野的情勢而論，至少也非聯合兩黨以上成立一聯立內閣不可，吉田不此之圖，還是一本過去的態度，逕情直往，其引起這次的不信任案，寧非事理之當然！

我們現在不妨姑作一種預言：此次選舉結果，無論是否仍由吉田以首班資格繼續組閣，或由鳩山重光合作組閣，日本今後一次的內閣，無疑的總是聯立的，不是聯立，則無論由何人來獨當一面，日本的政局還是無法安定得下來，一切對內對外的重大政策，也無法確立得起來，這是一定的。而且這次的聯立內閣一旦成立，還可能延續到一個較長的時間，假定在一兩年內，整個世界或亞洲一局部不幸發生其他的變化，日本除掉以一聯立內閣的姿態去努力應付以外，也更無其他的善策。以上是就日本目前情勢所有的一種看法。

聽說台灣有在本年內召集國民大會之說，以時考之，大概是勢在必行。假定依據某種解釋，即令國大代表能出席的去法定人數甚遠，但只要除去附共、死亡以及行蹤不明的等等不算，則事實上的法定人數是不難達到的。不過話雖如此，假定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可以够，是不是修改憲法的法定人數也可以够？一旦法定人數够了，則國民大會便是中華民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斷不能由任何人出來說：這次的國民大會只能辦理選舉，決不能修改憲法，因為確實沒有任何人能具有這種權力。自然，我也懂得，依於黨派的運用，也還是可以做到只辦選舉，不改憲法的。我個人平日的立場：只要這部憲法一天沒有動，我便主張絕對的遵守，可是行了這幾年的結果，根據現行的這部憲法，中國乃決無實現民主的可能，因為，它雖沒

有明明規定政府可以不信任人民，但人民却沒有絲毫的權力可以選擇他們認為可以滿意的政府。凡立法院監察院可能行使的職權，也只能到今天這樣為止，決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換言之，即令在人民心目中，認為中國未來的事變絕不可知；政府所負的責任空前重大；可是人民希望實現他們一個較近理想的政府，乃於法無據。假定政府確實賢明，自然是如天之福；如其不賢，則人民除安命樂天以外，也別無其他可以改弦更張之道！中國人要求實行憲政，總算也有了五十年的歷史，但不幸所得的結果，不過如是如是，天下事之可悲，寧有更甚於此者？

因為看見日本的政局又在動盪之中，因而聯想到我們未來的國民大會，在這裏所提到的只是一個發端，以後我們還非密切注意這個問題不可。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自由人）



## 克拉克之來與亞洲聯軍

當聯合國在韓聯軍統帥克拉克將軍完成其分別訪問菲、越、港、台的時候，久已趨於沉寂的韓戰場，又突趨活躍。最近聯軍對於老禿山的棄守，從某一意義上看，不能不說是和平空氣瀰漫全世界的時候一聲警鐘！

韓戰的延續，快要到達三年了，聯軍人力的損失，合南韓軍計之，當不少於五十萬，而物質的損失，更何止十倍於共方？

可是，假如您向聯軍的最高當局，或逕向美國的總統艾森豪先生提出如下的問題，即：

究竟有何種方法贏得韓戰的勝利？或如何實現光榮的和平？我敢擔保，將不會使您得着滿意的回答。

我們決不是由於主觀，也決不是專爲自己打算，但我們自韓戰初起，以迄今天，却有一個一貫的看法：韓戰的發生，係由於中國大陸的淪陷，不就中國大陸想辦法，韓戰決無單獨解決的可能。到了今天，不，實際是早已如此，毛澤東要藉韓戰去加強他的政權，蘇聯要藉韓戰去加強她對中共的控制，假如能有三個類似韓國這樣的戰場，則共產黨對於民主國家的消耗戰，確將產生一種意想不到的作用，但終以蘇聯自己不參加爲條件；蘇聯不僅不出面參加，而且她的和平調子還要越唱越高，其目的則在使得一般昧於現實而又心存幻想的人們，完全陷於昏頭昏腦而手足無措，喜懼交集！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不正對着蘇聯的頭頂上去開刀，而日惟竭其人力物力和她所嗾使的下駟去決鬥，這在我們這樣一個非軍事內行的常識者來加以判斷，是毫無疑義的要上當的。

大凡一個策略定了下來，行之既久，而又沒有什麼顯著的毛病，要加以改變是不大容易的。杜魯門時代的對蘇策略大致「圍堵」兩字足以盡之，如果說真的不想打大仗，當然「圍

堵」也就不失爲可行的策略之一。艾森豪和杜爾斯要把「圍堵」修改爲「重點」，這在他們當時競選的宣傳上是有相當作用的；可是艾森豪就職以來，又已兩月以上，實際對杜魯門時代的現狀，並還沒有加以何種變更，歐洲一如過去的歐洲，亞洲一如過去的亞洲，乃至韓越兩戰場的狀況，以及日本和台灣的地位，其所已變更者亦復微乎其微，現在所謂亞洲聯軍的一說，則又已甚囂塵上。在原則上，就亞洲可能合作的國家，加以密切的組織，使他們在軍事上能分別負起實際的責任，這當然是很對的；可是亞洲情況的複雜，也未必下於歐洲，歐洲建軍搞了兩年，至今還沒有做到一個理想的境地，我們便能相信亞洲聯軍在短時期內就能實現嗎？就亞洲可能聯結的這些國家加以分析，其比較具有工業潛力的，僅只一個日本，而日本又是一個意見最多顧慮最多的國家，在組織的初期，她還未見得肯來，如日本不來，則所謂亞洲聯軍者，其對美的依存性，實在使美國有點望而却步，假定從計劃到實行，建立一文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的亞洲聯軍，實際非歷有兩年以上的時間不可，我們又能判斷時局的變化在兩年間會成一個什麼樣子呢？

據我觀察，一個戰爭體系的樹立，只有進入實戰階段才能迅速的建立得起來，否則考慮復考慮，接洽又接洽，其結果總還是議論多而成功少，恐怕在時間的爭取上乃遠不如共產集

團來得那樣敏捷，質言之，以今日歐亞兩方的現狀，儘管天天都在一種備戰狀態之中，但一旦真正進入大戰的初期，我看依然非大受打擊不可！我說這種話，決不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但我總覺得避戰的心理不除，備戰的進展，便必然很慢，而且可能夜長夢多，這一點乃正是蘇聯所求之不得的。中國舊日的軍事家所說的，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這也就無非是說明要有一種作戰的堅決意志而已！

截至今天爲止，我還看不出民主一方真有一種對蘇作戰的決心，甚至連美國，也並非例外；到今天蘇聯還能運用一種和平的膏藥，在那裏招搖撞騙，實際都是由民主一方所暴露的弱點使然，而蘇聯乃即抓住這一弱點，一天天在那裏不聲不響的調兵遣將，我們只要一看一年來蘇聯在遠東，在中國大陸所增加的實力，寧不使人不寒而慄！

總而言之，準備好了再戰，與一面戰一面準備，其利害是相當懸殊的：今天的民主國家一面在準備，一面却要應付韓國與越南這類的戰爭，而蘇聯却能曠使她的爪牙去當前敵，而她自己却坐下來專心一意的加速準備，不把蘇聯的這一優勢粉碎，而今天一個計劃，明天又一計劃，這無非令共匪坐大，而使得最後的勝負之數陷於不可知而已！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由人）

## 新日本給我的新印象

### ——試答朋友們向我提出的幾個問題

我不够了解日本，但我頗歡喜日本，若干年來，也不斷的在注意日本，因此，戰爭剛一結束，我便想到日本去看看。可是因種種的原因，種種的困難，始終不得成行，一直延到最近，日本的獨立又一年了，我才跑到日本去住了一個月，總算部分的滿足了我這個宿願。

回到香港，又已四天，連日有不少的朋友，都跑來向我問長問短，這無非表示他們對日

本前途的關心；其實大家所提的問題，有的我勉強可以答覆，有的我簡直不能答覆，這完全由於我對日本知道得太少，實在是非常慚愧。在日本一個月的聞見，我另有一篇約三萬字的「東遊雜記」陸續在「中聲晚報」發表，那一篇雜記的內容，只是就我所看見或聽到的一些具體事實，作成一種報告，並沒有多表示我自己意見；現在在這一篇裏，我却想就朋友們所提的幾個問題，擇要來說明我自己一些看法，當然只是請教的性質，我決不敢說我的看法便一定正確。

第一個問題：現在日本，正在向復興的途中邁進，究竟她這種復興工作的成就，已經到了怎樣一個階段？前途有無困難？今後的動向如何？

我是在抗戰的前一年到過日本一次的，就我這次所看見的，拿來和十七年前所見的一加比較，可以說除軍備一點而外，日本的復興工作，已大體完成，甚而有若干方面說她已突過戰前，亦非過譽。一個國家，最怕的是沒有立國的基礎，日本經過他們前輩數十年的慘澹經營，他們的教育文化基礎、政治基礎、經濟結構基礎、社會組織與秩序基礎，……雖經過了一次的大敗，幾乎弄到亡國，但這些主要的基礎，並沒有根本敗壞，而且依然維持得相當的良好，把握得相當的堅實。

拿東京這一地來說吧，她的人口正與今天的台灣相當，他們的學術教育機關，真可說是到處林立，人民日在教育學術空氣的陶冶之中，也在藝術文化空氣的涵泳之中，關於各部門學問的研究，科學與古物資料的整理搜集，圖畫雕刻的展覽，音樂戲劇的演出，報紙雜誌閱讀者的普遍，出版事業的繁榮，體育獎勵倡導的不遺餘力，廣播與傳真，集會與講演的到處皆是……我們只稍稍一接觸，便可知道日本是一個有學之國，日本人民是有學之民，他們決沒有一種無知妄人，說像這樣一個七百萬人口的都會，只要有一個大學便已够了，決不許第二個大學的出現！也決沒有一種無知妄人，偶然聽見一種稍稍離奇的言論，或稍稍怪誕的表演，便要去加以禁止或取締，在從前軍閥的時代，偶然翻閱一本日本的書籍或刊物，我們往往看見有不少經過檢查的叉叉，現在這種叉叉已久矣不復存在！依照我的直覺，我覺得日本的文化工作者在這種自由空氣中生息下去，在不久的將來，無論思想、科學、文學、藝術，一定會有更偉大的成績表現。尤其我這次參觀了五處畫展，一處雕刻展，聽過兩次音樂，三次歌劇，一次話劇，跑過百家以上的書店，看見無數藝術性的成品，我更相信日本的文學藝術，在最近的將來，就會以新面目與世人相見！一個物理研究者得着世界的獎金，一部影片爭得了世界影片的首座，這不過是從密雲中最初露出的一鱗一爪而已！

日本何以在一個短短的復興期間，便會從學術文化方面表現這樣優良的成績？實在是由於他們的教育文化基礎，戰勝者既未予以摧殘，且會加以愛護，而他們自身也確實有多數人兢兢業業在那裏埋頭苦幹啊！

其次談政治：有不少的中國人，他們不憂慮自己的政治，一看見日本議會不能有一個絕對多數的大黨，便在那裏爲日本的政治前途擔心。其實，從政治方面多少表現一點不安，這並不是可憂的；反之只有政治情況凝靜得如一潭死水，或者如共產國家，永遠由一個大黨在那裏指揮操縱一切，而不能發現半點反對黨的力量，道才是真正可憂的。我這次在東京：看見他們辦理一次選舉的始末；曾參觀了他們的國會議事堂，略觀他們議會政治的規模；同時在該議事堂，瞻仰了板垣退助、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三位的峨峨銅像；我深信日本憑藉他們六十餘年的憲政基礎，斷然可以逐漸走上民主政治的軌道，即令隨時可能有一些小小毛病發生，但決無損於大體。下面我更舉出日本政治幾樁顯著事實：

一、在日本從事政治的人，他們確乎要對人民有交代，人民也確實有權表示他們對政治人物與政治主張的去取與好惡。不問您是什麼人（那怕就是現在最富有優越感的吉田吧），假如您要 and 民衆的關係脫了節，便立刻會發現您的政治地位不穩。所謂選舉者，便是訴諸民



意，表示人民確有選擇之權，在選舉的結果沒有完全揭曉以前，誰也不敢說自己有絕對的把握。質言之，一般人民確把選舉看成一件正經事，而沒有把它看成一幕滑稽劇。例如這次的吉田吧，他曾再三表示他的自由黨仍有把握在衆院擁有二百席以上，可是聽憑他如何掙扎究竟只得了一百九十九名；反之如鳩山與重光，他們也並不是沒有自信，但結果却歸於慘敗，以個人來說，例如號稱憲政之神年逾九十的尾崎學堂翁，他自己和別人，總以為他之當選是沒有問題的，但他這次却居然落選；反之，如久已被人遺忘的宇垣一成（也在八十以上），大家並不覺得他有怎樣的把握，但他這次競選全國區的參議員却得着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從這種地方看來，可見日本的選舉，決不是由有權有勢有錢的在朝黨可以為所欲為，而真正可以左右選舉的力量，依然操於多數的選民之手。即令日本的選舉還多少不免有一些毛病，但大體總算是不錯的。

二、日本的政黨，好像也相當的複雜，但實際角逐於今天日本政治舞台的，却只有兩個自由黨，兩個社會黨，夾在中間的還有一個新興的改進黨，其餘如綠風、共產、勞農等等，舉不足道。日本這幾個較有實力的黨派，分開來既不出保守與急進兩途，合起來却可構成一個兩大政黨的形式。可惜今天日本的政界還缺少能符衆望的人物，否則加以調整與說服，把

日本形成英國那樣一個兩黨更迭執政的局勢，並不是沒有可能。至於怕日本會要形成法國那樣一種小黨林立的局面，我覺得這是過慮。

三、這次我在東京的三越七樓，看見一個日本現代一百名人的照片展覽會，這個會是由何種方面主催，我不會注意，但看他們所挑選的人物，却也相當公道。這一百個現代名人，除掉一二現已死亡以外（例如古島一雄），其餘的都還是生存人物。在每一名人的照片下，都附得有一篇小傳，同時，也多附得有該名人一紙手書墨蹟。我把這一百名人大致的統計一下，政治人物僅佔十分之一，而教育家、科學家、實業家、新聞事業家、出版家、社會運動家，……乃居十分之九。日本的第一流人物，並不必一定要向一條狹隘的政治路上去擠，而各有其安身立命之道，日本政治前途仍必有其光明，這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以上三點看來，日本確有接近公平的選舉，政黨分野也有趨於簡化的可能，而社會有力人物，又可除政治以外分途作多方面的發展，這不是他們的政治確實有了良好的基礎，如何在敗後不及八年，即能給我這樣一個光明的印象呢？

說到日本的經濟結構，以黃馮明先生最近寫的一本「日本戰後工業」（已出版）和沈光沛先生一本「日本戰後經濟」（將出版）最爲詳明。我這次去日本以前，有機會讀到他們兩

位這兩部稿子，實在得益不少。大抵日本整個經濟結構，樹基於明治維新以來，擴大於甲午戰爭以後，再經過日俄一戰及世界第一次大戰，乃如日中天，確已成為亞洲的驕子。過去日本軍閥，不懂得東洋持盈保泰的哲學，乃發動一次不必要的長期戰爭，既過度輕視了中國的潛力，又上了斯達林的大當，更盲目的去與英美為敵，因此才遭遇一度無情的打擊，致軍需與民需工業設備，受到莫大的損害，而全國若干重要城市之被燬者，亦在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不等。可是中英美三國，均不缺少遠見的政治家，他們覺得給予日本一個嚴重的懲戒雖不可少，但如果超過某種限度，則不僅是亞洲未來的一大損失，而且是世界的一大損失，因此對於戰敗的日本，一致主張寬大。美國在佔領期間，負着實際的責任，更不惜出其全力，對日本加以多方維護，尤其以鐵道與造船業之迅速恢復，多數工廠的保全，金融與幣制未予以根本動搖，賠償幾於全部放棄，……實大有助於日本的復活！

在這八年的復興期間，斯達林與中共，乃又發動一個延長到三年以上的韓戰，確亦大有造於日本。本來日本經濟情況之所以有過去那樣一種景象，可以說無一次發展不是發的戰爭的財（中日、日俄、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次的復興，又何嘗不是受的戰爭之賜？因此我想：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恐怖戰爭的理由，但日本却並無恐怖戰爭的必要。同時

我也敢斷言：如果世界不再有一度的大戰，即有，而日本又不願以全力參加之，亦終無以完成其復興的大業！

就我這次在日本所見，日本各方面的經濟情況，不僅繁榮為亞洲第一，其豪華也不能不說是亞洲第一！過度豪華只是一種病態，我希望日本的這種現象，只是創鉅痛深後一種反常心理的表現，在不久的未來，當仍可趨於平實的一途。

上面我還是就外在的一般情況說，進一步看，則日本的經濟結構，亦確有其堅實基礎：一、日本一般科學技術人才，並不比其他的先進國家落後；二、在投降後不久，一般財閥遭受整肅，原來集中的資本，已化整為零，現在則又已化零為整，而且不缺少暴發戶，質言之日本並不過度缺乏可以運用的資本，亦絕不缺少吸收國內國際資本的信用；三、凡現代大規模經濟結構所不可或缺的交通、動力、金融機構，……等等，日本在戰時戰後，確曾有過一段時間的混亂，現在却已全盤恢復，而且管理良好；四、日本人原富有組織管理的素養，大而至於一工廠的設計，一農場或礦山的經營，一商店的裝置，細而至於一廣告的意匠，一商品的包裝，對一顧客的招待，幾乎無一處不可看出他們的力量；五、最根本的還是他們基本教育的良好，大抵人人都能按步就班，忠於所事，有持續力，有進取心，這更是他們成功的要

素。據我的直覺，今天日本經濟方面的人才，似乎較優於政治方面的人才。

日本畢竟是一個憲政有了基礎的國家，人民在不牴觸國家法律與妨礙社會秩序的原則之下，確實享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乃至今天的共產黨，也還是以合法的地位儼然存在。至於一切非政治性的組織，無論是學術性的、地方性的、職業性的，……更是天大小小到數不清的數目。這些團體有時也可影響到政治，但政治力量却很少無理去干涉這些組織，一切由人民自動自愛自發去相互團結，自求福利，絕對用不着什麼人去加以領導，就在他們開會的時候，也絕對不需去什麼「長官」去列席！同時也絕對不需要照例用「快郵代電」的方式，寫一篇毫無誠意、毫無意義的文字，向某人某人去致敬！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這種組織才是有價值的、有生氣的，隱然形成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或社會有不少的重大事件，大抵都賴這種組織在那裏推動，而顯出一種有朝氣的進步現象。

至於說到社會一般的秩序，這次我在日本走了八處地方，時間經過一月，我從來沒有看見兩個日本人在一處吵嘴，更不要說打架了（自然可以有人舉出一種偶然事件來對我反唇相稽）。凡是公共場所，無論是戲院、電影院、電車上、巴士上、乃至百貨公司，只要有一個不許抽煙的公告，我便沒有看見一人敢公然抽煙（凡戲院、電影院以及百貨公司等，都有指

定抽烟的地方)。在電車或巴士上，因為有時實在過於擁擠，事實上無法買票，但下車時却無人不把應交的錢交出，而買票員也絕不肯把收入的錢放入自己的荷包；我沒有看見所謂查票員；對於坐「霸王車」或買票員「揩油」的這類事，大概為他們所不能想像。街頭上有一種木架插得有各種的報紙，並無人管理，凡取得日報兩份者，即以十元投入一收錢的木箱，取晚報一份，即投入四元，據說並沒有人取報而不付錢的。我們的旅行團十四人，在東京以外遊了一星期，沒有人遺失過一張紙；我在東京住了三個星期，一切情形都不熟悉，但我從來也沒有花過一文我所認為不應該花的冤枉錢。大家不要以為這都是一些小事，日本人過去打仗，勝有勝的道理，敗了也還是敗得有秩序，也就是這樣的一種精神，質言之，這是他們的國民教育收到了最高的效果，能說他們的復興之快與這種精神沒有極密切的關係嗎？

上面我說明日本的復興之快，係由於他們的政治、教育、經濟、以及社會組織和秩序等等，各有其良好的基礎；而這七八十年以來日本又隨時有很像樣子的政治家產生，懂得對這些基礎去加以培育，即令在軍閥橫行時代，也總還有若干的豪傑之士敢於去披這班軍閥的逆鱗，甚至以性命相搏，也不肯令這些基礎完全歸於破壞；這確實是他們經過一度慘敗之後，即令他們目前的政治人物，大抵都是一些中材，但在這樣一種的良好基礎之上，依然能按步

就班，很迅速的又能建立起崇樓峻閣的基本原因之所在。至於問到他們前途有無困難，和今後的動向如何，則我擬在答覆下面第二第三兩個問題中來加以試答，在這裏便不多贅了。

日本建軍的實況，究竟如何？其遲遲不肯進行的心理與困難安在？

過去的兩三年，我也原有一種幻想：以為以日本的人力與軍事傳統，加上他們的工業潛力，再益以美國的支援，日本建軍總應該不十分困難，而且可能為他們的國民所歡迎。可是這次到日本一看，還和好幾位朋友加以相當的檢討，才知道確有問題。

一、一班人民對過去軍閥誤國的反感，並未完全消釋。

二、日本目前還在經濟復興的途中，就經濟復興的本身而論，原已有困難不少（例如原料太貴與市場難得），如立即建軍，勢必增加人民的負擔，即無異對經濟復興前途，更加一層阻礙。

三、所謂美國的支援，本來也不太痛快；而一般人民的心理，更不願過度的依賴美援以增加自身的束縛。

四、強隣逼處，待機而動，他們覺得，如暫不建軍，可能禍小而發遲；立即建軍，便能禍大而發速；我們不要忘記，日本確實是第一次嘗過原子彈的國家！

五、共產黨正在向全世界發動普遍的攻勢，而他們對共產黨的認識，却還不如我們的經驗豐富，一部分淺薄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很容易爲這種和平的甘言所欺騙，而日共及其同路人，更藉此推波助瀾，以使擴大他們自己的力量。這次我在東京新宿某劇場看過一次話劇名「真空地帶」，即在暴露過去軍隊生活的醜惡，演出的技術並無可取，但在他們宣傳又對建軍的作用上，却相當的成功。

六、一部分的新舊財閥和暴發戶，他們爲目前一種表面的、暫時的繁榮所迷惑，以爲可以從此一帆風順，他們對於建軍的財政負擔，確實也非常淡漠。

基於上述的這種原因，我這次在日本，乃看見如下的各種現象：

一、舊日的軍人，雖逐放或拘禁已經解除，但不獨政府未予起用，即社會對之也十分冷淡；日本因戰敗而流於沒落的，在今天確實只有舊軍人這一階層。

二、一般殘廢軍人，要募集一點更生基金，應者也寥寥無幾。

三、我會遊過東鄉乃木兩個神社，在過去是日本人所奉爲軍神的，但今天則門可羅雀。我曾在乃木故居低徊留連三小時以上，默默的爲日本人招魂，但遊人却始終只有我這一個不合時宜的異國遠客。



四、這一次的選舉，凡標榜正式建軍的均遭慘敗，相反的方面却相當勝利。

五、吉田這個人，在度過他們國家第一難關的這一點，也總算不無微勞，但論其風格與器識，却不能與明治時代的那班大老相提並論。他對建軍採取如目前的這樣一種灰色態度，目的只在維持一時的政權，根本談不上百年大計。

依據上舉的這些分析，我想讀者對日本建軍的前途，總可得一個相當明白的認識了。

這次我在東京曾向朋友們發過這樣的感慨：人類總還是會要在戰鬥中才能生活下去的。能戰、敢戰、又為正義而戰的便是一等國家；即令其作戰的動機不太純正，但能戰、敢戰，將仍不失為二等國家；既不能，又不敢，而只想仰仗他人保護，在和平世界坐享其成，則終於只是三四等國家而已。日本今天除軍備外，已具備了一切一等國家的條件，難道日本人會願意永遠停止在一個三等國家的地位嗎？我想這是決不會，而且是不可能的。

最後請來試答：

日本當前的思想界，相當混亂，若干的知識分子與青年頗表現一種左傾的趨勢，日共既具有若干潛力，而左派社會黨又從而掩護之，加以厭戰與反美情緒，對此一趨勢更有推波助瀾的意味，究竟日本在短期間是否真有流於赤化的可能？

這個問題，確實也是我這次到日本想尋求解答的問題之一，因此我會向若干深切了解日本的朋友們請教，而把他們的看法歸納起來，却剛剛得着兩種正反的意見。

認爲真有赤化可能的一面，舉出了六點重要的理由：

一、日本右派的力量，相當散漫，而左派却有較強大的組織，例如文教組合（教職員的團體）與勞働組合這類的團體，確擁有廣大的羣衆，爲右派所不及。

二、新舊財閥及若干暴發戶，惟一的目的在找錢，對當前情勢，甚爲麻木，而戰後貧富的懸殊，較戰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環境如此，實大有助於左傾思想之滋生與傳播。

三、思想和行動左一點，在目前的日本也算一種時髦，如書籍、刊物、報紙等等，不染上一點左傾色彩便會影響銷路，這正與中國過去認左傾分子爲「前進」，認右派爲「落伍」的情形差不多。

四、目前的政權依然掌握在右派的手裏，但右派的政治措施，却無法盡如人意；當權的吉田自由黨，既把政權看成高於一切，而吉田及其左右，更富於優越感，絕對不肯犧牲，即對其他在野的右派，並無合作的誠意，是非不明，友敵不分，致使右派的力量，無法趨於團結，乃容易爲左派所挑撥分化，而被他們個個擊破。這也正與中國過去的情形相彷彿。

五、左派有強大的國際背景，且有最高的指導原則，例如附和和平，反對重整軍備，隨時都在對中國大陸轉念頭，并高呼調整中日日蘇的國交，這一切一切，無一非直接間接爲蘇聯的原則所領導。

六、右派爲一種政權熟所麻醉，同時又過信自己的實力，對左派一種滲透分化的伎倆，每多忽視，在今天的吉田政府中，誰敢擔保不會如過去的美國國務院，或中國過去政府一樣，而有左派若干的第五縱隊暗中在那裏面潛伏？

這一方面的朋友，因爲他們過去受過中國赤化的教訓太多，他們目睹日本目前這種種的現象，乃發出這樣悲觀的論調，甚至他們相信，如果日本的現狀長此不改，不出五年，日本便有不流血而高掛紅旗的可能！

可是相反的方面，却針對着上面這種可能赤化的理由，而提出一種比較樂觀的看法，他們覺得：

一、日本畢竟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決不像中國這樣散漫；他們人民的教育水準，又比中國的高得多；加上他們自實行新憲法以來，人民確有思想言論自由的保障，左派可以自由鼓吹，右派也可自由說話，政府對兩者都不能隨便加以干涉；目前日本的思想界，儘管相當

混亂，但經過長時間的折衷討論，人民自然會因比較而得着適當的選擇，說日本的左傾思想可以造成一個「一面倒」的形勢，這只有在中國這種落後的國家才有可能，在日本是決不會的。

二、在今天的日本，決沒有人敢作一黨專政的夢想，右派的組織，儘管相當脆弱，但對於一個或若干個反共勢力的形成，決不會受到無理的摧毀，假以相當時日，他們自然會發生力量。這一點也正可說明，惟有一黨專政的國家，最適於共產黨的發展，亦惟有真正實行民主，才能談得上反共的把握，日本在今天，一切反共力量可以自由組織，這是毫無疑義的。既然如此，日本又何至於一定會爲共產的狂潮所捲去呢？

三、日本人忠君愛國的思想，也許不及從前那樣流於極端，但皇室却依然爲一般人民所愛戴，這一點，也不失爲日本不容易捲入共產洪流的一個主要因素。

四、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中國大陸橫行，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確會經過容共聯俄的一幕，又經過與中共聯合抗日的一幕，今天日本的左派社會黨，自然也主張容共，但他們之所謂容共，不過是容許日共存在的意思，決不是要把日共容納到社會主義面來的意思，今天日共既得不着有力的憑藉，要在日本這樣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圖發展，實無異於平地起樓台，真

是談何容易啊！

五、中共這幾年來在中國大陸的行爲，日人雖還不完全明白，但事實總是事實，永久掩蔽下來是不可能的。現在從大陸歸來的一部日本僑民，因爲還有不少的人尙未遣送完畢，他們已回來的這一部分，當然不能不說中共的好話，一旦遣送完畢，日本對中共的認識，便可得到許多真實的報告，有了這一種血淋淋的教訓，你們相信日本會肯重蹈中國的覆轍嗎？

六、蘇聯是日本的敵人，趁火打劫，曾搶去日本許多的領土和財產，即令史達林在死以前，又會向日本多方誘惑，但蘇聯欺騙日本的事實，日本人記憶猶新，說他們會甘心跟着蘇聯走，則除非日本人是天下第一等的傻子，否則他們斷然反蘇，這是毫無疑義。

七、日本在慘敗之餘，恢復獨立，才剛剛到達一年，其有一種反戰的情緒，自屬事理之常；她經過美國六年以上的管制，多少有一點厭美的心理，也毫不足怪；可是這都是一種臨時的現象，一旦理智回復，他們自然會知道立國非有武力不可，而在今天的世界想要找一個可以做朋友的與國，又捨美國其誰與歸呢？

八、日本的資本家，不缺少開明人物，如何和緩目前這種左傾的趨勢，他們一定會提出適當的辦法。

「我對於這兩種不同的看法，還是比較的同意於後者，我相信日本今後政黨的分野，可能大體上形成保守、急進兩大黨派，日共則終於無法立足，而遲早必為日本有知識的人民所唾棄。」

朋友們向我所提的問題，本來不止這三個，但這三個：即日本復興的成就，武裝重建的困難情形，和日本會不會完全赤化，却是比較重要的，現在，我只能姑作如上的這樣一種回答。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五月六、九、十三、十六日自由人）

## 斥中共入聯合國的傳說

這兩週來，國際盛傳中共將被許加入聯合國，我們固然不能相信上月份從美國傳出的托管台灣說與此事即有何種關聯，但證以我們出席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回到台灣以後的種種悲觀論調，確足以引起大家的一種不安情緒。

韓戰是快要打滿三年了，中共是聯合國所認為的一個侵略者，過去以聯軍的決心不能一致，造成一個勝敗不分；現在則由戰場的勝敗不分，造成聯合國內的是非不明；目前乃進一步，在這種勝負不分是非不明的情況之下，更醞釀出一個邀請中共加入聯合國的傳說！我們

認爲這件事影響未來整個世界局勢的變化者太大，不能不冷靜的加以考慮。

聯合國的理想，與過去國際聯盟的理想，本來是沒有什麼不同的，質言之，像這樣一種無所不包的團體，在根本上便只能站在正義的立場，作一種大體上的領導，而不能涉及若干的技術問題。聯合國即決定了中共是一個侵略者，此即所謂正義的立場，這個立場便萬萬犧牲不得。既責中共侵略於前，又歡迎其加入於後，這便不是制止侵略，而只是鼓勵侵略。請問站在聯合國的憲章與旗幟之下，而有鼓勵侵略的行爲表現，則聯合國還有存在的餘地嗎？

聯合國本來有所謂五強，即英美法蘇和中國，現在中國這一強算是弱了，而法國也事實上是一個挨打的國家，因此五強不復存在，而變成只有美英蘇三強。現在聯合國既只能退處於無爲，而必須另行召集所謂強國會議，即令把法國勉強湊上，而英美既有若干歧見，則法國的袒英、袒美，也就陷於左右爲難，以這樣一種陣容與蘇聯相見，不敗何待？聯合國失敗了，還可期待於強國會議，強國會議再失敗了，更期待什麼呢？以我們觀察，撇開聯合國而召集所謂三強或四強會議，這確是蘇聯所求之不得的，以蘇聯原無愛於聯合國，其所以一度退出而又終於不肯退出者，不過想藉聯合國作爲施展挑撥離間宣傳的一種工具，現在這一挑撥離間的工作既已漸次完成，試問她還要聯合國何用？因此我們覺得，以三強或四強會議去



除去英美間的歧見，乃爲事實的不可能，以這一會議來打擊聯合國，却是綽有餘裕。假定說使國際聯盟失其作用算是爆發第二次大戰的先聲，今日再使聯合國失其作用，誰敢擔保不是第三次大戰更趨於接近？以聯合國即不顧理想，究竟還有她的理想，以理想與理想爭，到底還有若干緩衝的餘地；一到強國會議，則一切只有現實，以現實與現實去碰，除掉短兵相接以外，試問還有什麼第二條路可走？所以強國會議的名義儘管是求和平，而實際的效用則只是促成戰爭。戰爭一旦實現，即聯合國根本瓦解，而所謂理想亦即完全毀滅，而一切一切便只有訴之實力了。

還有人以爲把中共拉進聯合國，乃至把中共升爲五強之一，這並不是蘇聯之所願，只要能實現到這一步，便是製造「亞洲狄托」的初步成功，這實在是一種太天真的想法；其實世界上有資格製造狄托的只有一個蘇聯，蘇聯自己不去努力製造，即第一個狄托也未必能實現，否則今日東歐的共產國家加入聯合國的已經不少，何以我們並沒有看見一個歐洲的狄托第二呢？

更有人以爲斯達林死後由馬倫可夫所表演的一套和平煙幕，也容或有若干的誠意，放棄了這樣一個機會，即無異自絕於和平，所以不妨姑試爲之以覘其究竟。其實我們看到消息報

和真理報同時答覆艾森豪威爾演說的一篇文章，則蘇聯立場之未肯加以一毫修正，乃洞若觀火。平心而論，蘇聯倒是有她的一貫的主張的，人以一貫的主張來，我乃以矛盾反覆的態度去作枝枝節節的應付，以此而想求得真正的和平，豈不太近於兒戲？

不過話雖如此，截至現在為止也還是有其補救的辦法：一、聯合國決不可輕棄其理想，參加聯合國的小國尤其不可輕棄其理想，小國只有在理想下，還可求得她們的生存，一談現實，小國即失其生存之道。二、希望艾森豪威爾和杜爾斯兩位，就他們就職前後的言論一加檢查，務求自己的行動，不過度的與自己的言論相反。三、英國確有若干火燒眉毛的問題立待解決，她如果得不到美國實際的助力，則英美間的歧見，即無法消釋於無形。四、希望台灣密切注意實際問題的解決，力改過去作風，要明白開會斷然無用，若干不能發言不必發言的人物，最好暫時停止他們的發言爲是。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自由人）

## 李承晚總統萬歲！

李承晚總統以堂堂正正的姿態，正式頒佈命令，釋放北韓兩萬以上的戰俘，我們千萬不可誤會他這一行為係出於一種臨時的衝動，實際他是經過十分慎重的考慮而後毅然出此的。

第一、他充分懂得今天共產黨所不斷放出的和平空氣，完全是一種虛偽的行為，其惟一目的僅在瓦解民主國家的反共團結。

第二、他看透了中共早已無力再戰，她不能不忍辱求和，以求得一時的喘息。

第三、證諸三年來的事實，他已絕對無法信任美國的空言保證。

李承晚總統萬歲！

第四、他懂得，南韓確實是參加聯軍序列對共產黨作戰的一個主要國家，從普通的意義上看，他的軍隊原有服從聯軍統帥的義務；可是聯合國之發動援助南韓，爲的是予侵略者以打擊，並求得韓國的和平統一，現在既然回轉頭來與侵略者言和，即不啻實際上放棄了原來的目的，韓國也將隨時繼續被人侵略而永無所謂和平統一的一天！李承晚總統已思之爛熟：他什麼命令也應該接受，他尤其不能輕於放棄在過去曾愛護過韓國的任何友邦，惟獨站在大韓國的立場，命令他出賣祖國，同時貽三千萬韓國人民以百世之患，他到底無法忍受！

第五、他把一個維護韓國獨立統一的堅決立場站穩了，本來可採的步驟是很多的：一、毅然退出聯軍，單獨作戰；二、即令戰敗，一時的放棄整個韓國以徐圖恢復，亦在所不惜；三、果然有不揣冒昧的國家真的要派武裝部隊去執行監視俘虜的工作，即斷然以武力對付，甚至可在事前宣布與印度這類的國家斷絕國交，且看好管閒事的尼赫魯先生之類怎樣！四、不顧一切，釋放所有的俘虜，包括任何反共的俘虜在內，又看毛澤東怎樣！五、縮小範圍，把北韓一部分的反共俘虜釋放了再說！

現在李承晚總統所採的，僅僅只是一個最輕鬆的步驟而已，可見他事前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逼到他忍無可忍，然後才斷然出此一着，其態度是穩重的，其心情是悲憤的，其行事

是感天地而泣鬼神的！

截至現在爲止，我們還只看見東京的聯軍總部十分着慌；華盛頓異常震動，幾乎手足無措；邱吉爾首相啣着他那枝烟斗，吐了一口氣，也覺得事態「相當嚴重」！莫斯科與北平怎樣呢？假如他們真正是愛好和平，他們對李承晚總統的這一行動，便只好忍痛屈服，即丟盡面子也在所不惜，否則惟有顯出他們侵略好戰的真面目，把過去兩年來所商談的一切一切，一筆勾銷，繼續再戰！

戰！這是大韓國的勇士們所求之不得的！是革命的老鬥士李承晚總統所求之不得的！他們爲了他們的祖國，爲了抵抗侵略，他們已經堅苦的作戰了三年，南韓百萬青年的血，已經流遍了整個韓國的國土，行且在這個血染的國土上，開遍自由之花，它們將永遠照耀着人類自由的歷史，它們將永遠給予爭取自由的人們一種最大的鼓勵！

我們承認毛澤東是「不信邪」的，他也是儼然以「千古風流人物」自命的，既「不信邪」，又要做「風流人物」，便不要縮頭，惟有一直的打下去，再打三年，且看又是如何；假如只是一個銀樣蠟槍頭，居然不敢不爲這位革命老前輩所屈服，那便太丟臉了！

同時，我們也以十分的誠意期待於艾森豪總統：

李承晚總統萬歲！

第一、李承晚總統採取這樣一種步驟，他是維護人類的正氣，維護人類的自由，他也是愛護他自己的國家，不僅絲毫沒有錯，而且完全是對的，艾森豪總統應有這種認識。

第二、什麼原子彈，什麼強有力的海陸空部隊，……這一切一切都是次要，美國今天最要緊的一着，乃是伸信義於天下，以博得全世界的同情，艾森豪總統應有這種信念。

第三、今後處理一切國際重大的問題，應該採取絕對公開的民主態度，任何大國的權力都必須有一定的限度，絕對不能為所欲為，艾森豪總統尤其不可缺少這種抱負！

我們為人類的自由歡呼！

李承晚總統萬歲！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自由人）

## 日本願再使時機坐失嗎？

從整個世界的各方面加以透視，並從當前所發生的種種，然是悠悠忽忽，錯過大好時機，不能乘時崛起以提高亞洲的

照情理上說，中國人曾吃過日本軍閥半個世紀的苦頭，該沒有比中國人更感到迫切需要的了。可是，今天除掉擁有的已從事了三年對韓侵略的中國共產黨以外，所有愛好自由的及武裝重建，幾乎莫不以好意迎之；此何以故？我們決沒有

日本願再使時機坐失嗎？

也決沒有意思鼓勵她再度發揮對外侵略的野心，實實在在，爲整個的世界着想，尤其爲亞洲的一局部着想，我們總覺得日本確實有十足完成自衛力量的必要，也確實有排除障礙以完成其和平發展的必要。

照理說，我們自身有一大串的問題須待解決，我們原不必「捨其田而耘人之田」，來爲日本借箸代籌；可是，儘管今天多數日本人對中國問題漠不關心，一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又建立在一種錯誤的假定之上，但我們依然覺得中國問題與日本問題在實質上爲不可分，中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則日本問題的處理必將陷於治絲益勞，甚至終於找不出一個合理解決的途徑。

日本今天依然有大部分的人，對再武裝抱持一種反對或搖擺不定的態度，這決不是偶然的；分析他們的心理，要不出下舉的種種事實：

一、戰爭的結束，究竟還不到八年，一部分人對於過去軍閥的顛覆招禍，實在是談虎色變，這種創鉅痛深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二、最近幾年日本經濟的漸趨繁榮，一半固由日本人的自身努力，一半亦由時局給了她良好的影響；但不幸這種一時的景氣，却招致了一部分工商界的錯覺，他們幾乎忘了自身的



根本弱點，以爲只要維持着某種程度的和平，他們的事業便不難扶搖直上，而不會遭遇難於克服的困難，他們誤會再度武裝足以擾亂他們的景片前程，因而他們對這件事始終不能十分起勁，或疑信參半。

三、共產黨的和平攻勢，不能說沒有影響：真正的日共，自然也只能和他們的祖國蘇聯一鼻孔出氣；其餘淺薄的知識分子，喜新好弄的幼稚青年，昧於事實，不肯深思熟慮，對國家又缺乏責任感的投機政客，也往往容易而爲這種和平攻勢所迷惑；他們幾乎是有意或無意的在爲共產黨張目，而認日本的重整武裝爲多餘。

四、也還有一種自命穩健的老成人，他們覺得蘇聯的力量不可侮，默察蘇方在遠東的一切軍事布置，又顯然以日本爲主要的對象，如果日本在此時忽視了這一危險的環境，即大吹大播的來整軍經武，豈不適足以招亂速禍？

五、最後我不能不說到美國。截至現在爲止，美國人始終還只有一個反共的原則，對於如何反共的技術，或者說她對於一個環球反共策略的安排，却依然是捉摸不定！在過去的七年間，美國在日本的一切措施，在一般日本人的眼中，只是毀譽參半，這由於他們幫助別人的心情，超過了尊重別人的心情，而又不能虛心去理解別人的心理，因而引起了許多不必要

日本願再使時機坐失嗎？

的誤會；再加以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又把反美確定爲他們的基本政策，更從而多方煽動之，以致使得多數的日本人誤解日本的再武裝只是美國人的需要，而並不是日本自身的需要，因此乃召致他們對這件事的一種懈怠，甚至於加以阻擾。

平心而論，吉田政權始終是依存於美國而繼續的維持着的。吉田本人乃至他的重要閣僚如緒方尚崎之類，他們對於再武裝的一種想法，原與鳩山重光蘆田等人是沒有多少區別的，不過，一方他們在等待着美國一個真實的態度，一面他們也確實是有意採取這樣一種模稜態度，藉以緩和對內對外的刺激，以求得更能穩定他的政權。以現實的觀點來說，我對吉田內閣的這一態度，毋寧是不願加以反對的，不過在這裏却可能包含了一個重大的危機：大凡一個政府過度的看重了它對於政權的維持，而忽視了國家的大計，原難保不給予共產黨一個巧於運用的間隙，而促成它自身的腐化與怠惰；因爲共產黨所怕的只是你的堅決，而最歡迎的便是你的模稜，一經模稜，他們便不愁你不會不流於妥協與遷就。你一經妥協遷就，他們蹈瑕抵隙的技術，乃可以運用裕如，而達到他們所要達到的某種程度的目的。

日本今天已儼然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日本人儘管表面上是謙讓未遑，但世人並不會忽視她所處的地位的重要；可是以實力未充之故，乃至對當前亞洲所發生而於日本有切身利害

的重大問題，例如目前因韓戰問題所引起的紛擾，雖欲堂堂正正作一正面有力的發言而不可得，不得已，乃只能一再表示對南韓的復興願加以相當的助力，其缺乏責任感與軟弱無力，實不令人失望。反過來說，如果日本不悠悠忽忽虛度最近這兩年的時間，已擁有二十萬以上的陸軍，益以差足自保的海空實力，與美國求得一切實合作之道，對亞洲其他反共國家，更能保持一較為密切的聯繫，則以今天敗象畢露的蘇聯與中共，固不敢對日本加以任何威脅，即整個亞洲的局面，何至於聽人擺布而陷於目前的這樣黯淡！

老實說，以最近所表現於國際間的種種事實和言動，實在是以一種赤裸裸的脫衣舞姿態出現，什麼正義，什麼理想，什麼共同安全，依然是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其惟一可恃的還是自身的實力，日本不着眼於這一根本，而想在這種虛偽的和平空氣中以確保自身的安全，并求得其應有的發展，致使時機坐失，將來終有追悔莫及的一天！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自由人）



## 大家照照一面歷史鏡子

時局真無可談，只好談談故事：

去今一百零四年以前，即一八五〇年，亦即清道光三十年的六月，洪秀全起兵於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

這是中國歷史一次稀有的亂子，時間經過一十四年，蔓延的區域牽動了一十七省，洪秀全建都南京，也居然延長了十一年以上，尤其奇怪的，乃是把這次亂子平定下去的並不是那班能征慣戰的武將，而是一羣無拳無勇的書生！

在「太平天國」這一幕大亂子以前，中國已經遭遇過一次空前的外患，即歷史上有名的鴉片戰爭，其結果則造成一個五口通商之局。在中國內部這一大大紛亂的過程中，外患不僅沒有中止而且越來越激烈：咸豐七八年之交，我們的東南沿海繼續為外力所侵擾，九年十年，外力更侵及北方，而英法聯軍之攻破天津北京，咸豐帝被逼出走熱河，也就正是咸豐十年的事（一八六〇），當時清廷的命運，真是不絕如縷！

關於太平天國的眞象，自南京被湘軍攻破以後，以迄清末革命運動的再起，世人大率得自口碑，其正式的文件是很少能看到的。清末的革命運動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因為洪楊也有排滿的一義，於是太平天國的價值，在這班新興革命者的眼中乃驟然抬高。其實這裏面包括一個很大的矛盾：

孫中山先生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的宣言說：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五族的關係既是如此密切，五族的地位又是如此平等，那麼，中國的皇帝何以只有老大可以做，老二老三便一定做不得呢？不過中山先生革命主張的重點畢竟在政治而不在種族，

當時其所以提出「驅除鞑虜」的一個口號，只是爲了革命進行的一種方便，同時也是爲了要給予保皇黨一個正面打擊，而他真正的宗旨，乃在「創立民國」，與洪楊那種充滿帝王思想的造反是截然不同的。更說得明白一點：爲了推倒滿族的帝制，建立一個五族平等的民國，如中山之所爲，這是當得起革命兩字的稱號的；推倒一個滿族的皇帝，依然捧出一個漢族的皇帝，如洪楊之所爲，這實在是沒有什麼革命的意義。

入民國以後，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乃陸續出現，尤其以近二十年左右出現的更多，甚至連李秀成一篇供辭的原文，過去爲會家收藏着的，最近也居然印出與世人共見了。爲什麼能辦到這樣？原因是很簡單的：

- 一、清朝亡了，一切忌諱都已解除。
- 二、因爲近幾十年內亂外患的刺激，引起中國史學界對近代史研究的特別注意。
- 三、保存在外國圖書館一部分的材料，也爲這般熱心的研究者抄錄或影印回來。
- 四、近年中國學術界有一種奇怪的風氣，便是凡事都要打翻案，凡事都要重新估定價值，因此對失敗的洪楊一方，總想找出他們的優點；對成功者的曾胡左李一方，也總想找出他們的錯處。

五、近年的中國共產黨，對太平天國這一幕又另有一種牽強附會的看法，因此他們更樂於把這些有關的資料，大量印行。

在我看來，洪楊依然是必討之賊；其本身原也具有必然失敗的因素甚多；如果承認中國五大民族原來平等，滿族在中國做皇帝也沒有什麼稀奇；或更承認清朝的十個皇帝並不比過去漢族的皇帝更壞，則會胡左李等在當時所保持的立場，也便沒有什麼錯誤；甚至就在今天看來，他們也依然沒有什麼錯誤。

現在我所要研究的，便是洪楊之所以敗，清廷或會胡左李等之所以勝，其真實的原因究竟在那裏？這個話說來太長，而且我自己也還在繼續研究中，現在我只想就勝敗兩方所得到的一些簡單觀點，分別列舉在下面，以供大家參考，我相信，就為研究當前的時局，這些參考資料也並不是完全無用。

先說明洪楊等之所以失敗：

一、洪楊這羣人，大率都是土包子，並沒有多少知識，他們的種族觀念，並不比他們的帝王思想更為濃厚。說他們真正有什麼平等想法，或甚至說他們「發動了廣大農民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鬥爭，並且擔負起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任務」，如中國共產黨之所



云云，當然更是向壁虛造，白晝見鬼。

二、洪楊等的組織，原由中國下層社會的祕密結社脫胎而來，再加上一種由他們改造過的外來宗教，他們這種欺騙手段，僅足以愚弄一般比他們更爲愚昧的下層份子，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當然無效。他們因爲這種方法在初起時收了小效，一直進到長江流域，也依然不肯修改，甚至還要變本加厲，既然得不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同情與贊助，不敗何待？

三、中國的傳統文化，也許有它的毛病，可是根底甚深豈是洪楊等那一套淺薄無聊的東西所能代替得了，而洪楊等居然胆大妄爲，對中國固有文化摧毀之不遺餘力，其足以激怒一般中國正統派的讀書人起來和他們拚命，自是理所當然。日本某史學家說，湘軍對太平軍之戰，在某一意義上乃是一種宗教戰爭，不爲無見。

四、依據中國歷史的教訓，南京根本不適於建都，即偏安也往往不能長久，太平軍一到金陵，便迷戀着江南的子女玉帛，進取的雄心，已嘎然中止。其實當時北方的社會比較南方更爲貧苦，潛伏的危機也比南方更大，假定他們不甘小就，能一鼓作氣，以全力直搗北京，則清室之亡，便可能提早六十年也很難說，惜乎他們見不及此。

五、咸豐六年八月金陵軍會的內鬨，表面上只是洪楊的爭權，據我近來的研究，覺得羣

會間似還有一些桃色的糾葛。自經過了這一幕以後，洪秀全覺得除掉他的親屬和親信以外，已無一人可以信任，石達開固已別樹一幟，甚至連對一個忠憤耿耿的李秀成，也都不免帶上幾分猜忌，規模的狹小一至於此，更何能與會胡那班廓達大度的人物去比權量力？

其次說明清廷或會胡左李等之所以勝利：

一、咸豐帝不是一個糊塗的皇帝，當時的清廷確實還有人才，我們看他們應付這一次亂子，自始至終，可以說並沒有犯什麼重大的錯誤，而賞罰尤其分明，例如青嬰、何桂清等的殺頭，賽尙阿、崇綸、楊需等的罷免，以及胡、江、羅、左、李等的不次擢用，都可看出當時他們那個政府還很像樣子。尤其文慶肅順等人，他們居然懂得滿人的暮氣已深，非特別重用漢人不可，僅此一點，已可看出他們確已立於不敗之地。

二、曾國藩這個人，他從二十五歲起，便已在北京讀書；從二十八歲成進士以後，便一直在北京作官，留心當世之務，同時還和倭仁、唐鑑、吳廷棟等這班人，研究宋儒的義理之學。他雖以一種儒家的姿態出現，但他却天然富有一種法家的精神，我們看他居官、處友、處家庭，真是無處不表現精力充沛，一切有條不紊。他關於這一方面的修養，足足做了十五年以上的工夫，所以一旦起而當大難之衝，儘管是遭遇種種人所難堪的困難，但他究竟能度

過無數的難關，而卓然有以自立，他在當時其所以取得一個惟一領袖的地位，夫豈偶然？

三、曾國藩這一羣人，並不只是一種泛泛的結合，他最初的一個班底，大率都和他有鄉誼、友誼、或師弟等等的關係。並加上他求才若渴，用人惟賢，凡見某人有一技之長，即贊不絕口，同時又有服善的雅量，最善於以他人之長，補己之短；我們看薛福成所記他的幕府人才之盛，真是蔚為大觀，豈是一般具有小家子習氣者所能比擬？更豈是洪、楊輩所能望其項背？

四、當太平軍由湖南衝出長江的時候，真是勢如破竹，那一種高張的氣象，豈是一般老朽昏庸的人物所能應付得了？現在一般人讀會胡左李等的著作，大家總以為他們出來抵抗太平天國的時候，年齡已經很大，實際並不如此：曾國藩以丁憂侍郎初出在長沙辦理團練的時候，其年齡不過四十二；左宗棠參與張亮基駱秉章幕府的時候，不過四十歲出頭；在太平軍末期他到浙江去獨當一面的時候，也剛剛才到五十；江忠源以安徽巡撫死在廬州，是四十二歲，胡林翼以湖北巡撫死在咸豐十一年，也才到五十歲；李鴻章於同治元年到上海去收拾江蘇，還是一個三十九歲的少年；至於羅澤南這位老諸生，似乎是年齡要大一點，可是考他戰死武昌之年，也不過五十而已。以少壯對少壯，以新人物應付新事變，這在當時的漕清政府

確實是做到了的。

五、凡一件事之所以成功，首先必得抓住要點，曾國藩之所以能戰勝太平天國，關於他接受郭嵩燾江忠源的提議，以全力創建水師，確實是一大關鍵，否則一條長江，太平軍可以橫衝直撞，曾軍必陷於束手無策，那裏還有成功的可能呢？

六、與人共功名是一件難事，與多數年相若道相似的人共功名尤其是一件難事，曾國藩有過人的修養，他雖以一身當萬難之衝，可是他的神明始終不亂，他總覺得除現世的功名以外，他還另有千秋，因此他對於人才的進退，功過的賞罰，始終是一秉至公，能使人樂為之用，雖死無怨。左宗棠是和他鬧過意見的，但等到會死了，左還是佩服他的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李元度是受過他的制裁的，但會還是念念不忘於李，李亦未嘗忘會；李鴻章也是受過國藩的挫抑的，但李却始終受着會的感化，當他攻下蘇常的時候，本已奉命直搗金陵，但他看見曾國荃苦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乃終不願去奪他的垂成之功，而屯兵不進，以表示退讓，其結果則淮軍成了湘軍的繼起，李鴻章也成了曾國藩的替人，而一個垂亡的滿清，也總算因此又延長了五十年之久！

上面關於雙方成敗的十一點，我不過就一時想到的隨便談談，實際也為篇幅所限，不能

盡量的暢發，然而成敗之故，豈不也已經大略可觀？今天的時局怎樣呢？馬恩列斯與天父天兄，固同爲一種騙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劉伯承之流，比起洪秀全、楊秀清、陳玉成、李秀成之類，實際也沒有什麼高明之處，可是亂子却是比起太平天國要大得多，情況也複雜得多。自由中國既以反共復國號召國人，也以此昭告世界，可是當日清廷和曾胡左李等的種種措施，是不是也值得我們加以借鏡呢？最後我要說幾句老實話：我對於自由中國登用人才的標準，培養人才的方法，以及黨派的成見，始終是不大了解的！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十日自由人）



## 中共攻台的空大鼓

中共並沒有力量可以攻取台灣；在事實上她也無攻取台灣的必要；果真要這樣做，並不能得着他們主子的支持和贊許。可是在越戰停火以後，中共攻台，攻台之聲却已高唱入雲；如朱德粟裕等關於這件事的發言，都是「語焉不詳，擇焉不精」，我們要研究中共何以於此時突然發出對台灣的「紙面攻勢」，當然仍得以六月二十三他們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作為分析他們這種心理的一種根據。

「人民日報」這篇社論，從大體說來，好像是異常凶狠，一如中共平日所發表其他凶狠

的文字一樣，但稍一加以分析，却立即發現這篇東西實在做得非常「蹩腳」，被指定的執筆者，至少應該痛打屁股一百。

我們從這篇文字所得的印象，並不是在說明他們決心攻台，而僅僅足以說明他們對美國實在是不勝其恐懼，而不能不裝出一副攻台的凶狠面孔，對美國再來一次恫嚇。

他們在此時發出攻台的叫囂，其願意達到的主要目的不外三點：

- 一、藉攻台嚇退美國，不敢和台灣簽定一個「中美共同安全雙邊協定」。
- 二、藉攻台嚇退美國，不敢積極從事組成一個中、日、韓、泰、菲五國足以致中共死命的「太平洋反共軍事同盟」。

- 三、藉攻台嚇退美國，使她不敢繼續阻擾中共闖進聯合國。

此外，美國在台擴大軍事代表團，加強台灣地面部隊的裝備，擴大台灣的海空實力，以及加大對台灣的經援，這一切一切，當然都是中共所痛心疾首，而不能不出以恐嚇慣技，以求得這個形勢能逐漸趨於和緩。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研究的，究竟這種恐嚇，能不能對美國發生相當的作用？

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中共的恐嚇伎倆僅僅止於空言，這是把美國嚇不倒



的；反之，如果除空言以外而繼以行動，則美國可能要加以考慮。

最近美國已給了中共一個有力答覆：即「中共攻台，美國必斷然加以抵抗。」

可是這裏的所謂「斷然抵抗」，與中共的所謂「一定攻台」，俱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彼此彼此，都不過是一種空言而已。美國對於越南問題，過去何嘗不是激昂慷慨表示斷不容許共方的侵略力量，進入這一東南亞的重要地帶？可是演變到最後關頭，美國却終於袖手，李承晚最近在美國揮淚陳辭，希望美國協助南韓以武力統一韓國，但美國一般的反應，尤其是官方的反應，却似乎是異常冷淡！美國對韓越兩個問題的態度如此，我們說美國一定可以效死於台灣問題，或進一步說美國可以無條件的以武力把自由中國送回大陸，誰有勇氣敢於作這種太不可靠的假定？

有人說：中共對台灣，如果先之以轟炸，繼之以傘兵，湊合十五萬噸的海軍，精選十萬有作戰經驗的地面部隊，載以無數的登陸艇與機航船，居然向台灣施行一次猛烈的攻擊，同時北起旅大，南達榆林，更藉重老大哥的潛艇優勢，遙壯聲威，兼防萬一，這何嘗不是對台灣絕大的威脅？

但我敢斷言，中共依然沒有勇氣敢於作這樣一次試驗。

一、今天大陸的財政情形，已經成了油乾燈燼的死症，籌備攻台非有大宗的金錢準備沉到海底去不可，中共的錢從何出？

二、美國對韓越問題，採取如今這種態度，雖說已經無可原諒，可是在美國究竟還不是絕對沒有苟安的餘地。因為美國即令不能保持韓越和東南亞這條第一線，可是北起北海道，南達馬尼拉，畢竟還有這第二線可守，如果從第二線的中間，再把台灣抽出，這便不只是放棄台灣，實際是同時放棄日非，這樣一來，美國除退到珍珠港去靜候挨打以外，更有其他的何種辦法？把美國的孤立精神，發揮到從整個的亞洲退出，即令艾森豪政府，爲其盟國的浮言所動，確實有一種苟安心理在那裏暗長潛滋，但這樣一個冒天下大不韙的丟臉舉動，究竟不是今天的共和黨政府所敢於採取，這便是中共最沒有把握的一端，也就是中共攻台的狂嘯所以止於空言，而決不敢採取行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三、明知空言無效，然而還要敲着這一面空大鼓，我很懷疑共產黨又在賣弄他們的另一手法。兵法有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懂得打仗的，原不一定戰戰都打硬仗，中共對韓戰比較是打的硬仗，對越戰已經是虛，對攻台當然更是虛之又虛，無非要把這一緊張局勢不使之歸於冷卻，而別生事端，以求達到他們的另一目的。現在已由蘇聯發動召集四強外長

會議，而以中共爲觀察者，以爭取西歐團結的澈底瓦解，使西德建軍成爲不可能，只要把西歐對蘇聯的這一威脅解除，掉轉頭再來解決亞洲問題，豈不更有把握？

我在這裏說明中共無力攻台，不要攻台，也不致攻台，並不是希望台灣因此就可以流於鬆懈，兵法說：「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天台灣的大願在反攻大陸，並不在死守台灣；要反攻大陸，並不是單單在軍事上要與中共爭高低，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與中共比優劣；老實說，今天台灣的這兩個反攻條件：軍事的、政治的去理想還甚遠甚遠，而政治且不如軍事遠甚，提心弔胆還來不及，那裏還有鬆懈的可能呢？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七日自由人）



## 注視中共的「填海工作」

關於所謂「解放台灣」的宣傳，中共已整整繼續鬧了一個月，儘管花樣是形形色色，內容却是平平凡凡，空空洞洞。今天早晨起來看報，連偽政協所謂六十八個人的發言，也居然不長不短排列得整整齊齊在報上公布出來了。這一大羣早已沒有靈魂的傢伙，儘管是千篇一律的在高呼着攻台，攻台，但我爲共黨難爲情的，乃是扯下了這樣一個瞞天大謊，究竟準備如何收網！

中共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無比的殘酷政權；他們爲了討主子的歡喜，可以「指姦爲姦

指盜爲盜」的屠殺中國的善良老百姓到一千萬以上；他們爲了討主子的歡喜，可以平白無故去干涉韓國的內爭，不惜用最凶惡的手腕把中國二三百萬的優秀青年，丟進韓戰場的火海；他們爲了討主子的歡喜，也可以平白無故去捲入越南的內戰，爲越盟這一反叛集團去撐腰；他們爲了討主子的歡喜，更可以把平日用惡毒手段搶奪得來的大宗糧食，運往蘇聯和捷克，不惜讓中國一億以上的老百姓在滔天洪水中載沉載浮去活活餓死，而絲毫無動於中！

現在他們居然在高呼攻台了！爲了完成他們祖爺爺爺爺所提出世界革命要「從亞到歐」的這一使命而要攻台；爲了打倒「美帝」孤立「美帝」而要攻台；爲了向主子多討幾個喜錢多得一份賞賜而要攻台；爲了證明毛澤東是不折不扣的「千古風流人物」而要攻台；爲了幫助他們的「周總理」到國際上去再搶幾個鏡頭而要攻台；爲了要打進聯合國和一般帝國主義者去「排排坐」而要攻台；爲了加強尼赫魯貝萬等這羣寶貝的誠心向化而要攻台……。

攻台的理由可以像這樣一直數上去數到無盡無窮，攻台使命的偉大可以偉大到比一顆芝麻還要大兩寸半，那末，中國的人民既是多到「六億」，便再驅使五萬到一千萬到台灣海峽去完成這「填海工作」，又算得什麼呢？

在韓戰中當百萬壯丁投入火海燒得焦頭爛額哭天無路的時候，毛澤東正一股子神氣，

口含一枝「美帝」的香烟，坐在西山上面乘涼！假定今年冬天，果然攻台的戰爭發動，儘管第一回合，便可能有十萬二十萬的中國青年「冤沈海底」，毛澤東可不是依然可以坐在南海的「寶座」上吟詩、喝酒、賞雪！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本來，所謂「風流人物」，眼看着大多數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時候，照例是要拿着一柄白紙扇兒輕輕搖動，去完成他的那一份風流工作的！從前中國有一位風流皇帝嬴政，以他那一種韃笞六合的雄風，等到他怕死的時候，也不過打發了三千個童男童女到海外去尋找「不死之藥」，今天的「風流毛」居然可以發動百萬以上的壯丁填海，您說他的風流並不超過秦皇漢武，那豈不是黑天的冤枉？可是美中依然不足：從前的嬴政劉徹，他們所要的究竟是本店自造的真刀真槍，今天「風流毛」所用以壯胆的百艘潛艇，一千架米格機，却十足道地是蘇記工廠的出品；就照中共的說法，說「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絕對不容許他人干涉，難道用美國的深水炸彈去粉碎這一百艘蘇聯的潛艇，用美國的軍刀機去擊落蘇聯這一千架米格，也算是干涉了他們的什麼「政府」？

提到中共「優秀的」宣傳技術，其可笑還不止上面所謂「干涉內政」的一端：你們說「

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要說說就好了，要「解放」就「解放」好了，何必還要引經據典，一定要抬出一九四三和一九四五這兩份「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幹嗎呢？這兩份東西，原來正是你們所要打倒的「美蔣」所合作出來的兩個文件，這上面所提到的明明白白是「中華民國」，決不是你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時候你們的「人民共和國」還在延安窯洞裏面懷胎，可見台灣的歸還，只是歸還「中華民國」，與你們的「共和國」有什麼相干？你們連「中華民國」四個字也早已一筆勾銷，現在忽然從窯洞裏攆出李達，說台灣本來就是我的，這豈不等於「脫了褲子打老虎」？

從前的日本軍閥要炸珍珠港，在轟炸前的一分鐘，美國在珍珠港的艦隊還在睡裏夢裏；他們要炸英國的威爾斯親王號，英國水兵在事前也全不知道；現在中共「解放台灣」，却打算先做半年的宣傳，給予台灣和美國一個從容準備的機會，如果說，一隻真要咬人的狗是不大歡喜叫的，而中共要「解放台灣」，却先要吠影吠聲的大叫一陣，這可看出共產黨畢竟比起日本軍閥客氣得多啊！

可是，話仍得說回頭：「毋恃敵人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天台灣在八百萬的人民中，至少應該有有組織的兩百萬武裝民衆，不要過分輕視了扁擔、鋤頭，要知道對付那些天



空掉下昏頭昏腦東張西望的傘兵，就是扁擔鋤頭也還是有很大的作用哩！這些有勇氣敢於在海灘，在空地，在機場冒險跳下來的青年，至少都是中華民國的勇士，你們在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以後，應該親切的款待他們，教育他們，感化他們，一如接待你們自己的子弟一樣！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自由人）



## 以行動求團結

「和平」並不是一個怎樣新鮮的調子，可以說自有人類以來，戰爭即沒有真正的停止，同時祈求和平的願望，也隨時隨地由人們在不斷中表示。

和平乎，戰爭乎，真不知道古往今來多少的志士哲人爲這一大矛盾問題絞盡了他們的腦汁；更不知道多少的顛連無告者在這一大矛盾問題的起伏中作了犧牲。

說好戰是人類的天性，未必盡然；說祈求和平爲人類一種過分的奢望，也言過其實。然而自有歷史紀載以來這短短的幾千年中，理想却終於是理想，而事實依然是事實。

戰爭的目的在求生存，至少在解釋上總是求生存，但戰爭的結果是死亡和毀滅；戰爭的進行是因爲一個問題或若干個問題已經到了非訴諸一戰不能解決，因而不得已才運用戰爭手段以濟其窮，但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從來沒有因戰爭而使要解決的問題得永久或真正的解決，反之，隨戰爭而引起的新問題，却是愈趨於複雜而且擴大。

「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由這「定于一」的觀念所推演，這也許是古今中外若干戰爭所以引起的主要原因之一，照孟子的解釋，像在他當時那樣一個列國分爭的局面，只要有一個不歡喜殺人的君主，便可以把它安定而統一起來。其實孟子這一個簡單的看法，乃與人類的歷史事實完全不合：我們知道，在過去任何一個國家的統一，幾乎是沒有不經歷一段戰爭的過程的；要戰爭就得爭城爭地，要爭城爭地，就得殺人盈城盈野，說一個不歡喜殺人的人而可以做到統一一個國家的事實，我實在舉不出這種例子。

在孟子時代的所謂「天下」，本來只是指他們所知道的「中國」而言，他之所謂「定于一」，當然只是指統一中國而言；羅馬人蒙古人是不是真有統一世界的觀念？我想就有也並不怎樣清晰；日本軍閥強調的所謂「八紘一字」，只能解釋爲導源於中國的一種浪漫大同思想；即希特勒所夢想由他來奮鬥的目標，也僅僅是一種誇大狂的發揮；可是雖然如此，却已

經爲人類召來了莫大的災害，何況是今天的蘇聯呢？

自從有了列寧和斯達林的共產黨，他們居然把一個共產極權的國家建立了三十七年，世界一切的動亂，幾乎無一不是導源於莫斯科。有了東歐一串的衛星國，再加上半個德國，已經使得全歐洲人無法安枕；自從她扶助中共搶奪了整個的中國大陸，再加上半個韓國，半個越南，更使得全亞洲人皇皇不安；果然等到歐洲全部陸沈，澳非固不必談，即美洲又何能倖免？現在蘇聯已經有計劃的發動了所有共產國家，一致集矢於美國，其意若曰，其他的國家還可以和他們和平共存（當然是一種欺騙），惟獨對於美國的搗亂，則絕對的不能放手。他們誠然知道，以美國的人力、物力，以及她領導國際的威望，確足以成爲他們一個惟一的勁敵，故不惜以全刀來和美國週旋。以蘇聯的立場來說，他們似乎已懂得中國人所謂「擒賊擒王」的道理，其選擇美國作爲他們第一個必須打倒的對手，在他們是並沒有錯的。

我們在這裏不可忽視：自從人類有了一個原始的統一世界的幻想以後，認真在有計劃的進行，而且得有初步成績，足以煽動一般野心者向這一方面盲目邁進的，莫如今日的蘇聯。尤其在她控制了整個中國大陸以後，更加強了她這種侵略的凶焰。以陰謀，以武力，三十年繼續不斷來毀滅人類和平理想，擾亂人類生活秩序的，蘇聯實爲禍首罪魁！而第一個最大的

幫凶，便是中共！中共所控制的土地與人力，實數倍於蘇聯其他衛星國的總和，亞洲有了一個中共，蘇聯才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這是蘇聯三十年以上，運用陰謀詭計所得來的一個成果，他們公開的，祕密的，下了許多工夫，並不是完全由於僥倖。像這樣一個漫長事實的演變，至今還爲全世界若干近視眼的政客們所忽視：他們總以爲對中共和緩，即可離間中共與蘇聯的交親；他們相信中共除「一面倒」以外，總也還多有一點國家民族的觀念；他們以爲即令中共經濟在蘇聯的壟斷之下，總也還多少有生意可做；他們甚至還相信，中共終有改絃更張的一天，決不會甘心樂意永遠做蘇聯的一個侵略工具！艾德禮貝萬如此想，尼赫魯如此想，一部分左傾的日本人如此想，甚至蘇卡諾也如此想，以號稱留意世界大勢的政治人物，甚至直接自有政治責任的人物，其淺薄無聊一至如此，這真是一件令人悲觀扼腕的事。

可是大勢的挽回，仍然決於美國，我們在這裏願意斬釘截鐵，向美國提出如下的建議：要搶救整個的世界，必須首先搶救亞洲。要搶救亞洲，必須首先直接打擊中共。

中共與蘇聯的分合，只有在中共直接遭遇重大打擊的時候蘇聯所持的態度如何一點上，才可以明白的看得出來，保持現狀不變，中共只有繼續向蘇聯一面的倒下去。以大力直接打擊中共，可能不需要長期的戰爭，更可能不必動用美國地面的部隊。

今天整個中國大陸，充滿了不安的情緒：真正的老百姓是反共的；大部分爲自救向中共靠攏的分子，是隨時在動搖中的；因爲蘇聯的領導錯誤，中共的高級幹部中，已經有了無數的不平分子（周恩來就是一個）；中共以外的大多數人民，他們富有國家民族的觀念，對蘇聯無理控制，他們衷心的厭惡。

中國人具有加速實現民主政治的決心，決不能容許其變質或延緩，在與中共進行戰鬥的過程中，中國大陸可能短時期復陷於分裂，但時間決不會太長，而且事實上不僅無害，還可能有益。

美國要求民主國家的加強團結，只能於行動中求之，這次聯合國以壓倒的多數把中共摒諸門外，便是因爲美國對保衛自由中國採取了積極行動。

英美兩大國在平時可能有歧見，在戰時決不應有歧見，這次周恩來在所謂「人代會」看見英國對東南亞公約以及在聯合國和美國完全合作，乃發出英國對中共「不友好」的悲聲，這僅僅是周恩來一個失望的開始，還有更大的失望在將來。艾德禮貝萬等這次對中國大陸的訪問，以爲可能發生良好的影響，但實際所得到的是英美合作的加強，是「不友好」三個字的冷酷批判，碰上一鼻子的灰，活該！

根據人類數千年的歷史，戰爭是可怕的，可厭惡的，但是無可避免的，你越想避免，那個莽惡的戰爭之神便越會向你招手，避免無數次的小戰，其結果可能召來一次空前的大戰！中國大陸可能有部分的毀滅，中國人民還要繼續的死亡，命運是無可逃的！

最後我要回到我開始所說的一段話：人類是樂分治而厭惡統一，「車同軌，書同文」，使全世界都說俄國話，全人類都向蘇聯歸化，這將成爲一個「黑漆一團」的世界！像俄國這樣一個在政治文化上極端落後的國家，不僅不能容許她去進行統一世界的企圖，而且不應容許她繼續統治像他們本土那樣一個大國；把一件有刀的武器握在一個愚昧而精神失常的人手上，毫無疑義是一定要鬧禍的。以俄國的歷史、文化、地理、民族性，……：無論她如何變化，他們將永遠只能實行極權政治，以一個土地龐大而人口衆多的大國而實行極權，這實在是人類和平的一大威脅！在經過最近一次的大戰以後，我們應該依據蘇聯的地理、民族、等等，而把她分成五十個以上的小國，他們只有再經過三百年的分治，才會有資格進入於那時候的文明國家之林！也只有這樣做，人類才有可能得到一時期的喘息。

但是，我依然不相信戰爭是可以根絕的。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自由人）



## 「鬥智」與「鬥力」

——爲四十三年的國慶而作

中華民國是不可毀的！袁世凱張勳康有爲等，曾有兩度正式的摧毀過她；日本軍閥曾不斷對她予以打擊，而且會把她蹂躪得遍體鱗傷；中國軍閥曾有一個長時期，把她弄得四分五裂；這些叛徒或敵人，在當時未嘗不是煊赫一世，好像其勢是不可侮的，可是都被中華民國的人民，將他們的人謀鬼謀，一一予以粉碎！

蘇聯開始盜竊中華民國，着手於民國九十年之交，她的方法却是比較的來得複雜，可以說一切運用陰謀：利用中國內部的矛盾，利用中國少數對政治抱有野心而不擇手段的人物，利用國際任何一個於她有利的機會，尤其要緊的是抱保提攜，培植一個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作為傀儡，供他們充分利用。陰陽開闢，變化不常，一會兒笑臉迎人，一會兒猙獰可怖，把他們那種苦寒地帶民族陰森殘酷的性格，發揮得淋漓盡致，其結果則德國人日本人上當於前，英國人美國人上當於後，一直到今天，如貝萬、尼赫魯、乃至蘇卡洛之流，也還是甘心受騙而始終不悟，至於在知識上自來落伍的人們，如毛、周、劉以及胡志明、金日成之類，其被他們玩之於掌股之上，自然更不待論。

蘇聯運用這種手法，已繼續不斷有了三十年以上，這種手法有一個最顯著的特色，便是以「鬥智」為主，「鬥力」為副，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輕於動用武力；即用武力，也必以他們次等武力運用於前，而蘇聯自身的主力不到緊急萬分的時候，仍決不會輕於一擲。

蘇聯為擾亂世界的禍首罪魁，世人已漸漸有了這種認識；蘇聯不倒，這一股所謂世界革命的狂潮便無法遏止，世人也漸次明白；所不幸的，世人還只知道如何厚集武力準備與蘇聯作最後的一拚，但在這個「鬥智」的過程中，即在這個蘇聯不肯輕於動用他們自身的主力，

而以和平共存作為掩護他們這一大陰謀的幌子的過程中，却不免情見勢絀，而終於無法令蘇聯感到致命的打擊，而使之不能不稍戢其野心。

我們承認：最後要把蘇聯鬥垮，終不能不有賴於武力。但在他們以「鬥智」為主，而以「鬥力」為副的階段中，則即有武力，也往往無所用之。在蘇聯「鬥智」的過程中，第一步在審度敵人無力而不敢輕於和他們去鬥（這一階段中他們的收穫已經着實可觀）；第二步在使敵人雖然有力而找不着主要的對手，以致無從發揮，甚至還意存僥倖，以為大戰終可倖免（現在便正在這一階段中，而可能把時間拉得很長）；第三步則在他們自身從容佈置，積極準備，一旦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候，即以武力硬拚，他們也可能立於不敗之地（這自然是他們一種不能不有的理想）。

我們現在正立於反共的第二個階段中，即是說正立於蘇聯自身還不肯動用主力，而只是運用二三等武力從事擾亂，而他們則期待運用國際，搖盪國際，以外交方式求取得更多收穫的階段中，即在這一階段中，我們不能不積極準備武力自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如果看得太單純，以為除準備武力以外即可無所事事，則算盤便不是這樣打法。未來大規模的反共戰爭中，決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單獨反共，而必然是一切反共國家的集體反共。單獨一個反共即美

國亦有所不能，何況我們？以我們去參加集體反共，因當前我們受着先天和後天的限制，就武力準備這一點來說，我們實無法不處於以美國爲首的這一體系之下，而切實求得其協助與配合，這是事實，不是理論。我們自身對武力準備的可能，不僅無法與擁有原子武器或氫武器的美英並論，乃至要與建軍後而具有現代工業基礎的西德和日本去度長絜短，也終於是望塵莫及！痛快言之，在以武力集體反共的這一階段中，我們可能佔着的地位不會太高，反之假如我們在準備武力的這一重點以外而能知所用力，換言之即除「鬥力」以外而能知所「鬥智」、「鬥政治」、「鬥思想」、「鬥經濟」、「鬥外交」、「鬥宣傳」、「鬥情報」，則我們感覺到我們可以用力的範圍或事項，却是相當的廣泛，而且就對付中共這一點來說，我們更是實無傍貸。

以最近的事實來說：中共開始宣傳所謂「解放台灣」，始於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爲時已在七十天以上；即從上月三號開始炮擊金門以來，也已一月有餘；我們因爲看見他們進展得這樣遲緩，便判斷他們準備不足，或畏懼不敢，甚至如金門守將劉玉章軍長的看法，認爲中共即要突擊金門，也要待於泗水過海，這似乎是過於輕忽，殊乖「知己知彼」之義。我們記得在中共還未加入韓戰以前的一星期，即以經驗豐富的麥克阿瑟元帥，也還不知道中共會要斷然加入，一旦他們以二十萬的大軍來一個入海的突擊，即當時已經到

達鴨綠江邊的美軍，也還是不能不有一次迅速的撤退，這豈不可以看出料敵之難！

據我們一部分朋友最近研究中共動態的結果，關於所謂「解放台灣」這一行動的開始，中共內部却是包括得有不少的矛盾的：自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等東來，以及他們在北平所發表的言論，攻台至少是得着蘇聯的支持的不管是事前的噉使或事後的默許，總之攻台斷然於蘇聯有益，攻台成功，蘇聯所得益處還小；攻台失敗，蘇聯所得的益處更大；而使美國的神經一時也不得休息，這自是蘇聯一貫的需要。說到中共的自身，其情況却不如此簡單，只要是出於蘇聯的願意或噉使，劉少奇等所代表的一派（即普通所謂國際派），當然除奉命惟謹以外，是沒有第二句話可說的；毛澤東周恩來等所代表的一派，則多少以維持現狀，不輕用武力為比較的有利，因為他們多少顧慮大陸的現實，或者說他們還多愛惜自己的本錢；中共若干的軍事巨頭，則顯然覺得所謂「解放台灣」，只是於他們有害，換言之，台灣果真「解放」之日，便正是他們鬼死狗烹之時，斯達林在一天內可以屠殺八個大將，他們想到這些事實，能不心驚胆顫？至於一般的所謂靠攏的「民主人士」，更是以台灣的存在為存在，現在已經快要用不着他們，更何論於台灣「解放」以後？共方內部的心理矛盾是如此複雜，或許這便是「攻台」遲遲無法進行的原因之一；渡海工具的不齊，蘇聯援助限度的難於確定，美

國態度的不可捉摸，天時地利種種條件的顧慮……也許反在其次。劉少奇看見周恩來從日內瓦「勝利」歸來而兩隻眼睛出火，周恩來以第四位站在最近一次的主席台上鼓着嘴表示滿肚皮的不高興，以一個久已打入冷宮的朱德，忽然爆出冷門，……凡此種種跡象，我們都不能不從中共內部矛盾日趨深刻的這一原因求之。像赫魯曉夫一類蘇聯的重要人物，不能不在這樣一個時候東來，其正面的作用固在對美示威，加強對中共的控制，其側面的作用，也許還把中共內部可能爆發的動亂，暫于鎮壓彌縫於一時哩！

我自然不敢說上面這段朋友們的研究一一合於事實，但至少可供參考，進一步言之，但在我們不應該只知道一個武力的重點，即估量敵人，也不應該僅僅以敵人的武力如何為惟一研究的對象啊！

今天是我們四十三年度的國慶，我有一最深的信念，我確信中華民國是不能毀的！但我還要強調的說：不能毀的不單只是中華民國之名，尤其不能毀的是中華民國之實，什麼是中華民國之實？這部現行憲法所代表的精神便是中華民國之實！這不是一句敷衍的話，這是一句存在我們心坎中許久而不能不說出的話，我希望台灣黨、政、軍若干最高的責任者，審度於成敗榮辱之際而加以相當的注意！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十月九日自由人）

## 泛論當前大勢

四年以來，我們會不斷的在本刊請國人提高警覺：

今天整個的世界問題決不簡單，也決不是急切所能得到解決；中國問題只是這個世界問題的一部，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因而內容也非常複雜，同時也決不是短時期內有可能獲得解決的希望。

反過來看，正因為中國問題早已變成了世界問題的一部，只要整個世界問題終於有得到合理解決的一天，我們便也深信中國問題終於會因世界問題的解決而得到解決。

今天的遠東問題，決不是中國大陸與自由中國對立的一個問題，不過遠東情勢其所以演成今日的嚴重，却以這一問題的尖銳化而表現得非常清楚。

尼赫魯及其同路人，以為只要把中共塞進聯合國，使台灣中立化，或以台灣交聯合國共管，遠東的情勢便可改觀；還有一種更簡單的看法，如英國的外相艾登，他覺得只要就中國沿海的若干島嶼求得一個適當的措施，遠東的緊張形勢便可趨於和緩。這類可笑的皮相之論不僅不能求得問題的解決，實際只是就問題解決的途徑上加以堵塞或添上障礙。

可是，若干年來抱有這種緩靖、苟安心理的人，並不以尼赫魯艾登為代表；一紙雅爾達的協定，斷送了中國的東北；一冊譴責中國的白皮書，斷送了整個中國大陸；如果尼赫魯艾登這類的說法，仍然可以在今天美國領導階層的人物中發生影響，我們便不能不為自由中國前途感到慄慄危懼。

誠然，中國問題之成爲一個世界問題，至少半世紀以來已經是如此；在此半世紀中，每逢着中國一個重大問題的發生，決不是由中國一廂情願可以得到解決，而總是若干強國的意見參雜其間；不過半數儘管是操之在人，至少也還有半數是操之在我。舉例言之，如第一次大戰後的一「山東問題」，誠然是因爲一九二一年開始的華盛頓會議而得到解決，但根本原因



還是由於中國在事前經過舉國一致的力爭。如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的對日抗戰，誠然是由於日本軍閥激怒了英美而得着共同的勝利，但假如不是中國經過八年全國一致的奮鬥，中國便無法贏得戰後那樣一個地位。即以後來的東北問題而論，即令雅爾達會議沒有那樣一種規定，我們是否便有方法有力量可以制止蘇聯的東侵？則令美國不發表那樣一冊譴責中國的白皮書，我們又是否有方法有力量可以制止在蘇聯掩護下的這一方張之寇？因為如此，追究淪陷中國大陸的責任，我總不願把這一筆帳完全寫在美國人身上，至少有半數以上應由中國自身毅然擔負。

現在的情勢，比已往是更加不同了，換言之，即中國問題的世界性比已往更來得顯然，其參互錯綜的關係和利害比已往更來得複雜，應付稍一失當，即很容易陷於一種無法補救的過失，而召致國家民族莫大的危險！

今天在海外，沒有人懷疑自由中國當局反共抗俄的決心，也沒有人否認台灣確有不少的人在那裏爲反共抗俄而努力，所值得檢討的：只是政策選擇的問題，用力重點的問題，人事安排的問題，國際配合的問題，一般風氣改造的問題等等。此外有一個基本態度須建立的，便是要確認反共抗俄是一個大題目，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所不會有過的大題目，中國從來沒

有過這樣嚴重的外患，也從來沒有過這樣凶得失的問題，也不是黨派政權興替的問題，存廢問題，祇有小題可以大做，決沒有大題

截至現在為止，美國的目的，似乎祇在乎祇在確保太平洋上這一條反共的防線，確執行整個太平洋一局部的警衛，也是我們所而且我們的認識是中國大陸的現狀不改變，窮！截至現在為止，美國所給予我們的軍經趕不上南韓，趕不上日本，乃至趕不上越南竟是美國在亞洲的政策上認識不足，還是我們不是一個兩個單純的原因，而還有其他更何，但我們的反共抗俄與光復大陸這一目標其在我的這一態度，總是不可少的。

在今天，我們要提出一套比較澈底、比

而且很怕容易引起誤會，甚至我們也還會覺得爲時尚早，可是始終隱忍不言，我們又更怕後悔莫及！無已，便還是避免具體，僅提出若干個人所憂疑莫釋的問題促起大家的共同考慮。

一、假定從現在算起，距反共抗俄與光復大陸的收功之日還有一段比較遙遠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政治機構，是否在台灣這樣一個島上，必須維持大陸時代這樣一個具體而微的龐大體系？是否能夠酌量裁、減、併，而求其更爲充實，更能發揮反共抗俄的力量？

二、要就反共抗俄這樣一個大題目而交出一本真正像樣的卷子，我們在今天自然會感到人才不夠，可是即以目前的台灣來說，是否仍有若干的可用之才依然是投閒置散或者是用違其才？那些憑藉一個機構號稱有事可做的人，是否便比較這些投閒置散的人確實來得優秀，而又確已表現其良好的成績？

三、以目前的情形來說，自由中國的國際地位自然還是沒有問題的；但以敵人不斷的進攻，年來在聯合國直接間接所遭受的精神威脅，以及出自各國當局口中或若干報紙雜誌一切是是非非的言論，是否使我們感到我們的外交陣容不够健全，成績不够良好，人才與地位不够妥適，經費不够充裕？

四、以我自己五年來海外居留的經驗，我深深感到凡是僑胞集中之地，我們決不缺少我

們可做的工作；假定就台灣今天投閑置散的人才，精選三百五百，有計劃的分配於海外各主要地點，使他們在同一目標之下去從事文化宣傳，從事華僑青年子弟的教育，從事思想上的反共抗俄，使他們去發揮各個的能力、素養、人格，以維繫海外千萬以上的華僑對祖國的希望，這是不是比較永遠凍結在台灣或取得一官半職以優遊自得要來得更為有益？

上面這幾點，只是就年所感到的舉例來說一說，此外可憂疑的問題還不在少數，但大致可以由此類推，也就不必細說了。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由人）

## 日本新局勢的展開

最近日本政局的變動，繼第五次的吉田內閣之後，居然有一個鳩山內閣出現，好像是偶然，實際却是很自然。

一、儘管吉田所領導的自由黨，在衆院依然以第一大黨的姿態出現，但自由黨外的任何黨派，却無一不集矢於吉田，在這樣一種的情勢之下，黨外的步調無法趨於一致，吉田還難以倖存，一旦所有倒吉田的勢力暫時歸於協調，吉田自非走路不可。

二、儘管在戰敗後的日本，吉田茂並不是沒有表現他可能的成績，但以吉田的個性、能

力、作風、對政治的理解，以及他所以取得自由黨領袖和首相地位的最初事實，他居然能超過他的前輩伊藤和桂聯續組閣至五次之多，這却是日本現代政治史上一件極可注目的事實。以我現在所研究的結論，其所以能如此的原因不外四點：（一）軍人干政之風已隨日本的戰敗與新憲的頒布而歸於消滅；（二）日本自明治以來，以這一時期最缺少有魄力的政治家，因而頗適於二流人物的存在；（三）「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日本敗後需要安定，需要元氣的恢復，吉田始終不變的親美政策，最適於這兩者的要求；（四）吉田究不失爲一保守派的有力人物，他能堅持反共的態度不變，這畢竟符合日本大多數人民的希望。可是時移勢遷，經過了六、七年的時間，國際風潮的鼓盪加劇，內部複雜的因素加多，過去吉田內閣所以能長期存在的這些條件已逐漸起了變化：吉田儘管親美，但無阻於國內反美空氣的暗長潛滋；儘管反共，但也無害於左傾勢力的突飛猛晉；日本當前的經濟情形，自然已與戰後頭兩三年的情況完全兩樣，但一個新起的僵局，却一天天趨於嚴重；加上鳩山重光這兩個人，儘管他們的資望能力未必一定便高於吉田，可是以多數日本人民一種窮變通久的心理，却不能不期待整個政局能有一新的轉換，而鳩山重光則要不失爲過渡時期勉強可以符合這種心理的人物；再加上鳩山吉田間的個人恩怨問題，以吉田的傲慢不遜，實有以促成鳩山一種必倒

吉田的堅忍氣概；積是種種，一個吉田不能不去的局面，因以趨於成熟。

三、自本刊發行以迄今日的這四年間，我們有一個一貫的看法，即說明蘇聯決定準備長期冷戰，除利用她的臣僕國家四出搗亂以外，她自己一定是躲在幕後操縱而決不出面。可是所謂長期冷戰，還是有一定的限度，即等到西德和日本開始正式建軍，則蘇聯將到底不能容忍。以亞洲的形勢來說，日本的大規模建軍，更足以促成蘇聯和中共的利害絕對一致，換言之，即蘇聯更有充分運用中共的可能。未來的世界大戰，其歸結自然是歐亞兩方對共產集體之夾擊，可是在蘇聯的立場看來，其首先發難的地點，則與其選擇歐洲，毋寧選擇亞洲。因為從歐洲打起，她的那些東歐附庸，實不堪一擊，而且內容複雜，難於運用，可能在大戰發動後的最短期間，蘇聯自身即須首當其衝，而且可能首先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亞洲的中共，則異常單純，而且確實是地廣人衆；蘇聯在近五年間，其對中共控制的周密，也着實可驚；把大戰的第一戰場首先在亞洲開關，一面可硬派中共犧牲一億的人民，蘇聯固然絲毫無所愛惜，中共也惟有敬謹接受。同時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只要在技術上能把亞洲大戰持續到一個相當的時期，則民主國家的幻想還不會迅速消滅，團結也不會十分澈底，換言之，即蘇聯還有可能不一定首先挨打，也還有從容應付的餘裕。凡此，都不是選擇歐洲作第一戰場所能

具有的便利。在過去四年間，蘇聯發動韓戰挑起越戰，現在又曠使中共高呼「解放台灣」，這在某一意義上，都可認為是蘇聯準備選擇亞洲作第一戰場的一種嘗試，一個序幕，其對於分化民主國家，困擾美國，加強中共，以及在亞洲擴大共產宣傳與滲透地域，均不能不說已收有絕大的效果，而蘇聯自身所耗費的却是微乎其微。處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的日本，其不能不起而自衛，自屬事理之當然；其轉瞬即將達到一億人口的這樣一個大國，斷不能永遠困處在幾個島上，亦屬不容否認的事實；再加上她生產力的龐大，原料的貧乏，市場的狹小，在在都要尋求出路；所以為日本的未來設計，決非僅僅自保所能了事，必須在整個世界的改造中另闢天地，斷不能支支節節而為之，這應該是日本今後立國的一個總方針。因此，日本的改憲建軍，刻不容緩；加強與英美合作，毫無疑義；反共抗俄，其責任亦無可推諉；環顧今日亞洲的國家，其對日本具有高度同情，深切理解，並且可與日本商討上列一切日本所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的，只有一個中華民國，然而非所論於今天的台灣，對整個亞洲大局，要求得中日兩國的通力合作，必須在中華民國逐漸進入大陸以後，中華民國對大陸進展一步，即日本的希望增加一分，中華民國的全部光復，亦即日本問題全盤解決一個切實的保證。吉田本人，對日本這樣一個死活問題，根本無理解；其魄力與才氣，亦斷然不足以語此；可是



日本已面臨決定這一重大國策的關頭，其政局不能不變，吉田不能不被迫而功成身退，實在是再自然也沒有的大事實。

在日本這次政局變動以後，一般的國際輿論（包括自由中國方面的一些看法），仍對日本前途抱有無限的杞憂，但我不是這樣看法，試分析其理由如下：

一、形勢強於一切，今天的日本只有一條與英美及其他民主國家合作反共的大路可走，斷無「騎牆」、「討巧」的可能。模稜的態度不足以見重於美，亦不足以見信於蘇，其結果可能兩面開罪，一無所得，而招致一個最後失敗的惡果。正式走上這條大路，自然可能遭遇一時的危險，但敢於加危險於日本的敵人，其自身必須具有更高度的冒險精神而後可，蘇聯敢嗎？站在反共抗俄的立場，以求得世界的改造，說毫無危險可言，世界上便從來沒有這樣便宜的買賣，大家以為日本人的智慧連這一點也不能理解嗎？

二、日本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經濟情況、以及其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態度，在本質上是保守的，近年誠然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在思想上不無左傾，日共直接、中共間接也在那裏推波助浪，因而勞工方面多少受到一些影響，但這究竟是一種浮面的行為，實不足以動搖日本的根本。假定真有一二左傾政團僥倖得勢，日本反共的潛力可能立即發動，根本加以打

擊。把日本的社會看成和中國一樣的脆弱，這可能只是中國人的一種錯覺。

三、日本今天一般的經濟情形，誠然不能說沒有弱點，人民的生活也還相當的困難，但明年度美國對亞洲的經援，一定可以加多，其總數的三分之二，可能直接間接的通過日本，因為就科學技術和工業設備去說，在今天的亞洲，也還只有日本才有運用二三十億美元這樣一個龐大援助的可能。如此，則就業的人數可能加多，人民的生活可能改善，這是防止共黨活動一種最有效的措施，經濟繁榮，應該可能促成日本政局的穩定。

四、因為鑑於上次的選舉，日本兩個社會黨在議會的席數同時加多，因而推測明年三月的選舉該兩黨更要得勢。但上次選舉的結果，我們只能解釋為一般人民對吉田政權的厭倦，並不能證明日本人民果已加強了對左傾政團的信心。在吉田個人已告退休的現狀之下（他的放棄自由黨總裁，其意義更大於他的辭去首相職位），我預測明年選舉的結果，兩個社會黨頂多能維持現狀，說他們就能給予保守陣線一個致命的威脅，這似乎是一種過慮。

五、所謂「保守陣線」，在日本的今天自然還是不存在的。可是國內國外的情勢，却已在鞭策他們非走上這一條團結的道路不可。即自由民主兩黨本身，也捨此別無自救救國的其它途徑。過去吉田本人，確實是形成這一保守陣線的絕大障礙，現在這個障礙既已移開，團

結工作比較的容易着手，自然困難還是很多的，今後便要看緒方鳩山們是否經得起來是少許一個政治家的考驗。

六、預測明年三月後的日本內閣，依然是一個保守派的內閣，可能以三種不同的形態出現：一、自由黨捲土重來，但首相已不是吉田而是緒方，由民主黨予以善意支持；二、民主黨以議席的躍進而聯續下去，而自由黨給以相當的維護；三、實現一個自由民主兩黨的聯合內閣，而仍以鳩山為首班，閣員則按議席公平支配。

總而言之，日本這次政局的變動，確實是由大環境的推動使然，決不能誤解為吉田、鳩山個人間的勢力消長，而且僅僅是政局轉變的一個發端，並不是轉變的一個歸結。他們這次改組政府的行動，誠然多少帶得有一種悲壯的色彩，但究竟還是遵循着憲政和政黨政治的常軌。儘管吉田個人及其少數親信，還想毅然解散議會作最後的掙扎，但結果還是不能不接受黨內多數的意見，出於總辭一途，這可看出即以吉田這樣一個倔強的領袖，他們的黨內還是能發揮一種民主的力量。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好好去加以玩味的啊！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自由人）